

目 录

译者的话	(1)
序言	(1)
第一章 苏联对外情报机关形成简史	(3)
1. 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局—国家政治 保安总局	(3)
2. 情报部—第四部—工农红军情报总局	(9)
3. 共产国际	(22)
第二章 中山中国劳动者大学和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为中国培养干部的熔炉	(57)
第三章 苏维埃政权在中国的情报工作	(69)
1. 争取承认的斗争	(70)
2. 驻北京的谍报机关	(82)
3. 驻哈尔滨的谍报机关	(96)
4. 驻上海的谍报机关	(139)
5. 驻广州的顾问和谍报机关	(173)
6. 张家口顾问团和开封顾问团	(194)
第四章 在中国工作的暂时收缩	(199)
结束语	(250)
注释	(254)

序 言

在苏联时期的著作中，苏联情报机关在国外，包括在中国的活动情况，是禁忌的题目。只有极少数情报人员经克格勃*准许，或者一些专业人员经情报机关准许，才可写这方面的情况。普通的研究者最好不触及这个题目。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准许印刷在国外出版的有关情报活动的书籍。然而，近10年来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叙述20世纪20—4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的数十种图书和文章纷纷问世。首先想提到的是由E.M. 普里马科夫院士主编、对外情报局出版的6卷集系列书《俄罗斯对外情报史概览》。同时还应说明一点，这样的出版在俄罗斯为破天荒第一次。现已出版了4卷，涵盖了1917年以前情报机关在革命前俄国的形成时期（第1卷）、1917—1933年时期（第2卷）、1933—1941年时期（第3卷）和1941—1945年时期（第4卷）。

俄罗斯已经发表一系列有关苏联情报机关的文章。国外对苏联对外情报机关的工作也早就表现出了兴趣。有关这一题材的新书和文章相继出现，档案材料不断公开，从而明显地扩充了我们对苏联对外情报机关的认识，有助于对许多新的事实和论据进行学术探讨，披露了一些新的姓名。不过应该公正地指出，我们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远没有掌握全部档案资料，对克格勃档案的研究还很薄弱，而已经公布的东西并非总是能够满足广大历史研究者的兴趣，许多人物和事实仍然未予披露，我们的历史依然留有一些空白。

* 即国家安全委员会。——译者注

笔者在拙著中只是想叙述苏联对外情报机关的形成过程，特别是与远东相关的那部分，介绍 20 年代在中国的情报工作（这一工作对那一时期我国同中国的关系状况有所补充），展示其复杂性和多面性及其成就和挫折。笔者的目的在于：对国内外现存的使我们感兴趣的这一题材的资料加以综合归纳。



第一章 苏联对外情报机关形成简史

在叙述苏联对外情报机关形成史之前，我想指出，开展情报工作有几条渠道：一、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局、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系统；二、红军军事情报系统（情报总局）；三、共产国际系统（在此我们不提及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外交部系统）。众所周知，共产国际的所有支部在组织局中都同红军各安全与情报机关保持密切联系。

1. 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

1917年夏季，在布尔什维克准备夺取政权之际，雅科夫·赫里斯托福罗维奇·彼得斯*（1886—1938）领导着党内一个反间谍机关。

苏维埃俄国自1917年10月诞生之后，就面临一项重大任务——同国内各种秘密的反革命组织作斗争，而这些反革命组织大部分都同外国情报机关紧密勾结，依靠它们的援助和支持。内战，饥饿，彻底

* 俄罗斯人及当时苏联其他民族人的完整姓名由名、父名、姓组成，一般按此顺序排列，但在需要突出姓氏的场合（如在名单中或人物介绍中），按姓、名、父名顺序，其中名和父名常用第一个字母代替（可放姓前和姓后）。行文时可全称，也可只称名和姓或名和父名（表示尊敬），还可只称姓或名，只称名时可用小名或昵称。这样，在书中就可看到同一个人的姓前有时出现两个字母（表示名和父名）、有时只有一个字母（表示名）的现象。如下文的 ф.э. 捷尔任斯基，视情况也可只写成 ф. 捷尔任斯基。——译者注。

破坏，经济崩溃，都十分尖锐地提出了苏维埃俄国本身的生存问题。在新政权面临危机的这种局势中，为了开展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的斗争，1917年12月20日成立了由Ф.Э.捷尔任斯基领导的全俄肃反委员会。由于内部和外部威胁紧密相连，同内部仇视新制度的秘密组织的斗争，以及同渴望消灭新俄国及其独立自主性的大多数国家进行的反革命活动和间谍活动的斗争相互交织，所以情报工作和反间谍工作的职能不久就交给了革命的“盾与剑”——全俄肃反委员会。

档案资料表明，全俄肃反委员会在其存在的最初几个月就开始尝试进行国外情报活动。

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一开始，就必须加紧与各种各样的外国间谍机关在红军内部的破坏活动进行斗争。1918年12月19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执行局通过了《关于全俄肃反委员会军事局和革命军事委员军事监察局（军事反间谍机关）联合工作的决议》。职业革命家M.C.克德罗夫被批准担任全俄肃反委员会这个新设机构的领导人。1919年1月成立了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局，而军事监察机关和各部队的肃反委员会改组成若干特别处。1919年2月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批准了《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局及其地方机关条例》，赋予各特别处同军内反革命和间谍活动开展斗争的使命。该条例指出，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局在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监督下开展工作，完成一切任务；经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协商，任命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一个领导成员为该局负责人。特别局归捷尔任斯基直接领导，负责监督红军军官们的“政治可靠性”。

全俄肃反委员会中央机关、陆海军中大的分队和一些省建立了特别局（处），内战时期托洛茨基成功地使用了红色近卫军各团的前沙皇军官。列宁和捷尔任斯基认为，这股可观的力量应该受到当局百分之百的严密控制，这些特别局（处）也应该监视这股力量。

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局的第一任局长是M.C.克德罗夫。1919年8月，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本人被委任此职，早些时候则由全俄肃反委员会领导成员B.P.缅任斯基担任。在特别局工作过的还有一位对外情报机关的未来领导人A.X.阿尔图佐夫（弗拉乌

奇)，他出生于移居俄罗斯的意大利籍瑞士人、干酪制造者的家庭，是 M.C. 克德罗夫的侄儿。

1920 年春，同波兰的战争遭到失败，迫使苏维埃领导人更加关注情报工作。1920 年 9 月，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对情报机关实行重大改组。决议指出：

毫无疑问，谍报工作的组织是我们军事机关最薄弱的环节，这一点在波兰战局期间暴露得特别清楚。我们盲目地向华沙进军，遭到了灾难性的失败。考虑到已经形成的这种国际形势，我们身处其中，必须将我们情报工作的问题提到应有的高度。只有严肃的、摆正位置的情报工作，才能使我们摆脱盲目的意外行动。

为了加强对国外情报工作的领导，1920 年在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局内组建了对外处。对外情报机关就这样扎根于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局了。它未取得独立的地位，而留在军队反间谍机构之内。

为了制定情报活动的改进措施，组建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斯大林、捷尔任斯基和其他许多人进入了这个委员会。根据该委员会制定的提案，捷尔任斯基 1920 年 12 月 12 日向全俄肃反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下达了如下指示：

我要求颁布由我签署的以下密令：未经我同意，全俄肃反委员会任何一个局（处）均无权自行向国外派遣谍报人员或全权代表或情报员。请草拟关于组建全俄肃反委员会对外局（同时撤销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局对外处）及任命该局局长的命令，命令还应规定，只有该局才能经由全俄肃反委员会向国外派遣谍报员。

于是在 1920 年 12 月 20 日，根据这项命令开始组建独立的对外情报机关——全俄肃反委员会对外局。

下面是捷尔任斯基 1920 年 12 月 20 日签署的第 169 号命令：

一、解散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局对外处，组建全俄肃反委员会对外局。

二、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局对外处的所有工作人员、财物、卷宗一律转归新组建的全俄肃反委员会对外局。

三、全俄肃反委员会对外局隶属特别局局长緬任斯基同志。

四、任命达维多夫¹同志为全俄肃反委员会对外局代局长，他必须在一周内将对外局的编制呈报主席团批准。

五、自本命令颁布之时起，全俄肃反委员会各局与国外及外交人民委员部、外贸人民委员部、中央后送站和共产国际常设局的一切工作联系，一律通过对外局进行。

《国家政治保安局对外局境外处条例》在该局的国外工作部分中指出：

“国家政治保安局对外局境外处是一个组织中心，集中领导和管理国家政治保安局所进行的一切国外情报工作。”

“为了按照国家政治保安局对外局境外处所拟定的方案，在国外指定地点完成上述一切任务，被称为谍报站长的全权代表拥有固定的居所。”

仔细制定的对外局工作细则指出，俄罗斯联邦在资本主义各国的外交和商务代表处均将组建以谍报站长为首的驻外谍报机关。谍报站长在代表处里应该有官方职位，其谍报员的身份只能向代表处的首脑透露。该细则还指出：“每位谍报站长向中心寄送密码情报每周不得少于一次。”为了保密，将谍报机关的情报提供者用号码表示，后来在实践中又采用假名。

“合法的”谍报机关网的创建就这样迈出了第一步。对外局的工作细则还规定秘密向那些同俄罗斯联邦尚无外交关系的国家派遣全俄肃反委员会各部门的谍报机关。

这样，自1920年12月20日起，Я.Х. 达夫强（达维多夫）被任命为对外局代局长。

达维多夫即雅科夫·赫里斯托福罗维奇·达夫强（1888—1938）从1920年12月20日至卡塔尼扬被任命为对外局局长之时，即1921年1月20日，担任对外局代局长；而从1921年4月10日起，达夫强正式担任对外局局长²。

自1921年8月6日起被任命为下一任对外局局长的是С.Т. 英吉列夫斯基，他在任上未干几个月，便在一次空难中牺牲了。

按照全俄肃反委员会行政组织局1921年1月14日颁布的第9号命令，组建了秘密行动局。特别局局长В.Р. 缅任斯基兼任秘密行动局局长。该局合并了三个局——行动局、特别局和保密局。特别局（局长为В.Р. 缅任斯基，副局长为Г.Г. 亚戈达，局长助理为А.Х. 阿尔图佐夫）下辖几个特科，其中第14特科负责东方国家业务（科长为卡卢日斯基）。过了一年，秘密行动局已经并进五个局：保密局、特别局、行动局、情报局和对外局。

按照全俄肃反委员会办公厅1921年12月2日第277号命令，制定并实行了对外局新的人员编制，同时还批准了该局新的人事配备方案：局长为С.Г. 莫吉列夫斯基，副局长为И.А. 阿佩捷尔，局长助理为Р.А. 皮里亚尔和М.А. 特里利谢尔；下辖境外处（处长为М.А. 特里利谢尔，副处长为Г.Е. 普罗科菲耶夫）、情报处（处长为Л.Б. 扎林，副处长为В.Ф. 维索茨基）、签证处（处长为Н.Ф. 乌加罗夫）。

1921年12月，米哈伊尔（梅尔）·阿布拉莫维奇·特里利谢尔（1883—1940）被任命为对外局的新局长³。特里利谢尔的档案卷宗里有他对其主管单位目的与任务的简要陈述（1922年5月）。其中写道：

在外国开展的全部情报工作应该达到如下目的：

- 查明每个国家境内进行反俄罗斯联邦活动的反革命集团；
- 详细侦察对我国进行间谍活动的一切组织；

——获取有关上述所有工作方向的有根据的材料。

……谍报站长应全力协助全权代表工作……同时，谍报站长也有权要求全权代表同样全力协助自己工作，特别是为了保守秘密，使用联络器材，转交国家政治保安局对外局拨来的现金之时。

对于人员编制的组成，特里利谢尔特别注重干部的业务素养、外语知识、驾驭谍报机关的本领和适应瞬息万变环境的能力。他邀请几位过去同他在西伯利亚和滨海地区一起搞地下工作的老战友到对外局工作。前西伯利亚驻军司令员的情报部长 С.Г. 韦列热夫当上了他的副手，而在满洲搞过谍报活动的 Я. 明斯克爾、А. 奈曼、А. 米勒则成了对外局各处的负责人。

1926年，根据捷尔任斯基的提议，特里利谢尔成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局长，同时任对外局代局长。

1930年，按照斯大林的指示，他被调去领导工农检察院所属机关的工作。根据西方的资料，他是回到共产国际任职。一些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例如，1935年8月21日，根据斯大林的提议，特里利谢尔化名 M. 莫斯克温，和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人 H. 叶若夫一起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书记；1936年1月，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决定，建立了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莫斯克温（M. 特里利谢尔）为首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机关工作人员职业技能检查委员会”。

1922年，全俄肃反委员会改组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直属国家政治保安局。苏联成立后，国家政治保安局又改组为苏联人民委员会直属国家政治保安总局。

作为对外情报机关的对外局被列入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组建的秘密行动部编制后，开始称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秘密行动部对外局。对该局的人员进行了扩充和加强，总数已达70人之多。

还制定了《对外局条例》，规定了对外情报机关的下列任务：

——揭露外国境内对苏联进行破坏活动的各种反革命组织；

——查明国外从事军事、政治和经济间谍活动的各种政府机构和私人组织；

——阐明每个国家及其政府在国际政治基本问题上实行的政治路线，说明各国对俄罗斯关系的意图，获取有关各国经济状况的情报；

——获取所有工作方向的有充分根据的材料，包括那些可以用来使反革命集团的首脑人物和整个反革命组织名誉扫地的材料；

——为在国外的苏联机构和公民进行反间谍工作提供保障。

为了完成这些任务，按地理位置组建了应该从事国外谍报工作的6个处，后来这些处统称为科。随着驻外谍报机关数量不断增多、谍报工作的地理范围日渐扩大及一个个新的情报工作方向的开辟，谍报处数量越来越多。1930年前夕，对外局总的人员编制上升到122人，其中62人为各驻外谍报机关的工作人员。

到20年代中期前，截获和破译密码情报，在苏联情报工作中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特科实施这种截译活动，自1921年至1937年，Г.И. 博基⁴是该科的领导人。该科早在1921年就在肃反委员会中开始工作，不过它当时的活动是专门性的，主要与劳改营有关。后来该科机关和人员逐渐转到情报资料的截获与破译上来。在此之前，特科的工作人员已成功查明了驻莫斯科的几个外国使馆的窃听装置。此外，他们还破译了一系列外交密码。

2. 情报部—第四部—工农红军情报总局

1998年11月5日，俄罗斯军事情报机关庆祝自己诞生80周年。正是在1918年的这一天，按照革命军事委员会第197/27号命令，宣布了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司令部的编制，该编制中包含登记局的编制，这个中央机构合并了此前早就存在的所有军事谍报机关。军事情报工作的目的是：收集和整理军事的、军事政治的和军事经济的情报，呈报最高领导。

但是，军事情报机关不是凭空产生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年代，俄军总参谋部下设的军务总监部负责掌管军事情报与反间谍工作。因

此，军事情报机关一直由总参谋部集中管理。军事情报机关的组织结构包括：一、野战领率机关：大本营和各方面军司令部；二、国外谍报机关：军事谍报员（即当时的所谓武官）和秘密谍报机关；三、敖德萨军区及东部的土耳其斯坦军区、伊尔库茨克军区、鄂木斯克军区、阿穆尔河沿岸军区和外阿穆尔军区的司令部。

除总参谋部的秘密谍报机关和我们在日本与中国的军事谍报员外，各军区司令部也有在远东开展谍报工作的职责。

将近 1917 年年终时，已经显而易见的情况是，俄军总参谋部军务总监部过于庞大。因此，当时决定将其一分为二：第一军务总监部和第二军务总监部。前者负责解决作战问题，后者开展情报工作，研究外国军事统计学，实施反间谍活动。第二军务总监部的领导人是曾在总参谋部军事学院任过教的 Л.Ф. 里亚比科夫少将。该部情报系统由侦察处和情报处理处组成，情报主任是里亚比科夫的助手、三等军需官安德烈·瓦西里耶维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上校⁵。就组织结构而言，第二军务总监部在 1918 年初由 8 个处组成。第一处（情报处）由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施瓦茨⁶ 领导。他是总参军事学院的毕业生，上尉，1918—1919 年为莫斯科军区司令部情报部的领导人。M.B. 蔡特林在其所著《司令部的情报工作》一书中回忆道：

……十月革命后，各个司令部的工作，包括情报工作都完全停止了，布列斯特和约签订之后，由于取消了所有司令部，情报工作完全中断。虽然各种各样的游击队在搞情报活动，但是任何人都没有集中统一这些活动，情报常常遗失……由于习惯使然，谍报侦察倒是持续了一些时候，从巴黎盟国委员会俄罗斯部和外国军事使团，特别是法国军事使团，还能获取一些情报。

一直到 1918 年 7 月底，都能收到法国军事使团提供的情报综合材料。

1918 年 5 月，由莫斯科军区司令部作战部改编的军事人民委员

部作战部，参与指挥各方面军进行的战役。起初，该作战部统一领导苏维埃俄国境内所有谍报工作及部队的情报工作，同时还完成了人民委员会给予的专项任务。当时主管情报工作的领导人是 Б.И. 库兹涅佐夫（1889—1957），他在以后的年代里一直在工农红军司令部任职（1940年起为少将）。

领导国外谍报侦察的依旧是总参谋部军务总监部，自 1917 年 11 月至 1918 年 5 月，军务总监 H.M. 波塔波夫（1871—1946）主持该部工作⁷。

随着 1918 年政府机构迁到莫斯科，总参谋部也迁到了那里，其第二军务总监部就安置在大莫尔恰诺夫卡 20 号楼（格列博夫私宅）。就编制而言，该部依旧由侦察（侦察）处和情报处理（区域性）处组成，其一切工作人员都是总参军事学院的毕业生。远东处处长是 K.И. 埃泽林格，他负责编写统计报告和北美、中国、日本情况概述。

1918 年初，这个部改为全俄总司令部作战部军事统计局。该局编制为 7 个处，由情报主任领导。其第 6 处就是远东处，承担的任务是：“根据我军事情报机关获取的资料”，研究有关各国的情况，特别是研究这些国家的武装力量，同邻国交战的可能计划，编印军用普及手册。

3 个处归登记部门（反间谍机关）领导。另外还有军事间谍处和普通处，由军事统计局局长直接领导。

当时军事情报工作搞得糟，其典型的原因是，主要机关在行动上缺乏联系，互不协调，孤立无助，全俄总司令部、最高军事委员会和军事人民委员部作战部领导力量分散。

1918 年 6 月，全俄总司令部作战部军事统计局就当时军事情报工作的实际情况指出：

当前几个机关同时开展情报工作，相互之间大部分没有联系，完全独立地接受某一项工作计划。由于上述几个机关之间在情报工作方面没有明确的职权界限，更没有对整个情报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已经明显暴露出并令人感觉到下列消

极现象：一、几个机关在同一方向上平行工作，因此对某些地区及有关资料完全不予关注，更不去侦察；二、一些机关过分挥霍情报工作经费，而另一些机关虽然往往具有成功发展情报工作的一切条件和能力，但工作经费却十分拮据；三、对上述所有机关获取的情报资料，缺乏一个机构来做统一综合和条理化的工作。不进行总结，对不成熟的材料不进行科学系统的整理加工，这样的情报工作对事业毫无益处，它自然会衰落下去；四、由于对上述所有机关的情报工作缺乏统一领导，整个情报工作杂乱无序、毫无系统性的特征显得异常引人注目。

为了改善情报工作，建立了制定《侦察和反间谍工作总则》的委员会。其成员包括：该委员会主席 C.A. 库兹涅佐夫（全俄总司令部）；全俄总司令部作战部军事统计局代局长 A.B.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及其战友——代理情报主任 A.Л. 诺尔肯、情报处长 H.H. 施瓦茨、登记处（反间谍处）代处长 A.A. 切尔尼亚夫斯基；来自最高军事委员会的作战部长的情报助理 B.M. 沙波什尼科夫；来自军事人民委员部作战部的军事监察局（反间谍局）局长 M.Г. 特拉克曼，以及各军区司令部的代表；来自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代表 Я.Г. 布柳姆金（惟一的非军事机关的人）。

这份文件共有三章：一、情报工作；二、反间谍工作；三、情报工作和反间谍工作经费。该文件确认，“对整个情报工作的领导，即对各种情报机关划分活动区域，布置工作任务，属于全俄总司令部的职责。”其第一章第二条称：

全俄总司令部负责领导：（一）和平时期、动员阶段和战时的国外谍报侦察；（二）在共同和平会议工作结束后，深入研究同情报“动员”密切相关的一切问题，而这种“动员”既能保证宣战时情报工作的连续性，又能保证国外谍报网与各大国军事同盟相适应；（三）依据第一条及同条第一

和第二项注释，对在俄罗斯共和国境内开展情报工作的所有机关，划分情报工作区域和布置情报工作任务；（四）对我情报机关获取的情报，进行最终整理加工和条理化工作。

为取代被解散的最高军事委员会及其司令部，建立了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及其司令部。Б.М. 沙波什尼科夫被任命为该司令部情报部部长，Ф.Л. 格里戈里耶夫被任命为该部情报处长。

1918年11月1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Э.М. 斯克良斯基*、总司令瓦采季斯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К.Х. 达尼舍夫斯基批准了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司令部的编制，任命前沙皇情报军官、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革命军事法庭成员、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司令部政治委员谢苗·伊万诺维奇·阿拉洛夫（1880—1969）⁸为登记局长。后来阿拉洛夫在劳改营一直呆到1953年。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司令部的组织结构中规定设立登记局，负责统一领导谍报和军事反间谍机关。登记局由两个处组成：1处——军事监察处（即反间谍处）和2处——谍报处，该处编制为39人（包括技术人员）。登记局内部举办情报和军事监察训练班。登记局和训练班按照命令安置在莫斯科普列奇斯捷诺克街35号、37号和39号楼，军事人民委员部作战部从前就在这几座楼里。从1918年5月起，阿拉洛夫就领导军事人民委员部作战部，现在大部分工作人员和他一起从该部转到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司令部。按照编制，登记局长的下属有：顾问Г.И. 特奥多里（他还是情报和军事监察训练班的负责人）；谍报处长В.Ф. 塔拉索夫，但几天后他就奔赴前线，由Г.Я. 古特列夫任代理处长；该处政治委员В.П. 帕武良，他很快就成了阿拉洛夫的副手；谍报科长Г.Я. 古特列夫，不过В.А. 斯雷瓦林调到谍报科工作后，接替了他。军事监察处（反间谍处）由М.Г. 特拉克曼及其助

* 根据正式文献材料，斯克良斯基（1892—1925）并未担任过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他在1917—1918年曾任副陆海军人民委员。1918—1924年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24年4月后未再担任）。1925年在美国出差时溺水死亡。——译者注

手、拉脱维亚人 B. 施泰因加特领导，他们都领导过军事人民委员部作战部军事监察处的工作。不过，军事监察处受登记局管辖总共只有两个月，之后该处转属全俄肃反委员会，其名称改为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局，局长为 M.C. 克德罗夫。

登记局 1 处 1 科科长斯雷瓦林在其谍报机关 10 个月工作总结报告中说：

正确的情报组织应被视为有如国家武装力量组织那样不可或缺，而且是国家武装力量不可分离的补充，否则，军队只能成为封闭的机体……

情报工作不能成为临时安排的事情，也不是手工业，因为它的基础是人数很少的秘密谍报网的活动，而这些谍报人员要精心挑选，尔后进行培养训练，传授需要的技能和知识，最后，在其常常成为重要军事行动根据的情报被认为可以信赖之前，还必须经受多次考验。做情报工作务必坚定顽强，持续不断，同谍报员的联系务必可靠。在国外的秘密组织应当是绝密的，谍报机关应达到以下标准：某个谍报员被捕或叛变，不会导致整个组织被破坏。谍报员的数量应该足够多，以能够通过大量印证，检验谍报员情报的真实性。

这份文件强调指出，欠缺愿意从事谍报工作的人员，党的工作人员中可用人员的比率很低（低于人员总数的 35%）。该报告还提到，谍报机关人员所受的教育程度低（66% 的谍报员所受教育程度是城市中专或者教会学校毕业），50% 的谍报机关人员是工人，90% 的谍报员不但从未搞过秘密军事情报工作，而且甚至从未搞过党的秘密工作。谍报机关还有其他缺点，斯雷瓦林指出了其中一点，即工作人员对从事系统、细致的工作缺乏强烈的愿望和客观态度。报告的作者在总结时提到了以下缺点：（一）谍报机关为数不多；（二）工作人员频繁变动；（三）配备干部未经选拔；（四）通信联络情况不佳；（五）“权力分散”（“在最近 3 个月呈送的陈述整个情报事业的大量报告中，

列举了从肃反委员会到各集团军司令员在谍报工作中碰到许许多多障碍的事实。”)。可以援引格奥尔吉·伊万诺维奇·捷奥多里的“档案”为例。1919年3月1日，阿拉洛夫在军事人民委员部作战部和登记局最亲密的助手捷奥多里被派往立陶宛、拉脱维亚、北方面军和其他方面军出差，执行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的谍报侦察特别任务。3月12日，他在德文斯克被特别局的人逮捕并押解到莫斯科。由于被怀疑搞间谍活动和参加了反革命组织，被囚于莫斯科布蒂尔斯克监狱和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局，一直到1921年1月4日。获释之后，他历任工农红军的各种职务，直到1937年4月再次被逮捕，并遭枪杀（1957年恢复名誉）。

1918年12月，全俄肃反委员会从军事部门收回了并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司令部登记局的反间谍机关（军事监察处），并完全改变了该处业已积累了一定工作经验的领导班子。由于捷尔任斯基的努力，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在1920年11月通过了由列宁亲笔签署的一项决议：登记局（军事情报机关）既隶属革命军事委员会，又以局的规格隶属全俄肃反委员会。但是，这项决定并未执行。

1919年6月19日，第一次通过了登记局条例。根据该条例，登记局被确定为“中央秘密谍报侦察机关”，归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直接领导（绕过该委员会野战司令部参谋长）。登记局内设三个基本单位：第1处——陆军谍报处，第2处——海军谍报处，第3处——战时检查处。陆军谍报处由四个科组成：北方科、西方科、近东科和远东科，其中远东科的工作区域包括西伯利亚、中国和日本。该处处长是H.M. 奇希尔任（纳扎罗夫）。但是在那些年代，领导人员经常变换。例如，早在7月份，阿拉洛夫就将其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司令部政委的职务交给了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委员С.И. 古谢夫，而在1919年初，他已交出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职务。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古谢夫（1874—1933）当上了登记局局长。后来他担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1924—1933年则在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机关工作。古谢夫之后，1920年1—2月，由Г.И. 皮亚塔科夫领导登记局；从2月起，则由弗拉基米尔·

赫里斯季安诺维奇·奥谢姆（1879—1937）领导⁹；到1920年7月，扬·达维多维奇·伦茨曼¹⁰接替了奥谢姆。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登记局的几位副局长身上。1919年9月，B.Л. 帕武良被解除这个职务，接替他的是 T.Л. 萨姆索诺夫，尔后（从1920年2月起）是 Д.Р. 伊波利托夫，而自1920年9月起则是 A.Я. 赛博特。到1921年1月，又来了一位副局长 A.M. 乌斯季诺夫。

谍报处处长也不断更换：1919年6月，B.Г. 济韦尔特当了几个星期处长，尔后领导该处的是 H.M. 奇希尔任，从12月份起为 B.K. 瓦尔特，1920年1月起为 B.H. 索科洛夫，4月起是 A.П. 阿普申，1920年12月起又改为 Я.К. 别尔津。登记局的地址为：卢比扬卡广场12号楼。

1919年12月，召开了登记局工作人员、各方面军和集团军代表、俄共（布）各国外局代表参加的会议。T.Л. 萨姆索诺夫在会议上宣称，在他来接任登记局副局长之前，谍报工作几乎没有开展起来，在此之前是无法召开类似会议的，因为登记局的各任局长只是被任命为这个职务，而没有履行这个职务；此外，也需要时间将所有军事专家从登记局中“清洗出去”——现在他们已经不存在了，今后谍报侦察将是阶级的了。

到1920年前，登记局为情报工作耗资近600万卢布。在编谍报员为285名。

从1920年1月1日起，登记局实行新的编制和条例。现在该局由四个处组成：动员处、行动（谍报）处、信息处、财务管理处，稍后又增设一个公共处。动员处吸收工作人员做“秘密情报工作”，训练他们，为他们制定工作细则和规定。

奥谢姆在1920年4月曾经指出，在国家“边境地带”白卫军后方开展的情报工作，随着这些边境地带的敌人被肃清而日渐失去其意义，或者收缩到最小的规模。在西欧国家、日本和美国开展深入的情报工作已处于首要地位，因为这些国家被视为潜在的敌人。奥谢姆写道，国外秘密情报工作明显不同于在白卫军后方进行的情报工作，前者需要开阔的政治视野，熟悉语言及当地环境。为此从（革命前的）

老俄罗斯侨民中挑选 10—20 名可以做共产国际联络员的人就行了。但是，难题是要找到这样的俄罗斯侨民，送他们到登记局任用。这份文件上的批示指出：“奥谢姆同志需要熟悉当地环境和通晓当地语言的人士给予帮助。”

快到 1921 年时，登记局的领导成员有：局长 Я.Д. 伦茨曼，副局长 А.Я. 赛博特和 А.М. 乌斯季诺夫。行动处处长是 Я.К. 别尔津，С.Т. 曼德里科和 В.В. 塔塔里诺夫“直接由他差遣”。该处第 1 科（行动科）科长是 Ф.И. 布什，第 2 科（组织科）科长是 Н.И. 尼科利斯基，第 3 科（技术科）科长是 Я.Я. 布连格曼。

迫于托洛茨基和总参谋部的压力，1920 年开始组建情报部；1921 年 5 月 3 日命令明确了它的组织形式。

1921 年的情报部共有 275 人。

过了一些时候，情报部改称红军总参谋部第四（情报）部，尔后又称为情报总局。该部起初在亚历山德罗夫军事学校办公，后来迁到兹纳缅斯基大街 19 号楼。

从 1924 年 3 月至 1935 年，情报总局局长一直由扬·卡尔洛维奇·别尔津担任¹¹。

1924 年 5 月，制定了新的《工农红军司令部情报部条例》，在那些岁月里一直负责情报工作的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И.С. 温施利希特*正式批准了该条例的细案。该部依旧有一个总务（行政）处和两个业务局——第 2（谍报）局和第 3（情报统计）局。情报部部长由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长协商）委任，“按总的序列隶属工农红军司令部参谋长，在谍报侦察及组织方面，则直接隶属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一个委员”。1924 年，取代了情报部的情报局只剩下 91 名工作人员。

从 1926 年 9 月起，工农红军司令部各部、局的名称都用代号表示。情报部从那时候起变成了第四部。该部的组织机构也随之发生一

* 据苏联正式文献材料，温施利希特并没有担任过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而只在 1925—1930 年担任过副主席。——译者注

些变化。从 1925 年 12 月起，又恢复了第 1 局（军队情报局）。从 1926 年 9 月起，出现了新的第 4 局（对外联络局）。同时密码处从第 2 局分出，成为情报部的第 1 处——密码处。领导第 1 局的人员如下：1925 年 12 月起为 H.A. 谢苗诺夫，1927 年 2 月起为 A.И. 格列恰宁，1930 年 3 月起为 B.E. 卢茨克维奇。

从 Я.К. 别尔津 1925 年上半年呈人民委员部领导的报告中，可以明显看出当时摆在情报部面前的目标和任务：

情报部的基本任务是：为红军最高指挥机构、各级司令部、机关、部门和部队及苏联国家和党的相关机构服务，提供有关外国，特别是我邻国和可能的敌人军事实力现状，以及这些国家针对苏联的计划和企图的情报。对达到这一目的所必需的资料，情报部首先依靠自己的谍报机关获取，其次从外国报刊和文献中，从一些文职机关（例如：外交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安局、共产国际等）发出的偶然性的通报中获取。这些资料总量极大，需要做大量工作，对它们进行整理、评价、检验和加工……

情报部对建立专业图书馆开始给予较大的关注。1925 年，该馆藏书超过 48000 册（含杂志）；仅 1924—1925 一年间，收入该馆的图书就有 4275 册，各种杂志 9929 期。

第 3 局局长 A.M. 尼科诺夫¹²的报告让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了 1924—1925 年情报部的工作量。尼科诺夫透露，“经过情报部谍报机关获得 9851 份（总计 84148 页）谍报资料和 3703 册图书、杂志；此外，情报统计局还直接从外交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及其他一些机关获得资料 1986 份，这样我局所获取的资料总量达到 11837 份。”此外，该局还获得并整理了由 25 个国家以 24 种外语出版的 110 种外国日报和 247 种期刊。同时，作为自我批评，尼科诺夫在其报告中也指出，侦察机关与整理机关（即第四部的第 2、第 3 局）在工作中相互配合不够。

从 20 年代下半叶起，工农红军第四部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各处之间，围绕双方的驻外谍报站长获得而呈报上级的情报的“正确性”、“可靠性”、“珍贵性”，日益激烈地展开了竞赛与斗争。而且在 20 年代下半叶和 40 年代进行情报工作（包括在中国的情报工作）的全过程中，都能感觉到这种斗争的余波。

可以举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特别局上报的一份报告书作为例子。该报告书称：

从工农红军司令部情报部一些负责人就驻英、美两国谍报机关状况的谈话可以看到，驻这两个国家的谍报机关的工作令人极不满意。从英国常常寄来一些毫无价值的材料。如果说极为罕见地传来多少有点价值的资料，那也是从官方经济报刊上摘录的东西。驻北美合众国谍报机关的工作更加糟糕。有材料表明，这样的驻外谍报机关对自己的职能根本明白了……驻英美两国谍报机关在执行任务和使用资金方面的所作所为，可以视为漫不经心、形同犯罪地对待事业。

1925 年曾任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书记的工农红军司令部情报部部长助理 Б.Б. 博尔特诺夫斯基（1894—1927）在 1926 年 6 月不得不向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伏罗希洛夫* 写了一份专门报告，谈到了上述“报告书”中指出的驻英、美两国机构的工作情况。他断言：“谍报机关报告书中所表达的极端不满，只是反映了至今确实未得到服务的政治部门的情绪。既然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外局主要是做政治谍报的工作，那么这一事实不会令我们感到特别不安。”写报告者把指责军事谍报站长工作“漫不经心”特别作为不正确的意见予以否

* K.E. 伏罗希洛夫（1881—1969），苏联重要领导人，苏联元帅（1935）。国内战争时期历任集团军、方面军司令员等职。1925 年起任陆海军人民委员、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4—1940 年任国防人民委员。卫国战争期间历任方向总司令、方面军司令员、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战后曾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译者注

定；同时强调指出，这只是“情报整理机关个别工作人员”的意见，而这些人员既不了解谍报站长们的个性，也不了解工作条件。博尔特诺夫斯基指出：

实际上在这些国家里，我们拥有因为过去的工作而知名的、非常认真负责和久经考验的同志。即使工作成绩不好，也不能责备他们漫不经心。……作为结论，我可以指出，整份报告书所反映的是第3局政治部门的下级工作人员的情绪。由于这些人员对工作勤勤恳恳，对某些资料的缺点往往不满意。由于客观条件所限，我们在这方面的的工作并非总能让人感到满意。

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与军事情报部门对情况评估出现的分歧，在其他许多事情上也有表现。工农红军副参谋长 C.A. 普加乔夫早在 1925 年 8 月就指出过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

……苏联陆海军人民委员部各指挥机关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特别局之间就队伍战斗力的评定问题出现分歧，其原因是后者以一些相互没有联系的个别事实为基础作出结论，因为后者的全部工作主要是要揭露反面的东西，而不是发现正面的因素……

1927 年 4 月，第四部主持召开了各军区情报机关工作人员会议。工农红军参谋长 M.H. 图哈切夫斯基致开幕词，指出了军事情报工作的一系列缺点。别尔津和尼科诺夫在发言中介绍了第四部的工作状况。尼科诺夫专门讲了在东方各国开展情报工作的情况。他指出：

现在已经积累了有关这些国家的大量资料，这些资料只是部分地得到整理加工，还在不断补充新的材料。在现有资料基础上，已经能够相当清楚地阐明东方各国的情况。但

是，东方正在发展的民族解放斗争和世界资本主义的进攻，正日益强烈地直接冲击着苏联，以后东方各国也将受到应有的关注。必须熟悉日本武装力量的详细情况。由于政治和其他各种条件，日本至今未引起我们谍报机关足够的注意。但是，日本作为一个拥有一流陆、海、空军的国家必会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依据上述体现第四部情报工作特点的资料，可以说，目前第四部具备足够的条件，将工农红军各部队和各级司令部研究外国军队的工作提到应有的高度……

会议闭幕时，工农红军副参谋长 C. A. 普加乔夫做了总结：

我希望，在第四部的领导下，情报工作的一切手段都将动用起来。不应该忘记，黑云已开始笼罩地平线：波兰人在 1925 年侵犯了边防哨所，发生了中东铁路问题，最后是我驻北京大使馆和驻上海领事馆遭到袭击。假如我们奉行另一种政策，那我们早就加入战争了。但是，我们不想要这个东西。至于中央机关，我们将竭尽全力减轻你们的工作负担。

到 20 年代末，第四部已经拥有利用合法渠道工作的强大国外机构和分支机构众多的秘密情报网。1929—1930 年，拨给该部的经费是 75 万美元和 51.5 万卢布（此数目不含驻外使馆陆海军武官的工资和工作出差费用）。

第四部的业务干部主要靠毕业于工农红军军事学院东方系和基本系及其他军事学院的指挥员来补充，这些学院的学制一般都是 4—5 年。情报部还举办一些为期一年的供指挥人员进修的训练班，在这里学习的都是经过专门训练的人。另外，还有一所谍报高等专科学校。

几乎从军事情报机关存在一开始，就发生了毫无根据地镇压情报人员的事件。这些人最好的结果是，根据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特别局的坚决要求，被解职，遭逮捕，受监禁；最坏的结果是被枪决。其中有：Г. И. 捷奥多里（由于被怀疑搞间谍活动和参加反革命组织，

1919年3月12日在德文斯克被特别局的人逮捕，押到莫斯科，囚于布蒂尔斯克监狱，直到1921年1月4日。后来获释，1937年被枪决)，我们在前面介绍过他的情况；Б. И. 库兹涅佐夫（1919年被捕）、Г. Г. 季马（1922年被捕）、Р. Я. 格拉西斯（1923年被捕）、О. А. 约恩福尔（1924年被捕）。1927—1929年期间，一个“审查各中央部局人员”的绝密委员会在军事部门开展工作。Я. К. 别尔津被任命为这个委员会的主席。

3. 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于1919年创立之后，就庄严宣布自己是世界革命行动党，竭力成为准备和实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某种司令部（特别是在其活动的最初几年）。许多档案文件证明，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从共产国际作为“世界革命司令部”这种角色出发，开始积极利用“革命合理”的推断，将那些法律规范和其他规范视为“资产阶级的”、“阶级异己的”、甚至是敌对的规范，一概予以排斥。

共产国际的大部分领导人——顺便说，俄共（布）的大部分领导人也一样——头脑中占统治地位的、关于“革命的权利”、“革命的合理性”、“革命的良知”等至高无上的观念，对于他们毫不客气地对待国界和民族关系有着重大影响。这也影响到如何为正在建立的各国共产党所开展的革命宣传等活动提供经费的问题。

1920年8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指出：“共产国际的目标是：运用一切手段，甚至拿起武器，开展推翻国际资产阶级的斗争。”为了进行这样的斗争，需要建立相应的组织。“共产国际实质上应当确实、真正地成为世界统一的共产党，在每个国家活动要求的党则是其独立的支部。”

同时，信奉列宁世界革命的理论，要求“东方所有觉醒的”民族团结在苏维埃俄国周围，向世界帝国主义发动决定性的进攻。

当时在莫斯科创立的共产国际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者。1920年3月，列宁在庆祝共产国际成立一周年之际指出：可以担保，

共产主义革命在所有国家的胜利不可避免……共产国际将在全世界和不太遥远的时间内取得胜利，这一胜利是有保障的。

众所周知，布尔什维克在这些年实行的对外和对内政策，就以一整套充满矛盾和幻想的思想为依据，这些思想的基础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根据这一总思想，通过民族解放革命破坏和粉碎帝国主义外围势力，被赋予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一工作中，共产国际占据应有的地位。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机关曾制定共产党员在外国军队中进行瓦解工作的细则。共产国际的档案里存有一份绝密文件草案：《在资产阶级武装力量（陆军、海军、警察、宪兵队、法西斯组织）中开展工作》。

最后定稿的这份秘密文件命名为《军队内工作实施细则》。该文件由俄文译成了德、美、法三种文字，应该认为也被译成了中文。德语文本标明的日期为1928年8月31日。《细则》就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对下述问题的态度作了最为详尽的表述：如何对待革命的夺权斗争和武装起义？如何对待共产党人瓦解军队的军事秘密工作，即平时和战时，特别是发生反对苏联的军事行动时，对资本主义各国的国家机构实施的破坏活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特别指出：

保卫苏联应该置于消除军事危险斗争的中心。各国共产党务必指引国际无产阶级支援各国民族革命战争和革命；务必在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中开展反战工作，一旦发生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务必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提出“变世界大战为国内战争”的口号，换言之，提出“变世界大战为国际社会革命”的口号。

无论是在苏维埃俄国境内，还是在外部世界，都奉行公开采取革命暴力的强硬方针，致使共产主义的领袖们对任何道义性的警告，包括文化活动家科罗连科、高尔基的警告，都置若罔闻。无政府主义理论家П. 克鲁泡特金在1920年12月21日致列宁的一封信中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将革命推向一条灭亡之路？之所以会灭亡，

主要是因为存在种种缺陷，这些缺陷根本不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固有的，而是一个毫无限制的、吞没一切的政权统治下的旧制度和旧污秽的残迹。”他的问题没有得到回答。克鲁泡特金向列宁写这封信的起因是《消息报》和《真理报》刊载了一项声明：苏维埃政权决定逮捕萨温科夫¹³和切尔诺夫¹⁴集团中的社会革命党人、民族中心和策略中心¹⁵的白卫分子及追随弗兰格尔的军官作为人质；一旦苏维埃领袖遭到杀害，就决定“残酷无情地枪毙”这些人质。

克鲁泡特金问列宁：

难道你们当中找不到一个人提醒自己的同志，并说服他们相信，这样的措施意味着回到中世纪和宗教战争的最坏时代，有损于开始创建未来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建设者的声誉，而珍视共产主义未来的人不可能采取这样的措施吗？难道没有一个人去说明什么是人质吗？一个人质被投入监狱，但他不是犯人。把人质关起来，是为了用他们的生命威胁自己的敌人：“你们杀我们一个人，我们也杀你们一个人！”——然而，难道这不是等于每天早晨拉出一个人去处死，却又把他送回监狱，对他说：“等着吧！不是今天！”

难道您的同志不明白，对于人质及其亲人来说，这无异于精神折磨吗？

我希望谁也别告诉我，掌权者活在世上，同样不愉快。现在，甚至有的国王也担心自己的生命会遭人谋害，并视此种谋害为“他们的职业特点”。

……即使国王和神甫也拒绝了像扣押人质这种残暴的自卫方式。新生活的宣传者，新社会生活的建设者，怎么可能使用这样的武器来防备敌人，保卫自己呢？

可否认为这件事就是一种征兆，即你们认为自己的共产主义实验已遭到失败，你们拯救的已经不是你们所珍视的新生活的建设，而只是你们自己？

难道您的同志没有意识到，你们共产党人无论犯过多少

错误，都是为了将来的工作吗？没有意识到，你们因此无论如何都不应该用近乎兽性的恐怖行动来玷污自己的事业吗？没有意识到，正是过去的革命者所采取的类似行动，才把新的共产主义尝试弄得如此困难吗？

我相信，你们当中的精英会把共产主义未来看得重于自己的生命。对这一未来的向往，应该使你们摒弃这样的措施。

在此我们还想让读者注意到罗萨·卢森堡对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民主与专政的观点所持的批评意见。大家知道，罗萨·卢森堡高度评价布尔什维克的历史首创精神，因为布尔什维克通过在俄国夺取政权，勇敢地走在世界无产阶级的前面，为他们做出了榜样。与此同时，她极其明确地表达了自己不赞同俄国布尔什维克在民主问题上的观点。她认为：

列宁-托洛茨基理论的主要错误正在于，他们如同考茨基一样，把专政同民主对立起来……考茨基在为自己解决问题，自然有利于民主，也就是有利于资产阶级民主，因为正是他把民主当成一种抉择同社会主义变革对立起来。列宁、托洛茨基则相反，从对专政有利而与民主相对立的立场解决问题，因而有利于一小撮人的专政，也就是资产阶级的专政。对立的两个极端离真正的社会主义政策同样远。

罗萨·卢森堡又写道：

自由如果只给予政府的拥护者，只给予一个政党的党员，不管他们的人数如何众多，这都不是自由。自由永远是思想不同的人的自由。这不是因为“公正”的狂热，而是因为政治自由振奋人心、治愈百病，纯洁人世的一切功效，全依赖这一本质。自由一旦成为一种特权，那么这种功效便告

终止。

……

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没有各种意见和主张的自由斗争，任何社会机构里的生活都会如一潭死水，会变成生活的幌子，其活跃分子只会是一些官僚……而且，这样的条件必会导致社会生活的野变化——导致谋害、枪杀人质，等等。这就是强大客观规律，任何政党都不能摆脱其影响。

罗萨·卢森堡在 80 多年前讲的这一席话，就是在今天听起来仍然令人感到那么现实。

罗萨·卢森堡认为，布尔什维克犯错误的原因，是在欧洲被孤立的俄国革命处于极其异常的条件。但是，她看到了一种严重的危险，就是布尔什维克“把贫困装饰成美德，现在他们想把由这些命中注定的条件强加给他们的策略，逐条逐项全部从理论上加以固定，推荐给国际无产阶级作为值得效法的社会主义策略的楷模。他们就是这样不但完全没有理由地将自己真正的、无可辩驳的历史功绩埋葬在一大堆不得已的错误行动中，而且为国际社会主义事业做了些坏事。他们为这一事业而战斗厮杀，饱受苦难，竭力将俄国非常环境造成的过错当做新发明提供给国际社会主义宝库，而这些过错归根结底是国际社会主义在这次世界大战中遭到破产的后果……我们大家都受历史规律的支配，而社会主义政策只有在国际范围内才能实现。”

总之，共产国际所采用的一整套行动手段和方法的共同点，就是强调使用武装暴力，尽管这并非总是达到目的的唯一途径。共产国际的行动因此常常违犯某个具体国家的刑法规定。由于共产国际整个系统的指挥中心是莫斯科，所以，不管共产国际同苏联各国家机关之间，或者同俄共（布）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只要这种关系一经建立起来，苏联政府就要为共产国际的行为承担责任。这一切，决定了共产国际机关组织，亦即其内部机构组成和工作人员的活动方法近乎主导性的原则——绝对保密。他们就是运用这种办法，不但竭力防

止共产国际本身的行动暴露，而且竭力隐蔽共产国际同苏联政权机构之间不间断的通讯联络，尽管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

红色工会国际总书记 П. А. 罗佐夫斯基于 1923 年 12 月 28 日就苏联政府同共产国际的相互关系问题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著名的专函。罗佐夫斯基写这封信的起因，是 1923 年 12 月 18 日美国国务卿休斯在美国参议院发布了美国政府拒绝同苏维埃俄国政府进行谈判，拒绝同它恢复外交关系的声明。按休斯的说法，美国政府拒绝的理由之一，是存在“一直持续不断地宣传推翻我们现存制度”的事实。12 月 19 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份供报刊登载的声明。该声明陈述了似乎是共产国际下达给美国工人党的“指示”的内容，其中要求它组建射击和进行破坏活动的“战斗支部”。美国国务院企图借此论证苏联政府同共产国际的同一性。Г. 契切林曾就此事发表声明：“休斯公布的任何文件似乎都充斥着发给美国工人党的指示，都详细叙述了已经制定好的革命计划。这纯粹是假文件。”

共产国际作为一个组织的某些方面及其活动，直到今天仍然处于五里雾中。究其原因，既因为远非所有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都被记录在案，也因为许多当事人基本上在 1937—1939 年的镇压时期已经去了“另外一个世界”（据极不完全的资料，被杀害的共产国际领导人有 100 多名）。顺便说，我们在后面将很直观地看到军事情报机关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一些活动家。

于是，罗佐夫斯基建议“通过一项今后经常可以引证的正式法令，庄严声明苏维埃政权同共产国际之间互不制约的“绝对独立性”。罗佐夫斯基写道：“在这项决议中给予休斯及其他外交骗子应有的回敬之后，大致可以这样说，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全俄代表大会庄严声明，共产国际和驻共和国联盟境内的红色工会国际都是志愿的国际联合组织，其活动不可能受苏维埃政权及其机关的监督。另一方面，这些革命工人的志愿国际联合组织也不可能监督只向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汇报工作的苏维埃政权的活动。”罗佐夫斯基坦率地写道，这样“一份声明今后应该是我们所有外交官的掩护”。

与此相关，有件事情很使人感兴趣。英国政府依靠自己的情报机

关获悉，M. 鲍罗廷在中国当政治顾问，就向苏联方面询问这位“顾问”在中国担任的角色。李维诺夫回答，“对这个鲍罗廷，无论是他还是外交人民委员都不认识。如果他在中国有什么活动的话，那也不在苏联的管辖范围。”

共产国际将其境外的组织用作苏联对外情报工作和组织起义者作战的工具，是共产国际 20 年代的典型工作方式。对斯大林及其周围的人而言，共产国际只是逐渐变成了“进行破坏活动和情报工作的干部的供应者”而已。

考虑到国外对共产国际的革命活动持明显否定的态度，其代表人员在国外的的工作不得不在秘密条件下进行，并同全俄肃反委员会对外局的情报机关和军事情报机关密切协调，经常在苏联全权代表或者商务代表处的外交“庇护”下开展活动。一个典型的情况是，苏联对外情报机关的许多领导人来自共产国际的机构，或者在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工作过。例如，从 1919 年 3 月 29 日起，Я. 别尔津就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常设局成员；从 1919 年 7 月至 1920 年 8 月，他还是由 3—6 人组成的小常设局成员。许多杰出的苏联情报员都是在共产国际的机构里开始自己的情报活动，以后经过相应的考验，再转到工农红军司令部情报部或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外局工作。

根据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儿子提供的资料，共产国际的国外“站”（即谍报站）的数量，既不亚于工农红军总参谋部第四部的谍报机关，也不亚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外局的谍报机关。共产国际的情报机关有时被外国的研究者称为“政治情报机关”。

但是，每一个谍报机关都在独立地为本部门工作，不能相互取代。这一点从 1921 年 8 月 8 日《共产国际国外部门、情报部代表和全俄肃反委员会代表条例》草案中看得非常清楚。

一、共产国际的代表不能同时成为全俄肃反委员会和情报部的全权代表。反之，情报部和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代表同样不能履行共产国际的代表及其各局的职能。

二、情报部和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代表无论在何种情况下

都无权向外国政党或集团提供经费。此种权利仅属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注：未经共产国际同意，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同样无权向外国政党提供经费。)

全俄肃反委员会和情报部的代表不能向外国政党和集团建议为情报部和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

三、情报部和全俄肃反委员会只能通过共产国际的代表要求各国共产党给予帮助。

四、共产国际的代表有义务向全俄肃反委员会和情报部及其代表提供一切可能的协助。

季诺维也夫和皮亚特尼茨基代表共产国际，温施利希特代表全俄肃反委员会，阿尔维德·赛博特代表情报部，共同签署了这份文件。

为了实际工作的开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组建了自己的机关。根据政治任务的变化或俄共（布）内部斗争的突变，在共产国际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些机关曾经多次改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机关下设几个局，它们都管辖一些工作部门。

共产国际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世界代表大会。代表大会休会期间，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担负领导责任。为解决同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活动相关的最重要问题，需召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内部，一开始就建立了集体领导机构。

根据俄共（布）中央的建议，1919年7月建立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小常设局。1921年9月14日，小常设局易名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选举产生，并在其会议上报告工作。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领导机关，这个主席团一直存在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是1919年作为执行委员会的技术组织机关成立的，在不同时期，书记处由一个或几个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领导。

在1920年7月至8月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专门

讨论了民族殖民主义问题，并在总体上通过了共产国际在东方的行动计划。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在巴库、塔什干、上海成立了三个区域性的“东方革命运动领导”中心。在1920年秋至1921年秋期间存在的共产国际土耳其斯坦局（塔什干），下设两个行动分部，一个在中国的西北部（准噶尔和喀什地区），另一个在安集延和阿拉木图（当时称韦尔内）地区活动。根据共产国际关于必须坚持合法活动与秘密活动相结合的原则，在共产国际土耳其斯坦局的组织机构内，一开始就进行了严格的分工。例如，那些秘密基地沿着与东方各国接壤的边境，在编内秘密教官帮助下开展境外情报工作。

然而，共产国际土耳其斯坦局的工作效率却存在很多问题。A. A. 越飞检查了该局的工作，然后向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契切林呈上一份报告。他在报告中坦率地指出，他“十分清楚，这个机关益小害大”，“实际上是一些政治上幼稚的人在做工作，他们拿革命当儿戏……虽然花钱无数，却什么事也没做”。

1921年10月19日，越飞给季诺维也夫寄出一封专函，对共产国际土耳其斯坦局的工作做出了颇为详尽的鉴定。他确认，“中国的工作完全没有做”，而“在喀什-准噶尔地区的工作，可以归结为组织我国境内的贫民”，“这没有什么政治意义，但是，却可以导致这样的结果，那些归国人员会被毫不留情地枪毙”。

共产国际国际联络局。1920年8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小常设局¹⁶通过决议，决定建立机要局（取代第一次代表大会后不久建立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特别联络委员会）。该局的组建工作由1903年加入共产党的拉脱维亚人达维德·萨穆伊洛维奇·贝科（贝卡）¹⁷负责。顺便说，贝科的工作，同他的著名老乡扬·别尔津一样，有任用自己同胞的显著特点。在他的任期内，国际联络局机关内的关键位置都被拉脱维亚人占据，其中一些人在贝科离任后仍然留在共产国际工作。例如，贝科在国际联络局的副手就是他的亲密朋友西蒙尼斯·贝尔吉斯（1887—1943），他1905年加入共产党，侨居德国和美国，1937年12月被逮捕。到1920年11月11日前，该局最后定型为以贝科为首的保密局。但是，这个局过于弱小，又组织得不好，完全不能适应其面

临的工作任务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需要。从1921年6月起，该局称为国际联络局（缩写为OMC，这是一个闻名于全世界的缩略语），下设联络、拨款、文献、密码几个处。国际联络局领导共产国际的全部秘密活动，拥有同世界各国共产党领导人直接联络的多分支机构的系统。可以说，国际联络局是共产国际各局中最为秘密的一个局，其活动都是地下的。单从表面看，国际联络局完全是模仿任何一种谍报机构，就是说，它拥有完整编制，包括合法的和秘密的工作人员、信使、译电员、无线电报务员、假护照和假文件制作机关。其主要任务是在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之间进行秘密联络，包括传递情报、文件、指示和资金，从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调派职员，等等。在共产国际工作过的、奥托·库西年·艾诺的妻子写道：

国际联络局是最秘密的一个部门。这是大脑的中心，是共产国际中最神圣的机关。国际联络局的全权代表网覆盖全世界。共产国际的命令通过国际联络局的谍报员发给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国际联络局的全权代表把共产国际拨出的用以开展党的工作和宣传的经费交给各国共产党。……所有秘密的贸易企业、代表团和秘密情报机关都归这个局领导。该局还做编辑情报、为情报加密和解密的工作及宣传工作。

此外，国际联络局又是共产国际同总参谋部情报机关之间，以及共产国际同秘密警察局之间的联络环节。

总之，共产国际所有秘密贸易企业和秘密情报机关都隶属这个局。该局还做编辑情报、为情报加密和解密等工作。其职能还包括组织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及工农红军情报部的协同。此外，国际联络局的编制内还有个文件处，其领导人是弗里茨·米尔特。签证、护照、印章、文件就在这里制作。

1921年5月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小常设局任命И. А. 皮亚特尼茨基¹⁸为国际联络局局长，他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上任。

皮亚特尼茨基的副手 П. А. 翁佩 (1890—1925)¹⁹从 1922 年 12 月起成为该局局长，从 1925 年 8 月起，国际联络局局长由 M. 格罗尔曼担任；尔后到 1926 年 6 月，则由 A. E. 阿布拉莫维奇接任，他与阿尔布雷希特、亚历山大、切图耶夫、阿尔诺、伍德罗、M. 哈伯 (1888—?) 齐名。A. E. 阿布拉莫维奇于 1926—1931 年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组织局顾问，1926—1930 年间，曾间断地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派驻中国的代表，后来做科学教育和经济工作，1961 年退休。他离开国际联络局后，И. А. 皮亚特尼茨基 (他此前同时负责共产国际预算委员会、共产国际执委会组织处、组织局和书记处的工作) 将 A. П. 阿布拉莫夫从柏林召回莫斯科。阿布拉莫夫载入史册的姓氏为阿布拉莫夫-米罗夫²⁰，他当时为共产国际国际联络局首批国外据点之一的领导人。1926 年他被任命为国际联络局局长。阿布拉莫夫-米罗夫的第一副局长为雷利斯基-柳别列茨基，第二副局长为 С. В. 布里奇金娜 (1883—1967)。1926 年国际联络局的工作人员有 33 名，1927 年有 45 人。而到 30 年代中叶，仅在莫斯科机关工作的人员就达 65 名。

1920—1921 年，国际联络局相当大部分工作是在莫斯科与各国之间接送共产国际各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宣传书籍、各种货物 (包括武器)。负责这项工作的是按照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定建立的、由国际联络局管辖的专门信使机关。1921 年 1 月 21 日，小常设局根据贝科的报告，决定“请求俄共中央：(一) 在外交人民委员部 (外交信使局) 工作人员中保留一名由共产国际委派的同志，负责完成共产国际交给的任务；(二) 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照此办理；(三) 在每个商务代办处都照此办理”。共产国际得到了这样的权利。

应该说明一点，信使勤务和机要通信是当时最通行的联络手段。30 年代初以前，铁路运输仍然是远东地区的基本运输手段，因为正常的莫斯科-新西伯利亚航空邮政直到 1928 年 8 月 1 日才开通，途中要四次换乘飞机，全程持续时间为 26 个小时 30 分钟。

1922 年 8 月 30 日，俄共 (布) 中央组织局决定，从此在莫斯科市区以外寄送秘密信件，应该由重新建立的、隶属内务人民委员部国

家政治保安局的专门机要通信分队负责实施。伊尔库茨克用作对中国的“情报收集站”，赤塔则面向蒙古。尔后将从这两个城市收集的情报，依其作用每三周一次发往中国和蒙古。不过，这样做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局书记И. 穆辛于1923年3月22日抱怨，莫斯科-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一线缺乏传递情报的可能性。由于正式的机要通信路线只到赤塔，继续下去的情报传递，只能依靠同各地区党的机关工作人员达成“君子协定”来实施。如果某个“非正式信使”因故失踪，共产国际中央机关同赤塔以东各地区支部，特别是同各外国支部之间的全线情报交换就将遭到破坏。经由机要通信系统，平均要经过一个月时间才能收到对书面通知的答复。情报从一个收件人传递到另一个收件人的一个月到几个月期间，各地的情况会发生重大变化，中央机关却不可能考虑到这些变化。

苏维埃俄国驻中国全权代表A. 越飞在1923年1月27日致列宁的信中痛苦地承认，长距离缓慢地传递情报和文件，有害于革命事业。他在信中写道：

我们好几个月没有收到莫斯科发来的任何东西了，没有收到训令，没有收到指示，甚至连新闻性的重要消息都没有收到。我往莫斯科发送内容详尽的电报消息后，常常收到通知，说这些意见很宝贵，但是应该撤销了。²¹我通常依靠信使传递有关中国的情报，只是在极个别情况下才发电报。考虑到中国毕竟在经历一场革命，这里的各种事件极其迅速地演变，由于这一切而造成了互相完全隔绝。在此情况下，我依靠信使上报的那些事件，经常是在您收到我的报告时，已经发生了变化，并且已经被其他往往与之相反的事件所代替，而您时隔好久才得到的是对已经不复存在的事件的看法。对此应该补充一点，您经常就涉及中国政治的问题发出一些指示，但不是发给我，而是发给远东局，发给远东革命委员会，而这些指示同我在这里实行的政策相矛盾，更常常同您本人以前下达的指令相矛盾。

在那几年，一个最为复杂的问题就是资金供给。共产国际几乎总是经受着境外工作经费的不足。还在1919年初，Л. М. 加拉罕就曾呈送列宁一份有关资金供给问题的“绝密”备忘录。加拉罕“要求在1919年第一季度1—3月份向外交人民委员部拨款20万金卢布，用以支持东方的工人组织，派遣宣传员去东方开展宣传工作。”计划向备忘录中列举的国家派遣“宣传员”，鼓动受压迫的群众参加无产阶级革命，所列国家中有中国、朝鲜、波斯、印度。

根据索科利尼科夫和皮亚特尼茨基的报告，政治局于1922年4月专门作出决定拨出，并由斯大林签字批准的共产国际第一笔预算资金金额为5536400金卢布。

但是，在这些年，正式的预算只是为共产国际活动拨款的一部分。经常从所谓“储备基金”、政治局基金、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预算中拨出款项，以满足各国共产党这样或那样的需求。例如，1922年4月，加拉罕向斯大林报告，他将一大笔钱交给了朝鲜人（两次为总值60万卢布的黄金，一次是价值400万卢布的珍贵证券），用以建立两个印刷厂（在上海和北京），并在朝鲜开展直接的抗日秘密工作，包括组织武装抵抗斗争。

共产国际向各地运送的通常不是纸币，而是贵重的珠宝、钻石，这些物品秘密过境比较容易。它们占的地方比较小。常见的做法是，将贵重物品藏入共产国际派往某一国家的谍报员穿的皮鞋鞋掌和便鞋的后跟。在共产国际的档案中，找到了一份很有意思的文件，这是1919年8月18日写给俄共（布）中央书记Е. Д. 斯塔索娃的又一封信，信中答复为什么共产国际各机关需要相当数量的皮革：

尊敬的斯塔索娃同志！我们需要皮子是为了做鞋掌用。我们要把贵重物品，主要是钻石，藏到鞋掌里。现在我们就有做这件事的可靠人员。

我恳请您在我们的信上作相应的批示。

谨致同志的问候。

看来，给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调拨了所需要的皮子。

然而，并非总是把钱花在该用的地方，而往往花在别处。例如，共产国际东方局领导人 Г. И. 萨法罗夫向斯大林报告，有些资金和珠宝给了“某些小组不负责任的人。”他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将 20 万金卢布送给了胡翰根和高志日，以支援朝鲜的民族运动。可是后来发现，这些钱竟被用来维持朝鲜侨民中的派别斗争！

还有一个人所共知的事例。日本人多吕良原（化名诺吉）1920 年从美国来到俄国。他在美国是威廉·海伍德领导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积极分子。此人在俄国参加了 1920 年在巴库召开的东方各民族第一次代表大会，并且是 1921 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1921 年秋，他受共产国际委托，前往日本，以恢复同日本共产党人的联系。他随身带有价值很大的宝石，为建立日本共产党提供资金保障。但是，他竟肆意挥霍掉了这些财宝。

显而易见，滥用钱财的现象已经到了有目共睹的程度，以致列宁不得不亲自草拟了俄共（布）中央 1921 年 9 月 9 日密函，其内容如下：

毫无疑问，共产国际向各资产阶级国家的共产党提供资金，当然是完全合理而必要的，不过有时却导致胡作非为和令人作呕的滥用钱财。

为了毫不留情地同这种滥用钱财的丑行作斗争，俄共（布）中央向所有在国外工作、驻留或通过某种途径十分熟悉这一工作的党员写这封密函。

中央声明，中央认为下列行为属于最严重的犯罪，对犯有此种罪行者，一律无条件地开除党籍（且不说只要有丝毫可能，就追究其刑事责任，并公诸报端，令其声名狼藉）：

——任何一种滥用取自共产国际的资金的行为（为了满足炫耀其“左派”或“革命性”的欲望，为了保障自己或他

人享有高于党的工作者平均水平的生活条件，等等)；

——将花费这些资金的详情对中央作哪怕最细微的隐瞒，此处的隐瞒理解为以直接或间接的一切方式，使中央无法获知在国外花费每一戈比和从共产国际获得每一戈比的最精确和绝对真实的情况。

所有如此隐瞒实情的罪犯，无论是出于故意，还是因为漫不经心，中央将一律视之为窃贼和叛徒，因为即便在国外敷衍塞责地（且不说不正当地）花费钱财，其所造成的危害也超过叛徒和窃贼所造成的危害好多倍。

任何一个从共产国际领到钱的人，都会预先得到警告，他务必绝对一丝不苟地遵循一切细则和条件，它们是保障俄共（布）中央了解有关花费每一戈比的十分完整、快捷和真实情况所必需的。

中央委托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的俄共党员，立即制定最为详尽的细则，规定共产国际执委会资金支出原则和报告制度。

这个细则的主要规定应是：

一、未经加入共产国际的当地共产党中央批准和同意而擅自动用资金，应被宣布为盗窃行为；

二、凡领取钱款人员，即便只是转交，都必须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开具收条（或者邮寄收条），以证明收到钱款和符合支出规定；

三、凡领取钱款人员务必将每一戈比支出的情况告知至少两位身在花钱地点的同志，其中至少有一个人应该完全具备合法身份，就是说，他从未参加过任何哪怕最小的秘密行动；

四、凡领取钱款人员，都应该每三个月至少一次亲自到莫斯科（或者第三条中提到的人员之一到莫斯科），极其详细地书面报告每一戈比的支出情况。

B. 皮亚特尼茨基的父亲当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预算委员会主

席，同时兼任俄共（布）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书记、共产国际组织局领导人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人事秘书处的领导人。据皮亚特尼茨基证实，他父亲很快就整顿好了财务秩序。然而，根据 20—30 年代德国共产党领袖之一和共产国际活动家的妻子玛加雷特·布贝尔-诺伊曼的回忆录可以得出结论：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她举了一个例子。她的丈夫诺伊曼按照斯大林的嘱托，应该会见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1927 年 7—11 月）B. B. 罗明纳兹²²。并与他一起到广州参与起义的领导工作，同时他们还应该为起义者带去一些资金。于是，罗明纳兹和他的朋友诺伊曼在中国的一个港口（预定为上海）会面了。玛加雷特·布贝尔-诺伊曼回忆道：

他们乘坐一艘大型远洋轮船，继续向香港航行，但他们很快就落入过分的保密陷阱。在旅行中他们当然用的是假名字，言行举止尽量不惹人注意。他们考虑最多的是手提箱里的贵重物品。两个人总有一个在舱里值班守护。但是，当轮船行驶到下一个港口，要停泊好几个小时，所有乘客都上岸参观城市风光时，两个朋友为难了。他们该怎么办呢？留在船上，让别人怀疑自己吗？或者把贵重的行李丢下，无人看管？他们两人当时还年轻，行事轻率。不过，这么短的时间内手提箱能出什么事呀？最后，他们确信没有人盯梢后，也上岸了。他们回到码头时，得到的是一个令人败兴的消息。乘客们得到通知，不可能再让他们上船了，因为很快就会刮起台风。轮船必须遵守航行时刻表，已经开走了。他们只能在明天由另一艘轮船送到香港。不言而喻，他们的行李由轮船公司负责看管。

他们该怎么办呢？共产国际的两个密使惊恐万分。他们无论如何都不能把手提箱交给“轮船公司负责”啊。他们找了一个又一个帆船主，但结果令他们失望。每个人都摇头：我可不去找死哟！就在已经丧失一切希望时，诺伊曼和罗明纳兹找到了一条破旧小船的衣衫褴褛的船主，那条小船恐怕

只能勉强在海上行驶。小船主人答应把他们送到船上。确实，他驾着自己可怜的小舢舨，把他们送到了已准备起航的轮船。手提箱没有动过。但是，发生了他们恰恰不想看到的情况。他们惹人注意了。不过还好，这没有妨碍他们顺利抵达香港，再乘火车到达广州。

在广州一家旅馆的房间里，诺伊曼和罗明纳兹见到了“中共广州分部的负责同志”，他们应该把钱交给这些负责同志。中国人数了两次美元，情绪激动，低声说了些什么，又到隔壁房间交谈一会儿，然后对共产国际的两位使者说，钱数比等待和告知的数额少 3000 美元。两位使者十分震惊。这就是说，当他们不在时，有人打开过手提箱。诺伊曼和罗明纳兹请中国人再数一遍。钱仍旧那么多。他们要求往上海打电话，询问手提箱里的钱到底是多少。上海方面的回答更是出乎意料：对方说出的钱数居然比罗明纳兹和诺伊曼送到的还少 2000 美元。诺伊曼指出：“这件事情证实，共产国际机关当时的财务状况简直是一团乱麻！”

解决财务问题有时要耗费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相当多的时间。例如，1921 年 6 月 18 日，在 Я. Э. 鲁祖塔克主持召开的共产国际土耳其斯坦局工作会议上，九项议程中有三项是为了解决财务问题，其中一项决定指出：“拨出一大笔款项（中国货币）及相当大数量的鸦片 (!)，作为往中国南方派遣谍报员的费用”。

在共产国际国际联络局与外交人民委员部之间，起初在一系列组织和财务问题常常产生矛盾和纠纷。

外交人民委员部与共产国际各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1926 年春甚至被上报到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通过了专门提纲。该提纲指出，利用外交人民委员部机关“完成共产国际委托的党的工作任务，应该遵守严格保密和维护外交人民委员部机关完整的所有原则。共产国际交给外交信使的一切任务，一律由皮亚特尼茨基和维利科维斯基（后者为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负责往国外传递外交邮件）同志转达，同时要求他们个人负起严守秘密的责任”。“经俄

罗斯联邦批准和同意，共产国际的代表可委托外交信使完成其在国外的工作任务……由信使专送的共产国际代表的邮件必需通过使馆机关传递”。在特别重要的情况下，准许通过俄罗斯联邦的全权代表机关向共产国际的谍报员拍发密码电报，“但条件是，这些电报的报文应毫不掩饰地告知全权代表，以便译成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密码”。

该提纲还附带说明，“利用外交信使勤务，需要注意到与各方商定的不可侵犯的外交邮件的极限重量，因此，只能利用该勤务邮寄书信和重量轻的包裹。”说明中还专门强调，发送这种邮件，“必须最严格地减轻重量——写在卷烟纸上，用薄纸做信封，避免用过多火漆印”。作出这样的说明并非偶然。譬如，根据俄罗斯联邦政府和德国政府 1921 年 2 月 18 日签订的关于两国代表机关互惠权利协定，外交信使的秘密行李重量被限制在 15 公斤以内。但是，苏维埃俄国外交邮件的这个限重，以及该协定所规定的“信使行动自由”，还是引起了德国内务部长的“特大怀疑”，他还向德国外交部长提出了抗议（1921 年 3 月 25 日）。这位内务部长断定（看来，他倒是近乎了解真实情况），俄罗斯联邦的外交邮件袋里“装的是鼓动世界革命的宣传材料，而不可能是别的东西，因为俄国找不到能够出口的任何更好的玩艺儿”。

产生了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和客人的路费问题。外交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 1921 年 9 月 29 日作出决定，“对共产国际的外国来宾收取同其他人一样多的路费”。皮亚特尼茨基随即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提出异议（其抄件发往外交人民委员部）。他在信中指出：“外国共产党员的路费不是由自己负担，甚至不是由党负担，而是由共产国际负担。签证费和路费都得用外汇支付，而外汇是我们通过财政人民委员部和外贸人民委员部，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得到的。”按照皮亚特尼茨基的说法，既然每个月到莫斯科的客人有 30—40 名，那么，“所支付外汇自然只得从拨给共产国际的黄金储备中提取。倘若我们要依靠黄金储备向一个苏维埃机构支付外汇，那么我们就不得不为这笔费用扩大预算。可否在苏维埃机构之间直接进行重新结算呢？”（我们举个例子提请注意，共产国际 1922 年 4 月份的预算为

315 万金卢布，其中 40 万拨为后备基金。)

1921 年 10 月 13 日，外交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对皮亚特尼茨基的信件迅速作出反应，通过了如下决定：

“部务委员会听取了关于对乘坐外交人民委员部车厢的共产国际代表不收路费的意见。考虑到保密的需要，以及收取的并非外交人民委员部车厢费，而是全程路费，决定：拒绝”。

1921 年 10 月 24 日，在 A. 叶努基泽主持召开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通过了类似的决议：“拒绝申请”。然而，资金供给问题却没有从议事日程上删除。这两个组织仍然为钱争来斗去。根据 Г. 萨法罗夫和 Л. 加拉罕的报告，1922 年 4 月 20 日，“关于外交人民委员部与共产国际在东方工作资金供给方面的相互关系”问题被提到了政治局。于是政治局作出了以下决定：

(一) 规定凡未与共产国际协商，未经政治局批准，外交人民委员部今后在东方一律不得动用任何一种有特殊用途的经费；

(二) 对外交人民委员部未与共产国际和政治局商量而动用经费提出警告；

(三) 委托政治局于今年 4 月 20 日任命的委员会（莫洛托夫、索科利尼科夫和皮亚特尼茨基——见第 3 号记录第 8 项）在审查共产国际预算时，从中拨出一定款额，用于增加在日军士兵中进行宣传鼓动的经费。

于是，该委员会从共产国际总额为 40 万金卢布的后备基金中，给远东各国共产党拨出了 10 万金卢布。

还有一个例子。外交人民委员部曾拒绝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局的工作人员加入自己的代表团和使领馆。1921 年 10 月 12 日，共

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局局长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为此致函季诺维也夫：

按照莫洛托夫的嘱托，我被召到俄共中央。给我看了契切林的信。他在信中援引俄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和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互相分离的决议，反对我们的代表加入赴挪威代表团。我声明，中央委员会授予我们派一个代表加入每个代表团的权利，我们不可能放弃这一权利。可以争论的是，某个代表是否胜任，是否需要派往某一工作站。但是，郑重其事地提出问题是为了让共产国际和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互不相干，以致我们不能拥有自己的代表，不能发电报，完全不能利用国家机关，这样做是不行的。

1921年2月2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发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各局局长一份通函，要求“了解和遵守以下规定：为了整顿工作和保守秘密，一切对外联系，如：邮寄信函，订购文献，转寄印刷品等，务必毫无例外地交国际联络局执行，并且只能通过该局掌握的手段实施”。

20年代初期，国际联络局由四个处组成：密码处、传递（联络）处、会计财务处（会计核算和财务）、技术设备登记处（在这个名称掩护下，发挥假文件制作中心的职能）。1923年建立了所谓技术处。尔后在组建密码处的同时，组建了登记处，负责登记各国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感兴趣的人士的各种资料及地址。登记处内设照相洗印室和照片档案库。

国际联络局的经费是依靠共产国际的预算外资金来解决的。国际联络局工作人员在致共产国际领导的一封信中指出：“我们在国家银行中还有第二个往来账户，户名是‘红色体育运动国际运动员第八训练基地’，一旦‘共产国际’账户遭到责难，我们就启用这个账户做业务。”国际联络局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还常常利用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基金的外汇进项。

国际联络局在莫斯科市区外拥有自己的一些秘密设施，其用地都被带铁丝网的高栅栏围着，还受到军事化的勤务组和警犬的精心护卫。

例如，位于波德利普基的基地（在共产国际的文件里，该基地的加密名称为“1号基地”）负责制造文件专用纸，制作假护照、证件，制造填写假护照、文件的专用墨水及其他常用材料。

在罗斯托金诺（“2号基地”）有一个强大的无线电中心。该中心拥有最先进的技术装备，能够让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局同驻西方和东方大多数国家的谍报机构保持可靠的联络。Д.Г. 利普马诺夫（格列泽尔）曾是该中心的领导人。这里应该指出，共产国际和苏维埃情报机关的活动家们起初明显过高估计了自己的保密能力和条件，而过低估计了西方情报机关的能力²³。比如，英国情报协会（主要训练政府通信译电员）总部依靠埃内斯特·费特尔莱因（费蒂）就“破开”了莫斯科用来同英国和东方各国（首先是阿富汗）的外交代表保持联络的全部密码。这个埃内斯特·费特尔莱因是沙皇俄国“黑色办公室”的主管密码分析员，他和妻子藏在瑞典的一艘轮船上，躲过了搜查，逃到了英国。在克里木歼灭了白匪男爵弗兰格尔的红军南方集群总司令 M. 伏龙芝，就是最早评价苏维埃密码系统被破译程度的领导人之一。1920年12月19日，他气愤地给莫斯科写了以下信件：

从原弗兰格尔塞瓦斯托波尔无线电台台长亚姆琴科今天交给我的报告中可以看到，我们百分之百的密码由于过于简单，都被敌人破译了……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的一切敌人，特别是英国人，对我们内部的军事作战指挥和外交工作一直了如指掌。

莫斯科获悉在西方和东方所使用的密码和电码都已被破译后，立即采取措施研究和运用新的密码和电码。例如，1920年底，苏维埃贸易代表团在伦敦得到指示：一直到“新的密码系统研究成功之前”，只靠信使传递信件。1921年初，开始使用新的苏维埃密码。据英国

密码专家承认，以后好几年国外都无法破译这套新密码。

1925年，皮亚特尼茨基在国际联络局的第一副手阿布拉莫夫为了保障国际联络局同外国共产党机关的无线电密码联络，在梅季希创办了一所训练共产国际外国无线电报务员的秘密学校。

在普希金诺镇近郊的“3号基地”上有一所创办于1933年的共产国际通信学校，按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习惯，称为“国际运动员第八训练基地”。校内设有许多专用实验室。选进这个学校的学员必须年轻、聪明、单身，能够学习语言和技术。学校的课程设置非常广泛，多种多样，要学习语言和未来工作区域的地理、历史。特别注重学习密写、秘密工作方法、密码技能、莫尔斯电码、通信手段。研究在地下工作条件下利用就便材料制造通信设备的各种方案。

早在1920年，共产国际就建立了一所军事学校。1921年1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小常设局就改善该校经济状况、培养以后能成为本国党内军事组织者的学员通过决议。然而，共产国际执委会小常设局于1922年8月26日又通过决议，关闭了这所军校，其优秀学员转到了俄罗斯联邦的一些军事部门。

1921年—1922年，皮亚特尼茨基领导的国际联络局在许多国家，包括中国（上海），建立或改组了一些秘密联络站。设在国外的这些联络站只归国际联络局直接领导，该局千方百计地让这些联络站免受各有关国家共产党领导及苏俄一些部门的某种监督。

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局的两个“友邻”——工农红军情报部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外局的密码电报、经费和文件，经常通过国际联络局的联络站转交。同样，这两个“友邻”在必要时，也对国际联络局的工作给予帮助。

国际联络局主要从其他共产党（非联络站所在国共产党）的职员中，常常是从侨居在外的共产党人中，选调各联络站的关键工作人员。但是，由于警察的追捕变本加厉，侨民的存在加剧了联络站工作人员的心理紧张，大大提高了冒险程度和遭到破坏的可能性。信使穿梭般的往来，同样会引起当地政府的极大怀疑。在遭受一系列挫折之后，这促使国际联络局于1923年认识到，必须利用国家政治保安局

的机要通信部门。

国际联络局工作的秘密性，在国外实施的秘密行动，都要求为这些行动找到某种掩护措施。供共产国际使用的大量印刷品、各种货物和商品，不断运到莫斯科的外贸人民委员部。共产国际的电报、无线电报，只通过外交人民委员部拍发到境外（为此专设了“外交人民委员部共产国际执委会无线电报拍发代表”一职）。为了运送人员和货物，国际联络局使用根据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人民委员会的决议调拨给它的专用火车车厢和商船。据 P. 法利戈和 P. 科费尔的资料，到 20 年代末，国际联络局的“国际联络地下谍报员的实际数”接近 200 人。

从 20 年代初起，国际联络局的工作人员通常都是苏联大使馆、商务代表处、塔斯社代表处及苏联其他国外合法组织的职员。

共产国际执委会联络部门的一位领导人 B. 奥尔洛夫在 1939 年 3 月 4 日就所谓“留埃格案”（又称“诺乌连斯案”）（雅科夫·鲁德尼克²⁴与妻子都是国际联络局联络站的领导人，1931 年在上海被捕）所写的一份报告中指出：

1927 年之前，国际联络局的工作人员持有外交护照和公务护照，被秘密派往苏联各外交代表处驻在国。也就是说，对政府和其他机关职员而言，国际联络局的工作人员属于普通职员，可实际上完全为国际联络局工作。同莫斯科的一切联络——汇款、发电报、寄邮件和印刷品，都要通过外交人民委员部各机关来做。另有一部分工作，由国际联络局工作人员在苏联大使馆内完成。在英国阿科斯的几个房间被搜查，以及 1927 年苏联驻北京大使馆被搜查之后，决定按新的更加保密的原则，对国际联络局在各国的工作进行改进。禁止国际联络局的工作人员在苏联机关内会见外国共产党员、存放秘密档案或制作假护照。外交邮件只能用于领取钱款、邮寄密码财务报告，以及用于解决共产国际系统的外国人办理赴苏联入境签证问题。

1928年3月1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专门听取皮亚特尼茨基汇报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工会组织与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之间通信联络的整顿问题。通过了斯大林签署的如下决议：

为了整顿中国共产党和工会组织与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之间的通信联络，必须：

（一）在哈尔滨组建不受苏联机构管辖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局的一个处。国家政治保安局各机关应在那些不经过国家边防哨所和没有正式签证的派出人员通过苏联领土时提供各种帮助。

（二）从哈尔滨领事馆工作人员中挑选一个可靠的同志，负责向莫斯科拍发电码电报和接收同样的电报。该同志应与国际联络局哈尔滨处的一位同志秘密联络。

（三）领事馆不应存放任何物品。这位工作人员不应在自己那里接待任何人（总之，在全权代表处做类似工作的同志所应具备的条件，这位同志也应该完全具备）。

1921年10月成立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组织局，该局应研究共产国际各支部——各个独立的共产党的组织机构问题，并“对个别支部的地下工作进行监督”，因为“反革命在逐月变得越来越厚颜无耻，而且并不局限于政治领域，在同共产党人的斗争中，竟采用恐怖、谋杀、服苦役等手段”。1923年初，Г.Н. 维经斯基²⁵进入了组织局。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以后，组建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局的工作继续进行。1921年末到1922年初，共产国际有两个部门负责实施其东方政策：近东中东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秘书处，后者经常被称为远东局。远东秘书处在伊尔库茨克已经有较为固定的分支机构：领导机关和四个部——蒙古西藏处、中国处、朝鲜处和日本处，总编制为100多人。1922年夏秋之际，进行了机构改组，建立了三个局：（一）近东局；（二）中东局；（三）远东局。在共产国际执委

会内建立这样的机构，选拔熟悉东方各国特色的干部，为各地的据点安装设备，加强同它们的通信联络，这一切都是同时进行的。

根据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执行委员会应该特别重视东方局的组建工作。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人员 M. 戈利曼和 K. 特罗扬诺夫斯基在 1922 年 12 月 12 日关于东方部改组问题的报告中，批评该部门的工作没有明确的工作计划和合理的工作安排，“一片混乱”。因此，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认为必须以东方政治秘书处代替东方部”，或者以东方局代替。为了东方的工作，首次建立了统一的包罗万象而又相应区分职责的组织机构。

1923 年 5 月 4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任命 K. 拉狄克为东方局局长，维经斯基为副局长。从 1924 年 3 月 8 日起，Ф. 彼得罗夫（Ф.Ф. 拉斯科利尼科夫，即伊利英，1892—1939）成为该局领导人，其副手依然是维经斯基。远东处是该局三个处之一，负责日本、中国、朝鲜和蒙古的事务。

1923 年 1 月，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组织局的建议，作出了组建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秘书处的决定。维经斯基、卡塔亚马、马林被任命为该秘书处领导人。

东方局与国家政治保安局保持着紧密联系。例如，远东地区的苏维埃机关经常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或者直接向东方局通报日本、中国、朝鲜等国警察当局监视和逮捕共产党人的情况，以及有些秘密印刷厂和联络站遭受破坏的情况。同时这些机关也经常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或者东方局询问类似的消息。

共产国际国际联络局也经常与情报部门各机关交流情报。例如，1922 年 5 月 13 日，M.A. 特里利谢尔给皮亚特尼茨基写信：

收到我驻国外一些谍报站长获得的某些材料，可能会引起人们的兴趣，现呈上。

再举一个例子，请看皮亚特尼茨基收到的另一个秘密情报：

1925年12月21日。绝密。

共产国际执委会——皮亚特尼茨基同志亲阅。

尊敬的同志！

(一) 根据已经查证的材料，负责与共产国际联络的远东海军司令部副政治委员杰米亚年科同志，由于不善于进行保密工作，他作为你们的工作人员的身份已经被日本人和轮船负责人员识破。今将此事奉告，同时再补充一点，我们获悉，杰米亚年科同志的疏忽已经导致派往广州的整个小组的同志暴露。……

签字人为情报部长别尔津。

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局继续领导主要建在苏联和外国港口城市的联络站的工作，将人员与货物秘密运进和运出苏联，以商人、公司代表为幌子，将那些“非法居留者”送到其他国家。

国际联络局工作的保密性及其在外国的秘密行动，使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这个局与情报总局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相互关系不断巩固。

例如，1923年4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局局长彼得·翁佩（自1922年12月19日至1925年8月领导该局）和国家政治保安局机要通信处长И. 米特罗法诺夫签订了“关于根据国际联络局需要利用国家政治保安局机要通信”协定。该协定指出，国际联络局应向所属各机关下发“关于授权国家政治保安局各地方局接收国际联络局信件的指示”。国际联络局应“向国家政治保安局机要通信队通报本局所属各地方机关驻地及其以后发生任何变化的情况，以便在路线图中予以注明”。这样，国家政治保安局就掌握了国际联络局所有联络站配置的全部情况。

国家政治保安局通过国际联络局向共产国际的客人发出他们将在祖国遭遇危险（边境搜查或逮捕、警察追捕）的警告。国家政治保安局对外局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局询问有关来苏维埃俄国学习或工作的外国共产党活动家的情况，同样它也向国际联络局提供其感兴趣的情报资料。

鉴于共产国际的一些支部尚处于秘密状态，同时考虑到另外一些党可能有一段秘密工作时期，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委托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对相关共产党组织进行训练，使其便于开展这种秘密工作”。为达到这一目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组织局于1922年12月19日组建了秘密工作委员会，其成员有：M. 特里利谢尔、N. 皮亚特尼茨基、Г. 埃伯莱因、Э. 普鲁赫尼亚克。国际联络局局长翁佩被授权参加该委员会的工作会议，但他只有发言权。这个委员会后来被称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常设秘密工作委员会。1923年2月3日，E. 雅罗斯拉夫斯基和B. 米茨克维奇-卡普苏卡斯被接纳进入该委员会，取代离任的Г. 埃伯莱因和Э. 普鲁赫尼亚克。1923年2月28日，根据组织局的决定，又将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И.С. 温施利希特(1879—1938)(亚沃尔斯基)、K. 拉狄克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B.A. 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接纳进入委员会。

该委员会开展了富有特色的工作：除查清各秘密党组织现有数量及其组织形式和规模、各秘密组织内部通信联络水准、在军队中开展工作的方法等以外，还训练秘密接头方法和秘密印刷技艺，监视法西斯组织和白匪组织。

1926年3月1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选举了新一届组织局组成人员，皮亚特尼茨基1926年3月26日出任该局主席。1926年末，共产国际执委会组织局被撤销。

1926年3月1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选出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由11名书记和3名候补书记组成，主席为O. 库西年。从1926年7月起，R. 佐尔格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的工作会议；而从8月起，委托他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报告对书记处各项决议执行情况的监督与检查情况。

1926年3月24日，由于决定组建各支部秘书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决定“撤销东方局，该局所有工作人员转归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建立了近东远东秘书处，取代东方局。实际上这个分支机构是以独立秘书处的资格存在的，在文献中称为远东秘书处。

在维经斯基3月31日汇报了东方局存在整个时期的工作、把文

献资料送交档案库、又把专家分配到其他局之后，东方局从1926年4月1日起不复存在。

远东秘书处在1926年4月9日至1927年初开展工作，其范围包括中国、蒙古、朝鲜、日本等国。负责远东国家工作的责任书记是维经斯基。在他领导下工作的有美国共产党员M. 贝达赫特（化名马歇尔、詹姆斯）（1883—？），英国共产党员E. 弗格森、印度共产党员M.N. 罗易²⁶（1892—1954）（化名艾伦和罗伯特）、爪哇代表R. 塞芒（1899—1971）和德国共产党员G. 雷梅勒（1880—1939）。维经斯基在中国有一个据点——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中国办事处。

为了加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影响，有人建议在上海组建特设的远东局。1926年3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不反对在上海组建共产国际远东局”。于是，根据远东秘书处1926年4月27日决定，建立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1926年4月29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了该局的组成人员：Г.Н. 维经斯基（主席）（化名谢尔盖、谢尔金）、M.Г. 拉费斯（马克斯）（1883—1939）（书记）、Л.Н. 黑勒²⁷（教授，来自红色工会国际）、Т.Г. 曼达良（切尔尼亚克）、Н.А. 福金（莫洛多伊）²⁸（来自青年共产国际），他们均已赶赴中国，计划在当地吸收中、朝、日各国共产党的代表为远东局成员。来自中国方面的代表是党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化名老头子）和瞿秋白（文学家）。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从1926年6月起开始在上海进行秘密工作。莫斯科为远东局开展工作提供经费。1926年5月10日，远东局致函共产国际预算委员会，请求每月拨给该局6位成员2400卢布生活费，其他工作人员的生活费及用于电报、房租和购买文献资料的费用共计3400卢布。

1926年10—11月，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实际上认为远东局的工作不能令人满意，从1927年初起，该局在中国的工作事实上已经停止。

1927年3月1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

（一）远东局应该成为所有东方国家的统一机构，其管

辖范围包括中国的活动。(二) 批准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由下列人员组成：委员为鲍罗廷、罗森贝格、罗易同志，并指定列普谢同志为书记，委托库比亚克和莫洛托夫同志在他到莫斯科后与其谈话。

(И.И. 列普谢其实未着手工作，也没有到过中国。——作者注) 在中国发生诸多事变的危机时期（下面将述及此情），为了加强对联共（布）、共产国际的政治代表和军事顾问工作的协调，1927年6月9日和16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在中国建立共产国际办事处，其成员包括 M.N. 罗易、M.M. 鲍罗廷和 B.K. 布柳赫尔*。6月底罗易被召回莫斯科，G. 诺伊曼被派来接替他，尔后则由 B.B. 罗明纳兹接替。7月初鲍罗廷从中国被召回莫斯科，一段时期内，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只剩下布柳赫尔。

从1929年3月起，在共产国际新的驻中国代表机构工作的是 И.А. 雷利斯基（领导人）和 G. 艾斯勒²⁹、乔治·哈迪³⁰。1927—1928年，共产国际的代表是 D. 佩佩尔³¹。1927—1930年红色工会国际驻中国代表和工会太平洋书记处书记为 A. 马西³²。总之，除个别例外情况，这一群代表组成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该局还负责朝鲜共产党、日本共产党、印度支那共产党和菲律宾共产党的工作。

如前所述，共产国际第五次、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国际联络局在上海有自己的联络站，通过这个联络站建立同远东和东南亚其他国家共产党的联络。该局继续散发政治读物（包括共产国际读物），通过陆路和海路运送人员，制作假文件，向各国共产党代表转交资金。在国外和俄罗斯，国际联络局不但工作隐蔽，而且自身也隐蔽。1924年3月3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皮亚特尼茨基给国家政治保安局

* 化名加伦。生于1890年。来中国前曾任远东共和国军事部长兼人民革命军总司令。1927年回国后先后任乌克兰军区副司令员、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员（直到1938年10月）。1935年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首批五人之一）。1938年11月在肃反运动中被杀害。——译者注

对外局局长 M. 特里利谢尔写信说：

为了在国家银行领取外汇时能够隐蔽我们机构的名称，我们需要向领取外汇者 A.A. 埃克伦德——外汇持有人发一份假证件。所以，我们请贵局证明他是对外局或某个大型托拉斯（如果你们有的话）的重要负责人。

在外国为该国共产党领取外汇，往往产生一些麻烦。根据各地每季度的申请电汇，可能会引起当地特务机关的注意。因此，国际联络局在上海的谍报员阿尔贝特在致皮亚特尼茨基的信中建议“采取措施，使拨给各国共产党的资金不是按申请电汇，而是不按申请，定期实施普通银行汇款，而且不是由一个人，而是由不同的人从不同的国家寄汇”。

在另一份文件——国际联络局局长 П. 翁佩 1924 年 6 月 7 日致国家政治保安局特别局局长 Г.И. 博基的信中称：“我们需要盖有德文印章和有德文签字的苏联各大型经济机构和联合协会的空白表格，因为这些机构和协会都同国外，特别是同德国和其他中欧国家保持联系。”共产国际各次代表大会的许多代表就是凭藉这些假文件来到莫斯科的。国家政治保安局对外局同样不止一次地请求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局为其工作人员制作护照，因为国家政治保安局“不能向自己的人员提供这样的护照”。

这样的请求并非偶然。20 年代，共产国际在国外建立了一个伪造护照的重要技术部门。在柏林的共产国际西方局总部里组建了由好几个部门组成的“H 机关”。其护照部就在一栋住宅楼的二层窗户朝着院子的房子里。护照部以技术服务部的名义，于 1923 年开始工作，没有招牌，也没有向警察局呈报。此外还有通信部、工作资料印制部、印章（几种材质和式样）制作部、锌版制作部。一个专门人员负责制作锌版原件，购买柏林各印刷厂使用的印刷铅字。但是，由于保密手段差和同楼居民告密，有一天警察突然袭击护照部所在的一套住房。所有这一切都来源于德国共产党中央秘密护照局工作人员弗朗茨

于1924年11月4日所写关于该护照部遭破坏的报告。鉴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秘密工作委员会收到了这份报告，执委会于1924年末拟定了发给各国共产党的通函草案，要求严格遵守保密规则。国际联络局局长助理雅科夫·米罗诺夫-阿布拉莫夫自1926年起成为“H机关”的领导人。列奥·弗利格，一位领导青年工作的老战士和德国共产党秘密顾问，在柏林地下中心（“帕斯”机关）的帮助下，负责组织制作护照的实际工作。帮他忙的还有两位专家：里哈德·格罗科普夫（图尔格尔）和卡尔·维恩（希林）。30年代初，一个叫里亚特的人当上共产国际护照部的领导人。随着纳粹分子上台，护照机关迁到哥本哈根，由丹麦共产党员里哈德·任森涅负责领导。20年代和30年代初，护照机关每年平均制作护照约100本。

打开1931年在上海被破获的诺乌连斯案卷宗，可以找到共产国际所采取措施较为准确的实证。共产国际远东局的领导人诺乌连斯夫妇在上海被捕，在他们的住处搜出了许多护照。

国际联络局力争通过本系统运输的人员、货物在苏联境内通常免去海关和护照检查（护照里有暗号）。当国际联络局全权代表在海上护送货物时，他们都被列入运输该货物的苏联轮船的船员名单。

国际联络局同国家政治保安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接触和联系在不断扩大。这里不仅指我们已经写过的运送人员、货物及提供假文件。

国际联络局经常从外交人民委员部得到苏联各全权代表机关的工作人员同各国共产党领导人谈话的记录及各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情况资料。

从1927年9月《国际联络局各处与共产国际执委会全权代表相互关系》文件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国际联络局全权代表同共产国际执委会全权代表之间形成的相互关系，是多么非同寻常。这里说的是国际联络局驻华机构的情况。这份文件特别指出，该机构的“目的是建立共产国际执委会同中国的联系”；它“不归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中国全权代表领导，而是对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局负责”。此外，共产国际执委会全权代表同国际联络局驻华机构的任何联系，应该

“只通过国际联络局局长或副局长”来进行，财务手续“只按照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局的指示”办理。申请护照与国外通信也照此办理。最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全权代表与该机构的一切冲突，均由国际联络局解决”。

临近 1925 年夏时，军事情报员暴露的数量增多，迫使莫斯科于当年 8 月 14 日召开情报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外局、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共产国际代表联席会议。这次会议是根据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全权代表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他同时也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化名科瓦奇）的建议召开的。他在信中指出，情报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外局和共产国际，不是互相配合行动，而是互相挖墙脚，等等。И. А. 皮亚特尼茨基、Я. 别尔津、А. 洛吉诺夫都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让情报工作从苏联驻各国大使馆中分离出来，减少通过各地共产党进行的特种勤务工作，只有征得当地共产党中央或共产国际领导的同意，才能动用特种勤务。会议又决定，如果共产党员改做情报工作，那么这些党员务必先退出所在的共产党组织。会议还通过一项决定，即这种人员的名单只编制 1 份，由皮亚特尼茨基保存。然而，有意思的是，本次会议决定不完全中断各国共产党同情报机关的合作，因为“别尔津同志指出，不知道当地同志的住所和地址不行”。

由于国际形势日趋紧张，苏联同一系列国家的外交关系恶化，一些苏联驻外谍报机关相继暴露，所以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倡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使共产国际执委会全权代表的工作条件变得更加复杂。禁止他们把苏联驻外官方代表机关作为“掩护”。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7 年 5 月 5 日的决议指出：

责成共产国际执委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情报部为保密起见采取措施，使这三个组织通过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系统派到国外做公开工作的同志，不再占各全权代表机关和商务代表处工作人员的总编制。同时责成外交人民委员部为这些同志完成上级组织给予的特殊任务，提供相应的条件。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7 年 5 月 28 日决议指出：

将国家政治保安局对外局、情报部、共产国际、红色工会国际、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的代表机构从各全权代表机关和商务代表处编制中完全分离出来……检查国家政治保安局对外局、情报部、共产国际等组织的人员编制……从最严格保密的角度，整顿国家银行为其他国家革命运动服务的财务秩序。

根据苏联外交家 Г. 别谢多夫斯基提供的资料，苏联驻外国大使馆职务通常如下分配：肃反委员会或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代表一般担任二等秘书，军事情报机关的代表一般担任武官，共产国际的代表一般担任新闻处顾问。不过也常有与此常规不同的例外情况。

1928 年 4 月 28 日，根据斯大林所作《共产国际与苏维埃政权》报告通过了一项决议，该决议指出：

为了不给敌人关于苏维埃政权与共产国际融为一体的说法提供更多口实，取消雷科夫同志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苏联问题的报告……责成布哈林和皮亚特尼茨基同志研究向共产国际各支部发放资金的问题，这些资金不应从莫斯科和通过俄国人发放，而应从柏林（西方局）和伊尔库茨克（东方局），并且一定通过外国同志发放。

1928—1935 年期间，国际联络局的工作中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1929 年底组建了一个秘密指导处，隶属国际联络局局长，直接领导该处工作的责任由国际联络局副局长 C. A. 西罗京斯基承担。

国际联络局驻上海联络站大大扩展了工作规模。它是亚洲最大的联络站，竭力建立同中国、朝鲜、日本及其他国家革命组织的良好关系。上海联络站负责收发邮件，将密码电报加密和解密（鉴于我们的

代表机构在 1927 年遭到袭击后，工作变得更加复杂，国际联络局驻上海联络站代表建议皮亚特尼茨基加强保密力度，“要使每份电报都有自己的密钥，因为我们现有的条件不便于保存电报”），散发共产主义读物，办理各种财务手续（包括向各国共产党领导人转交莫斯科发给的资金，接送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人员及为他们安排好住处（包括秘密接头地点），派遣中国学生到国际列宁主义学校、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及苏联其他专业学校深造。同国际联络局驻上海的代表联络通常按下列方式进行：来人应该先到“无绒地毯”旅馆、“阅兵场”旅馆或“巴林顿旅馆”住下；尔后在一天之内，拨打电话 188—24，打听某种货物情况，但只能向哈伯（A.E. 阿尔布雷希特）打听，而且他应该说自己从巴黎的米歇尔处来，或者说与此相似的什么话。禁止来人直接去国际联络局谍报员的住处或他的“企业”。

国际联络局驻上海联络站通过假冒的进出口公司开展活动。例如，1928 年曾利用一家“地铁贸易公司”。国际联络局谍报员阿尔布雷希特曾致函皮亚特尼茨基，谈到这家公司：“我们这里有一家相当体面的企业，我们利用它收取各种设备和一些材料”。

国际联络局亚洲各联络站工作人员的骨干都是欧洲人，警察时刻在监视他们。例如，在中国工作的是美国人尤金·丹尼斯、埃尔·布劳德（乔治·莫里斯）、哈里森·乔治、菲利普、阿伦贝格、吉姆·多尔森、斯蒂夫·纳尔逊、玛格丽特·温茹斯和查尔斯·克鲁姆贝夫妇、帕斯卡·科斯格雷夫、马里昂·爱默森等。当时比较喜欢西欧人。国际联络局驻上海的谍报员请求莫斯科：“请指派那些能够被当是欧洲人的同志（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等）到这里来，但一定不要捷克人、保加利亚人、南斯拉夫人等。”同时还建议采取相应的方式，对他们进行指导，让他们“离我们的‘邻居’远点”。此处所指“邻居”，是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外局和工农红军司令部第四部（即情报部）的工作人员。

然而，职业训练不足，对当地生活条件、该国人民的习俗与传统了解很差的工作人员不在少数。这就是国际联络局驻上海、哈尔滨、汉口、新加坡等地联络站工作人员屡屡遭受重大挫折和被捕的原因。

共产国际和外交人民委员部之间经常产生矛盾，并且因为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干涉外交事务而发生争吵。外交人民委员部领导人Г.В.契切林在自己的工作人员上报的文件中，常常看到“共产国际的政策脱离外交政策总方针”的各种证据。契切林1921年8月6日在一封信中写道：“对外关系局经常抱怨共产国际土耳其斯坦局的活动，因为该局不负责任地干涉外交政策，向邻国四处派遣谍报员，他们的活动给我们的国际关系造成危害。”



第二章 中山中国劳动者大学和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为中国培养干部的熔炉

苏联关于通过各国革命人民在外部（即苏维埃俄国）直接支援下以武力推翻统治政权，实现世界革命的学说，必然要求在苏联境内为这些国家的人民培养领导干部。

首先做的事情是试图把居住在苏维埃俄国的中国人和朝鲜人组织起来。在外交人民委员部资助下，组建了一个中国工人组织，彼得格勒的三间房子和莫斯科博戈斯洛夫斯基小街6号楼——一处独家住宅的一部分，拨给了该组织。为中国人举办了宣传训练班，帮助他们召开了全俄中国工人代表大会（为此次代表大会拨款1万卢布），每个月为该组织拨款约2万卢布。经过一定的训练，中国和朝鲜的宣传员被派到远东，同“无产阶级民主组织建立联系”。从加拉罕1919年2月20日就东方宣传工作问题致列宁的信看，每个宣传员的派遣费用加上回来后发的奖金为：赴中国北方和朝鲜者1万卢布，赴中国南方者——2万卢布。

为东方各国劳动者建立的一些学校，同样可以视为从中国人、朝鲜人、日本人等培养出一定数量的未来潜在情报员的学校（须在特种学校里进一步深造）。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决定在共产国际的监督下，建立为东方各国人民服务的特种学校。按照俄共（布）中央1921年2月10日决议，当年在莫斯科建立了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23年取名为斯大林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该校一直存在到

1938年前。早在1921年，进该校学习的中国革命者就有36人，一年后有42人，到1924年已经有90人左右。1925年，由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民族反帝革命爆发，中国学生斗志昂扬，在苏维埃俄国为中国劳动者建立专门高等学校的设想已经有了条件。抱着这一目的，莫斯科开办了存在至1930年前的中山中国劳动者大学*。中国共产党反帝革命失败及在中国出现最残酷的“白色恐怖”之后，中山中国劳动者大学于1928年9月17日更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25年底，在鲍罗廷的参与下，国民党和共产党选派了310名学生到中山中国劳动者大学学习。第一批118人于11月抵达莫斯科。据邓小平回忆，其中至少有103人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到1926年2月，在该校的中国学生人数已达340名左右（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起初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二，后来在统一战线和北伐期间所占比例多于四分之三），临近年底，他们的人数已达500余名。据有些人的估计（我们没有确切的材料），1927年末至1928年初，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由原中山中国劳动者大学与原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30—40人）合并而成——学习的中国学生已有800人左右。1927年春，第一批约40名优秀学员——都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同M.N. 罗易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委员谭平山一起前往中国。临近1927年底，首批几个班的学员共计300名左右结束了两年制的培训。一部分毕业生留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工作，或当翻译，或当教官，或做研究中国的工作；相当大一部分毕业生分配到苏联各类军事学校 and 政治学院。1925—1930年，约有1200名中国学生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听过课。

除上述这些学校外，还有其他一些学校：1922年夏，在伊尔库茨克开办了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分校，也有一些中国人在此学习；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市，从20年代中期起就开办了中

* 在中国一般简称为“中山大学”或“中山劳动大学”。本书有时也简称为“中山大学”。——译者注

国列宁主义学校和中国青年工人苏维埃党校。除汉族人外，在这些学校里学习的还有中国少数民族的代表，尽管他们的人数相当少，总共不过几十人。其中维吾尔人占很大比例。20年代居住在几个中亚共和国境内的维吾尔人约有50万，其中一半左右形式上是中国公民。

应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特别是周恩来）的请求，苏联举办了专门军事训练班，对通过共产国际和其他系统来到莫斯科的中国革命者进行军事训练。军事训练由总参谋部负责组织。因此，1927年下半年，总参谋部专门建议在莫斯科政府部门间中国工作委员会讨论下列问题：

一、

（一）各高等学校中国学生的情况。

（二）如何对待政治上不可靠的人。

二、

高等学校（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山大学）中国班的教学宗旨——是否教授游击斗争战术、地下工作技术，是否需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伏龙芝军事学院、列宁政治学院、高级炮兵学校及设在基辅的各军事院校都开设了中国的班。各高级步兵训练班也对中国的指挥员进行训练。仅在1927年内，在下列院校学习的中国班人数就达到：各军事院校共142人，其中共产党员29人，共青团员51人，国民党员29人，冯玉祥追随者33人；各空军学校共33人，其中共产党员13人，共青团员7人，无党派人士9人，冯玉祥追随者4人。具体说，伏龙芝军事学院6人，托尔马乔夫政治学院14人（其中就有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各高级步兵训练班31人，莫斯科炮兵学校63人，特维尔骑兵学校5人，莫斯科步兵学校13人，军事工程学校15人，航空军事理论学校6人，航空学校3人，空战学校7人，军事技术学校9人，特种军事勤务学校9人。1927年10月2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通过决议，各高等军事院校再接收30名原贺龙、

叶挺军队中的共产党员指挥员。因此，“按照高等院校外国人训练经费预算条款，增加军事部门的预算 45000 卢布”。

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中山中国劳动者大学的学生还在夏季野营中进行军事训练。1927 年 6 月 16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工作会议决议谈到了这一点，该决议第五条建议“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接收 79 名中山大学毕业生，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生一起到夏季野营地继续进行军事训练”。

鉴于 1927 年中国发生了“蒋介石叛变”和袭击苏联驻广州总领事馆（其五位工作人员被残暴地枪杀）的一系列事件，决定将“不可靠的学生”和“国民党右派分子”经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上海遣送回国。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工作会议决议第四项指出，必须“将中山大学一年级的 32 名国民党右派分子同毕业班的 36 名国民党右派分子一起遣送回中国”。按照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7 年 9 月 15 日决议，军事学院的 5 名国民党右派学员亦被遣送回中国。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7 年 12 月 29 日决定支持中山大学领导将“国民党右派分子”清除出校的立场。

由于第二年中国局势更加紧张，同国民党的关系进一步恶化，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8 年 3 月 22 日会议建议，“鉴于各军事学校的中国学员中存在大量异己分子，委托中国委员会立即进行清查，开除一切国民党员、无党派的冯玉祥分子，令人怀疑或不受欢迎的共青团员”。军事学校开除的所有学员应全部遣送回中国。文件要求将“各军事院校今年（1928 年——作者注）的毕业生中那些经过相应政治改造，以后能够被中国共产党用于中国的军事工作的中国指挥员留在苏联。”

中山中国劳动者大学行政负责人和党的领导人此后又作出决定，将冯玉祥的子女（子冯洪国，女冯弗能——蒋经国之妻，化名涅日丹诺娃。）及另外一些学生开除出校。但是，中山中国劳动者大学领导人米夫建议，不要把他们遣送回中国，而应留作“人质”。不过，上层反对这样做，于是只好顺从下达的指示。1928 年 5 月 25 日，冯玉祥的子女（包括其另一女冯弗伐，化名索比诺娃，也在中山中国劳动

者大学学习) 启程归国。

鉴于中国南方发生了一系列事件，我们在广州的工作人员被逮捕和杀害，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7 年 12 月 23 日作出决定，“逮捕并监禁支持国民党将领的中国反革命分子（学生及其他人），直到在中国南方的所有苏联公民被释放之后，再把他们驱逐出境”。当时在苏联学习的毛泽东的私人翻译师哲³³的回忆证实一批国民党高级官员和军官的子女先是被逮捕，继而被驱逐出苏联的事实。政治局的决定指示外交人民委员部“为逮捕中国反革命分子附发一份声明”。该文件专项要求联共（布）莫斯科市委“组织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中山大学的学生们提出抗议，反对中国南方发生的野蛮行径”。同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向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电报，要求“积极开展反对中国的反革命，反对白色恐怖，反对在广东杀害苏联代表的最坚决的政治运动”。要求各国共产党在英、日、美三国领事馆前举行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口号是“保卫中国革命和苏联。”

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中山大学的大多数学员（1928 年有 127 名）被转到各军事院校。

中国方面不止一次坚决要求，“由于共产党在进行反对国民党的斗争，”必须将中山大学校名中孙中山的名字去掉。根据该大学校长米夫的申请和中国局势的变化，1928 年 9 月 17 日通过了联共（布）中央组织局的以下决议：

由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部与中山大学合并，采纳既合并大学关于该校命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建议。

隶属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中国代表团握有为各军事院校中国班补充名额的决定权。各军事院校开始注意只接收中共党员。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8 年 3 月 22 日会议第 16 号记录中强调本教学年度必须“至少接收 200 名中共党员到各军校学习，特别注重扩大各专业军事院校（即航空兵、炮兵、工程兵等院校）的学员名额”。这份记录还

指出：“由于学员成分的变化，必须提出进一步明确各军事院校中国班的教学宗旨问题，即转向专业化，讲授特别课程（武装起义的战术、游击斗争、破坏活动等）。”

例如，1928年9月17日，总参谋部通知伏龙芝军事学院的领导：“按照各级机关的决定，明年派到你们学院的中国学员为10人。选派学员的工作由在这方面握有决定权的中国代表团实施。”究竟是谁具体决定将何人分派到何处呢？根据现有的1928年8月7日高级步兵学校学员分配会议的记录判断，在当时情况下由米夫³⁴和周恩来（化名莫斯科温）决定。那时就是按照他们的决定，将110名中国学员“交到军事部门分配给各种军事学校”，“41名学员则转到中国劳动者大学”。

摆在苏联各军事学院面前的任务是培养具有高度军事素养的中国干部。1928年7月，总参谋部向各军事学院的领导下发了如下文件：“各学院应将中国学员培养成中国大部队（团以上）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根据这一训令，工农红军各学院都拟定了特别班（中国班）三年训练计划。计划中包括一门独立的课程《武装起义的战术》，在三年训练中每年必须学习60学时。第二和第三年应该学《起义的军事政治导演》课程。武装起义战术课程包括：城市起义的准备问题，农村起义的准备问题，地下工作技术，游击队的补充、训练和装备。

除了按照各个军事科目的要求研究合同战术和掌握教学技能外，还按照联共（布）中央组织局的决定，把研究游击斗争的经验纳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举办的各种党的高级训练班教学大纲中。一些经验丰富的苏联指挥员，包括曾在中国工作过的军事顾问B.布柳赫尔（加伦）、H.拉宾、И.马马耶夫³⁵，被聘请来为中国班上课。

各军事院校面临的任务是，培养“在中国条件下开展秘密军事工作的”中国专家。

Я.别尔津和Ф.苏达科夫曾致函工农红军政治学院院长A.Л.希夫列斯（1898—1938），建议“注重对地下工作领导人员、党委军事部门领导人员等的教育。武装起义理论与战术，农民游击战争理论与战术，地下工作技术等课程，应该在教学大纲中占据其越来越重要的

地位”。该文件还通报，“在莫斯科已经进行了单方武装起义导演”。

临近 1928 年初，新的一大批参加过中国各地区武装斗争的约 500 名中共和中国共青团工作人员来到苏联。他们当中有党的军事和政治工作人员、冯玉祥部队的政治工作人员、西安军事学校的领导和教员、大批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党和工会机关的工作人员，华北、东北、华中、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区的青年运动积极分子，以及参加南昌起义（1927 年 7 月 31 日至 8 月 1 日，贺龙、叶挺和朱德率领的部队在南昌举行起义，起义者宣布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其大部成员是共产党员；1927 年 8 月 1 日因此成为中国人民军队的建军节）、广东及其他地区起义的年轻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

来苏联参加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各次代表大会，以及因为其他事由而来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也都在各类短期军事专业训练班学习过。譬如，根据周恩来的请求，1928 年夏季为在莫斯科郊外（莫斯科州纳罗福明斯克区五一镇）秘密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举办了训练班。从总参谋部有关部门整理的现存档案资料可以看到，中共六大 50 名代表在训练班里学习了武器使用、破坏活动、巷战战术。10 名中共中央委员则学习了游击运动战术、地下工作技术及武器使用。类似的训练班在以后的年代里仍然继续举办。

不过，应该公正地指出，教学大纲并非总是符合居留苏联的中国人的愿望。例如，1927 年 12 月 16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大楼前举行过一次游行，约有 100 名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各类军政训练班学员参加，他们要求改善教学和军事训练。（游行过后，该大学校长 Б.З. 舒米亚茨基建议将 14 名学员开除出校。）中国学生特意致函驻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中共代表们，发出类似的抱怨，提出了完善教学大纲、改进中文资料、提高译员的质量、将学员合理分班、改善生活条件等建议。1928 年 1 月 28 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向忠发就此事致函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他写道：

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学员的不满和激愤的原因，不应该在“无政府主义”和“取消主义”情绪中寻找。

按照某些俄罗斯同志的看法，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中国同志身上似乎存在这些倾向。……

在这种情况下，不应该用这些责难（“无政府主义”，“取消主义”）来掩饰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部的工作缺点。

向忠发建议“改进该校总的领导和党的领导”，“彻底改造各军事政治训练班，因为现存的这些训练班，学员选派耗资巨大，前往莫斯科一路冒着很大危险，从这些期限为几个月或一年的训练班中获益甚少”，经验证明，这些训练班名不副实。向忠发写道：

为了使这些训练班名副其实，为了在举行武装起义时，凭借这些学员的帮助，我们会使用从敌人手中夺来的各种技术装备（机关枪、火炮、飞机、工程器材等），而不是只会用步枪射击，为了这一切，应将现有学员中文化程度较高、具有一些军事斗争经验的一部分人，送到战斗学校接受各种军事技术训练，而将其余政治上较为成熟的学员送到普通政治训练班。

此后在1928年1月20日成立了以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 Я.Э. 斯滕（1899—1937）³⁶为首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冲突协调委员会，该委员会做了一定的工作之后，于1928年2月27日向联共（布）中央组织局会议提出了一些建议。当时已经承认，“之所以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部和军政训练班发生纠纷，不仅与学员成分有关，而且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领导人在中国同志中开展党的工作和教学工作所犯的严重缺点有关。”已查明的缺点如下：学校“对党内积极分子的选择，就其专业水平而言，不能令人满意”；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人员流动性过大；“校行政领导就日常生活急需事宜，同学生们联系不够；课余时间对学生实行过分的管束”；宿舍状况不佳。

当时还确认，“同意解除特别班党委书记韦尔特纳同志在该班党委的工作；同时认定必须把安德烈耶夫、普列斯涅夫、奥布霍夫和伊格纳季耶夫（他们的化名是：吴湖京、黄师嘉、朱廷章和宗希钧——作者注）几位同志调离该大学。同时还通过一项决定，“将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部和军政训练班无组织活动的积极参加者柳林、罗蒙诺索夫、格里博耶多夫、佩图霍夫、奥辛（即鲁毅、李侠公、朱戴杰、马远胜和何胜阳——作者注）、王国及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三位研究生调出该校”。

然而，大学的问题依旧继续存在。1929年3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了中共代表团的来信，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糟糕工作再次受到批评。这封信指出，该校为近几年办校需要耗资500万卢布。“但是，所取得的成就只是：250名回国的学生中，只有很少数人可以用于工作。他们的学习是如此不切合实际，他们的理论水平是如此可怜”。有文件称，已有30名左右回到中国的学生投靠南京政府。这封信证实，“他们在报刊上公布了留学莫斯科的学生名单。在上海、大连及其他城市，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甚至被南京政府用来在莫斯科归国学生中开展特务活动”。中国代表团认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校”，它要求该校负责同志报告工作情况，要求“加强军事学习，在所学课程中加入特别科目《武装起义》，改进图书馆工作，最大限度地裁减该校教职员多达396人的编制”。该信最后指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现状不能令中方满意”，确定该校的课程，“应该从中国的需要出发”。

1929年11月6日，按照联共（布）中央书记处的决议，再一次成立了以K.И. 基尔萨诺娃为首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指出，“中央关于必须采取措施，改变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生中不能令人满意的社会成分的指示尚未执行；学生的生产实践和党的工作实践未见组织；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科研人员、教员、教研室领导的配备没有保障。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基层组织的政治、实践和生活方面存在以下异常情况：国民党主义，取消主义，颓废主义，在中国局势和中共任务问题上的右倾观点，反

对党的路线，号召反对党的政策，调和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民族主义，违犯党纪和教学纪律，小资产阶级绝对民主和绝对公平要求，群众与领导关系破裂，对党的领导机关缺乏最起码的信任，毫无原则性的派别斗争，个人吵架斗殴。经过讨论，该委员会一分为二：一部分人（基尔萨诺娃、彼得斯、普舍尼岑）主张撤销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另一部分人（布拉特、戈普纳和塔尔）则反对撤销，主张彻底改造。最后，前者胜利了，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关门停办。

无论 20 年代下半叶的局势多么复杂而矛盾，苏联方面就是如此不惜人力财力，为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卓有成效地训练军事指挥员。众所周知，蒋介石之子蒋经国 1928 年就在托尔马乔夫政治学院学习。中共党员、毛泽东的未来翻译师哲，也在苏联长期（总共 15 年左右）学习与工作。

在 1929 年春夏两季红军建设充分发展和游击战争规模扩大时期，头几个班训练有素的军事专家回到中国，其余部分或者成班，或者单枪匹马，于 1929 年底至 1930 年初归国。据远非完全的现有资料和外国作者的估计，红军各部队相当大一部分团长和团政委以上指挥员与政工干部，在苏联各军事院校里受过训，这是中共武装力量快速发展的条件之一。他们当中有的是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有的是大兵团司令部首长，有的是军事情报机关的组织者，还有一些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各领导机关特科的负责人。

苏联各军事院校的学员中有许多人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众所周知，朱德、林彪、贺龙、叶挺、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邓小平等许多中国军事首长、中国革命元勋，都曾在苏联各军事院校深造，或同驻华苏联军事顾问相互协作，深入研究了苏联的军事经验。

来苏联学习的许多中国人身体存在严重问题，这就影响到他们的学习，倘若要把他们培养成军事专家，则受到的影响更大。例如，有一次体格检查发现，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1929 年的 100—120 名中国学生中，70% 的人患有神经性疾病和肺结核，致使选派工作显得非常困难。

从档案文件中可以知道，20年代下半叶，中国国内先是在黄埔军校，后来在“根据地”区域，也对中国军队指挥员进行训练和复训。仅从周恩来1928年5月12日制定的一份中国军事工作月预算方案，就能看到苏联为中国军事训练和组织初级指挥员训练所拨经费的情况（每月5000墨西哥元）。当时在海南岛、海陆丰、湖南省都设有军事学校，每所学校有400名学员。

据前面引用的文件看，中国对在苏联学习过的人才需要量越来越多。例如，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26年10月20日和21日的63号和64号（专号为47）会议记录中第7项称：“将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相当数量的中国同志派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广东军队政治部任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27年5月19日103号（专号为81）会议记录中第5项建议“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中山大学应届毕业生中，派遣10名中共党员到于右任的部队工作”；而第6项则委托Φ.拉斯科利尼科夫与汉口协商，将于右任部队相当数量的选派人员纳入赴苏联高校学习的中国青年总分配计划。过了一周，即5月26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05号（专号为83）会议记录中第5项指出，“派遣中山大学64名毕业生到国民政府工作，首先派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其次派国民党员。”

在苏联学习的学生同样被莫斯科用作宣传鼓动员，宣传其对中国国内和中共党内局势所持的观点。Φ.拉斯科利尼科夫关于对中国共产党采取组织措施的建议第1项说明了这一点：“应该将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中山大学能够讲明我们的观点，并能同中共领导人的机会主义作斗争的一批学生派到中国，特别是派到汉口和上海。”

30年代，中国人继续在苏联军事院校学习。1933年7月31日的“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王明、康生就各军事院校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各学校录取中国共产党员事致И.А.皮亚特尼茨基的信”，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这封信中说：

我们受我党中央的委托，向您请求，希望您向联共

(布)中央提出，请联共(布)中央允许中共中央派遣100名中国同志到苏联各军事院校深造。其中大约：20名去航空学校，20名去炮兵学校，15名去化学兵学校，15名到军事学校，10名去步兵学校，10名去骑兵学校，10名去司令部工作专业学校。此外，我们请求派遣20名中国同志到国家政治保安局系统学习。所有这些军事专家，都是我们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特别需要的人才。

有意思的是，在该信正文上方从左至右写有一行不知出自谁手的批示：“尽速与别尔津同志商谈。”



第三章 苏维埃政权在中国的情报工作

布尔什维克在 1917 年 10 月夺取政权后，对于中国在这段时间发生了何事，各种政治力量的分布如何，实际上没有掌握任何可靠的情报。因此也不是很清楚，对这个国家当时存在的两个政府——以段祺瑞为首的北京共和政府和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军政府——究竟应该采取何种立场。当时已经知道，北京政府得到一些大国的承认，但其政治方针却不十分明确。苏维埃俄国应该如何与他们打交道呢？应该将北京政府视为帝国主义的帮凶呢，还是将其视为在国际舞台上依旧处于不平等地位的一个政府，因而是俄国潜在的盟友呢？必须尽快对这个问题作出论据充分的回答，以便今后正确制定对待这一东方邻邦的具体政策。对这一问题的答案，首先应该从驻中国的外交工作人员及情报机关获得。

俄国外交部门对整个东方，尤其是对中国的最初看法，从苏维埃政权的声明中看得很清楚。这些声明是外交人民委员部东方局局长 A. 沃兹涅先斯基与中国李世中秘书长 1918 年 1 月 19—20 日在“友好的气氛下”互访时发表的。例如，参与互访的外交人民委员部负责人员 E. 波利瓦诺夫向中国官员申明：“中国和俄国几乎同时发生了革命。如果以历史事实为依据，那么应该承认，俄国革命形势比中国的成熟得早一些。但是，革命的道路曲折，任何人都不会认为，中国在这方面会超过俄国。我相信，中国人不可能不欢迎我国建立人民政权。须知中俄两国人民本是应该携手奔向共同目标的兄弟。”³⁷

双方接着谈到中国革命和日本革命的前景。李世中提到，如果没有当前的世界大战，那么无论在何种条件下，俄国都不可能建立人民政权。波利瓦诺夫赞成这位同行的看法：“尽管世界大战给人们造成

了无法统计的灾难，它同时却促进了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我相信，英国、日本和美国之间的矛盾已是既成事实。在不久的将来，这些国家之间必然爆发战争。战争的后果就是日本革命。我们应该利用这一时机，开始行动。我们目前正在促进印度摆脱英国的压迫，帮助印度获得独立。总而言之，20世纪总形势的特点是，帝国主义各国政府的日子已屈指可数！”

但是，苏维埃领导人的立场不久就急剧改变了。促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有二：其一，中国公使参加了外交使团的行动，和同行们一起去见列宁，逼他下令释放被捕的罗马尼亚大使；不久他又跟随其他国家大使馆人员离开彼得格勒，拒绝到莫斯科，而前往沃洛格达。其二，1917年12月，由于协约国各国与北京政府互相勾结，中国军队违反当时还有效的国际协定，占领了中东铁路区，武力驱散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将对最重要铁路干线的监督权交给白卫军和协约国代表。

1918年2月22日，外交人民委员部向各边疆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国际局发出指示，要求它们：

与中国人交往时应该记住，目前的北京政府不是中国人民意志的代言人，它在同举行起义反对北方反动势力，并建立联邦共和国的中国南方人民作对。

不过，后来外交人民委员部并未拒绝同北京反动政府打交道，但已经不认为有必要和这个政府讨论世界革命问题了。这个题目应该成为苏维埃政府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的南方交往的核心。

1. 争取承认的斗争

苏维埃俄国希望中国承认她，并与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但是，就这一问题而进行的谈判却不定期地拖延下去。在这里，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敌对立场起了作用，这些国家自华盛顿会议³⁸开始就对北京施加强大的压力，千方百计地阻挠俄中签订建立外交关系的协定。中国

和 1920 年 4 月成立的远东共和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的尝试亦毫无结果（后者在 8 月底向北京派遣了起先是 A.Φ. 阿加列夫，尔后是 И.Л. 尤林³⁹为首的外交代表），尽管这些谈判还是为俄罗斯联邦第一个正式的外交代表团（1921 年底至 1922 年上半年以 A.K. 普赖克斯为首，1922 年 8 月至 1923 年 1 月以 A.A. 越飞为首）前往中国创造了条件。这个代表团之所以能够派出，是因为 1920 年 9 月北京政府终于拒绝承认前沙皇公使和各位领事，宣布废除俄国人在中国的治外法权。

众所周知，苏维埃政府早在 1917 年就剥夺了所有驻外沙皇外交代表机关的全权。但是，它们依然自称为代表机关，甚至还利用当初他们被派驻的各个国家（这些国家希望俄国恢复旧制度）及外交使团的承认。中国当时也存在这种情况。

H.A. 库达舍夫公爵在中国依然被视为俄国公使。十月革命之后，1917 年 12 月 1 日，库达舍夫收到苏维埃俄国第一届政府第一任外交人民委员 Л.Д. 托洛茨基 11 月 30 日发来的电报，要求驻北京使馆同苏维埃政府合作。这封电报陈述了外交政策的实质。过了一周，即 12 月 7 日，库达舍夫收到了 12 月 5 日发出的第二份电报，内容如下：

人民委员会要求使馆全体人员立即答复，他们是否同意实行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农民代表大会确定的国际政策，这一政策体现在以尽快缔结和约为目的的各项措施之中。凡是不愿执行这种政策的人，既然他们不同意服从苏维埃政权，那就应该立即停职，将卷宗交给下级职员，而不管他们以前的职位如何。仇视苏维埃政权的官僚们企图原封不动地继续实行其政策，将被视同祸国大罪。请将本电报的内容通知所有领事。我要求立即作出明确的答复。

但是，答复却未随之而来。原因是 1917 年 11 月 19 日，H.A. 库达舍夫收到了俄国驻伦敦外交代办 К.Д. 纳博科夫的电报，其中通

告，俄国外交部全体人员拒绝同列宁的政府合作。11月21日，库达舍夫将这一消息通电驻中国的所有俄国领事。翌日他又通电命令各领事不得服从托洛茨基，并对他的电报置之不理。几乎所有驻中国的俄国领事都一致遵从库达舍夫的这一命令，表示决心只遵照驻北京公使馆的指示而开展活动。12月5日，俄公使馆向中国政府发表声明，称其拒绝服从布尔什维克政府，将依旧“继续履行自己的义务，直到俄国成立合法政府”。

中国政府没有承认苏维埃政权。它甚至请求库达舍夫命令俄国驻中国领事们“协助中国政府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间谍来到中国”。同时，按库达舍夫的话说，北京又指示中国各边境当局“要善待布尔什维克”。

但是，托洛茨基没有罢手，1918年1月6日，又向俄国驻北京公使馆发出一份电报，要求指出愿意为苏维埃政府服务的工作人员姓名，并许诺给他们提高工资。然而，这份电报依然无人理睬。于是在3月份，莫斯科试图用自己的外交和领事代表来代替库达舍夫及各位领事。莫斯科通知中国政府，任命早在沙皇政府时期就因持民主观念而被解职的前俄国驻上海副领事 A. H. 沃兹涅先斯基为苏维埃政府驻北京的外交代表。任命恰克图的印刷工人为 A. H. 瓦西里耶夫为驻库伦^{*}总领事，任命转到苏维埃政权的领事馆秘书 A. II. 津克维奇为驻伊宁领事，任命士兵东布罗夫斯基为驻海拉尔领事，任命铁路工人德罗诺夫为驻宽城子（长春）领事。但是，北京政府没有承认这些任命，没有让这些被任命的人员进入中国。

库达舍夫及其属下全体人员继续占据着使馆区俄国公使馆宽敞的办公大楼，自称是临时政府和俄国人民的代表。根据远东共和国公使馆秘书 M. II. 卡扎宁的看法，沙皇公使馆人员中最聪明的人，是沙皇公使馆一等秘书 B. B. 格拉韦：他相貌英俊，身体匀称，蓄着尖形的胡须，衣着无可挑剔，总是戴着单片眼镜。公使馆二等秘书伊戈尔·米特罗法诺夫总是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他是个年纪轻，面部刮得

* 即乌兰巴托。1924年前俄国称该城为乌尔加。——译者注

干干净净的淡黄色头发的小伙子，他熟悉北京及其历史。东方学家中有非常著名的译员布伦涅特和哈格尔斯特罗姆。至于那个主任译员科列索夫，照卡扎宁的中国老师的说法，则是一个“恶棍和小人”。

1920年9月22日，中国报纸终于发表了总统命令，声称“中国……当前不再承认俄国的公使和领事”，因为“他们早就丧失了代表性，实际上他们也没有理由继续履行所承担的重大职责”。

此后各省当局相继发布命令封闭沙皇的领事馆。但是，沙皇的外交官们依靠外交使团的支持，继续抗拒执行总统命令。

按照张作霖1920年9月30日的命令，驻吉林、黑河、沈阳和长春的领事馆相继被关闭。驻上海的前总领事冯·格罗斯企图固守岗位，但没有得逞。他的副领事为K.Э.梅茨勒⁴⁰，该沙皇领事馆里还有一名领事法官H.A.伊万诺夫。广州领事馆于12月份关闭，驻其他城市的领事馆的关闭时间则晚了许多。

旧领事团同中国当局经过持久的谈判，终于达成协议。根据该协定，俄国领事馆除诉讼外的所有职能都移交俄国事务局*。该局原封不动地继续留在上海领事馆的房子里，但外交部的中国官员被任命为俄国事务局总办，其副手是B.Φ.格罗谢。

大家知道，各沙皇领事馆人员和驻北京公使馆人员一样，被驱散到中国各城市，到处进行五花八门的反苏维埃活动。他们收集白匪军官，尔后经边境送到高尔察克、谢苗诺夫、弗兰格尔的军队中。库达舍夫公爵所起的作用众所周知，他身为驻北京沙皇公使馆的首脑，窝藏了1920年2月逃出哈尔滨的匪徒和凶手卡尔梅科夫。这个卡尔梅科夫3月8日被中国当局逮捕，囚禁于吉林狱中。但是，驻吉林的沙皇领事布拉采夫按照库达舍夫的指使，帮助卡尔梅科夫于7月16日越狱逃跑，随后将他窝藏在自己的领事馆里，一直到8月底。

毫无疑问，北京政府了解这位沙皇公使所搞的“外交”工作的真实性质。为了说明问题，谈谈库达舍夫和中国外交总长颜惠庆显然在1920年9月中旬举行的会谈是合适的。会晤应库达舍夫的请求举行，

* 全称为中国特派管理上海俄侨通商事务局。——译者注

他对外交部剥夺前沙皇公使馆密码通信的权利提出抗议。颜惠庆在拒绝抗议的同时，这样解释外交部的决定：“大使馆密码通信无疑与政治活动有关”，而这些政治活动“可能会给中国地方当局造成困难”。为了避免对其所说的政治活动产生疑义，这位外交总长举出了吉林领事的例子，该领事执行库达舍夫的命令（显而易见，这也是用密码发的命令），窝藏了政治罪犯卡尔梅科夫。

为俄国各领事馆职员及其活动提供经费的问题，是通过俄罗斯亚洲银行解决的。中国每两个月准时向该银行存入 25 万两白银，以清偿“义和团”赔款⁴¹。这些钱财均归库达舍夫掌管。苏维埃政府拒绝获得这种赔款，并且要求中国方面“勿向那些企图非法得到赔款的前俄国领事们……或者俄国组织给付这些赔偿金”。苏维埃政府不止一次地提出抗议，却屡屡无人理睬。

8 月 7 日，即向各边疆当局发出允许远东共和国代表进入中国的指示后不久，北京政府正式通知库达舍夫和俄罗斯亚洲银行董事会：停止交付“义和团”赔款，并要将下次所付款项存入中国国家银行。

沙皇公使馆一失去中国人的承认，库达舍夫就根据某些理由对领事们停发工资。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转向远东共和国的代表，表示愿意为远东共和国效劳。但是，据 M. 卡扎宁的材料，他们之中的一些人竟然干起了敲诈勒索和沿街乞讨的勾当。原领事馆机关的一些官员则被雇佣到远东共和国公使馆机关工作。他们当中的图日林，原驻齐齐哈尔副领事，给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是一位颇有造诣的中国学家，为人谦虚，单身汉。

如此看来，关闭所有沙皇领事馆，北京内阁拒绝为前沙皇公使馆的活动提供经费，是苏维埃外交的巨大成功，同时也打碎了反苏维埃活动组织者的金钱杠杆。因而为同远东共和国使团，尔后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进行谈判创造了起码必需的条件。这是苏维埃政权与中国关系实现正常化，争取中国承认苏维埃俄国的第一步。

1924 年春中国政府承认苏联后，上海俄国事务局被关闭，俄国领事馆大楼转交苏联领事代表。

苏联在中国的情报机关很细心地监视沙皇领事馆人员以后的各种

行动，以及这些人员参与组建的多种组织。

根据俄国东正教协会主席 Д.И. 卡扎科夫的倡议，上海俄国侨民组织召开会议，讨论俄国侨民的法律地位问题。在 В.Ф. 格罗谢主持下，选出的一个小组拟定了《上海俄国侨民权利保护委员会暂行条例》。В.Ф. 格罗谢当选为该委员会主席，Н.А. 伊万诺夫当选为副主席。新的侨民组织称为白俄领事馆。

该委员会并非普选产生，而是按照个人选择其全体成员的原则产生。委员会在其开展活动初期，为了 Н.С. 阿尼西莫夫将军一案，不得不花费许多时间和气力。阿尼西莫夫将军曾率领 450 人的集团，摆脱了 Ф.Л. 格列博夫⁴²将军（格列博夫将军将自己的名由法尔杰伊改为费奥多尔，认为后者是平民的名字）的管辖，夺取一艘军舰——蒙古盖号，乘此舰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这是俄国侨民第一次群体回归苏联的行动，当时上海市以外的人对此事毫无察觉。

从权利保护委员会出现的那一刻起，它同一些侨民团体及其活动家之间就发生了争执。这些争执首先反映出文职与军人当局之间的冲突，即前俄国总领事 В.Ф. 格罗谢同来自滨海地区大军事集团长官 Ф.Л. 格列博夫之间的冲突。这些分歧之所以变得尖锐，还因为在俄国领事馆被移交苏维埃政权之前，该领事馆里有一个负责遣送俄国人回国的委员会存在。

权利保护委员会于 1925 年改组，所有俄国社会组织的代表都进入了该委员会，它成为大上海、租借地和法国租界当局承认的上海俄国侨民区的统一代表。

日益深化的分歧最后终于在 1926 年酿成彻底的破裂，当时在 К.Э. 梅茨勒主持的俄国慈善协会上，与会者表达了对权利保护委员会理事会多数委员的不信任。作为对这种不信任的回答，В.Ф. 格罗谢脱离权利保护协会，组建了俄国侨民委员会和称为《救助》的慈善协会。上海就这样一下子成立了希望能够代表俄国侨民区的两个权力组织和两个慈善组织。Н.А. 伊万诺夫当选为权利保护委员会主席，而 В.Ф. 格罗谢则是俄国侨民委员会的领导人。

权利保护委员会于 1929 年再次改组，增补了一些新人，而且配

属当时已经存在的俄罗斯民族协会，其首脑是“协会长”、海军上校 Н.Ю. 福明。1931年10月，В.Ф. 格罗谢去世，俄国侨民委员会主席职务转由 К.Э. 梅茨勒担任。

由于1921年上半年远东共和国正对着中国满洲边界，该共和国外交部就任命 Э.К. 奥扎尔宁为其驻哈尔滨总领事。远东共和国准备往中国东北有中东铁路大战的满洲里市派遣谍报站长。恢复中国与远东共和国之间正常的铁路运输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列宁曾亲自过问此事。捷尔任斯基建议委托总参军事学院学员 П.Ф. 瑞科夫-亚历山德罗夫斯基同中国当局进行谈判。在其从莫斯科出发前，捷尔任斯基、瑞科夫-亚历山德罗夫斯基与加拉罕三人受到列宁接见。列宁强调指出，苏维埃外交官会遇到巨大的困难，并说：“你们的任务是在最短期内，同中国北方政府签订关于开放与远东共和国边界，并建立赤塔与中东铁路联系的条约。”

1920年12月，瑞科夫-亚历山德罗夫斯基由莫斯科赶到了赤塔。他回忆道：“远东共和国外交部发给我的证件写明，我是总参谋部的代表。按照领导同志的意见，这样应该能帮助我尽快做好外交工作，同中国的军事长官及文职特别是外交官员，建立必要的联系。”1921年1月上旬，他已经开始就签订协定与开通赤塔—满洲里铁路运输线事宜同中方进行谈判。1921年3月6日晚签订了条约，3月7日边境已经开放，第一列由满洲里到赤塔的火车便隆隆开出了。1921年底瑞科夫患病，12月前往莫斯科，经过休养和治疗，重入总参军事学院。

这里应该指出，远东共和国驻中国的代表们根据实际情况，以中央和克里姆林宫的名义实施某些具体行动时，往往要自由一些（与以前我们的文献给人造成的感觉相比）。可以作为例子的是，远东共和国驻中国外交使团代表 И. 尤林于1921年夏秋之间，同张作霖举行了会晤，讨论中东铁路问题。在这些会谈过程中，尤林拒绝向张作霖转达契切林的要求：在中东铁路一旦移交中国时，沿该铁路线部署2万苏维埃军人。尤林认为，中国人横竖不会接受这样的建议，提出这样的建议只会破坏会谈的气氛。还有一个例子，尤林拒不执行远东共

和国政府关于同北京政府签订贸易条约的指示，因为照他的说法，这个条约草案“就其内容而言过分蛮不讲理”，因此他只是向中方宣称，还没有从赤塔收到该条约草案。

由于从1922年初起就谣传四起，说远东共和国的官方代表和共产党员把大量武器运到哈尔滨并秘密保存，1922年2月27日，张作霖的警察当局和中国军队总司令部的军官们对远东共和国各官方机构，甚至对赤塔政府*特命全权代表奥扎尔宁的办公室和住宅，以及工会房屋、工人俱乐部、许多俄国公民的房子，实施了40次搜查。驻哈尔滨的各国领事都对发生的事件极感兴趣，在搜查过程中，全都迫不及待地打听消息（显而易见，许多人在猜测，远东共和国是作为“在东亚，特别是在中国和朝鲜秘密和强化宣传第三国际思想的基地”而建立的，如同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全权代表和远东共和国政府未来的主席A.M. 克拉斯诺晓科夫在1920年写的远东政策目前问题提纲所说。当时克拉斯诺晓科夫被授予组建“缓冲国家”机构的广泛全权）。但是，令所有这些中国人和外国人极为不快的是，任何武器都没有发现。远东共和国外交部向中国外交总长颜惠庆发了抗议照会。该照会指出，中国政府庇护白卫军分子，实际上执行的是敌视远东共和国的政策，是在阻碍实现两个邻邦的人民生活在和平与亲密友谊之中的热切愿望。北京政府驻满洲的官方代表不得不声明，称自己与搜查行动绝对毫不相干。至于中国政府，则沉默了好长时间，只是在远东共和国驻北京公使馆1922年4月19日第二次发出照会之后，才于1922年5月1日声明，对奥扎尔宁被搜查一事深表遗憾，同时通知，业已命令满洲当局今后要特别关心远东共和国驻哈尔滨代表，对他实行保护。

在此条件下，在中国开展情报工作，对保障俄国在远东的利益，具有巨大的意义。从中国可得到日本的情报；而其旁边就是朝鲜，许多朝鲜人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他们掌握着有关朝鲜国内状况及日本

* 从1920年10月起，赤塔为远东共和国首都。该共和国在1920年4月作为俄国与日本之间的缓冲国建立，1922年11月撤销。——译者注

政策的有用情报。香港、澳门、印度支那都处于在华苏维埃情报机关可以达到的范围。大家知道，20年代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外局的一项主要境外情报任务，就是同准备对苏联实施军事进攻的武装白俄侨民作斗争。因此，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外局特别关注俄国侨民中心哈尔滨，特别关注白俄侨民组织。中国当时总体上已经是侨民分布的特殊区域。海军上将高尔察克军队残余，季捷里赫斯将军、卡佩尔将军以及哥萨克首领谢苗诺夫的军队残余都向中国聚集。20年代居住在满洲的俄国侨民达15—30万。白卫军部队驻扎在中国境内，造成了苏中关系的严重问题。俄国侨民没有停止过制订反共斗争计划，其中包括从秘密向苏联境内派遣单个特务或游击小组，到妄图在后贝加尔和外阿穆尔的铁路隧道中安放炸药包。A.И.安多格斯基将军筹划建立几十支25人组成的武器精良、熟悉地形的快速行动游击队，在滨海地区、后贝加尔和外阿穆尔地区的居民中开展工作。

在满洲靠近苏联边境地带作战的第一批游击者，就是一些散兵游勇。他们当中有个人叫叶姆林，是来自南部滨海地区的农民。叶姆林早在十月革命时，就在乌拉尔拉起了几百人的游击队，跟红军部队打仗也很顺利。当乌拉尔出现正规白卫军部队后，叶姆林带着自己的队伍投靠了他们。依仗自己的勇敢和组织才能，他很快得到晋升，在白卫运动的几年间，当到了中校。

叶姆林在哈尔滨没呆多久，很快就窜到了绥芬河。他几次由该地越境到苏方，尽量深入俄国内地，发动居民反对政府委员和国家保安人员，残酷无情地迫害他们。在苏中发生冲突时期，叶姆林出现在红胡子曾经盘踞的横道河子。在中国正规军来到此地前，他招募当地居民组成一支队伍，肃清了车站和镇里的红胡子土匪。

另一位单独打游击的是彼得罗夫大尉。这个彼得罗夫主要在绥芬河、尼科尔斯克-乌苏里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和苏昌等地行动。

中东铁路西线的白匪游击运动，是后贝加尔军队的哥萨克首领希利尼科夫将军打下基础的。希利尼科夫曾在哥萨克首领谢苗诺夫部队干过一段时间，由于二人不睦，他转投海军上将高尔察克麾下。他在后贝加尔边境区的额尔古纳河沿岸建立起一个个哥萨克哨所，尔后再

由这些哨所组建一些不大的游击队。在这些游击队的指挥员中，最为突出的是战死在后贝加尔的哥萨克戈尔杰耶夫兄弟、梅利尼科夫及死于菲律宾图巴堡的Г·波切库宁上校。

小股游击队通常由非常熟悉地形和居民情况的人组成。他们选择那些不大引人注目而又难以通行的地方，潜入苏联境内。经常发生游击作战行动的地方是苏昌煤矿区、伊曼、乌苏里江中游、阿穆尔河（黑龙江）左岸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到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段、兴安岭山脉、额尔古纳河左岸，游击队在这一点曾深入到涅尔琴斯克，甚至到博尔贾。

白匪的游击运动令外国人颇感兴趣。巴黎最高君主政体委员会向哈尔滨派出了一个以海军上校 K.K. 舒贝特为首的特别小组，其中有海军中校 B.П. 阿普列列夫、Ю.П. 阿普列列夫上校和 H.B. 弗罗洛夫上校等。为了实施游击作战行动，当时将 4 万日元交给舒贝特支配。俄罗斯真理协会首脑 П.Н. 克拉斯诺夫将军对游击运动的发展也很感兴趣，认为满洲具备游击运动获得成功的一切条件。当时该协会拨出了 2000 美元资金，但不知道这些钱花到什么地方去了。苏中冲突前不久，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的代表 H.П. 萨哈罗夫将军从美国来到哈尔滨，其肩负的任务就是积极组建游击队。

在相当长时期内，俄国志愿军远东军辖有三支经常作战的游击队，每支队伍的人数为 15—30 名。第一支是在后贝加尔作战的 П.А. 韦尔希宁的队伍；第二支由 С.Н. 马里洛夫指挥，在滨海地区作战；第三支是 H. 胡佳科夫指挥的古老信徒派*教徒队伍，在阿穆尔州行动。这些游击队从哈尔滨及满洲的其他地方获得武器，同驻哈尔滨的游击活动分子之一 H.A. 马丁诺夫保持经常联系，而马丁诺夫本人不止一次越过苏境，潜入滨海地区纵深。

白匪游击队的这种行动及他们对苏联领土实施突然而猛烈的袭击，为苏联情报机关提出了尽快查清和消灭他们的任务。

根据以前达成的协议，中国当局应该把所有白卫分子从文职和军

* 17 世纪由俄国东正教分裂出来的一个教派。——译者注

职部门中解雇。但已查明的情况是，一支白匪队伍在前沙皇军官涅恰耶夫的指挥下，参加了张作霖的军事行动。

建立为中国将军们效力的白卫起义军的想法早在 1919 年就产生了。当时哥萨克首领谢苗诺夫建议张作霖元帅为自己组建一支由哥萨克人指挥、由蒙古人组成的骑兵。但是，这位老帅的犹豫不决，使谢苗诺夫的这一计划未能实现。不过，利用白卫分子的部队为互相敌对的中国督军们效力的想法，却继续存留于那些善于钻营的侨民首领的头脑里，有时候甚至能变为现实。

1923 年，张作霖元帅在对“基督教将军”冯玉祥恨得咬牙切齿的时候，想起了哥萨克首领谢苗诺夫的建议，决定建立由熟谙军事的旧军人侨民组成的外国军团。组建队伍的任务交给了 M.M. 普列什科夫，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指挥过第一支西伯利亚步兵军。这支队伍应该由三个营和一个总务部门组成。应普列什科夫之请入伍的志愿兵达 300 多人，他们都是在森林租让企业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做工的侨民。凡入伍者都签订一份有权长期续约的为期六个月的契约。契约向志愿兵保证发放薪金；一旦志愿兵死亡，保证向其家庭发放一次性抚恤金；契约期限未满之前，如非因志愿兵的过错而终止服役，保证向其发放全额薪金。

当这些志愿兵来到奉天时，张作霖和冯玉祥已经签订了停战协定，他已经不再需要雇佣军了。这些志愿兵好不容易领到了仅仅一个月的薪金。

晚些时候，有人建议张作霖元帅的亲信之一山东督军张宗昌组建一支新的雇佣军。张宗昌同他在满洲的靠山一样，是以红胡子的身份开始其冒险生涯的。后来他流落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以承包人的身份向梅尔库洛夫兄弟的火柴厂供应木材。外国对西伯利亚实施武装干涉时，他指挥驻扎绥芬河的一个中国师。

着手组建雇佣军的任务交给了 B.A. 契诃夫上校，而山东俄侨部队则由 K.П. 涅恰耶夫将军指挥，远东地区的侨民都知道他曾是一位英勇的天才上校。

山东俄侨部队开始组建之前，滨海地区前统治者 H.П. 梅尔库

洛夫就在张宗昌元帅的麾下当上了顾问。除这支队伍外，山东省会济南府还建立了步兵和炮兵军事学校，学制为两年，配备了年轻的侨民教官。1924年秋季，涅恰耶夫将军奉命指挥山东俄侨部队。

涅恰耶夫指挥由4000白卫分子组成的一个旅。在这支队伍内还组建了装甲列车总队，前面已经提到的业已晋升为中国部队将军的契诃夫被任命为总队长。涅恰耶夫的装甲列车（其中有“北京号”、“山东号”等）都是用普通火车平车改装而成，用沙袋代替车厢的挡板。两年时间内这支装甲列车总队有了长足发展，到国民党北伐前，它已经拥有17辆装甲列车（而不是像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所说的只有4辆）。

梅尼希科夫兄弟指挥的3000名白卫分子在张作霖帐中效劳。

应该指出的是，组建为中国军阀效劳的俄侨部队，甚至产生了某种独特的竞争（例如，梅尔库洛夫与谢苗诺夫之间就是如此）。

因此，苏联大使馆在1925年2月2日照会中，将以上情况向中国人做了相应陈述。北京则不顾苏方的抗议，不愿解散涅恰耶夫的部队⁴³，也许指望在反对革命力量的斗争中利用这支部队。契切林1925年1月16日向M.A.特里利谢尔通报此情时指出：“这支受雇佣的白匪亡命徒部队在全中国到处游荡，不受任何制裁，仰仗自己高超的军事技能，打了一些胜仗……”这位外交人民委员继续说：“我们方面将指示加拉罕同志，为了消灭这支部队，必须施加影响，但除此以外还需要贵系统采取措施，瓦解并消灭这支队伍……”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1925年4月17日专门决议第9项指出，必须“就瓦解涅恰耶夫部队的可能性、合理性与方法问题征询加拉罕同志的意见”。

设在赤塔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外局驻远东的全权代表处负责在中国开展情报工作。正是这个代表处向满洲和中国派遣秘密谍报机关。如前所述，那些年月非常重视哈尔滨的作用。由华中、华南、上海、广州获得的情报资料，都经这座城市传递。该城还是从中国到苏联来回秘密调派人员的转移中心。

苏联驻中国的谍报机关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奉天、

哈尔滨、长春等市。

2. 驻北京的谍报机关

全俄肃反委员会对外局成立后，阿里斯塔尔赫·雷利斯基⁴⁴被派到北京任谍报机关首脑。

1919—1922年，A.E. 霍多罗夫⁴⁵在北京工作，担任俄罗斯通讯社（罗斯塔社）的领导人。第一批苏维埃代表到中国后，他积极同他们合作，受他们的委托去南方见孙中山。

1922年Я. 达夫强来到北京。到达后两周，他就致函自己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对外局局长岗位的继任者M. 特里利谢尔：“我认为我们这里的工作极其重要，我想在这里可以大有作为。”

达夫强在两个方向开展工作：一是以外交人民委员部参赞身份，二是以全俄肃反委员会对外局谍报站长身份。并且就第二个系统而言，他实际上担任俄国情报机关设在中国不下10个区域性谍报站总领导者的角色。

1923年，实际上已经在北京和哈尔滨建立了直接隶属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外局的谍报站。

工作半年后，达夫强给特里利谢尔写信：“这儿的工作很有意思，引人入胜，意义重大，但又非常困难，非常重要。远离莫斯科，联络不畅，相互不了解，更令我们的工作困难重重……我从来没有（即使在对外局里）像在此处这样多地工作过，从来没有耗费过这样多的心神。”达夫强认为，恰恰是“这里不但成为世界帝国主义的，而且成为我们的世界政策的焦点和最薄弱的环节”。照他的看法，“在这里夺取远东的牢固阵地”，绝对依赖俄罗斯。在北京工作一年后，达夫强向中央报告：

工作进展得很好。如果您注意寄回的材料，那您大概会看到，我已经掌握几乎整个中国的情况，任何重要的东西都不能躲过我的眼睛。我们的联系范围在不断扩大。总的说

来，我可以大胆地讲，白匪在整个远东的一举一动我都了如指掌。一切我都能事先知道，很快知道。

确实，驻奉天谍报机关通过自己的谍报员，在日本特工机关获得了整个远东的白匪反间谍机关独一无二的文件档案。这对中央而言是毫无疑问的、弥足珍贵的成功。达夫强派特别信使将所获文件及附函送回莫斯科交全俄肃反委员会对外局领导人。他在信中写道：

亲爱的米哈伊尔·阿布拉莫维奇*，由今天的信使给您送去在奉天获得的白匪反间谍机构的全套档案。请采取措施，勿让这套档案束之高阁，而应令其得到利用……

1923年2月11日，他向中央报告：

我大力开展工作……上海、天津、北京、奉天现在均已建立很好的谍报站。我将在哈尔滨建立一个重要的机关。有希望渗透到日本情报机构……我们在长春已经建好了一个很大的谍报机关。将在我们这儿工作的两个人同日本人和俄国白卫分子有联系。期待多获取有意义的东西。

然而，并不是一切都如同希望的那样一帆风顺。在中国的俄国工作人员中往往发生内部冲突。他们具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气质，担负不同的任务，代表不同的部门。所有这一切都给他们的相互关系打上了烙印。达夫强与雷利斯基之间形成了特别不平常的关系。前者致中央的几封书信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1923年12月9日，这位谍报机关首脑写道：

我不能说雷利斯基的任何坏话，但也不能特别夸奖他。

* 特里利谢尔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我来到这里后，他大有进步，他有希望成为有用之人。我们拭目以待……

但是，达夫强很快又写了完全不同的一封信，要求换掉雷利斯基，因为他懒散，萎靡不振，不胜任自己的职责。

过了9个月，即1923年1月9日，达夫强又致函特里利谢尔：

与我过去的看法相反，雷利斯基原来是一个出乎我意料的较为讨人喜欢的人。他在工作中是有点儿精神不振，但总体上干得不算坏，言行举止很得体。我差不多很满意他了，所以我请求不要替换他，他同我协调配合得很好。

不过在下一封致对外局局长的信中又流露出对雷利斯基否定的语气。

达夫强还必须为外交人民委员部系统做许多工作，但他的工作并不是总能得到莫斯科的肯定，尽管他的情报资料经常呈送列宁审阅。例如，经斯大林签署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1923年3月23日会议第57号记录指出：

向外交人民委员部指出必须采取一切措施，废除达夫强同志签订的中东铁路协定（档案中未发现该文件——作者注），对达夫强同志违反中央的指示提出警告。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今后勿将重要任务交给达夫强同志。

达夫强与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同事们在工作上配合得不是很好。在一封信中，这位谍报机关首脑对其中一些人对北京公使馆对外情报机关工作人员的态度表示愤慨；在另一封信中称，外交人民委员部经常对他迟发经费。

他在第三封信中写道：

我想，北京是我在这个心爱的机关里最后一个工作岗位了。我希望在莫斯科工作，或者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到西方工作。我宁可完全断绝同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关系，因为我实在不能同他们和睦相处。

应该公正地指出，他也常常不满意本部门中央机关的工作。1923年9月6日，他向特里利谢尔报告：“我认为，在北京比在莫斯科对情况看得清。如果您不同意这一点，那就请彻底解除我的工作。”还有一次，由于不满莫斯科提出的一些办法，他向中央声称他想拒绝从事对外局的工作。这些材料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人，他满怀热情，要求严格，工作能力强，同时又与任何人都合不来⁴⁶。

看来，1920—1923年间，在共产国际和外交人民委员部两个系统，同达夫强一起工作的是K.A.米赫利松-阿尔维斯⁴⁷。

1921年7月22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正式任命A.越飞为共和国驻中国特命全权代表。他领导的公使馆按全权代表机关规格组建，由14人组成，包括军事专家A.H.黑克尔。1923年初，越飞经上海赴日本治病，被达夫强留任作他的副手。

20年代中期，叶夫根尼·阿列克谢耶维奇·福尔图纳托夫⁴⁸以苏联公使馆医生的身份作掩护在北京工作。

1924年5月31日，签订了《苏中解决悬案大纲协定》。Л.М.加拉罕于1924年6月13日向中国照会，建议将两国外交代表机关升格为大使馆。此后加拉罕当上了俄国驻中国正式大使。他在北京工作到1926年8月前，只是于1925年10至11月休息了一段时间。

为执行共产国际的任务，Г.Н.维经斯基不止一次来到中国，包括北京：1920年初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秘书处代表团团长；1924—1925年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全权代表；1926—1927年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代表。他对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共产党报刊的创刊，都给予了很大帮助。他参加了中共第四次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共中央各次重要全体会议的工作。据一些目击者回忆，有一天维经斯基乘火车去哈尔滨，得到奸细通风报信的中国警察

闯进了车厢，要抓捕携带密码和文件的“俄国间谍”。但是，维经斯基隔着窗户看见了警察，锁上包厢，把所有文件吞进肚子里。因为当时一没有地点，二没有时间把东西烧掉。警察把他带走，在监狱里囚禁了一段时间。但由于没有得到证据，警察不得不放了他。

为了改进中国的整个军事工作，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⁴⁹1925年4月17日决定“在北京建立一个中心，其人员组成为：主席——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同志，成员——军事领导人黑克尔同志（苏联驻中国常任代表处武官——作者注）和军队政治工作领导人沃罗宁（普季钦）⁵⁰同志”。参加中国委员会的有温施利希特、契切林、维经斯基、彼得罗夫、隆格瓦、梅利尼科夫、博尔特诺夫斯基和别尔津。这样，自1925年春季起，苏联在北京组建了一个协调并领导在华全部工作（显然也包括情报工作）的“中心”。中国委员会还决定“运送部分武器归加拉罕同志支配，无偿援助将军们”。温施利希特通知，业已运出的武器数量是日本造步枪和德国造步枪各2000枝，以及相应数量的子弹。准备运出的武器价值估计为771万卢布。

20年代下半叶在中国的情报工作经常引起中央的不满。为这一工作耗费了大量钱财（据Г.阿加别科夫的材料，一名谍报站长在当地每月得到约250美元，生活有充分保障）。军事情报员和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工作人员在中国常常平行开展工作，互不通信，相互隐瞒所获资料，情报资料常常耽搁好多时间才能送达中央机关。送到莫斯科的材料常常以那些零星的、偶然的、未经查证的情况为依据。各地情报机构受破坏的情况时有发生。

在这方面，1925年5月20日伏龙芝致加拉罕的信中专谈苏联驻中国军事政治机关工作的那部分内容是很有意思的。他关注的是必须改进驻华机关的工作，打消大规模扩充驻华机关的强烈愿望。伏龙芝指出：“我们不会在北京建立任何司令部，只许将情报机构略加扩大，各小组的译员数略微增加。”他为驻华机关工作，特别是其三人领导小组工作提出的迫切任务之一是“把有关各种事件、现有各种力量和当前局势的情报，以及对这些力量和分布的评价放到应有的高度。”“例如，我们至今不了解中国南方发生的情况。必须知道的不是那些

单纯的零星事实，而是有事实证明的情况。”这就是伏龙芝提出的要求。

驻中国各情报部门工作人员之间经常发生摩擦。相互间的闲言碎语不但从北京，而且从其他地方不断传到上面。

由于国民革命军最高统帅部与不能中肯地评价国民革命军状况的驻华南军事顾问团领导人 H. B. 古比雪夫之间，形成了非同寻常的关系，苏联军事顾问们在广州的工作条件越来越困难了。使莫斯科感到不安的还有：苏联军事顾问在驻中国西北的国民军中也未能适当做好工作。

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1926年1月），蒋介石在其军事问题报告中表达了该党军事政策的主要目标：准备北伐。有关蒋介石及其最亲近者加紧准备北伐的情报，通过多种渠道由广州源源不断地传到莫斯科。对于北伐顺利进行的可能性，驻中国苏联工作人员的看法互相极为矛盾。

所有这一切，迫使联共（布）领导层既根据一些新现象更加严肃地思考苏联对中国的整个外交政策，也更加严肃地研究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合理性问题。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几乎同时建立了两个委员会：一个委员会以 Л. Д. 托洛茨基为首，在莫斯科工作；另一个委员会以 A. C. 布勃诺夫为首，在中国工作。后者以伊万诺夫斯基（化名 A. C. 布勃诺夫）委员会而闻名于世。

鉴于这一切，1926年初成立了专门的《在华侦察情报工作委员会》。该委员会检查当地工作后，于1926年4月22日提出了一些建议，并将其送到莫斯科。这些建议的内容包括：

一、对中国局势的侦察和报知明显不能令人满意（特别是从有利于我们对中国采取积极政策而言）。其原因是资金短缺和组织有缺陷。

二、委员会认为完全应该加强对中国局势的研究。为此应当：

1. 加强军事和政治经济情报工作。

2. 在全权代表机关组建研究机构，任务是全面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研究机构隶属负总体领导之责的全权代表机关。相关机关和人员通过全权代表机关向该机构交派任务。

3. 责成情报部的谍报站长一方面要执行莫斯科下达的任务，另一方面又要执行武官交给的任务。

此前已得出结论，必须松开对武官的束缚，赋予其更多自由。

为了改善军事情报工作的组织与实施，早在1920年夏，革命军事委员会就决定在苏维埃共和国驻各国（即同苏维埃国家签订了和约并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国家）全权代表机关设武官机构。1920年6月3日，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了俄罗斯联邦驻外军事代表工作细则。该细则第4条确定了武官收集外国情报和资料的活动范围，指出了武官为收集需要的情报而应当采用的方法和途径：

1. 研究外国文献；
2. 研究期刊上有用的材料；
3. 直接观察；
4. 利用谍报机关。

在非党工作人员被任命为武官的情况下（在那些年代这决不是绝无仅有的），其工作归结为代表本国、就军事问题进行答疑、利用能够获得的公开情报来源研究驻在国武装力量。谍报工作则由担任副武官的特派党的工作人员负责。所以，武官或副武官就是谍报机关领导人。不过临近1926年时，已经要求对旧的工作细则进行更准确的说明和解释。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26年4月15日通过一项专门决议：《在中国的军事政治工作及其近期必须进行的改造》。该决议第11条指出：

考虑到过去的经验，必须向作为全部军事工作领导人的武官提供机会，使其能够在中央和全权代表机关所制定的总政治路线范围内，根据该国军队内部形势，独立确定开展军

事工作的方法和完成既定任务的途径。

由于要对本部门工作的成效负责，武官应有可能确定军事工作人员在军事领域中同当地军队指挥人员的相互关系，并为他们拟定工作计划和方针。

在中国工作的伊万诺夫斯基（A.C. 布勃诺夫）委员会⁵¹“也表示赞成让武官担负情报部谍报站长的职责”。И.С. 温施利希特于1926年6月收到的一份报告称：

如此解决问题既能保证完成莫斯科下达的在中国进行情报工作的任务，又能保证对我们教官团的服务。能保证我们不受妨碍工作的种种争执的干扰——近日在广州顾问团里，情报部的谍报站长就向加伦（布柳赫尔——作者注）多次证明自己有独立性。顾问团有做情报工作的专门人员，他们有机会通过中国机关开展这一工作。谁知情报部的谍报站长突然来了，要求把情报工作移交给他，声称他自己不受团长的约束。结果就出了荒唐的事。

这样，从这项工作细则来看，武官本身通常就是情报部的谍报站长。那些年中谁当过驻中国武官呢？

驻北京第一任苏联武官（1922—1925）是阿纳托利·伊里奇·黑克尔⁵²。1923年，他和越飞一起在上海同孙中山进行过会谈。

第二任武官是土耳其斯坦方面军原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H.M. 沃罗宁。武官通过担任顾问团长的著名而有权威的红军军事首长，如 B.K. 普特纳、B.K. 布柳赫尔、H.B. 古比雪夫、B.M. 普里马科夫等来领导军事顾问的工作。

1925年10月至1926年2月，著名红军统帅 A.H. 叶戈罗夫将军被任命为驻北京武官；1926年3月，他被召回苏联⁵³。

1926年，拉脱维亚人阿尔伯特·亚诺维奇·拉平⁵⁴担任驻中国代理武官。

在这几年中，П.Ю. 博罗沃伊⁵⁵一直在驻中国武官的领导下工作。

1926年9月至1927年4月的最后一任驻中国武官为P.B. 隆格瓦⁵⁶。1926至1927年，Г.И. 萨法罗夫担任苏联驻中国全权代表机关的一等秘书。

前已提及的《在华侦察情报工作委员会》所提建议的第4项指示：

“各地开展谍报工作的谍报网应该统一起来。情报部谍报站长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外局的全权代表共同下达各项任务。”顺便说，在中国的整个情报工作直接归武官领导的问题过去也存在，而且很好地解决了。1925年9月17日，别尔津通过电报通知驻北京武官，他同意让武官直接领导在华各情报小组的工作。

该委员会的建议之所以有第4项不是偶然的。在此之前，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外局驻外谍报机关与红军军事情报机关的代表之间，常常暴露出各种矛盾和不愿意合作的倾向，彼此并非总能向对方提供所获情报。И.Я. 拉兹贡（奥利金）1926年2月5日呈送苏联驻中国全权代表加拉罕的报告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按照加拉罕交给的任务，他本应拟写一份关于驻中国教官工作的文件，揭露妨碍工作的种种原因和缺点。拉兹贡报告，他无法很好地完成这项任务，因为“许多客观原因就是障碍”，首先是不给他看所需要的资料。他在报告中说：

第一处已经得到了以某种形式下达的指示：限制“局外人的任何渗透”，不得提供任何材料。就在那里，通过同我们的教官谈话和交换意见来收集资料，居然被视为抱有策反图谋的某种秘密工作。形成了一系列最不方便的规定，这些规定以妨碍工作来恫吓我的交谈者，鼓励人们寻找各种形式上的借口。事情竟然发展到命令我一昼夜内离开北京的地步。

由于资金短缺，专家不足，加上从中央传来对各地工作不满的信

号，各类情报机关试图协调和密切相互关系，达成共识，更精细地处理财务问题：明确谁该向谁付款，各自精简机关编制。

1926年5月19日由北京寄出，现保存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文件《对〈情报工作设想〉的补充意见》颇有说服力地证明了上述情况。这份文件说，“在边远地区我们应该有统一的情报与反间谍机关”。这有助于避免“分散使用不同情报机关为情报工作拨出的款项”，“减少对公开（服务性）机关人员的费用，以便将最大限度的款额用于秘密（谍报）机关”。又好又省的做法是，用一个技术服务人员，既是摄影师，又是打字员，这样从统一的机关向北京发情报花钱较少，北京把指示和任务下达到边远地区也是如此。

要在边远地区建立双倍数量的谍报机关，我们太缺乏人员和资金了。要解决这个问题，肯定需要：第一，驻北京的军事部门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情报机关就任命谍报站长及其助手达成人员配备协议。第二，顺利组建谍报机关：谍报站长是军队同志时，其助手应是国家保安人员；相反，谍报站长是国家保安人员时，其助手应是军队同志。第三，业务行动服从北京情报中心。第四，行政和财务上的从属关系按其隶属相应部门确定（谍报站长或其助手为军人者，则隶属军事情报机关，由军事情报机关负担其费用；相反，谍报站长或其助手为国家保安总局人员者，则隶属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由该总局负担其费用）。第五，业务和技术设备费用同样由军事情报机关和国家保安总局情报机关分担。业务开支、谍报员的薪金由各情报部门负担；技术设备费用大致平均分担。

1925—1927年，M.И.卡扎宁在布柳赫尔（加伦）的司令部当翻译。他在其回忆1925—1927年中国革命的材料中提出的看法在这方面带有典型性。正像他的朋友马祖林向他解释的那样，“虽然鲍罗廷与布柳赫尔经常见面，效力于同一事业，但是两个使团——鲍罗廷

的政治使团和布柳赫尔的军事使团，都各干各的，彼此不负责任”。

派遣到中国的苏联工作人员中常常产生严重的分歧，根据我们档案馆中保存的文件，可以对这些分歧进行系统研究。大使 Л.М. 加拉罕（卡拉哈尼扬）与武官 А.И. 叶戈罗夫及其在北方的副手 В.А. 特里福诺夫（1888—1938 年）⁵⁷ 之间就存在严重的分歧。В.А. 特里福诺夫在笔记中写道：“假如苏联全权代表机关（驻北京的机关——作者注）将目前为支持那些军事冒险主义者而耗费的巨额资金中的哪怕一小部分用于援助共产党，训练有经验有知识的党的政治工作人员，资助中国学家，收集文献资料，那么，对中国革命运动的好处之大就无法估量，而苏维埃俄国还会省下数百万钱财。应该记住，我们如今是在中国工作，可是我们完全不了解中国，不掌握汉语，只有 3—4 个懂汉语的译员。仅仅这一种情况就应该促使我们的全权代表机关在特别重要的工作中十分谨慎，做到深思熟虑。”他和加拉罕的看法不同，认为在我国承受巨大财政重负的情况下，“我们的顾问乃至整个苏联对人民军队的影响，简直微不足道”。

国民党的政治顾问 М.М. 鲍罗廷与主要军事顾问 Н.В. 古比雪夫之间也存在分歧。Н.В. 古比雪夫给 А.И. 叶戈罗夫写信说：

我认为，鲍罗廷因其僵化了的工作方法变得越来越有害无益了。我不否认，相反，我强调鲍罗廷对我们过去在中国取得的成就立了大功，但是我认为，他已经干完了自己的事情，再不能干更大的事。必须另派一名强有力的工作人员到广州，他必须是最优秀的党员。……近一段时间我同鲍罗廷同志很少争吵，因为在我据理力争之下，他大为泄气了，几乎不再通过干涉来妨碍我的工作。……既然我认为必须派人取代鲍罗廷，那么从我们的相互关系看，我认为他在公开的工作中已经做了与他有关的一切，他已经跟不上形势的发展。

这种情况令莫斯科焦虑不安。决定火速派一个小组到中国现地查

明情况。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3号记录（特别2号）中经斯大林签署的决议指出：“由布勃诺夫（主席）、库比亚克和列普谢同志组成的委员会必须火速赶赴中国，委员会成员包括加拉罕同志。”向该委员会下达的任务是：

第一，查明中国局势，及时上报政治局；第二，无须政治局批准，和加拉罕同志一起，就地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第三，整顿赴中国军事工作人员的工作；第四，检查如何正确选拔赴中国的工作人员，并检查这些工作人员接受指导的情况。

对中国总的情况进行周密的调查之后，A.C. 布勃诺夫率领的委员会于1926年5月17日提出了改进工作的《总结论与具体建议》。该文件《情报侦察工作》一章指出：

应该认为，整个情报工作的安排，特别是侦察工作（情报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外局的工作）的安排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各情报机关虽然能令人满意地阐明满洲和蒙古的情况，但是对中国其余部分及其各个争斗集团情况的阐述令人极不满意。

全权代表机关的政策和我们的军事政治工作，往往以零星、偶然和未经证实的情况为依据。

此外，对材料的加工整理，对整个国家的研究工作，在北京都组织得无法令人满意。

情报部花费大量精力研究一般经济情况，对外局根本不整理材料，而全权代表机关的情报对时事的阐述（全权代表机关简报）总是迟误一个半月到两个月。

此外必须指出，情报部和对外局的工作中有许多重叠现象，导致额外的外汇消耗。

为改进工作提出了以下建议：

一、组织情报工作（情报部、国家政治保安局）应做到：既能从苏联国防利益的角度来阐述中国北方（满洲、蒙古），又能从我们需要对中国采取积极政策及对中国各种争斗势力进行研究的观点来介绍全中国。

二、应在全权代表机关下建立一个研究和阐明中国政治经济生活的专门机构。

三、建议军事部门和国家政治保安局就情报工作具有更高的协调性进行磋商，消除重叠现象。

布勃诺夫委员会建议为中国严格选拔和训练军事教官。该委员会在建议中指出：“所有被派遣的工作人员都应在军事学院东方部预先接受指导，哪怕是进行短期的训练，了解中国内部形势”。考虑到多数教官是在不懂汉语的情况下派遣的，而这妨碍了“工作的速度和效率”，建议拉狄克在中山大学“特别关注培养”可靠的精通业务的翻译人员。委员会认为必须重新审查在中国的军事教官全体人员，并“拟定人员更新与充实方案”。在这种情况下，选拔新教官应该逐个进行，既考虑到他们的素养，又考虑到健康状况和家庭情况。

1926年12月30日，情报员С.И.阿拉洛夫（1880—1969）被任命为苏联政府驻中国国民政府的代表，但他在那里只呆了很短一段时间，就于1927年当上了苏联部长会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外事局长。

派遣到中国做情报工作的不但有苏联公民，而且有其他国家的公民。例如，自1926年2月至1929年初，情报总部（第四部）先后派驻北京和上海的秘密谍报站长的助手，就是保加利亚的情报员伊万·措洛维奇·维纳罗夫⁵⁸（1896—1969），与他一起工作的译电员是其俄罗斯妻子加林娜·列别杰瓦娅。他们和X.И.萨尔嫩⁵⁹一起，在军事情报工作中帮助有苏联军事顾问的中国军队。蒋介石叛变后，萨尔嫩小组转入地下，以生意人的身份住在北京和上海。他们将大批武器从欧洲和远东运到中国，满足中共军事机构的需要。卖完在西方十分

畅销的中国稀奇商品之后，萨尔嫩和维纳罗夫在欧洲大批地买下这些武器，收藏在哈巴罗夫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仓库里。1929年，萨尔嫩及其小组返回苏联。

维纳罗夫1969年在索非亚出版了《寂静战线的战士——一个谍报员的回忆》一书。他们到中国并会见B.K.布柳赫尔后，受领了“帮助中国国民革命军建立情报机关”的任务。

20年代末情报部驻中国代表是赖萨·所罗门诺夫娜·本内特⁶⁰。

1927年4月5日夜，在使馆区警卫协助下及美国、英国、日本、法国、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大使知悉的情况下，由张作霖的士兵和警察组成的匪帮洗劫了苏联驻北京大使馆。据Л.巴拉克申回忆，此前不久，苏联武官助理试图潜入英国大使馆时被捕。看来中国警方掌握了一些中共党员躲藏在苏联大使馆的情报，这些共产党员卷入了反抗国民政府和张作霖元帅的多次起义。苏联大使馆遭袭击时，大使馆人员未及烧毁的463个卷宗总共3000多份文件被劫掠一空。警察逮捕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及20名住在大使馆内的中国人，以及武官处工作人员И.Д.通基赫和利亚先科。通基赫是后贝加尔的一名哥萨克，前沙皇军队将军，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国内战争，当时是驻北京武官处的军事顾问。他被捕之后被关进监狱，身受严酷的牢狱之灾一年有余。

苏联政府立即表示最严厉而坚决的抗议，认为对苏联大使馆的袭击“是对最基本的国际准则前所未闻的践踏”，而那些被抢掠的文件是张作霖的警察精心伪造的东西。作为对这一声明的回答，张作霖命令报刊登载所获文件的一些照片。

1927—1928年，苏联驻北京的代理领事为И.И.斯皮利瓦涅克⁶¹。

1925年毕业于军事学院的谍报站长瑙姆·伊萨科维奇·艾廷贡那些年也在北京工作。

1925—1927年间，С.Г.韦列扎耶夫⁶²化名韦杰尔尼科夫，先后以驻北京外交代表机关工作人员身份和驻汉口总领事馆工作人员身份作掩护，担任总谍报站长。

3. 驻哈尔滨的间谍机关

俄国 1917 年十月革命胜利及白色运动失败之后，满洲成为制造反对俄国苏维埃政权新机会的桥头堡。中东铁路征用地带*，即所谓中东铁路走廊，成为特殊的国中之国，其中有俄国法律、法院、行政机关、警察、铁路卫队以及人数众多的俄罗斯员工，上至铁路管理局长 Д.Л. 霍尔瓦特将军，下至最低下的扳道员。

中东铁路的修建始于 1898 年，竣工于 1903 年。取得铁路征用地带治外法权的租让合同，是以俄罗斯亚洲银行的名义，代表中东铁路股份公司同中国政府签订的，俄国政府掌握该公司整整 1000 个股份。1903 年中东铁路资产估价为 3.75 亿金卢布。除铁路外，该公司还拥有 20 艘轮船、不少码头及其他河运财产；其太平洋船队估价为 1150 万卢布。中东铁路有自己的电报局、煤炭和森林租让企业、学校、医院、图书馆、铁路俱乐部。铁路修成后，俄中两国之间的交通改善了，加快了。著名的中国作家张至公在为梁启超评论李鸿章的书作序时写道：

西伯利亚大铁路和满洲支线建成以后，俄国和我们的距离比之其余西方列强要近一倍以上，而且应该坚信，从这一时刻起，两个伟大民族的关系会更好。

俄国是我们的老邻居。历史上可以找到互相友好的诸多证据；而互相仇恨的正式证据则尚未发现。

但是，后来到 20 世纪 60—80 年代，一些中国历史学家评价在满洲修建俄国铁路的缘由，以及十月革命前对该铁路的使用时，得出了

* 我国有些材料简称为中东铁路“属地”。这一地带的行政、司法和经济特权都由俄国管理。据有关资料披露，俄国仅砍伐原木一年就收入 3—4 亿元。日俄战争后在这一地带驻军达十余万。——译者注

一致的结论：沙皇俄国在满洲抱有侵略的目的，企图借助中东铁路建立其在中国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基地。他们认为，这种情况对中国的民族利益造成了威胁，这就决定了中国人民将为恢复自己在中东铁路征用地带的主权而进行斗争。

早在 1903 年，国内最有权威的“铁路员工”之一 С.Ю. 维特（1905—1906 年担任俄罗斯帝国首相）就任命德米特里·列昂尼多维奇·霍尔瓦特中将为中东铁路局长。

1917 年，俄国临时政府照搬旧的决定，再次任命 Д.Л. 霍尔瓦特中将为中东铁路征用地带管理委员。

位于中东铁路区域的哈尔滨，是当时满洲的经济贸易和政治中心、首府，同时还是远东“走私和间谍活动中心”。1917 年以后，北满、中东铁路区域成为距俄国最近的形形色色的白卫军根据地。这里组建了武装部队，他们进入俄国领土后，从这里为他们提供补给品；他们被红军击溃后，又向这里逃窜。

1926 年曾以外交信使身份到过哈尔滨的苏联元帅 В. И. 崔可夫回忆道：

哈尔滨是一个公开买卖外汇、毒品、武器、人口的黑市。这里的一切都被视为商品。当地没有的东西，有人会从地球的任何角落搞到手。

走私贸易，包括私运鸦片、黄金、各种珠宝，在中东铁路沿线泛滥。鸦片是从滨海地区运过来的，朝鲜人和中国人在那边的乌苏里原始森林中开垦大片土地种植罂粟。边境官吏、铁路员工、警察人员全都参与贩卖鸦片。投机商掌握的特别公司控制着运送鸦片的行动，这些投机商中有朝鲜人、犹太企业主及多年居住在当地的铁路员工。其中有两个最大的企业主，一个是姓朴的朝鲜人，另一个叫武尔福维奇。鸦片藏在火车头、电动机车厢、餐车和乘客车厢里（那里可拆卸的天花板后可藏走私物品），由绥芬河运到哈尔滨。为了密封住鸦片的特殊气味，每磅鸦片用铅纸和胶布裹好，几磅合装成一包运送。鸦

片的运费是2—5个中国银元。管运送鸦片的人事先与海关官员和警察商量好，先付给他们“货物”放行费。运到目的地的鸦片价值比其成本贵很多倍，就这样为走私贸易的所有参与者带来了巨额利润。

走私贸易的另一种典型商品，是苏联政府没收并经过满洲运到外国市场的珠宝。负责运送黄金、珠宝、皮毛、艺术品的人中，有的同苏联谍报员的关系十分密切，后者经常充当机车和车厢里的仆人。餐车承租人和中东铁路沿线多数小饭馆的服务员一样，多半是高加索人。他们必定有苏联护照，因为他们都在中东铁路和乌苏里铁路的国际直达列车上服务；他们几乎全部要常常违背自己的愿望，同包括远东边疆区执委、北满共产主义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局、内务人民委员部等在内的各种苏联组织保持密切的联系。

20世纪20年代中期，哈尔滨的人口为60万左右，其中俄罗斯人约15万，满族人和汉族人共39.5万，日本人2.7万，朝鲜人3.4万。

哈尔滨已成为中东铁路的中枢，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苏维埃俄国、中国、日本、西方国家为了控制中东铁路，在20年代整个上半期实际上一直在进行斗争。因此，苏联各种特工机关参与这种斗争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了。

俄国革命之后，哈尔滨苏维埃1917年12月尝试按照列宁亲自下达的关于夺取中东铁路区域全部权力的指示，在中东铁路征用地带建立苏维埃政权，但未获成功。收到列宁的电报后，哈尔滨苏维埃兴高采烈地作出决定：罢免霍尔瓦特，夺取管理权。霍尔瓦特对此也作出反应，采取紧急强硬措施，立即取消苏维埃。因此，霍尔瓦特在哈尔滨很快建立了远东积极保卫祖国委员会和立宪会议。霍尔瓦特本人就其观点而言，是一个狂热的君主主义者，沙皇一家在俄国被灭门令他痛苦不堪。中东铁路实行铁的纪律和对工作人员政治上是否奉公守法进行严格而细密的检查。按照霍尔瓦特的指示，所有被怀疑同情社会革命党人特别是布尔什维克者，一律立即解雇。鄂木斯克市国家保卫

局*警察局 1919 年 7 月 29 日向中东铁路管理局发了一则通缉令，在此不妨引用该通令的内容：

秘密。通缉令。致各省及各州所有管理人员。

一度在乌法被捕的布尔什维克积极活动家雅科夫列夫随后获释，本应具结保证不离开鄂木斯克，但却潜藏起来。遵照警察局长命令，特别处请求下令采取最有效措施，搜捕雅科夫列夫。此人特征：个子中等偏高，身体壮实，发色暗褐，剃光胡子，举止庄重，椭圆面庞带有书生气，年龄 36—38 岁，衣着考究。一旦发现此人，应立即搜捕并送交最高统帅部司令部军务总监部反间谍局和军事监察局局长处置。

看到通缉令后，霍尔瓦特立即通过自己的“耳目”——秘密警察机关，询问按照 H. 索科洛夫提供的名单搜查雅科夫列夫的结果。得到的回答是：在他负责的中东铁路区域，布尔什维克雅科夫列夫未被列入名单。

社会民主党人于 1917 年 12 月被驱散之后，其残余力量精心隐藏在各个铁路机修厂里。于是，虽然布尔什维克起初能够在铁路上建立一个工人委员会苏维埃，但是铁路管理权仍旧掌握在霍尔瓦特手里。他依靠的是工商界、外交领事团和部分当地居民。苏维埃政权方面放弃昔日俄中签订的各项中东铁路协定，迫使中国当局自己掌管该铁路。在 1918 年初苏维埃政权与中国举行的彼得格勒会谈中，中国深信自己的行为是合法的。苏维埃俄国非但没有对中国的行为提出抗议，而且还同意从中东铁路征用地带撤出自己的军队，认可中国军队

* 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一些地区在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条件下相继成立了若干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政府”，其中包括 1918 年 6 月 23 日在鄂木斯克成立的“西伯利亚临时政府”。这些“政府”都有自己的“国家机器”和军队。此处出现的“通缉令”就是鄂木斯克伪政府发出的。——译者注

取而代之的现实。

1918年春，霍尔瓦特将军参加了沙皇俄国驻华公使库达舍夫在北京召开的会议，参加此次会议的还有海军上将 A. B. 高尔察克及各盟国的代表。霍尔瓦特将军的地位自然而然地把他推到远东支援临时政府运动首脑的岗位上。他一度领导“西伯利亚政府”，同鄂木斯克政府相对抗，企图将西伯利亚和远东的一切白匪势力联合到自己的周围。他呼吁各盟国援助，但只有日本回应。而日本提出的是霍尔瓦特及其周围的人认为不能接受的条件：炸毁符拉迪沃斯托克要塞，变该市为自由港口；将西伯利亚的矿物和木材专有开采权转让日本人；日本船只在阿穆尔河（黑龙江）上自由通航，等等。霍尔瓦特将军终止了同日本的谈判，以此“赢得了不向外国人出让俄国权利和财产者的声誉”。在霍尔瓦特的积极参与下，高尔察克被抬出来，并被一致推举为最高执政者，霍尔瓦特接受了高尔察克的庇护，同时被任命为“高尔察克在满洲的最高全权代表”。于是霍尔瓦特在美国印制了中东铁路使用的纸币，面值从 50 戈比到 100 卢布。老百姓把 1918—1919 年的中东铁路区域称作“霍尔瓦特国”。

然而，在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年代，西伯利亚铁路于 1919 年 3 月转归盟国共同监管，这些盟国成立了盟国铁路委员会，其首脑是美国人约翰·斯蒂文斯。虽然摆在中国面前的任务是保护中东铁路，以免被日本、白卫军和各盟国完全夺走，北京政府却尽量在这种情况下维护列强对中东铁路过分露骨的染指。在那种条件下，北京领导人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对中东铁路运营的控制能力，不得不遵循盟国的指示行事，而这些盟国的行为目的，在于限制北京政府管理铁路的权利。中东铁路处于困难的财政经济状况之中。鄂木斯克政府垮台后，日本试图夺取中东铁路，但又不敢破坏同一个盟国的关系，因为俄罗斯亚洲银行被视为法国的一个机构。此外，斯蒂文斯作为盟国铁路委员会首脑和铁路局长，精心保护了铁路的利益。

1920年初，由于红军粉碎了高尔察克，满洲的形势发生了变化。这使中国当局于 1920 年 3 月自动建立了中东铁路监管机构。中东铁路征用地带的白卫军部队被解散，俄国铁路卫队被遣散，俄国邮局关

闭，警察则隶属中国行政机关。中东铁路局长霍尔瓦特将军被解职。大家知道，白卫军部队得到日本的支持，从编制上看人数众多。中东铁路征用地带划归东三省特别区，该区的总司令被赋予了广泛的权限，甚至有权按照自己的选择任命铁路局长。工程师 B. B. 奥斯特罗乌莫夫被任命为中国当局监管下的中东铁路第一任局长。

这样，北京政府通过支持反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干涉，也为巩固自己在中东铁路上的阵地创造了条件。我们看到，在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旗帜下，中国当局获得了机会，实行进一步削弱俄国在中东铁路上的阵地的方针。

中东铁路是 20 年代初帝国主义列强激烈争斗的目标。一些苏联历史学家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为控制中东铁路而相互冲突的同时，却极其一致地指责苏维埃俄国和远东共和国实行侵略，指责他们蓄意夺取中东铁路，并企图证明：苏维埃俄国起初在 1919 年 7 月 25 日的宣言中许诺将中东铁路无偿地移交给中国，后来却变了卦。也有人在论证，这种事从来没有发生过。在论证这种情况时，对立双方通常援引并且至今也在援引苏维埃政权致中国南北方人民和政府宣言的两种不同文本，其中一个文本中似乎含有这样的许诺：“无偿地将中东铁路归还中国人民”，而在另一种文本中没有这样的话。

让我们试分析这份文件的不同文本。

1919 年底，凡尔赛会议的决议激起了中国社会舆论的愤怒（根据同德国签订的和约，德国在中国的租界没有归还中国，却转归日本人）。正是在那一时刻，苏维埃俄国外交人民委员部“向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发出照会，工农政府在该照会中庄严声明，放弃沙皇俄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中国 1920 年春才得到该文件的正文。起初由伊尔库茨克用电报将文件发到中国外交部，随后托返回中国的外交官带到北京；不久，终于由苏维埃俄国代表将宣言的另一份亲自交给哈尔滨的中国官员。其中果然有一句承诺——“无偿地将中东铁路归还中国人民”。

然而过了一些时候，当事情发展到俄罗斯联邦同北京政府直接进行谈判时，向中国人出示的宣言正文有些不同了，其中无偿地将中东

铁路归还中国的一段不见了。于是开始了长时间的争吵，加拉罕和越飞反复证明，照会的原始文本中没有该条。譬如，俄罗斯联邦驻中国代表越飞 1922 年 11 月 14 日致函中国外交总长顾维钧：

1919—1920 年各份宣言中没有中华民国外交部备忘录中所引证的话：“工农政府打算无条件和无偿地将与中东铁路有关的权利和利益归还中国。”

1924 年 6 月 12 日，攻占冬宫的英雄、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在《消息报》上发表文章，解释当时的情况。他写道：

指出这份文件引起的误会颇令人感兴趣。它在产生过程中，由莫斯科的中国工人开会讨论过，涉及中东铁路的一条被人随意进行了重新修改……该文件就是以这种面貌在中国广为人知。

俄罗斯历史学家 M. 克留科夫十分正确的认为，这一解释看起来不很令人信服。第一，我们所谈到的这份宣言并不是“在产生过程中”，而是在加拉罕签署一个月之后交中国侨民会议讨论。第二，该文件在中国广为人知的不是其中文文本，而是法语文本，应当猜测是由俄语文本翻译过去的。苏中关系研究者 B. 萨温后来试图给予完全不同的解释。按他的说法，北京政府 1920 年春收到的那份照会的文本，经过了白匪间谍的恶意歪曲，加进了原先没有的一段。但是，正如 M. 克留科夫公正地认为，这一说法也没有讲明多少原由，因为依然令人不解的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如何能有机会接近从伊尔库茨克送到恰克图，再由恰克图送到北京（当时恰克图没有任何白卫分子）的照会。此外，要知道当时还有另外一些文本在人们中间传来传去。

20 世纪 50 年代末，M.C. 贾丕才再一次（算来已是第三次了）尝试把这一情况弄个水落石出，这次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被宣布

为误会的肇事者了。

根据这一说法，在照会的准备过程中，确实曾有一个包含那个有争议段落的草案，但这一草案似乎未提交政府批准。参与起草外交人民委员部宣言的维连斯基 1919 年在其小册子《中国和苏维埃俄国（我国远东政策问题）》中公布了这个草案。这本小册子在莫斯科出版，篇幅为 30 多页。正是这个最初的草案于 1920 年春送到了中国。M. A. 佩尔西茨在其一部著作中，以及其他许多苏联历史学家都坚持这样的观点。不过，这种观点同样不能自圆其说，因为正如 M. 克留科夫所指出的，“证明发文号为 324、发往中国的宣言书的真实性的人根本不是维连斯基，而是外交人民委员部驻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全权代表 Я. 扬松。最后，历史学家 A. 海费茨还有一种观点，就是应将第一和第三两种说法合并起来解释所发生的情况。

外交人民委员部 1919 年 7 月 25 日照会究竟有怎样的原始方案？假如不久前未在列宁秘书处发现这一问题的答案，那么对“加拉罕第一次宣言”内容的争论在持续了 70 多年之后，可能还会持续下去。M. 克留科夫分析档案文本后，得出结论：

维连斯基于当年 8 月 10（前面提到的中国工人开会前两周）呈送列宁的照会文本中，曾有后来从宣言中删掉的将中东铁路无偿移交给中国的一段话。但是，当本国利益在苏维埃俄国的外交方针中逐渐占上风、为未来的世界革命在全世界慷慨行事的思想被摒弃后，这段话就变得多余了。

契切林同意这一结论：

将中东铁路无偿归还中国的声明是 1920 年以最庄严的形式发表的。

但是，在中东铁路上更为现实的观点占上风时，加拉罕竭力说服依旧坚持“宣布无偿地将财产权移交中国人民”的热心的越飞，提醒

他：

我们今天的政策应较少宣言性，更多务实性……我们当前的外部环境已进入这样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每一寸苏维埃土地和每一个卢布都应该成为我们特别关注的东西。

M. 克留科夫写道：

维连斯基（像越飞一样）是那样一种苏维埃外交战线战士，他们如托洛茨基所说，首先是革命者，然后才是外交官。加拉罕的态度则相反，他在大得多的程度上具有“务实”的特征。因此，维连斯基与加拉罕观点分歧的根源，比人们第一眼可能看到的要深刻得多。

不同级别的苏维埃职员观点上的分歧，在我们所记述时期他们的活动中，还会有所体现。

已成立的远东政府会议和阿穆尔、赤塔、符拉迪沃斯托克代表团于1920年4月6日共同宣布的远东共和国成立宣言正文（特别是第6条）同样令中国政府恐惧不安，中国政府在该宣言中看到了夺取中东铁路及整个北满的企图。10月3日的《上海生活》写道，9月29日或30日，北京得到并公布了该宣言正文，其第6条这样表述：

远东共和国从贝加尔湖到太平洋的全部领土，包括后贝加尔州、阿穆尔州、滨海州、萨哈林岛、堪察加半岛及中东铁路沿线地区，被宣布为一个独立的统一国家，不会向外国提供任何领土租让。

远东共和国发布的这一并非深思熟虑的声明，很快就在中国引起注意。一位谍报员不久就向莫斯科发来一份密码电报，其内容如下：

1921年3月在盟国铁路委员会一次会议上，白卫分子代表希季科夫在会间休息时与中国代表交谈，请后者把北京政府的注意力转到远东共和国成立大会的外交政策宣言。希季科夫断言这份文件里似乎说过“远东共和国政府横竖都要从中国人手中夺回中东铁路”，并说，据他手中掌握的情报，红军已经准备夺取铁路和整个北满。

远东共和国政府不得不就此事进行解释。它反复强调，问题在于文字表述有错误，而不是政策上有错误。该宣言的起草者为此表述的意思是，铁路征用地带的俄国公民是远东共和国的国民，此外别无他意。俄罗斯联邦外交人民委员部早在1920年4月16日就已经向远东共和国政府指出前面所指文字表述的错误性，要求它向中国政府提出建议，共同制定在铁路征用地带共处的方法。

不久，远东共和国驻北京外交使团就在其正式声明中讽刺性地指出，“铁路当事各方可以利用报刊上公布的关于中东铁路区域纳入远东共和国版图的那份宣言……但是俄罗斯亚洲银行的先生们将会感到失望。宣言力求把远东的居民（包括铁路沿线的居民）联合起来，由于报刊上公布材料时它遭到了歪曲，于是产生了误会”。没过多久，从上乌丁斯克*给远东共和国驻北京外交使团寄来了宣言的新文本，其中作了一些修改，该使团在中国报刊上公布了这个文本。在中国报刊宣布的内容是：

远东政府会议和阿穆尔、赤塔、符拉迪沃斯托克代表团发布的宣言第6条在其原始文件中的表述为：“从贝加尔湖到太平洋的全部远东领土被宣布为一个独立的统一国家。不会向任何外国提供任何领土租让。”

1920年4月至1922年12月期间，俄罗斯联邦与远东共和国一

* 1934年改称乌兰乌德。——译者注

起就中东铁路问题同中国方面（中央政府与张作霖）进行谈判。中方坚持苏维埃政府在 1919 年 7 月 25 日宣言中所表明立场——将中东铁路无偿地交给中国或者由其赎回。华盛顿会议召开前夕，已经彻底暴露，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计划在这次会议上解决中东铁路问题时，不但要损害苏维埃俄国利益，而且要损害中国利益。北京内阁显然明白了，拒绝同俄罗斯谈判，首先会削弱中国的地位，于是决定表达其同莫斯科和赤塔达成协议的决心。远东共和国驻中国代表尤林向中央报告：

随着华盛顿会议临近，中国官员的行为有所好转：他们感到必须在华盛顿讨论中东铁路之前，就此问题达成协议。

苏维埃政府和远东共和国的坚定立场使中国代表敢于在华盛顿会议上，向意味着各国实际占领中东铁路的各种方案表示反对（我们提请读者记住，当时那里没有俄国人）。这一切加上列强之间矛盾尖锐，使帝国主义列强以损害苏俄和中国利益为前提来决定中东铁路前途的图谋遭到了失败。美国代表团团长——美国国务卿尤兹被迫宣称，他的政府“无意获得对中东铁路的监管权”。直到 1921 年夏秋之交，在苏维埃军队进驻蒙古并逼近中国边境之后，俄罗斯联邦才制定了有关中东铁路的具体计划。该计划规定，在承认中国享有对中东铁路的所有权及向苏维埃俄国提供军事和经济保证之后，俄罗斯联邦、远东共和国与中国共同管理中东铁路。

1921 年秋，中国方面主动要求就双边关系的一揽子问题，包括中东铁路问题，召开俄中会议，以便在华盛顿会议之前决定中东铁路的命运。然而，由于苏维埃红军进驻蒙古，双边会议未能举行。对红军进驻蒙古及苏维埃方面不愿就此问题举行专门会议怒气冲冲的满洲统治者张作霖取消了这次会议。

苏维埃驻中国代表 A.K. 派克斯反对外交人民委员部提出的关于共同管理及中方向俄方提供军事保证的意见，提出一个建议：建立俄罗斯联邦有表决权的三方监管委员会，该委员会可以为铁路的利益监

督中东铁路的工作。根据他的看法，让中国向俄罗斯提供军事保证的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中国永远不会同意苏维埃军队进驻满洲。

尽管有华盛顿会议的教训，北京政府还是很快又屈服于美国、法国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压力，实际上拒绝与1921年12月12日到达北京的苏维埃代表A.K. 派克斯及与远东共和国公使A.Φ. 阿加列夫就中东铁路问题进行谈判。

苏联、张作霖和日本人之间展开了争夺中东铁路的斗争。

在中东铁路的管理权转归苏维埃局长之前很久，《今日新闻报》就对以B.B. 奥斯特罗乌莫夫为首的旧理事会开展了猛烈的批判运动。旧的铁路理事会受到管理不善甚至进行蓄意破坏的指责。远东共和国的哈尔滨代表奥佐林（他就是基斯特尔）通过铁路职工委员会企图破坏铁路的正常运营，挑动中东铁路员工实行罢工。

为使中东铁路转到苏维埃局长手中而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将杨卓将军提升到中东铁路监察委员会主席的岗位。杨卓还是孩子时，被著名的阿格列涅娃-斯拉维扬斯卡娅带到俄国，当时她的合唱团刚结束在远东的巡回演出。杨卓在俄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精通俄语，十月革命后开始同情情报机关合作。后来苏维埃情报机关招募了张作霖元帅的参谋长杨武经将军。杨武经受命举行奉天起义，夺取政权，逮捕政府官员，控制军队。拟订的计划安排杨卓担任满洲人民共和国首脑。但是，这些计划被张作霖的人揭露，杨卓和杨武经这两个密谋者都被处死。

由于莫斯科进行操纵和施加压力，A.H. 伊万诺夫当上了苏维埃第一任中东铁路局长。有一种说法称他过去是彼尔姆铁路的一个报务员，另一种说法称他是符拉迪沃斯托克码头的装卸工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水运局的工作人员。伊万诺夫于1922年来到哈尔滨，准备当中东铁路局长。当时铁路经济处处长是季基，昔日西伯利亚乳品加工业劳动组合协会的著名活动家，满洲经济学和铁路运输专家。Л. 巴拉克申指示，“季基被苏联政府招募，为伊万诺夫当局长做准备。”

早些时候，中东铁路开始被莫斯科视为插入中国的“革命手指”（布哈林语）。莫斯科在中东铁路问题上提出了以下任务：利用北京政

府同张作霖之间的矛盾，以对莫斯科有利的方式解决中东铁路问题。1925年4月至1926年1月，在加拉罕授意下，中东铁路局长A.H.伊万诺夫开始制造与中国地方当局对抗的局势，而这些地方当局可能将苏维埃俄国推到同中国发生战争的边缘。

伊万诺夫当上中东铁路局长后（1924—1926年在任），下令解雇没有苏联或中国国籍的职工。希望保住工作岗位的侨民被要求设法获得苏联国籍。铁路的苏联权力机关在铁路员工、老住户和侨民中间加紧开展运动，逼迫这些人取得苏联国籍。铁路的中国权力机关也要求侨民转为中国国籍，以此保住自己在中东铁路的工作岗位。

在苏方的压力下，主要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19000名铁路员工开始申请转为苏联国籍。有2000名侨民断然拒绝取得苏联国籍。他们当中有一半左右的人取得了中国国籍，其余的人宁可被中东铁路解雇，也不愿意接受其中一国的国籍。

外交人民委员部实行制造同中国地方政权机关冲突的政策，激起了俄共（布）哈尔滨省委员会的强烈不满，后者责备加拉罕和伊万诺夫“对革命盲目乐观”。苏维埃俄国研究了利用红军力量武装夺取中东铁路的可能性。为此于1924年成立了在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B.A.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为主席的俄共（布）中央专门委员会。该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实施这样的行动是不可能的。其决议说：

同库比亚克、阿尔波夫（国家政治保安局政治教育人员——作者注）和乌博列维奇商谈后，委员会已经十分清楚，远东的实际情况（农民的政治情绪，我军人数少，面临的动员任务）无论如何都不允许对中国实行侵略政策。

1920年7月14日，日本陆军大臣田中义一⁶³指示驻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日军司令官向哈尔滨、海拉尔、满洲里派遣特务和破坏分子，夺取这些城市的电报局。7月19日，驻中东铁路征用地带的日军司令部收到命令：严密监视中东铁路沿线中国军队的调动情况，每天向

陆军部报告所获情报。

日军司令部与红胡子（土匪）队伍建立了十分紧密的联系，向他们提供武器、服装和金钱，秘密指挥他们的行动。红胡子受领的任务是，炸毁铁路桥，破坏路基、车站建筑物，袭击和平公民。日本人企图以这些行动为借口，展现中国当局无法建立中东铁路秩序，从而证明，保护铁路的使命应该由日本人负担。例如，1920年6月22日，远东通讯社报道：中东铁路的中国经理报告本国政府，“红胡子匪帮的6个头目同日本当局签订了一些秘密协定，根据这些协定，红胡子应该截断全线的铁路运输。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即可借口中国军队和警察无力保护铁路的安全，承担起保护各个火车站的责任”。同时还拟订方案，为了较为顺利地组织中东铁路的保卫，将允许日本代表进入铁路理事会。

旅华白俄侨民的一些领导人也极力将中东铁路的监管权抓在自己手中。例如，为了指挥他们在中东铁路的行动，在哈尔滨建立了一个专门军事司令部，其主要任务是建立并在铁路全线分散驻扎能够在需要时完全监管中东铁路的白卫军部队。按照这个司令部的命令，谢苗诺夫的24位将军和大约50名军官分赴各个火车站，假借保卫铁路的名义，组建一些队伍。例如，在哈尔滨货运站护货的60名看守人均被解雇，代替他们的人全是谢苗诺夫和哥萨克首脑卡尔梅科夫军队残余的军官。

1921年1月底或2月初，高尔察克的前部长们和其他白俄侨民活动家贡达季、金斯-米哈伊洛夫、沃江斯基、克罗波特金公爵、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前驻日大使克鲁片斯基、季捷里赫斯将军、哥萨克大尉奥尔洛夫聚集哈尔滨，以解决由谁承担新运动的军事政治领导问题。

II. 巴拉克申在其研究远东白俄侨民一书《在中国的结局》中写道：

在最近几年已经习惯于各种各样的宫廷和非宫廷政变的一些侨民集团中间，产生了先夺取哈尔滨政权，随后夺取整

个满洲政权的想法。尽管在那种情况下这种计划显得如此轻率，但它还是得到了认真的讨论，分配了各阴谋家担任的角色，讨论了如何占领建筑物、武器库、电报局的问题。策划这一阴谋的依据是，苏维埃俄国打算攫取满洲，把它变成一个苏维埃共和国。这一阴谋的策划者是个姓别尔谢涅夫的人，他是中东铁路经济处正式机关刊物《满洲通报》杂志的编辑。他了解到北满共产主义委员会书记 A. 斯米尔诺夫同张作霖元帅的亲信进行会谈的情况。然而，实施政变的细节却未进一步讨论。

因此可以明白，为什么苏联各种情报机关赋予满洲和哈尔滨特殊的意义。哈尔滨和满洲同时被用作各种货物的“转运站”和跨越苏中边境的“走廊”——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被派往苏联学习、到共产国际机关工作、参加党的代表大会（例如 1928 年到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就利用这个“走廊”，秘密越境）和返回中国时利用；另一方面是苏联公民到中国做地下工作时利用。

中东铁路出现苏维埃政权机关后，满洲建立了一系列苏维埃商务机构。

1922 年初，哈尔滨建立了苏俄在中国东北的第一家商务组织西伯利亚远东对外贸易局。不久又建立了一个称为“志愿船队”的运输管理局，这是苏维埃商船队的一个分支机构。还建立了阿穆尔国营航运公司运输管理处的一个分支机构。

苏联商船队的这个分支机构起初由 Л.Г. 贝斯特里茨基、随后由 Т.А. 基塞尔霍夫领导；阿穆尔航运公司的这个分支机构则由 П.Е. 捷连季耶夫和 П.С. 布尔兰领导——据 П. 巴拉克申的资料，他们都是共产国际的谍报员。

在哈尔滨开设了远东银行的一家分行，该银行的主要办事处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行长起初是 H.H. 罗姆，后来是 C.M. 沙皮罗。远东银行为共产国际在满洲和全中国的工作提供资金，大量收购金锭运往莫斯科，销售在俄罗斯征集的贵重物品以换取外汇，为共产

国际谍报员保留往来账户。

在哈尔滨建立了国家进出口贸易局远东分局，其主要办事处设在哈巴罗夫斯克。哈尔滨分局局长是 B.A. 伊格纳坚科，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哈尔滨站的工作人员。国家进出口贸易局远东分局设立了一个苏昌煤矿代表处，其领导人是 M.T. 米罗诺夫，他在白俄侨民中开展工作，以查清经常在苏昌地区出没的白匪游击队领导人和参加者。

还设立了苏联贸易企业中央联合会分会，会长是 B.3. 涅姆钦诺夫，副会长是 A.И. 列温、M.Я. 林德贝格、П.Т. 利扎切夫和 M.П. 斯莫罗金。这个斯莫罗金就是在中国享有全权的国家政治保安局谍报站长。

1918—1920 年，C.Л. 维尔德（1892—1967）以苏联贸易企业中央联合会哈尔滨办事处助理会计的身份作掩护，担任共产国际的联络员。后来他前往俄国，1921 年 3—9 月又当上了共产国际远东秘书处办公室主任。

哈尔滨还设了苏联合作总社西伯利亚边区联社，正式销售苏联产品，为苏联购买原料和饲料。该联社的主要负责人是国家政治保安局在远东享有全权的谍报站长 A.Φ. 波波夫。

全苏石油辛迪加也在哈尔滨建立了分支机构，由 M.K. 谢尔宾斯基领导，从事苏联石油业务。

几家国际社会组织也在哈尔滨开展工作。这里有享有全权的俄罗斯红十字会地区管理局及由其分管的苏联远东疗养局代办处的分支机构。它们都加入了苏联工会理事会，由同一个 K.A. 菲利波维奇领导。正如 П. 巴拉克申所说的那样，这些机构“只是开展地下活动和情报工作的幌子而已”。

哈尔滨还设有加入了国际革命战士救济协会的哈巴罗夫斯克慈善协会的分会，为在满洲和全中国开展一定的工作集资。该分会的领导人马贡还在中东铁路监察委员会兼职。

除这两种社会组织外，哈尔滨还有一个满洲地方研究协会。该协会由以下几个部门组成：工商部、自然历史学部、历史民族学部、地理学部、艺术部、医学部、游览部、社会学部和编辑出版部。该协会

开展考察勘测工作，同时秘密“向共产国际提供有关满洲的一切必要的情报”。为了掩护这一秘密活动，安排中国公民担任协会领导人：主席为王景春博士，副主席为李元庚，第二副主席为中东铁路的兽医 A.C. 梅谢尔斯基。苏联职员、商人及其他持有苏联护照的人为协会会员。

1920—1921 年，工农红军司令部情报部驻北满的全权代表是雅科夫·格里戈里耶维奇·明斯基⁶⁴。

1919 年，一个叫 B.B. 雅科夫列夫（真实姓名为 K.A. 米亚钦，又叫米涅尔、米诺尔和 K.A. 斯托亚诺维奇）⁶⁵的人携妻子来到哈尔滨，当时他 32 岁。起初他被安排到哈尔滨郊区的面粉厂当电工。但这里的工作对他并不合适。他希望转到中东铁路总机修厂工作。B. 雅科夫列夫喜欢机修厂高技术水准的装备和成品的机械化生产。在机修厂工作的基本上是俄罗斯人，一部分是中国人，很少欧洲人和日本人。像所有哈尔滨人一样，雅科夫列夫把欧洲人与日本人都列入破坏分子和特务之列。过了一年，他在哈尔滨结识了一些有用之人后，实现了这一愿望。他利用自己的欧洲证书——世界电力公司技能证书，被安排到中东铁路机修厂当电工。后来雅科夫列夫对这个机修厂的工作写了下面的话：

在哈尔滨，我以自己的真实姓氏米亚钦进入总机修厂工作。我不能无所作为，就开始同自己的工人伙伴开展活动，和他们一起阅读政治经济学，解释一些政治问题，进行座谈，等等。哈尔滨已面临多事之秋，反对白俄、驱逐霍尔瓦特的罢工一触即发。

工人的主要力量就在我享有声望的机修厂内，所以罢工一爆发，我就被公开推举为工人首领。起初我只是罢工委员会里的机修厂代表（当时宣布进行铁路全线罢工和全面总罢工），后来形势要求采取革命措施，成立了地下军事革命委员会，我当选为该委员会主席，并成为罢工委员会主席。

布尔什维克组织（中东铁路背井离乡的俄国人中的组织

——作者注) 几次提出要我加入组织的问题, 但我几次都没有机会讲明原因就拒绝了, 因为我不能说出真相。我声称我更像个无政府主义者, 而不是共产主义者。

中东铁路党组织发动的频繁罢工, 时常震动中东铁路全线, 雅科夫列夫所在的哈尔滨党组织也在这一组织之列。雅科夫列夫积极参与建立战斗义勇队, 好在他经验丰富, 能够获取武器和资金。他关注俄国内部形势, 因为俄国内部形势直接影响哈尔滨的事态。海军上将高尔察克军队的失败和撤退, 特别是 1920 年 2 月 7 日在伊尔库茨克枪毙这个最高执政者之后, 大量军人和难民向哈尔滨仓皇逃窜, 使该市挤满了俄罗斯人。3 月间, 雅科夫列夫细心监视着挂着法国国旗的军用列车, 有一天它驶出了哈尔滨车站, 开往南方海港。该军列有一个人同雅南⁶⁶将军一起永远离开俄罗斯, 他就是非常卖力地寻找、却始终未能找到雅科夫列夫的 H. A. 索科洛夫。此人正从国内运走在叶卡捷琳堡枪杀沙皇一家的大批侦查案卷、文件和物证。

尽管索科洛夫的任务严格保密, 却还是传出他在运走沙皇一家遗体的消息。雅科夫列夫相信这一点。他知道, 一些时候以前, 被杀害的罗曼诺夫家族成员(包括皇后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的妹妹大公夫人伊丽莎白)的遗体被从阿拉帕耶夫斯克弄出来了, 要往北京转移。想起乌拉尔苏维埃从托博尔斯克往叶卡捷琳堡押送罗曼诺夫一家时的野蛮行为, 雅科夫列夫不怀疑, 乌拉尔布尔什维克的凶狠行动会暴露。但是, 雅科夫列夫一看到转运的包装箱子和它们的尺寸, 就断定这些箱子里不可能装有遗体, 索科洛夫可能没有找到被杀者的遗体。他明白, 即将离开俄罗斯的索科洛夫手中没有遗体, 将使他的事永远无法了解。帮索科洛夫转移材料的那些人中有人在托博尔斯克就认识雅科夫列夫, 他就是阿列克谢的继承人的教育者皮埃尔·日利亚尔。后来日利亚尔写道:

1920 年 3 月, 我在哈尔滨又遇见了 M. K. 季捷里赫斯将军和 H. A. 索科洛夫。他们和我一样, 是在海军上将高

尔察克的政府垮台之后来到哈尔滨的。他们极其焦急不安，因为满洲的形势变得越来越动荡不定，中东铁路每分钟都有可能落入赤色分子手中……季捷里赫斯将军、他的两名勤务官、索科洛夫和我扛起早就装好的沉重的皮箱，走向离火车站不远的雅宁将军的列车。我们相互拉开几步的距离，就要走近月台时，走在最后面的人发现黑暗中突然跳出几个人，走到我们跟前喊道：“你们去哪儿？皮箱里装的什么？”由于我们不回答，并加快了脚步，他们打算扣留我们，命令我们打开皮箱。幸好我们要走的距离已经不远了：我们撒腿跑起来，顷刻到了将军的车厢旁，他的卫兵来迎接我们。整个侦查过程终于到了完结的阶段，也该完结了，因为我们确信，已经有人对我们进行监视了。过了一个小时，我们一个接一个小心翼翼地走出火车，神不知鬼不觉地从相邻列车的车厢之间偷偷溜走……这件事发生在1920年3月19日。

B. 雅科夫列夫在哈尔滨遇见了一位年轻人，并与他过从甚密，此人对其在中国生活期间起了特殊的作用。他就是Э.М. 阿布拉姆松（在B. 雅科夫列夫的日记中写为“阿布拉姆”）（1898—1941），化名马祖林、马松。比B. 雅科夫列夫年轻12岁的阿布拉姆松在哈尔滨长大。据有些材料，他曾是一个大学生，但弃学而完全迷醉于共产国际的活动。他的父母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是这个城市的奠基者之一。他精通汉语，熟悉当地社会情况及该市与全国的政治形势。他领雅科夫列夫去找党组织，因为他本人就是该市俄罗斯党组织的成员。他向雅科夫列夫详细介绍哈尔滨市的一切特点和整个满洲的情况。阿布拉姆松是雅科夫列夫的情报提供者，后来同设在伊尔库茨克的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建立了联系，当上了东方民族部中国处处长。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于1920年8月在伊尔库茨克建立。1921年1月，在该部基础上建立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秘书处，该秘书处工作到1922年2月。

1920年4月，有才华的新闻记者和符拉迪沃斯托克《红旗报》

编辑 Я.Г. 明茨克尔来到哈尔滨。他被派到哈尔滨中东铁路工作，立即和 В. 雅科夫列夫、Э. 阿布拉姆松建立了联系。明茨克尔作为俄共（布）滨海委员会的全权代表，很快就当选为哈尔滨党组织的书记，В. 雅科夫列夫则当选为罢工委员会和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1920年7月，中东铁路工人在党组织领导下宣布进行全线总罢工，对中东铁路的行政管理机关发起坚决的攻击。对铁路的领导而言，这次大罢工出乎意料，导致军运中断。当局立即对罢工者采取了惩罚措施，但罢工者进行了武装反抗，他们的大部分要求得到了满足。

国际铁路运输委员会和俄罗斯亚洲银行董事会开始共同管理中东铁路。在1924年苏中共同管理机构建立之前，中东铁路的工潮一直持续不断。过了一些时候，罢工的成功转变为对罢工者的惩罚和镇压。许多人被解雇，有的甚至被投入监狱。中国当局开始追捕米亚钦（雅科夫列夫），他不得不藏匿起来。组织上发给他一个护照，上面的姓氏为斯托亚诺维奇，并派他到天津与其他组织建立联系。后来斯托亚诺维奇在叙述自己活动的《琐事录》中作了如下记述：

党组织派我以斯托亚诺维奇为姓赴中国中部即北京、天津、上海去组建共产党和建立党组织。到了天津。见到了波列伏伊教授、维经斯基、霍多罗夫、奥加列夫。与维经斯基同志一起安排工作。

在1920年12月21日《致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关于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的组织与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到：

同时通晓法语的工人党员斯托亚诺维奇（米涅尔）从哈尔滨前往天津……类似（上海革命委员会——作者注）的革命委员会正在中国各大工业城市北京、天津、广州筹建（现在已经建立）。北京革命委员会由波列沃伊和斯托亚诺维奇领导。

我们在此可以发现一个熟悉的姓阿布拉姆松。

对外局留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部分同志阿布拉姆松、埃尔捷列夫斯基和马马耶夫，着手将朝鲜共产党员们组织并联合起来。于是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组建了朝鲜共产党远东委员会。阿布拉姆松和马马耶夫同志很快又到哈尔滨组织哈尔滨分部。他们在哈尔滨打算建立一些日文印刷所，印制供滨海州的日本占领军阅读的小册子。……阿布拉姆松同志回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后，于7月初又离开，经中国同伊尔库茨克建立联系。

1920年8月17日，Г.Н. 维经斯基从上海致信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信中写道，除上海革命委员会以外，“北京也有一个委员会，按照我的指示，同米诺尔（即K.A. 斯托亚诺维奇——作者注）和波列伏伊教授一起工作。现在我要派米诺尔同志由天津去广州，他应在广州组建革命委员会”。

斯托亚诺维奇就这样在短短的时期内，时而去天津，时而去北京，时而去上海，时而去广州。他在上海见到了远东通讯社的领导人霍多罗夫，后者为他办理了担任记者的手续，后来又让他当了俄罗斯通讯社的负责人。在其1920年9月29日寄自广州、收信人不定的一封信（现存于共产国际档案中）中，他以通讯社工作人员的身份注明自己的收电报地址。

我们在斯托亚诺维奇的《琐事录》中可以看到：

赴华南出差。以盐商身份作掩护。联络广州工人组织、大学生。1922年。

哈尔滨苏联全权代表机关后来更名为苏联总领事馆。国家政治保

安局* 谍报站长 Д.Д. 基谢廖夫被任命首任总领事，他同时又兼任中东铁路理事会委员。中东铁路监察委员会委员 А.Я. 佳特科维奇被任命为第一副领事。杰出的国家政治保安局工作人员 А.Н. 比季耶夫被任命为第二副领事，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外局满洲处的整个机关都集中在他的手中。担任国家政治保安局反间谍处处长的 К.Э. 泽伊捷被任命为护照签发处处长。

П. 巴拉克申证实，在满洲里、齐齐哈尔和绥芬河也设立了苏联领事馆，馆内附设有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外局的几个处，这些处的领导人通常是各领事馆的秘书。

根据 П. 巴拉克申的材料，皮丘金、库兹涅佐夫、索什尼科夫以苏联领事馆秘书的身份于 1924 年来到哈尔滨，兼任领事馆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职务。他们经常去哈尔滨上流社会咖啡馆和城外的情人饭店，这是哈尔滨显贵聚会的所在。在两个地方，俄罗斯领事馆的工作人员甚至拥有专供会晤有用之人的“私人办公室”。上流社会咖啡馆的经理是德国难民，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同那些年设在哈尔滨的各国情报机关，从苏联的驻外谍报机关到日本人、英国人、美国人，以及俄国侨民事务局第三处，都有联系。

根据巴拉克申的材料，最积极和最重要的走私企业主中有个人叫米克拉泽，同北满共产主义委员会书记 А. 斯米尔诺夫和豪华饭店经理、前海军军官 В.Н. 拉布佐过从甚密。豪华饭店原来属于远东著名的当铺老板 И.В. 库拉耶夫，他把该饭店献给了中东铁路的苏维埃权力机关，后者在饭店里设立了情报与侦察司令部。身为豪华饭店经理的拉布佐似乎与苏联谍报员和米克拉泽有密切联系。

拉布佐不仅仅与米克拉泽及其他人合作运输被没收的俄国珠宝，其活动引起了外国情报机构的注意。人们几次看见拉布佐同英国情报机构头子威尔逊大尉会晤，这就使苏联情报机关的一位谍报站长帕夫洛夫斯基或法尔德舍尔有理由怀疑他是两面间谍。此后不久，拉布佐

* 国家政治保安局于 1922 年由全俄肃反委员会改组而成，1923 年起改称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本书在时间段不明确时常常混用两个名称。——译者注

在可疑的情况下自尽。后来查明，他是被苏联情报机关除掉的。米克拉泽在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进行一次例行的旅游之后，也紧随拉布佐无影无踪地消失了。

1924年哈尔滨来了一个叫格托夫特的人，他自称拉脱维亚侨民，作为几家欧洲贸易与技术公司的代表从欧洲来到哈尔滨。永远是衣冠楚楚、钱袋鼓鼓、仪表堂堂的格托夫特，很快便在侨民的显要圈子里展开了交际活动。

那时，乌苏里边区哥萨克首领卡尔梅科夫的助手 И.Г. 希里亚耶夫的游击队在滨海地区的军事行动很顺利。希里亚耶夫熟悉地形，又得到当地居民一定程度的支持，他的活动令苏联权力机关焦急不安，决定无论如何要消灭这支游击队。当时查明，希里亚耶夫袭击苏联领土之后，通常率领自己的队伍越过乌苏里江到达中国口岸，在那里躲避一阵子。他从哈尔滨获得武器和其他装备。

苏联情报机关派格托夫特去哈尔滨，正是为了查明希里亚耶夫在哈尔滨的联络关系。他新结识的人中有尼基京将军及其对格托夫特颇有好感的妻子。尼基京与希里亚耶夫保持联系，互通书信。他的一封信被尼基京的妻子交给了格托夫特。根据这封信弄清了希里亚耶夫队伍的驻地及其在伊曼地区居民中的联系。国家政治保安局后来查明了这些联系，便说服一个联络员出卖了希里亚耶夫。捕获希里亚耶夫以后，格托夫特就匆忙离开了哈尔滨。

1924—1927年，驻哈尔滨的谍报站长是费奥多尔·雅科夫列维奇·卡平（1896—1938）。他从1919年起就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自20年代中期起驻中国副谍报站长由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扎鲁宾担任⁶⁷。

苏联情报员兼外交官 Б.Н. 梅利尼科夫⁶⁸于1923—1924年担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驻哈尔滨全权代表处的工作人员，1928—1931年担任总领事，同时兼任中东铁路理事会委员。和他一起工作的有身为苏联情报员的商务代表处负责监察员 И.И. 考夫费尔德和中东铁路公共事务部护照签发处处长 А.И. 帕里洛夫。冲突事件发生后，新任总领事 М.М. 斯拉武茨基-阿尔沙夫斯基接替了被召回苏联的梅利

尼科夫。中东铁路监察委员会委员马贡被中东铁路公共事务部负责人华西列夫斯基代替，商务代表处处长埃姆津则由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驻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秘密行动处前处长、后任远东银行哈巴罗夫斯克分行行长的 A.M. 普洛特金-皮洛夫代替。

苏联情报机关的基本骨干就在哈尔滨苏联总领事馆的大楼里。许多谍报机关设在中东铁路沿线、满洲及华北各城市。据 И. 巴拉克申的材料，20 年代下半期，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机关在满洲和华北的各个机构中，以及在中东铁路各处内，总人数达 500 多人。

哈尔滨的谍报机关同中国境内各朝鲜组织保持联系。例如，档案中存有同朝鲜天路小组代表进行谈判的文件。这个组织请求向他们提供“手枪和破坏器材”，用来在朝鲜境内实施恐怖行动，以此“唤醒国内的社会舆论”，并在 1929 年临近之际在朝鲜举行武装起义。我们的情报机关奉命：第一，“委托哈尔滨的某个人对这个武装组织进行认真的调查”；第二，“让他们与红胡子组织，哪怕是吉林地区的红胡子联络”；第三，“视调查结果决定是否提供器材”。

1924 年，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外局驻哈尔滨谍报机关帮助下，破获了白匪地下组织。国家保安人员用自己的人代替秘密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领导匪帮的科瓦廖夫中尉。

1925 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就科瓦廖夫及其白匪组织的其他成员一案，实施了公开的诉讼程序，当时在地方和中央的报刊上都可以看到对此事的反应。

哈尔滨谍报机关最积极的助手中有个人叫伊万·特罗菲莫维奇·伊万诺夫-佩列克列斯特，他在日本军人、宪兵队员、服务于日本机构的中国人中，拥有广泛的联系。情报员扎鲁宾写道：“佩列克列斯特是个小组长，从事招募谍报员工作。他经常获取有关日本驻满洲军事代表团活动的非常珍贵的材料。”

哈尔滨谍报机关设在苏联总领事馆大楼的 3 层。该谍报机关在整理（解密、照相、检查、包封）通过谍报机关获取的一切邮件时困难重重。业务技术设备欠缺，许多工作人员既不很懂日语，又不很懂中文。10 页以上的最重要的文件，只能用老掉牙的照相机摄在玻璃底

片上。他们经常不断地向莫斯科要求改善组织的技术设备。在哈尔滨方面的坚决要求下，终于从莫斯科来了两位日本问题专家，送来了最新式的德国造胶片摄影设备。

《俄国对外情报工作史纲》的作者们认为，哈尔滨谍报机关工作的最大成就是获得《田中奏折》。《关于对满蒙政策的意见》由日本总理大臣兼外务大臣田中将军（1863—1929）于1927年夏呈送日本天皇。但是，还存在另一种说法：《田中奏折》是明显的伪造品，这从《奏折》的语言本身和公布它的刊物即可看清。

苏联对外情报机关的领导牢记日本在1917年10月之后的头几年对远东的武装干涉，对其驻日本及一系列相邻国家（名括中国）的境外情报机关提出了下列任务：揭露东京统治集团旨在反对苏维埃俄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事计划；获取日本国内政治和经济状况情报；获取日本政府总体扩张计划尤其是侵略中国的情报。十分重视查清日本特工机关与国外俄国侨民组织的秘密联系，以及对苏联采取特务、破坏和恐怖活动时使用这些关系的计划。

在此不妨谈谈美国的立场。虽然苏俄与美国的正式外交关系直到1933年才建立，但是早在20年代初，美国就对日本在亚洲日益增长的影响感到不安，从而决定了美国军界的“亲俄立场”。这种“好感”表现在美国情报部门与布尔什维克进行的非正式合作中。这样的合作又集中体现于符拉迪沃斯托克，美国人向远东共和国相关部门提供了关于日本在西伯利亚和远东的计划的计划的情报。例如，1920年夏末，美国人向俄方通报：日本放弃直接军事干涉政策，试图通过支援白卫分子势力而保持自己在该地区的影响。

1921年10月，俄日大连第一阶段谈判破裂后，即日本向远东共和国和苏维埃俄国提出一系列侮辱性要求之际，美方情报来源又向我方通报，美国政府向日本施加了外交压力，日本准备在下一阶段谈判中作出重大让步。

尽管日本特工机关基本上是以高超的专业水准开展工作，但他们仍然有弱点。日本自以为是满洲的主人，对当地军事形势的特点注意不够，对外国情报机关的能力估计不足。特别是日本人十分轻率地对

待其公务和外交文件的投递。这些弱点被苏联情报机关利用。苏联谍报机关仔细研究了日本在满洲最重要的目标及其工作程序、邮递渠道。在日本秘密邮件经过的各主要站点都收买或安插了谍报人员。

《田中奏折》是由佩列克列斯特获得的。它的获取是驻哈尔滨谍报机关的“光辉成就”。

1929年，正值中国国内反苏运动猖獗之际，中国杂志《中国评论家》在俄罗斯特工机关的帮助下，登载了《田中奏折》。这一奏折的公布在外交界引起了最广泛的反响，对那个时期及以后许多年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国际关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该奏折第一次披露了日本征服世界的真实计划。

……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倘中国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攫取整个中国富源，即可征服印度及南洋群岛，并进而征服中小亚细亚以及欧洲。然而第一个重大关键就在于掌握满蒙利权。

于是，实现这一任务的各个阶段得以清晰表明：先征服满洲和蒙古，再征服中国。占有中国资源之后，日本应该转而征服印度、太平洋区域各国、小亚细亚与中亚，最后再征服欧洲。同时作为“日本民族发展纲要”，该奏折提出“必应再次与俄国发生冲突”。田中写道：

虑及苏联武装力量之现状及其与他国之关系，应尽快进行日苏战争。依我之见，必令帝国政府实行尽快发动与苏联战争之政策。

不言而喻，我须推进至贝加尔湖。至于进而攻击西方，则应取决于彼时之局势。日本应将已占之远东边区悉数纳入日本版图……为实现此等目标，应实行“铁血政策”。日本应征服世界，为此必先征服欧亚，首先征服中国与苏联。

日本的扩张图谋被公诸于众，不但令苏联和中国，而且令当时占有印度和亚洲许多殖民地的英国、统治着法属印度支那和太平洋地区许多领土的法国、统治着荷属印度*的荷兰，还令葡萄牙及其殖民地，当然还有美国，增强了对日本外交政策的不信任。日本处于各方强大外交压力之下，不得不声称，“实际上根本不存在，而且也不可能存在任何类似的奏折……”

有趣的是，《田中奏折》事件在朝鲜继续得到发展，在情报勤务实践中发生了独一无二的奇事：我们的情报员在不同的国家几乎同时获得了同一种文件。1927年担任苏联驻汉城**总领事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外局的年轻工作人员伊万·安德烈耶维奇·奇恰耶夫（1896—1984）⁶⁹，就于当年在汉城获得了《田中奏折》。奇恰耶夫成功招募了一位日本警察，通过此人获得各种秘密情报，这些情报涉及中朝两国政治经济状况、日本特工机关反对苏联的工作情况，包括由秘密派遣到苏联远东地区进行特务和破坏活动的白俄侨民、中国人和朝鲜人组成的日本间谍机关的活动情况。

这恰恰符合给予在朝鲜工作的情报员的任务。中央向驻汉城的谍报机关发出的指示称：“你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特别注意察明准备侵略苏联的全局情况及侵犯苏联在北满、蒙古和远东利益的局部情况。”

中央同时十分肯定驻朝鲜情报人员的工作。寄自莫斯科的信中说：“你们寄来的材料中有非常重要的文件……其中有总参谋部第二局关于满蒙问题的报告，你们寄来了该报告的译文。这样的文件非常重要，务必对这些文件进行拍照。”

这些年情报工作的重点是获取真实的秘密文件，破译外国密码，以察明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计划。

1924—1927年，驻哈尔滨的谍报站长为费奥多尔·雅科夫列维奇·卡林⁷⁰，他以苏联总领事馆工作人员的身份为掩护。

* 即印度尼西亚。——译者注

** 2005年起改译“首尔”（据韩国要求）。——译者注

与卡林一起工作的有哈尔滨谍报站工作人员尤娜·索斯诺夫斯卡娅和德国人埃里克·塔克。

情报总局的谍报负责人 А.Я. 赛博特（格兰特）⁷¹1924 年任苏联驻哈尔滨领事，1925—1926 年任总领事。

1925 年底，总领事馆里来了一位谍报站长，叫瓦西里·彼得罗维奇·罗辛（雅科夫·费奥多罗维奇·季先科）。起初让他领导外交信使与外交邮件处，自 1926 年 11 月底起他被调到另一个工作部门，同白卫分子进行斗争。他的任务是弄清各侨民集团的活动情况，这些集团已经建立了一些队伍，目的是带领他们潜入苏联境内进行破坏与情报活动。由于那些年日本情报机关在建立这些队伍方面起了主要作用，所以同日本间谍机关的斗争成了罗辛每天都要做的工作。他的功绩是查清了被日本人委任为这些队伍头目的侨民军官名单，并利用这些情报派遣自己的谍报人员打入组建起来的匪帮。这些谍报人员同样从前沙皇军队军官中选拔，他们过去在一起服役时同这些队伍的头目很熟，因此可以利用这些头目的信任。例如，前沙皇军队上校 А.А. 克柳卡诺夫及过去曾在高尔察克和季捷里赫斯将军的军队中服役，并对“白卫运动”彻底失望的 В.Е. 索特尼科夫，就是这样的人。他们顺利打入已经组建的头两支队伍，弄清了他们的行军路线，偷越苏联国界的地点和时间。在这方面帮了他们忙的还有前卡佩尔分子军官、中国军队上校，曾获得最高中国军功章的“布劳恩”，他自 1927 年起与驻哈尔滨的苏联情报机关合作。我们的谍报机关评价“布劳恩”是一个有学识、坚毅、勇敢，总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的人，他在中国人和白俄侨民圈子里颇得信任。他在“俄罗斯真理联盟”、“俄罗斯雄鹰义勇队”、“俄罗斯军人联盟”等白卫组织里积极工作，受到阿穆尔哥萨克领导人和谢苗诺夫分子的尊敬。从他那里源源不断传来的情报有：这些组织的活动情况，日本人为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进行未来战争而通过谢苗诺夫组建哥萨克武装部队的企图，破坏队和情报队训练及其侵入苏联境内的情况，日本情报机关向苏联秘密派遣间谍的情况，等等。

由于采取了这些行动，白匪队伍被彻底粉碎，从而最终导致其他

队伍的瓦解，日本情报机关的图谋遂告失败。“布劳恩”在哈尔滨工作到1930年10月，后来他被调到莫斯科中央情报机关工作。

以后从1927年到1928年，驻哈尔滨总领事为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维奇·阿博尔京（1899—1978）⁷²。

哈尔滨被认为是对日本进行情报活动的极佳中心。一个谍报站长1926年自哈尔滨向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外局局长 M.A. 特里利谢尔报告：

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外局驻北满谍报机关和哈尔滨中心一起，对一系列日本机构的外交和其他秘密邮件进行定期系统检查。日军总参谋部，日本各驻华军事代表团，驻关东（旅顺）、朝鲜（汉城）、中国（天津）的日军，以及其他机构均纳入我情报机关行动范围。

临近1926年4月，莫斯科的一个想法已酝酿成熟：签订苏、日、中三国协定，以一定的让步为代价，使日本与英国分离，为此必须创造政治和外交条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应当较准确地了解日方的立场，日本对国际形势总的看法，日本对各国立场的态度，分析未来苏联与日本发生冲突的现实危险。

1926年8月，苏联驻日本临时代办 Г.3. 别谢多夫斯基奉苏联政府命令，向日本外务副大臣出渊建议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该条约类似1926年4月24日在柏林签订的苏德条约。9月2日政治局责成外交人民委员部“就改善我国同日本关系制定具体外交措施并呈报政治局”。

9月30日，出渊向外交人民委员部代表声称，日本现时还不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因为双方还没有完全履行1925年1月20日签订的苏日关系基本原则公约规定的义务。按照他的话说，应该先签订渔业协定和贸易条约，解决向日本提供租界的问题，此后才能考虑新的义务。

1927年6月，为了完成政治局赋予的任务，苏联全权代表 B.C.

多夫加列夫斯基在同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谈话时，再次强调了苏联关于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愿望。田中指出签订政治条约“尚不合时宜”，在此之前应先签订贸易条约。这样，1926—1927年政治局赋予的这一任务，由于日方无此意愿而未能完成。

以上就是1926年3月1日至9月1日期间日苏关系的政治背景。当时著名的东方学家Д.М.波兹涅耶夫⁷³正在满洲旅行，其正式目的是为再版反映满洲情况的书收集资料。与此同时，他应苏联情报机关的要求，评价中国和满洲的局势，“摸清”日本的立场及日本对英国的态度。这个人通晓汉、日、英三种语言，富有善于分析的智慧，发表和出版过许多关于日本和中国的文章和书籍，在学术界享有很高声望，与很多外国东方学家熟悉。尽管年龄较大，他仍然能够对那时处于复杂情况的莫斯科情报机关提供很大帮助。

Д.波兹涅耶夫遍游满洲，会见了许多俄国人、中国人和日本人，认真研究中国形势及近几年发生的变化。他一到北京，就向莫斯科寄出了几份工作报告和谈话记录，还有一些满洲材料作为工作报告的附件。

Д.波兹涅耶夫根据自己四个月的旅行成果，于1926年7月14日向工农红军司令部情报部副部长А.М.尼科诺夫寄去了一份报告。他在报告中作出莫斯科感兴趣的重要的基本结论：第一，“日本毫无疑问在准备发动战争，并针对这一情况，正把满洲变成自己的后方”。第二，“这次战争最可能与苏联进行”。第三，“日本各军事训练大纲期限表明，日本抱定的目的是在1930年前完成最后一个训练大纲，此后可能爆发军事行动。”第四，“为了保障粮食供应，日本正在加紧制定利用朝鲜人开垦满洲的政策，通过朝鲜人扩大稻田耕种面积”。第五，“更加注重研究西北满地区及与之毗邻的蒙古各省”。第六，“分散安置朝鲜人，建筑湖海铁路并延伸至布拉戈维申斯克，表明日本图谋将自图们江口至布拉戈维申斯克的整个地带从苏联版图上分割出去”。

Д.波兹涅耶夫在其旅行报告的附件《满洲旅行札记》中，请中央重视他在满洲发现的许多缺点和漏洞。他认为在中国的情报工作有

一个严重缺点，就是对当地报刊研究不够，缺乏通晓日语的人才。波兹涅耶夫写道：

工作安排上最主要的缺点是在当地现实状况的研究中，对本地情报来源利用得不够充分。特别是在满洲，人们对中文远比对日文重视得多。中文与日文当然都很重要。中国人和日本人现在对苏联实际上都在实行同样的侵略政策。二者的差别仅仅在于，中国人的侵略性露骨，日本人的侵略性隐蔽。然而我们有更多的理由力求洞察日本人的图谋，尽可能多地了解他们的情况。至于对中国和满洲的中国人的研究，必须说，所有机构多多少少都读报纸，但我们还没有达到阅读厚厚的富有理性的期刊和中国书籍的程度。中东铁路经济部主任Г.Н. 季基对我说，有一段时间他们订了许多中国期刊，可是后来停订了，因为实践表明，现有的人员只能读读报纸，而且只能读其中直接涉及铁路问题的文章，其他文章则视可能予以翻译，而更为确切地说，是完全没有翻译。

至于日文，情况更糟。整个中东铁路只有一个工作人员涅兹奈科懂日文，他经常忙得不可开交，现在也早就不呆在翻译室了，因为他总是同奉天各种会议缠在一起。另外还有一个人叫佩列托尔钦是他的副手，不过他的日文水平比涅兹奈科低。

除这两个人外，听说驻哈尔滨领事馆还有一个职员马措金通晓日语，利用日本资料写了很多东西。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力量。

多数情况下干活的都是本地人，也就是中国人，个别地方是朝鲜人，但在某些场合就不能依靠他们了，所以这方面的情况很不妙。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关注这一点，将各东方学院毕业生派往中国、满洲、日本，以便在1930年前培养出尽量多的翻译人才。为使一个刚毕业于我们学院的大学生能够在当地熟练掌握语言，三年是勉强够用的期限。

除通晓中文和日文的专家外，他认为应当拥有通晓蒙语的人才。他举出了扎伊采夫的事例，这个人可以帮助情报机关做成很多事。

Ⅱ. 波兹涅耶夫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

此外，我们还应该思考蒙语的问题。当然，我们有一定数量有教养的布里亚特人，但我无论如何不会忘记，就是目前在独立的蒙古起很大作用的扎姆察拉诺、林奇诺等人，1919—1920年在赤塔召开的代表大会也起过明显的作用，那次代表大会认为必须建立接受日本统治和保护的大蒙古；不会忘记，当时他们是谢苗诺夫的拥护者，想把他奉为蒙古可汗。所有这些史实，在我留在你们那里的蒙古问题手稿中有详尽的叙述。

谈到蒙语问题，一件意外的事让我有缘碰到一个人，我确信此人可能对我们非常有用。南满铁路俄语翻译处有个职员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扎伊采夫，他生在蒙古，精通蒙语如同精通自己的母语。他是该处的绘图员，给日本人绘制地图。他告诉我，他在蒙古旅行期间很熟悉我的弟弟阿列克谢，当时我弟弟和他父亲——一位过去在蒙古经商的商人住在一起，这一情况可在《蒙古和蒙古人》第1卷中读到。我不记得这些书页，但你们当然可以找到。扎伊采夫为日本人干活就是为了挣口饭吃，每月挣100日元。我觉得务必将他买过来。做成这件事易如反掌。只要中东铁路商务处聘请他，比方说，每个月给他200卢布，他就会高高兴兴地来。如果把他安排在满洲里或者海拉尔，那么他就会依靠自己的蒙语知识，成为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人，他会值这么多钱。

这个扎伊采夫对我说，现在日本人对蒙古有着非同寻常的强烈兴趣。他们往那里撒钱，收买蒙古人，千方百计地不但要在东蒙古和呼伦贝尔，而且要在独立的喀尔喀站稳脚跟。日本人在喀尔喀的一个主要间谍姓佐滕，是日本总参谋

部的军官，他以库伦（乌兰巴托）一座寺院的喇嘛身份作掩护，在这里度过了10年。他蒙语讲得好极了。有一次他邀请扎伊采夫参加从东蒙古来到大连的蒙古王爷们举行的招待会，他的蒙语令扎伊采夫大为吃惊。遗憾的是扎伊采夫不懂日文，不能告诉我这个日本人的名，而只知道姓佐滕，不知道名，就像在俄罗斯只知道伊万诺夫一样。不过，经过满洲回去时，我要千方百计把这个日本人佐滕了解得详细一些。现在没有时间了。因为我是在离开大连的当天才知道他这个人的。

如果在我逗留此地期间聘请扎伊采夫到中东铁路工作，那么我恳请无论如何要让我知道此情。他掌握许多情报，但他自己不知道这些情报的价值，也不善于适当伪装这些情报。假如在哈尔滨或者海拉尔见到了他，我本来能够很好利用他，获得大量材料。

这个扎伊采夫帮助我从南满铁路俄语翻译处偷到该处用的一幅日本印制的蒙古地图（见附件4），我认为这张地图有重要价值。扎伊采夫将该图放大了九倍，标上所有的符号，而后从他那儿取走，由日本人写上汉字或假名。红线标示已经勘察过、日本人计划在蒙古建筑的铁路线。这幅地图实际上是日本在蒙古有巨大野心的证据，我们必须最严肃地关注此事。

我曾想过在扎伊采夫的原单位利用他，但我现在认为他不合适。这个人智力不强，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受过折磨、胆小怕事的人。他对日本人怕得要命。所以最好是把他彻底夺过来，利用他在蒙古可以当制图员和地形测绘员的条件。而他凭借自己的蒙语和蒙古知识，能够贡献非常多的东西。有他的帮助，可以轻而易举地监视所有住在蒙古的日本人，他能够在蒙古人中轻易地打听到这些日本人的情况。看来他没有任何政治信仰，完全是听天由命。况且这方面我不了解他。他很不喜欢日本人，照他的话说，他讨厌为“这些斜眼

鬼”干活。日本人给的钱也很少。我问他转到中东铁路工作的事，他说如果给更多的钱，他就去。

Ⅱ. 波兹涅耶夫让中央领导注意日本人在满洲开展的苏联研究工作，以此再次证明日本准备同苏联开战的侵略计划。他写道：

南满铁路的机构中有个研究处，内设俄罗斯科，该处招收所有多少懂点俄语的日本人。在该处工作的俄罗斯人有古梅柳克·伊万·格拉西莫维奇、上面提到的扎伊采夫和一个女缮写员。古梅柳克的工作是为日本译员讲解俄语疑难句子和用语。约有20—30人一起干活，工作量巨大，其直接领导人是曾在一次莫斯科会议当过翻译的宫崎。书籍或直接从俄国得到，或从伦敦、柏林和美国得到。为了出版这些书，南满铁路与大阪能够出版书籍的大阪每日新闻出版社签订了合同。现附上已出版图书的目录（见附件5）。该附件显示了日本人选译出版物的特点。我要求给我一份今后的出版计划，宫崎回答，没有这样的计划。不过这是谎言，因为我听职员和译员说过，出版180卷研究苏联经济状况的书籍的重大而紧急的工作已经考虑成熟，东京的经济学教授业已制定该项研究的计划。此外，这里当然还做着秘密的翻译工作，对此我只能略有耳闻，据说，“有些铁路理事会不能公开的书”。

如同莫斯科的领导，苏联情报机关对日本当时的立场很感兴趣，所以Ⅱ. 波兹涅耶夫经常会晤日本驻中国记者和大使，以便更详细了解日本的立场。他呈送的关于1926年4月12日12时他会晤日本田中大使的报告说明了这一点。报告内容如下：

4月12日，星期天，濑沼来找我，说鱼地向田中讲了梅浦在列宁格勒拜访我的事，田中说他如能见到我将会特别

高兴。根据濑沼很快来到，以及他在上午9时电话通知我，田中将于当日上午11时欣然接见我等情况，我明白，田中很有兴趣地期待我到访。我同鱼地、濑沼一起去见田中。他独自一人在办公室里，显然是在等我们。他立刻接待了我。

田中表达了他见到我很高兴的心情，说是久闻我的大名，还讲了一些客气话。我也以同样恭维的话答复他，尔后谈到我此次旅行的目的是为修改写满洲的书收集资料，更新有关该地区和中国的材料。此后田中用英语讲了下面一番话：

“您在研究满洲的工作中，当然会立刻发现，满洲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大多数必定影响到日本的行动。满洲对于日本具有生命攸关的意义和重要性（vital importance）。这不是以占有领土的观点来看问题，而是以同中国共同搞好经济观点来看问题。我十分明确地承认，我们过去在满洲有许多失误。倘若没有这些失误，我们在满洲的经济作用要大得多。第一，我们对中国人民的作用估计不足。我们做了个别人物及中国资产阶级的的工作。然而，实际生活证明，这是错误的，应该关心怎样使中国人民群众的利益结合起来，特别是与农民的利益结合起来。第二，中国人在许多方面比我们强大。例如，我们的朝鲜银行非常愚蠢（quite foolish），竟然宣布要在满洲开展发行金钞票的金融业务。它不明白，中国人自古以来世代代和银子打交道，而且只和银子打交道，他们都是大大的银子专家，同他们在这行业竞争极其困难。结果如何呢？中国人在不同的地方人为地操纵钞票的不同汇率。他们在钞票便宜的地方大量购入，在钞票昂贵的地方卖给银行。结果朝鲜银行损失惨重。我无法说出准确的数额，我想您会在满洲打听到，不过我知道数额巨大。我知道您非常熟悉银行业务，所以我相信您能对类似的‘银行蠢事’（banking foolishness）作出正确的评价。您知道

在朝鲜银行干的这桩荒唐事中谁赚钱最多吗？张作霖。他这个人在套汇和交易所投机活动中特别能干，是他筹划了一系列针对朝鲜银行钞票的活动，在这些钞票的买卖中大发横财。

“朝鲜银行第二项类似的业务与奉天的建筑工程有关。该银行向日本地段的房屋建筑工程投入巨资，指望以此加速日本向满洲移民，把所有住房都租给日本人居住。这一奇想的最荒谬处，您作为一个银行家自会很了解。朝鲜银行是个发行银行，而不是抵押银行。它突然打算把自己的资本投到这种长期业务中！结果又发现找不到合适的日本侨民，为了避免继续遭受损失，银行不得不将房子租给中国人，而不是日本人。所以，如今我们在日本地段朝鲜银行的楼房里有很多中国商店、企业、库房。您说说，为中国人的好处而耗费这么多资本，对我们有利吗？”

“这样和那样的教训令日本人确信，同中国行政机关和资产阶级共事非常无益。在一些联合公司里，中国人同样采取其敲诈勒索的惯用手法，致使共同工作几乎成为不可能。

“但是，日本人在工作着，而且在非常努力地工作着（are working very narrowly）。我在想，此前我们的投资已不少于15亿日元。如果您看到南满在您不在的15年里完全变了模样，那么，这当然是我们投资和我的同胞们辛勤劳动的结果。

“不过，近期日本思想界对满洲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您很清楚，日本发了世界大战的财。我们需要使用我们的资本，所以十分自然的是，我们要在满洲寻找这些钱的用场。但是，如果说过去日本人曾想过，他们能够成为满洲的主人（masters of Manchuria），那么现在这种想法已被完全摒弃。我们在许多方面弱于中国人，我们必须学习他们，因此我们决定同他们一起干（to co-operate with them），主要是同中国群众，而不是同行政机关一起干，有时也同唯利是图的资

产阶级一起干，但这是极其偶然的事。

“日本在满洲的工作还遇到另外一些困难。让我们举鞍山铁矿及附属制铁厂为例。我们对该厂寄予很大希望。现在那里有两座炼铁炉开工，而原计划要建六座炼铁炉。但是，日本进口生铁，应该根据最惠国待遇，和进口英国和美国铁同样纳税。我们从外国进口铁收保护税。所以如果我们降低鞍山铁的税额，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降低英美铁的税额，这是我们不可能办到的。

“这就是说，应该将鞍山的生产成本降低到使它能在输入日本的税额相同的情况下，经得起同美英的竞争。南满铁路的注意力目前正集中于此，尽管这件事决非轻而易举。现在鞍山的产量约为20万吨生铁。”

我问：“在这样的情况下，从中国汉冶萍工厂进口半成品怎么样呢？”

田中略加思索后说：“那里的规则有些不同，那里投入的是国家资本，产品供给国营的炼钢厂，而这里则是私营企业。”（这样的解释当然不能让我满意，但我不认为能够要求得到进一步解释。）

接着，他问我旅行路线。我答道，在中国现时情况下不可能事先确定，我很想去北京和上海，但不知道能否成行。他表示愿意为我向关东督军、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社长和奉天各权力机关发出介绍信，并使我能更容易地建立起彼得格勒大学同满洲各教育机构及在满洲的日本各协会之间的关系；而在给驻北京的吉泽的信中请求对方在中国给予同样的协助。最后他建议我扩大行程，到朝鲜和日本去，不过我说，虽然我打算去，但今年未必能成行。

接见就此结束。我以个人和大学的名义向他表示深深的谢意。田中示意我，他所说的一切只应帮助我理解问题，而不宜作为正式的谈话在报刊上发表。

后来，Ⅱ. 波兹涅耶夫在满洲之行 3 个月后，于 1926 年 7 月 25 日会晤了日本报纸《大阪每日新闻》驻北京分社社长布濑千足，和他就中国的国际地位问题进行了交谈。他还把关于这次谈话的报告寄往莫斯科，因为他很清楚，这次谈话不但对情报部门，而且对外交人民委员部都具有重要意义。他的注明“致加拉罕，绝密”的两个文件很快就到了外交人民委员部。这次谈话的第二份记录写道：

布濑说：严格地说，英国同苏俄之间的斗争被认为是目前中国所处国际形势的基本问题。英国 7 月 19 日正式照会北京政府，要求采取反对广州的措施。我们极秘密地获悉此事，于当日发电报通知大阪。据我所知，各报直到此时尚未报道这一照会。英国声称，广州形势对其利益会造成严重损害，要求北京政府采取措施。如果他们有能力采取措施，英国将不得不认为自己可以自由采取它认为需要的措施。

对此，我指出，今天只看到各报刊登了英国针对汉口地区形势的类似照会，但布濑说 7 月 19 日有过针对广东局势的类似照会。

接下来谈了英国借款给吴佩孚⁷⁴的问题。英国人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决定从香港借给他 200 万英镑，但条件是对“布尔什维克”要取得哪怕是局部的胜利。例如，如果吴佩孚能够占领怀来，那就借款给他。吴佩孚则告诉英国人，没有钱他不能打仗。然而，看来问题在于，英国人干涉中国内政的决心已定。顺便说，英国照会中称，如果英国采取措施的话，则其措施决不是针对全中国，而只是针对损害英国利益的个别地方。

英国在中国的威信总的说来在下降。对英国带来损害的，一方面是日本加强了对中国的出口，另一方面是美国不支持英国……这点在被英国破坏的关税会议上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⁷⁵，英国之所以破坏这次会议，正是因为中国关税事务

的任何变化都对英国不利。您大概知道，根据同中国签订的协定，在英国贸易占据优势的情况下，中国海关总监应该由英国人担任。日本人在关税会议上声明有权占据中国海关职员中的大部分岗位。目前在 1200 名职员中只有 200 名日本人，而英国人是 800 名，这与双方贸易额的比例完全不相适应。虽然就问题的实质而言，现在总监是否应该由英国人或日本人担任还是一个问号，英国人认为向日本人提供大多数工作岗位是不可能的。

我问布濂：“1902—1903 年修改海关税率时，我触及过这个问题，并有一本名为《中国海关外国商品进口登记系统（旗帜问题）》的书，这您知道吗？是符拉迪沃斯托克东方学院 1904 年版本。我在书中阐述了英国人如何依靠将他人的货物用自己的船从香港就近运到中国，窃为己有。海关将一切在英国旗下运到的货物作为英国货予以登记，而不管这些货物的原产地在哪里。”

“不，我不知道。我明天就往符拉迪沃斯托克发电报，要求把您的书给我寄五本来。但是，不但没有给我们总监的职位，甚至连较多不那么重要的职员岗位都不给我们。另外，在关税会议上讨论调整我们的‘西原借款’问题时，英国给日本制造障碍。”

尽管我了解问题的实质，但还是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段祺瑞⁷⁶第一次执政时期，西原龟三作为日本的财政代表，给中国各权力机关和中央政府的借款几乎高达 2 亿日元，不以关税收入和盐业收入作抵。为了偿还这些债务，日本同意提高关税。可是英国呢，第一，不同意提高关税；第二，声明首先应该调整工商债务，以便有可能保障今后定购工业成品，而后才谈得上西原借款的那种‘政治性’借款。总之，英国是逐条逐款反对我们。”

“那您怎么看呢，英国在中国是单独还是与哪个国家联

手反对苏维埃俄国？”

“单独，它能和谁联手呢？首先是钱的问题。在西原借款问题得到调整之前，日本不会再给中国钱了。美国决不会发放任何政治性借款。只有英国需要解决在中国战胜苏俄的问题。”

“法国呢？”

“法国目前在这里不实行积极的政策。法国卖给张作霖⁷⁷武器，但这与其说是政府的问题，不如说是私营商业公司的问题。”

“今天《大阪每日新闻》发表的《华北的格拉尔德》称，目前冯玉祥⁷⁸打算建立由察哈尔、绥远、阿勒泰和甘肃组成的共和国，孙传芳⁷⁹可能同广州和国民军联合，反对吴佩孚和张作霖，对于吴张二元帅而言，这是令人可怕的联盟。您说这是您的报道吗？”

“不是，您怎么啦！这是《大阪每日新闻》写的一篇社论，被一家通讯社在中国报导了。报纸就因为这篇社论掉进了可怕的陷阱。我的所有电报一直都在证明相反的情况，现在已得到证实。我认为这里有过错的人是上海的记者。真是一桩大丑事，《大阪每日新闻》就因为这么一篇社论着实搞臭了自己。”

“而且我觉得，”他略加思索后补充道，“如果英国人在给吴佩孚借款的问题上不再长久地讨价还价，也不及时给他钱，那么他也许将无力与冯玉祥作对，那时蒋介石⁸⁰的机会就将迅速增大。”布濂告诉我，他打算8月份去青岛、济南、大连和奉天，将近9月返回，届时有望恢复会议的工作。

波兹涅耶夫在这次旅行的最后几天（1926年8月）踏上归途，在济南府被俄国涅恰耶夫白卫分子逮捕。他们把他从旅馆里拖出来，给他戴上镣铐，夺去衣物，投入监牢。《新上海报》1926年9月17日就此事写道：“……8月25日，鉴于波兹涅耶夫教授长期身体不

佳，已到暮年（他时年 61 岁——作者注），狱卒取掉了他身上的镣铐。”苏联各家报纸广泛报道了这一事件。同波兹涅耶夫一起被捕的还有另一位中国学家 A.B. 马拉库耶夫。

由于缺乏证据，由于苏联报界就苏联著名东方学家和学者被捕大张旗鼓地抨击，他们被当局极不情愿地释放，回到了莫斯科。

但其他情报员继续留在满洲工作，以完成各自的任务。

1927 年 8 月至 1930 年 2 月，在满洲工作的军事情报系统人员是威廉·采瑟尔。⁸¹

1930 年至 1932 年 2 月，女情报员卓娅·沃斯克列先斯卡娅⁸²在哈尔滨担任苏联石油购销联营组织密码科负责人。

在此期间，苏联驻哈尔滨情报机关同中国共产党党员密切合作。他们的组织约有 150 人左右。哈尔滨市内有 63 名党员，中东铁路沿线有 87 名，组成了 23 个共产党支部（哈尔滨 11 个，中东铁路沿线 12 个）。共产党员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开展工作。例如，从联共（布）北满洲委员会中国工作特派员 C. 库诺夫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秘书处副秘书长 B.И. 索洛维耶夫（赖特）的信可以看到，临近 1927 年 9 月，中东铁路有 23 名党员被捕，“他们当中有 3 名委员会成员和一个最重要党支部（主要机修厂区）的书记”，被捕的人都被投入大牢。在大连有 52 人被捕。库诺夫要求中央派一名工作人员（北方人）来加强大连的党组织。

1928 年，由从北京迁至哈尔滨的拉脱维亚人 X. 萨尔嫩、保加利亚人 И. 维纳罗夫和从莫斯科派来的新情报员列昂尼德·叶京贡（璫莫夫）组成的情报小组，在工业企业主-列昂尼德·韦格杰卡拥有的罐头厂掩护下开展工作。维纳罗夫的妻子加林娜·列别杰娃从北京转至哈尔滨远东银行工作，依然是该小组的密码员。这个情报小组于 1929 年离开中国

1928 年，驻哈尔滨谍报机关受领了中央下达的一项特殊任务——护送中国代表参加于 1928 年 7 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从上海转到哈尔滨工作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外局工作人员 B.И. 罗辛在回忆录中这样叙述这件事：

1928年夏季，我们驻哈尔滨谍报机关受领了中央一项任务：保障中国共产党代表秘密通过苏中边界，参加于1928年7月17日在莫斯科开幕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1928年9月1日闭幕——作者注）。中共代表团共有几十人……送他们过境的任务由我负责。为此，我在满洲里市逗留了两周。

开往满洲里车站的每列客车有2—3名代表。到站前广场来接人的是一位挑选好的马车夫，他的特征和接头暗语代表们事先都清楚。交换过暗语之后，车夫要求中国人上马车各就各位，奔赴离城两公里的边境。越过边境时无论是中国一方，还是苏联一方都能确保畅通无阻。运送行动持续了两周，没有发生任何事故。

B.И. 罗辛叙述了他们如何运送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却只字未提参加几乎同时（1928年6月18至7月11日）在莫斯科郊区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们的运送情况，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84名，候补代表34名。可以初步认为，中共六大的消息看来极其机密，以至于不认为有必要告诉那些在中国工作的谍报负责人。（来自57个党和9个外国组织的532名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众所周知，参加中共六大的部分代表（29人），其中包括周恩来、瞿秋白、邓中夏、李立三等人，加入了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团。

惟一在世的中共六大代表，已经99岁高龄的谭云翘的回忆对B.И. 罗辛的叙述有所补充。根据他的回忆，当时代表们有两条路线可以抵达会议地点：其一，由上海乘船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少数人走这条路）；其二，由上海乘轮船到大连，而后到哈尔滨，再从哈尔滨经满洲里或绥芬河越境赴莫斯科（多数人走这条路）。事情的复杂性在于中国南部各省代表只会讲本地方言，他们从哈尔滨到满洲里站需要坐整整一昼夜火车，而且不得暴露自己的南方口音。正如谭云翘所

回忆的那样，他与自己所在的由五个代表组成的小组接受张国焘交办的任务，护送南部各省代表小组从满洲里抵达苏联边境。谭云翹本人护送广东、云南、贵州和江西各省的代表过境。他应该分别给每个小组买火车票，和每个小组一起去满洲里，然后再返回护送下一个小组。上火车前，给每个代表发一张专用小号牌。代表在满洲里下火车，车站已经有马车夫等候。每位代表应该找到与自己号码相符、挂在四轮马车灯笼下面的马车号，担任把自己的小号牌交给俄罗斯人的车夫，然后这位代表被运到苏境。

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外局 1926 年设在中国的“合法”谍报站仅有 5 个，到 1929 年这样的机关已多达 13 个，其中有 5 个在满洲。如果说 20 年代初期驻北京谍报站是对外局的主要谍报机关，那么随着形势的变化，到 20 年代末期，哈尔滨谍报站已成为主要的了。

20 年代上半期，驻奉天总领事是个姓库兹涅佐夫的人。⁸³他在长春和大连参加过同日本人的会谈，又曾在我驻北京使馆担任一等秘书，参与同张作霖签订中东铁路协定（1924 年奉天议定书）。据传，张作霖十分喜欢库兹涅佐夫，曾建议他放弃苏联职务而转为奉天政府效力。1929 年 6 月初，奉天总领事库兹涅佐夫和两个领事馆职员在回莫斯科途中被捕于海拉尔边境站。由于行李搜查中未发现任何不利证据，被拘禁者很快获释。但是，在满洲里警察搜查库兹涅佐夫及其同行时，另一位苏联领事馆职员乘汽车越过了满洲苏联边界，他携带有大量行李，其中大概有中国当局寻找的东西。后来库兹涅佐夫在苏联驻日本大使馆担任一等秘书。

1924 年 11 月至 1926 年 5 月，П.В. 斯图切夫斯基⁸⁴离开共产国际，先在地拉那（阿尔巴尼亚），后在奉天，以外交官身份作掩护开展工作。这个人时而在共产国际，时而在军事情报机关（也许是同时在两个部门）交替工作。

1925 至 1926 年，A.H. 瓦西里耶夫（1880—1941）担任驻奉天总领事。他从 1904 年起为布尔什维克，1923—1925 年为苏联驻蒙古全权代表和商务代表，从 1926 年起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局机关和外交部门工作。

4. 驻上海的谍报机关

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于1919年3月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号召东方各国被压迫人民共同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此后共产国际领导机关开始认真考虑与中国进行联系更密切的各种计划。1920年4月，共产国际远东秘书处派遣以Г.Н. 维经斯基为首的工作小组前往中国。该小组成员有维经斯基的妻子М.Ф. 库兹涅佐娃、И. К. 马马耶夫（1924—1927年为驻中国军事顾问）及其妻子，还有杨明斋（翻译）。他们这次出访的目的是了解中国情况，同中国社会进步人士建立联系，研究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方秘书处的可能性。首站是北京。通过在北京大学任教并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有广泛联系的С.Н. 波列伏依教授，他们在这里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钊及聚集在其周围的革命青年建立了联系。然而，官僚主义严重、官场风气盛行的北京，这个军国主义反动势力的中心缺乏工业，因而也缺乏工人阶级的大部队，所以共产国际工作小组认为它不是一个具有共产主义运动灿烂发展前景的大都市。

那个时期中国的另一个政治中心是广州。但是广州也没有发达的工业。这就是最后选择了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无产阶级中心及革命知识分子的集中地，作为共产国际在中国乃至整个远东工作的根据地的缘故。中国共产党代表费奥多尔（刘前）1920年10月5日曾向俄共（布）阿穆尔州委员会提交一份关于其上海旅行成果的报告，其中说：

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者可以公开进行宣传的核心基地。那里有许多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出版300多种各类刊物，这些刊物全都具有社会主义倾向。有时候还举行群众集会。人们争先恐后地购买附有苏联活动家，特别是列宁、托洛茨基的肖像的文学读物、报纸、杂志。

上海又是帝国主义国家间矛盾的集中点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基地，在这里，帝国主义的统治表现得最为露骨和最厚颜无耻。上海在世界上被称为东方明珠、亚洲的巴黎、中国的戈尔康达*和黄魔之城。A.E. 霍多罗夫在其 1922 年所著《世界帝国主义与中国》一书中十分准确地描绘了这个大都市：

上海是个处处铺满沥青的大都市，高楼林立，多层旅馆富丽堂皇，宽阔的大街上移动着成千上万五颜六色的人流，无数车辆吼叫着往返疾驰。一段段长街区充斥着卖淫丑行，交易所“经纪人”利用“金银差价”投机赚取暴利，形形色色的中间人乘坐轻便马车，为追逐利润而奔走于银行之间。上海是中国光膀子的工人们拉着四轮大车搬运重物或为外国海船卸货时发出单调而有节奏的“歌声”的城市。

上海是世界上藏污纳垢的场所，这里有数不清的酒吧间，有人在这儿喝得烂醉如泥，有人在这儿买卖鸦片，买卖灵魂，买卖女人的肉体。上海有皮肤黝黑、戴着大头巾的上等印度人充当警察制度的可靠而“忠诚”的卫士，有威严而高傲的英国人充当最崇高的“秩序”维护者。上海是奸商、密探、假绅士和骗子出没的城市，是贪婪剥削的城市，是工人拼死苦干，“占有者”疯狂牟利的城市。

是的，上海的确具备英国人要求理想殖民地城市具备的一切特征。等级制度和西方奉行的“分而治之”原则主宰整个上海。全城由三部分组成：一是面积广大、设备完善的公共租界区；二是法国租界；三是极度拥挤的中国人居住区。上海外国区的条条大街和林阴道两旁高树耸立，绿荫如盖；精心修剪的块块草坪冲洗得干干净净；处处是阳光明媚的花圃和公园。其后是上海显贵们的半宫殿式建筑和别墅。公共租界区各条大街上，戴着红头巾、满脸络腮胡子、身材魁梧

* 16—17 世纪位于印度德干高原的一个国家，以纺织和其他手工艺及钻石开采驰名。——译者注

的印度人在指挥交通，维持秩序。在法国租界的街道上执行警察勤务的是印度支那人（后来用俄国人补充警力）。租界区的警察不但有印度人，而且还有中国人、英国人，晚些时候又吸收了一些俄国侨民。不过，即使根据警察的装备品，也可以确定英国人对待这个或那个民族的态度。中国警察装备的是最老式的武器。印度警察的薪水较高，也装备较现代化的武器。英国警察则处于二者无法企及的高度。租界区有轨电车的售票员和司机是中国人，而检查员和验票员却是朝鲜人。这些中国人与朝鲜人相互仇恨，这使他们不可能串通起来耍什么花招。该市所有其他私营企业与市政府所有的企业情况也是这样。

俄国人认为，上海外国租界里最傲慢、最目空一切的居民是英国人，他们除极少数人外，都是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和冒险家。上海的多数英国显贵在其祖国的社会地位不会超过伦敦东区的小商小贩。然而在殖民地，这些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获得了他们在自己的祖国不可能得到的一切。在这里他们摇身一变，竟然成了出身贵族、有贵族血统的人，成了拘谨而又傲慢的殖民主义特权阶级。在殖民主义生活习俗和英国的特殊统治这样无所顾忌的条件下，他们为自己创造了能够让他们快速发财致富的特权和地位。

别的外国侨民不想落在英国人的后面。法国卑微的商品推销员，沿街叫卖橡胶制品的低贱卖主，在自己的祖国费尽力气才能挣到可怜巴巴的一口饭吃，却在殖民地变成法国租界富有的食利者、上等俱乐部的成员、豪华住宅和别墅的主人。

II. 巴拉克申写道：

20年代初期上海的外国侨民没有超过15000—20000人。其中人数最多、最有权势的是英国侨民，其后是法国人、美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斯堪的纳维亚人。日本人组成一个与世隔绝而又紧密团结的侨民团体，住在虹口区。自称为葡萄牙人的“混血”“等外人”与纯种葡萄牙人组成的大侨民群体生活在等级分明的环境中。根据某一血统为主的情况，他们也被划为若干等级。

拥有 300 万人口的中国城区，依中国当局的称谓是大上海，其居民与其说按出身特征划分等级和阶级，不如说按此特征划分为有权阶级和无权阶级、富人和贫民、买办和苦力。

来到上海的俄国侨民处于该市复杂等级制度的最低层。

这样的上海与外部世界联系也非常方便。俄共（布）中央远东局外事处那个时期的代表 Г.Н. 维经斯基来到了上海，并在这里度过了 1920 年的夏秋两季。他协助于 1920 年 5 月在上海建立了以陈独秀为首、由五人组成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8 月，他参与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始出版周刊《中国工人》。同时维经斯基帮助李大钊小组在华北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共产国际执委会 B.Д. 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 1920 年 9 月 1 日在莫斯科所作的关于在东亚各国开展对外工作（1919 年 9 月—1920 年 8 月）的报告称，“今年 5 月建立了对不断扩展的工作实行领导的临时集体核心”，它的“所在地定在上海，名为‘共产国际东亚第三秘书处’。”该报告强调，上海是“中国共产主义主要出版中心”（根据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方针，共产国际对东方各国共产党的帮助，首先应该体现在协助安排用当地语言出版报刊、定期出版物和机关刊物）。报告说：“秘书处在这里订阅了许多报纸和杂志。我们买到了《上海生活》，中国报纸《周报》等，中国杂志《新青年》（月刊，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博士主编）、《新中国》（现在已迁至北京）。”维连斯基指出，在上海组建了一个报刊处。

外交人民委员部通过上海进行了数次同孙中山建立联系的尝试。俄国旧军队上校 M.Г. 波波夫于 1920 年春季被派到上海作首次尝试，他作为职业军人要对孙中山的军事计划（《西北军事计划》）作出评价。波波夫认为孙中山的这项计划不可能实现，对计划的制定者给了完全否定的评语，认为他是“旧式军国主义者，除了军事途径以外，看不到拯救自己祖国的其他途径”。

莫斯科的特使 A. 波塔波夫将军大约于同一时间作了第二次尝试。1917 年革命爆发时，波塔波夫正在远东。有时他认为回俄罗斯

是件幸福的事，不过他又担心自己过去那段绝非革命的经历（1917年夏他支持过科尔尼洛夫）是否对此会有所妨碍。因此波塔波夫决定不能空手回国。他在给Г.契切林的报告中写道：

我在上海同孙中山博士联系密切，他是一个狂热的仇英者，是北京政府和广州政府（现已解散）的敌人。……我和他约好用我掌握的中文和英文密码相互联系。除了他的照片外，我没有他的任何文件。在多次不同的谈话中，他对我们在俄罗斯成功实现共产主义的可能性不止一次表示怀疑。

美国驻上海的情报员乔治·索科利斯基⁸⁵在其给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埃德温·坎宁安的报告中，对这两位莫斯科“特使”的评语颇令人感兴趣。埃德温·坎宁安于1920年3月30日将这份报告秘密寄给华盛顿的美国国务卿。乔治·索科利斯基写道：

上海的布尔什维克宣传微不足道，而且与莫斯科毫不相干。在这方面有三个主要因素导致这样的评价：波塔波夫将军、M.Г.波波夫上校和俄罗斯劳动社。

波塔波夫将军冒充为布尔什维克和为俄国革命献身的牺牲品。实际上在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于彼得格勒发生冲突时，他站在科尔尼洛夫一边反对革命军队。这就是他为什么来到远东的一种解释。由于在日本受布尔什维主义宣传的吸引，他出了点麻烦事，不过我并不认为他作出了什么大事。他是一个神经衰弱者，总受着被人迫害幻觉的折磨，又总是自命不凡。他自称甚至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地方自治局无法做到的情况下，他也能同莫斯科进行接触：他向列宁寄建议信，但这些信后来都在某种借口下被一一退回。他去拜访过孙中山博士，与其讨论国民党同布尔什维克合作的计划。但是，他承认自己没有得到这样做的授权。我表示愿意帮助他，条件是他向我出示自己的证书，然而他没有这样的证

书。这是他本人告诉我的。他的高谈阔论正是广泛传言上海有布尔什维克主义宣传活动的原由。他同王揖唐将军及其秘书曹先生过从甚密。他还同原吉林省东军参谋长高世平将军讨论过自己的计划。然而，高世平既无权力，又无影响力；他甚至引起了原先崇拜他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的某些人的反感。

波塔波夫将军有个亲密的朋友刘先生，是个朝鲜族人。他前不久在东京会见了原敬先生，大家认为他是个日本间谍。这个刘先生自称是个民主主义者，但有充足的理由断定他是个蠢货。令人不解的是，为何他与波塔波夫将军相交如此亲密。

不应该把波塔波夫当回事，实际上，如果不算那些偏爱布尔什维克故事的办报人，那么谁也不把他当回事。

波波夫上校则完全是另一种人。

他来上海持有证书，是阿穆尔州布尔什维克军队司令颁发给他的。我见过他的证书，那是货真价实的。他的使命带有秘密性，他不向任何人吐露自己的目标。他对什么宣传都不感兴趣。

但是，他拜访了唐绍仪先生，后者把1919年5月签订的中日防敌协定复制件交给了他。

波波夫上校能够读、写、说中文和日语，并能将日本诗歌译成俄文。他在旧制度下服役，负伤五六次。1918年他被托洛茨基派到远东接收属于俄国的全部财产，但他却成了捷克人的俘虏，身陷囹圄。

在近日进行的一次访问期间，他会晤了孙中山博士，后者与他讨论了合作的可能性。

波波夫上校得出的结论是，孙博士的计划无法实现。他说，布尔什维克厌倦战争，期盼和平。他认为孙博士是旧式的军国主义者，除了军事途径，看不到拯救自己祖国的其他道路。我根据他的行为得出结论：波波夫上校被派到上海的

目的是熟悉情况，看清未来的前景，同时弄清俄国驻当地领事馆的状况。……现在波波夫上校已经返回符拉迪沃斯托克。

从中国传到莫斯科的消息改变了苏维埃领导人对孙中山的态度。1920年10月，Г. 维经斯基在上海同孙中山多次会晤。后来维经斯基发表了一篇文章《我同孙中山的几次会晤》。

1921年春，荷兰共产党员H. 马林（H. 斯内夫利特）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来到中国。1921年秋，他也会晤了孙中山，当时孙中山把自己的军队集中在桂林（广西）。张太雷作为翻译陪马林来见孙中山。他们在孙中山的大本营度过了9天，同孙中山进行了三次长时间的谈话。

1921年6月，一个叫尼科利斯基的人同时以红色工会国际、共产国际远东秘书处和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情报部代表的身份从俄国来到上海。据俄罗斯历史学家K.B. 舍韦列夫的资料，尼科利斯基的化名直到70年代末仍然未被揭开。俄罗斯历史学家、历史学博士A.H. 卡尔图诺娃和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主任研究员P.H. 帕拉季佐娃一起于1987年得出结论，尼科利斯基很可能是奈曼-尼科利斯基·弗拉基米尔·阿布拉莫维奇，就是贝格·维克托·亚历山德罗维奇（1898—1943）。他自1921年起就是俄共（布）党员，在赤塔商业学校读完了三年级。1919—1920年，他在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部队服役。有资料证明，至少在1921年，贝格曾是共产国际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1921—1925年，奈曼-尼科利斯基在满洲工作。1926年夏，他从哈巴罗夫斯克来到赤塔。1938年被捕，因被指控为托派而受审，1943年被杀害。后来恢复了名誉。

A. 科尔帕基季和Д. 普罗霍罗夫在他们合著的《情报总局帝国——俄罗斯军事情报史概要》（不久前出版）一书中同样证实，他就是奈曼·弗拉基米尔·阿布拉莫维奇（贝格·维克托·亚历山德罗维奇）⁸⁶。

尼科利斯基应该同1921年6月3日到上海帮助远东各国的共产

国际执委会代表马林一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7月9日马林向莫斯科报告：“我希望，我们将在7月末召开的会议对我们的工作大有益处。几个小组的同志们将紧密团结。此后可以着手进行集中工作。”尼科利斯基为当时在中国的苏联工作人员带来了资金。

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至8月5日在上海和嘉兴召开。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共有12名，代表自称为共产党人的53个人。尼科利斯基和马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参加了此次大会的工作。尼科利斯基在会上发言，他向代表们讲了苏维埃俄国国内形势，通报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秘书处已在伊尔库茨克成立。

远东第一批共产党组织之一就这样成立了，尔后中国共产党加入了共产国际，成为该组织的一个支部。

在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曾发现尼科利斯基签署的惟一文件，这就是他发给中共一大代表张国焘赴苏俄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组织和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证件。许多年后，张国焘在回忆起这件事时写道：

他（即尼科利斯基。由于年代已久，张国焘把他叫作尼科罗夫斯基——作者注）将中俄边境满洲里一带的情形摘要相告，并问我是否已准备了御寒的衣服。我答称一切均已准备齐全，可以即日启程。他便从抽屉中取出一张极普通的商店名片，指点着说：“这张名片就是你的护照，上面有一个不容易看见的针孔乃是暗号。”要我持这张名片，用不露形迹的方法，去找满洲里某某理发店的老板，由他护送过境等等。

张国焘带着这个证件到了伊尔库茨克，继而到莫斯科参加代表大会。

1921年秋，哥萨克首领谢苗诺夫出现在上海。起初他在公共租界安身，但在当局的压力下，他被迫迁到法租界。有个叫纳哈博夫的

因为谋害他而被逮捕，不过此人又被释放了，理由是“谋杀的事实未经证实”。领事使团不希望上海发生政治斗争，便要求谢苗诺夫离开这个城市。他来到天津，为了躲避中国当局的追捕，有一段时间藏在一个意大利人的家里，这是还在西伯利亚反革命活动时期就认识他的一位前意大利营营长为他做的安排。

1922年，谢苗诺夫得到法国入境许可后，从中国抵达温哥华，再取道华盛顿、纽约到了欧洲。

1922年，孙中山与俄国外交官们开始频繁通信，并进行了私人接触。他乐于会见访问广州的苏维埃人士，其中包括青年共产国际代表C.A.达林（1921年为共产国际远东秘书处成员，而后在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局工作，再后至1927年底任教于中山大学）。

达林前往广州，筹备应于1922年5月5日开幕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他在1922年4月最初几天经过北京，会晤了B.П.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达林回忆道：

到北京后，我立即赶到苏俄使馆。使馆设在沙皇使馆大楼。在俄罗斯联邦特命全权代表和使馆首脑A.K.派克斯到来之前，北京政府就把十月革命后仍然妄想代表俄国的沙皇官吏统统撵出了这座楼。……我去找A.K.派克斯，并在他的办公室见到了使馆参赞B.П.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A.K.派克斯知道，我应该于近日前往已经成为孙中山政府基地的广州。A.K.派克斯领导的使馆交给我的任务是：同孙中山建立直接联系，了解他的内政和外交政策、他对苏维埃俄国的态度、他的近期计划及国民党作为积极因素在制定广州政府政策中的作用。授予我同孙中山进行有关会谈的正式全权。

达林得到6000墨西哥元的借款，他携带这笔款子，由张太雷和瞿秋白陪同南下广州。

从我们驻北京全权代表A.越飞致苏俄领导人的书信和电报、越

飞同孙中山的来往信函、苏俄全权代表处武官 A.И. 黑克尔同孙中山的会谈记录可以明显看出，苏俄 1922 年把对中国外交的希望寄托在吴佩孚身上，认为吴佩孚是“进步”而强有力的军事政治活动家，在 1922 年 4—5 月直奉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的直系集团首领。此外，还曾尝试促使孙中山与吴佩孚合作，希望这样做将导致建立新的与苏俄友好的北京联合政府。黑克尔于 1922 年 9 月 26 日在上海同孙中山的谈话内容（马林记录）雄辩地证明了这点。当时黑克尔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呼吁孙中山“与吴佩孚建立联系”。黑克尔“打算说服吴佩孚相信必须同孙中山合作”。然而，两位中国政治活动家并没有结成联盟。

在驻上海首批谍报站长中，有一位叫 JI.B. 卡佐夫（化名列昂尼多夫和施密特·约翰，1895—？），1919—1924 年先后任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工作人员。身为情报员的拉脱维亚人赫里斯托福尔·因托维奇·萨尔嫩（“格里什卡”）于 1920—1921 年化名赫里斯托福尔·福格尔，也在上海工作。

1921 年 9 月至 1924 年 3 月，C.П. 维尔德（1892—1967）在上海担任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办事处（位于九江路 14 号 5 层楼）的总会计师，他同时还是设在中国的所有苏俄机构的“联络代表”和主管“银行股东”。俄国来款通常先汇至远东银行——1922 年设在哈尔滨的苏联机构，继而汇到上海。会计师工作是维尔德的“护身符”。1922 年 5 月 20 日的《利金（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中国全权代表——作者注）有关中国工作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的报告》证实了这点。他在谈到“上海联络站”的一章中写道，“同俄国的联系实际上是通过维尔德同志进行的。”“例如，我确切地知道，去上海领导上海联络站的那个同志指示尽可能少见全权代表（指共产国际全权代表——作者注），并彻底禁止被派到中央联社上海办事处的维尔德同志去见全权代表。”

维尔德 1923 年 3 月 11 日从上海向 Г.Н. 维经斯基发的通报颇使人感兴趣。通报称，他收到了维经斯基的来信，并已按规定立即转交。接着他说明了同共产国际工作人员联系的若干问题。

我认为最方便的是利用志愿船队（俄罗斯轮船运输公司，1922年初在哈尔滨设立分公司——作者注）的轮船。他们在上海的代理人埃勒德尔同志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一个完全奉公守法和值得信赖的人。志愿船队代办处设在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的一个房间里。鉴于信件大概经常长时间滞留在波戈金同志的办公室里，所以经北京进行联系不方便。

维尔德接着报告，上海—北京的信使通信安排得很好，他“拥有同北京苏联使馆联络的密码，似乎被视为他们驻上海的非官方代表”，他那里还拥有与当时在日本的越飞进行联络的密码，从而充当越飞为莫斯科和北京开设的中转站。这样，从现有资料看，维尔德是个联络员和财务人员，他负责分配俄罗斯的汇款。1923年5月22日他在上海写了一封信：

昨天我收到远东银行汇来的9600卢布，可是我不知道这笔款来自何人，给予何人，为何目的。期待通知。……我还收到莫斯科寄给中共的278英镑和3500美元，附有详细的分配指示。

他在1923年7月26日给Г.Н. 维经斯基的信中报告：

5月底收到莫斯科经北京寄汇的3500美元和278英镑。其中红色工会国际工作费用278英镑，援助铁路罢工中受难的中国工人1000美元，按照4、5、6月的预算拨给中共1500美元，代表大会召开费用1000美元。

他在该信中还向维经斯基报告道：

我已将从您处收到的汇给日本共产党的9626日元及时

按用途交付。

后来从 1924 年至 1927 年，维尔德担任上海苏联总领事馆的副领事，1927—1928 年担任汉口苏联外交代表处的工作人员。

苏联总领事馆紧靠着苏州河流进黄浦江入口处的一座桥，设在建筑风格庄严的一座四层楼里。这座楼还是沙皇政府在 1914 年建成的，与日本领事馆相邻，对面是阿斯托宫旅馆。（1920 年 9 月之前，在上海沙皇俄国总领事馆工作的有领事 B.Φ. 格罗谢、副领事 K.Э. 梅茨勒、领事馆法官 H.A. 伊万诺夫，另外还有两位俄国官吏。1924 年春，中国政府承认苏联后，即将俄国领事馆大楼交给苏联领事代表。）一层的窗户都安上了又重又大的铁栅栏。楼里不但有领事馆，一层还有苏联商船队办事处，苏联驻中国商务代表处上海分处占居了一层几个房间。领事馆办公室也设在一层。总领事的办公室设在二层，他的住房，即一个房间和一个不大的外事接待厅（也可举行各种会议）也在二层。这个厅同时还是领事馆工作人员的餐厅（早餐和午餐）。三层有副领事们的办公室、领事馆其他工作人员的住房和办公室。四层则全是住房，另有一个客人住的大房间。

1925 年起担任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外局工作人员的 Я.Г. 明斯基（明斯克儿）于 1925—1926 年以驻上海副领事身份为掩护开展情报工作。此前，他在 1922—1924 年曾担任驻波斯领事，离开中国后，于 1926—1929 年担任苏联驻土耳其全权代表处随员。上海领事馆的秘书由库兹涅佐夫担任。

苏联石油辛迪加全权代表 3.H. 多谢尔于 1925 年 6 月 30 日被香港英国当局逮捕。他因“贸易业务”逗留香港，被捕后被转送上海交公共租界审判。苏联政府请求中国政府进行干预，并声明它不承认英国及其他国家在中国领土上享有司法追究的权力。1925 年 9 月 24 日，中国外交部通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中国当局审查了对多谢尔先生的起诉，认为起诉没有根据，因此，“多谢尔先生一案已告终止”。为避免再遭逮捕，多谢尔被迫滞留上海，当时被认为比英租界更富有自由主义氛围的法租界。

当时驻上海总领事是林德。自 1923 年起担任苏联驻中国全权代表的加拉罕在 1926 年 9 月 10 日离开中国后，林德被任命为苏联驻北京代办。

1927 年夏季，军事情报机关代表 Г.И. 谢苗诺夫（安德烈）⁸⁷ 在上海工作。

谢苗诺夫从上海给中央写过几封信，下面就是 1927 年 6 月 25 日写的一封信，他在该信中要求给他派助手。

如果你在莫斯科有优秀的工作人员，自然是中国人，那就给我派八个人来。这将会大大加强我的工作。我正在安排各地区（指上海各地区——作者注）的情报、联络（住宅、会晤地点）及技术设备事宜。现已有了化验室。至今尚未收到您许诺给的物品……在上一封信中我曾提出，为巩固组织联系，需要给这里派两名姑娘——阿列克谢耶娃·热尼娅和希芙（在共产国际德国支部工作）。也许，她们拒绝来这里，或者不可能派她们来，那就无论如何要派其他大致是这种类型的人来。一定要懂法语和英语。我还请求立刻将拜特尔一家派来归我任用——他们一家人在我这里都有用，可让他们开办酒吧和进行技术工作。随这份报告附上一位法国同志提供的法国军事力量生活状况和条件报告。

1925—1927 年，苏联情报员拉脱维亚人 А.П. 赫梅廖夫（А.П. 阿片）⁸⁸ 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部（军事委员会）的军事顾问。他于 1925 年 11 月 23 日到达上海。按照莫斯科的决定，赫梅廖夫不直属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军事顾问 В. 布柳赫尔，因为后者是苏联驻中国官方工作人员。赫梅廖夫奉命同布柳赫尔商量和协调自己的各项计划。

根据莫斯科的倡议和共产国际东方局 1925 年 8 月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指示草案，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工作于 1925 年秋开展起来。该指示提出，党必须开展组织中国革命武装力量的工作和训练群

众“同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军阀战斗”。草案指出，中共中央和各个大的地方组织“应该组建以各级委员会常设局中最有权威的委员为首的专门军事部”。草案建议在两个最重要方向开展工作：一是积聚和组织自己的力量，二是瓦解和利用敌人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各军事部开展工作应该保守秘密，以免同国民党发生不必要的摩擦。这项工作以组织上海和广州的工人纠察队并对他们进行军事训练为起点。要使此项工作具有计划性和广泛的规模。到1926年2月10日前，上海、广州、北京、河南的军事委员会已开始履行职能。也许，已经开始组建农民游击队，并在“红枪会”武装组织中开展工作了。为这项工作的拨款相当可观，例如，仅1925年12月中央给军事部的拨款就达3.76万元。从目标与任务看，苏联情报组织显然在努力关照和帮助赫梅廖夫工作。这从他给Я.К. 别尔津的《关于中共中央军事部的工作》报告中可一目了然。他在报告中既指出了中共中央在军事工作中的缺点，又指出了共产国际代表在军事工作中的缺点。为了加强军事工作，他建议“建立由经过莫斯科扎实训练的中国人组成的军事工作干部队伍，并在他们帮助下扩大和深入进行已经开始的工作”，“提出通过苏联军事学校为国民军培养由共产党员组成的指挥人员的问题”。

临近1928年5月，共产国际东方秘书处制定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的特别秘密指示，阐明军事部主要由三个分部组成：（一）敌军工作部；（二）工农部；（三）组织技术部。敌军工作部负责：1. 对军阀部队的工作。2. 对远征部队的工作。3. 情报收集与整理工作。在情报方面则又提出下列任务：（1）责成基层士兵小组和单个士兵报告本部队的战斗、精神及其他方面的状况。（2）军事部应在团级（含）以上司令部安插固定的情报提供者，以便掌握敌人采取的行动。（3）各地方委员会应努力收集有关本地驻军的最全面的情报。责成军事部“熟知所有军阀的武装干涉部队的情况，以及他们的兵员数量、武器装备、部署情况、政治情绪和精神状态、司令部计划等”。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建议军事部“组建一个专门技术机构，负责收集和整理情报资料，向应该通报的人员通报消息，同情报提供者互通信函”；

还建议军事部“在警察机关、各大政党（国民党及其他政党）机关、各农民组织等安插自己的情报提供人”。该指示有一条专门阐述破坏活动，指出必须有“几个最可靠的同志来进行破坏工作”。

在中国工作的其他顾问也要求在苏联境内对中国人进行专门的训练。例如，1926年春，一份《关于在苏联境内建立联合军事学校的报告》寄给了中央的伊万诺夫斯基同志。1926年4月16日，又从驻中国武官薛福林（А.Я. 拉平）处送来了一份同样的标有“绝密”字样的文件《关于在苏联境内建立训练中国人的学校的必要性》。

1927年3—4月发生事变前夕，还有两位在上海工作的情报部专家享有外交豁免权，他们是丘索夫和叶夫根尼·科热夫尼科夫。

从1927年4月起，国际联络局全权代表Г.М. 海费茨⁸⁹来到上海。此前他化名格里梅里尔，在中国、德国、奥地利、法国及其他国家数次执行国际联络局的短期特别任务。

1927年下半年，驻上海总领事为Б.И. 科兹洛夫斯基。总领事馆情报处主任是L. 马季亚尔（1891—1937）⁹⁰，此前，从1926年起他在驻汉口领事馆工作。

1927年1月国民党北伐之际，上海可能重现南京发生过的混乱状况，上海当局建议格列博夫将军组建俄罗斯部队。格列博夫答应愿意接受上海当局的建议，并在两天内建立了俄罗斯独立团，该团由两个连和一个机枪队组成，总数为300人。格列博夫将军自任团长，但上海的政治局势刚一稳定下来，他就离开了该团。格列博夫的副手Г.Г. 季梅上校被任命为团长。稍后，上海市政委员会建议俄罗斯团以本团兵员组建隶属于上海志愿军的一支正规部队。在俄罗斯团转为正规部队后，为该团规定了特殊条件，其所有官员都转成薪金制人员，并在某种程度上与市政职员等量齐观。不言而喻，这个俄罗斯团引起了在中国的苏联情报机关的注意。

和其他有苏联专家的地方一样，上海的苏联专家之间经常发生各种各样的摩擦。在中国工作的复杂性要求他们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然而，结果往往又不是这样。譬如，国民党总政治顾问M. 鲍罗廷与军事顾问B. 布柳赫尔（加伦）之间就出现了紧张关系。鲍罗廷企图

把包括布柳赫尔在内的所有苏联顾问都“压在自己身下”。有关这一问题的各种信号不断从中国传来。K. 伏罗希洛夫于1927年1月上半月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加拉罕和共产国际Φ. 拉斯科利尼科夫的信雄辩地证明这一点。这封信称：

隆格瓦同志1月14日（1927年）发来的特别5号电报，证实了我们对鲍罗廷同志与我军事顾问团工作人员关系的担心。例如，鲍罗廷同志……免去了军事顾问团副团长叶夫列莫夫（化名阿布诺尔德）同志的职务，任命斯卡洛夫—西纳尼同志代替他。从西纳尼的电报看，这一任命未得到军事顾问团长加伦同志的批准。

伏罗希洛夫接着援引隆格瓦最近一封电报指出，鲍罗廷“越过加伦”进行上述职务调动，鲍罗廷“力图使广东和广西的军事工作避开加伦同志，而直接归他领导”。此外，隆格瓦“注意到鲍罗廷和加伦同志的关系完全不和谐，也不正常，而且竟然发展到加伦同志在如此关键的时刻提出自己的离职问题”。伏罗希洛夫认为这是不能容许的，必须“尊重加伦同志的身份，他在中国南方军功卓著，在中国人中的威望非常高”。伏罗希洛夫建议向政治局发一份“调整他们相互关系”的电报。随上述信件附有致鲍罗廷和隆格瓦的电报稿，其中对鲍罗廷的指示是：

我们认为，在中国目前形势下，您和加伦同志绝对必须做到齐心协力工作……加伦同志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应该具有独立性，即能够任命和调动军事工作人员，进行会谈，同军事当局接洽，等等。从以上原则出发，您应该和加伦同志共同拟定调整你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原则，并呈报莫斯科批准。

加拉罕1927年1月17日回函伏罗希洛夫，提出了对上述电报稿

的意见，对该电报稿第一条进行了一些修改，该条原内容如下：“加伦同志从您（鲍罗廷）处接受总方针和政治指示，根据这些指示，他及其所领导的军事顾问独立开展工作。”补充的内容是：“但是，这并非剥夺您的以下权利：通过加伦同志就具有政治意义的纯军事问题下达具体指示。”

1927年1月27日，政治局不得不专门研究这一问题。政治局作出决议，向鲍罗廷和布柳赫尔发出了以下电报：

我们获悉，您与加伦之间时有误会和摩擦。中央认为，你们协同工作是绝对必需的，希望你们顾及自己承担的责任，认真商量，协调工作。你们两人都要立刻报告，你们认为什么样的相互关系准则能保障正常的协同工作。如有分歧，请确切报告分歧的实质和你们每个人认为必不可少的基本原则。

在各类工作人员从中国发出的信件中对鲍罗廷活动提出的批评，从1926年起就开始在莫斯科堆积起来。例如，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1926年7月4日在致加拉罕的信中写道：

对鲍罗廷同志的抨击不时出现。就连维经斯基同志对他的反应也十分强烈。对鲍罗廷同志暴君式处事方式的许多指责，使这一消极面更加突出。不过大家还是认为，召他回国是个十分重大的步骤。所以此时还不能说要他离任，而只能说让他回国述职，还没有考虑下一步的决定，而且他回国述职的前提是先找到一个能够在广州代替他的重要人物。

在武汉工作时期，鲍罗廷也没改变他这种工作作风。例如，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罗易1927年5月27日从汉口致电斯大林，指出，鲍罗廷行事“独断专行”，“不同许多负责人员协商，也忽视他们的意见”。罗易认为，“他的权力不是以政治威信，而是以垄断同莫斯科的关系

为基础……他说莫斯科不了解形势，不可能对半殖民地发出什么指示。当地需要铁一般的专政，而他实行的就是这样的专政”。政治局发过多份电报就一系列问题征求布柳赫尔的意见，但鲍罗廷没有让布柳赫尔知道。鲍罗廷办事常很专横，不同任何负责人员商量，也不同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代表商量。中国人也知道了鲍罗廷与布柳赫尔就一系列在华工作问题存在的诸多分歧，这就从整体上破坏了苏联军事顾问团的崇高威信。况且，鲍罗廷发出的指示有时与布柳赫尔的行动尖锐对立。比如，浙宁战役期间，当制定战役计划的布柳赫尔在医院治病时，汉口却给军事顾问们发出了破坏蒋介石军队实施战役的训令。档案馆里存放着一份令人感兴趣的文件——拉德克维奇于1927年7月上半月写给伏罗希洛夫的报告。从该报告中可以看出，随白崇禧出征的军事顾问科米（帕纽科夫）“在1927年1月初所受领的任务是协助取得胜利并夺取杭州。此后，由于同蒋介石决裂，我们的领导致电要他促成蒋介石的失败，因为这有利于武汉。科米没有收到这些电报，对这些训令的内容了如指掌的中国人扣压了这些电报。夺取杭州之后，白崇禧在庆功宴上当着将领们和科米顾问的面说，看呀，尽管鲍罗廷发出了那些训令，我们还是胜利了。”伏罗希洛夫问：“谁发出的训令？”拉德克维奇答：“鲍罗廷和加伦的副手——捷鲁尼。”

1927年2月2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局驻中国代表A.E. 阿尔布雷希特（即阿布拉莫维奇、阿尔诺）从上海寄给И.А. 皮亚特尼茨基一封信。从这封信也可以对存在的分歧一目了然。信中说：

顺便谈谈格里戈里（维经斯基——作者注），汉口事变前夕他离开这里了。出发之前，他亲口对我说，事变不可避免。我讲了自己的意见，如果他能留下不走，那会更好一些。他说他应该走，也许他还会回来。但是，他当时要求大家都离开这里。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他犯了很大的过错。现在简略而概括地谈谈他的工作。写这些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但又认为自己有责任说：不请求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这样

关键的时刻派一个能够应付紧急关头的人来，是可耻的。他所有的工作就是巧施计谋，就是磨平棱角，调和迁就。他不是向中共发出明确的指示，而是用那种最庸俗的圆滑手腕把大家搞得糊里糊涂。按照中共中央委员们的说法，俄国同志的威信已是一落千丈了。因为：第一，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在耍阴谋诡计，在中国这是可以做的事情中最坏的事情；第二，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没有路线，他完全应该对中共中央的决议和工作至今模糊不清承担责任；第三，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凭印象工作，他使党中央的工作混乱不堪。

我的意见是，如果现在没有更强的代表，那么这里最好完全不要这个人了。

我们在这里的工作成效甚微，因为中共中央尽可能回避我们。我和留在这里的同志，即切尔尼亚克和恰尔利（T.Г. 曼达良和 H.M. 纳索诺夫⁹¹——作者注），都努力做个有益于中国共产党的人，但是这很难，原因是格里戈里离开前，用他自己那一套东西和工作方法，早把我们搞得威信扫地了。我再重复一遍，写这些我心里不是滋味，不过这是我的责任，而且米哈伊尔（皮亚特尼茨基——作者注）同志知道我不是一个阴谋家。

就在同一天，A. 阿尔布雷希特给 И.А. 皮亚特尼茨基写了第二封“私人”书信。他在信里描述了上海无产阶级极其艰苦的劳动条件后，再次涉及维经斯基和鲍罗廷两个人，声称令他感到愤慨的是，“对如此伟大的事业给予如此少的关注，竟然让格里戈里和鲍罗廷这样不称职的人领导这一事业”。阿尔布雷希特抱怨：

格里戈里脑袋里空空如也，毁掉了这一事业中所有生气勃勃的东西。他东奔西跑，忙得不可开交，耍手腕，吹牛皮。鲍罗廷干得更糟。他纵容最坏的机会主义，散布丧失信心的论调，他只对蒋介石获得胜利有功。

1928年春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局工作人员阿尔布雷希特于1928年5月1日给皮亚特尼茨基写了一封信。他在这封信中猛烈地抨击1927—1928年担任红色工会国际驻中国代表的奥莉加·米特克维奇（亚历山德罗维奇，1889—1943）⁹²：

她（奥莉加——作者注）过去和现在都不择手段地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勒索钱财。比如，她从别尔津的邻居——（指工农红军司令部第四部的代表——作者注）那儿弄到了钱，没有告诉任何人。由于她干预财务工作，我们无法还清对中国人的欠账。……毫不保密、拉着中国人招摇过市、暴露我们所有的住所、与所有邻居——别尔津的人和其他人拉关系、夺取钱财、无休止地鼓吹盲动，最后是以彻底的无政府主义形式支持恐怖主义……她以最明确的方式声称，她认为将恐怖问题与国家政治保安局的所谓工作问题同样提到日程上来，是必须履行的职责。

1927年，一个叫“叶夫根尼·皮克”的先生落户上海，他过去在鲍罗廷的机关里工作过。他是最卓越的冒险家之一，用过十来个假名：科热夫尼科夫-霍万斯基、霍万斯、皮克、克吕格、彼得罗夫等。他是以这样的角色出现在上海的：阿斯特拉罕商人的儿子E.M. 科热夫尼科夫作为志愿者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了俘虏。1918年回俄国后，加入了红军和共产党，被派到莫斯科国家政治保安局学校参加军官训练班。同时他还是莫斯科一所戏剧学校的学生，取名为霍万斯基。

国家政治保安局学校毕业后，科热夫尼科夫先是被派到土耳其斯坦，后又派到乌克兰的波兰、罗马尼亚边境地区。一段时间内他被调到苏联驻土耳其和阿富汗的特别使团工作。1925—1926年，科热夫尼科夫-霍万斯基以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工作人员身份参加了鲍罗廷和布柳赫尔的苏联驻中国军事政治使团。还在苏联使团工作期间，他

就同法国情报机关建立了联系。他骗取顾问机关部分工作人员的信任后，在汉口活动了一段时间。有一天，他窃取了鲍罗廷的日记本和几份秘密文件，卖给了法国领事。后来他这样解释自己投靠敌人的行为：他的家庭受布尔什维克的迫害，父亲被逮捕蹲大狱，弟弟被枪毙。苏联使团怀疑他叛变投敌后，决定立即除掉他。他被约请到汉口供谍报站长们秘密会见的一所外国人的房子里。两个全副武装的中国人迎接他。科热夫尼科夫感到自己落入了圈套，拔腿跑向花园，但头部被中国宝剑刺伤。在花园里他好不容易逃到石墙下，又用尽了最后一点气力爬过石墙，来到街上。过路的外国人听到他求救的哀号，把他送到医院。

后来英国人帮他逃到上海，他开始公开与英国反间谍机关合作。他在英国报纸《华北新闻日报》发表关于苏联驻中国情报机关的系列文章。这些文章署的是假名叶夫根尼·皮克。几家中国报纸也转载过这些文章。几乎在他这些文章发表的同时，上海警察局收到一封冗长的信，上面署的是字母 H.H.。该信提供了似乎来到上海并在那里工作的 62 个俄国谍报员的姓名。警察局查明，这封信是科热夫尼科夫写的。1927 年 8 月他出版了自己的英文小册子《红色魔爪控制中国》。

科热夫尼科夫-霍万斯基又是发表文章，又是给警察局写信，又是出版小册子，这一切使他博得了熟知苏联在中国的“阴谋”和苏联谍报负责人情况的消息灵通人士声誉。驻上海的法国和英国权力机关都利用他的效劳。这个科热夫尼科夫-霍万斯基还为自己赢得了超群出众的演员兼导演的美誉。戴一顶鞑靼人的绣花小圆帽，掩盖住逃跑时留下的疤痕；一双眼睛流露出奸诈的表情。他这样的身材，这样的面孔，俄罗斯戏迷们已经非常熟悉。

1925—1927 年间驻中国军事顾问 A.B. 布拉戈达托夫中将在自己的《笔记》中这样回忆这个“演员”：

白天（1927 年 7 月——作者注）我们来到了上海。帝国主义分子已经从革命浪潮高涨造成的震荡中缓过神来，竭

力收回被夺去的东西，弥补疏忽的行动。就在这时，上海市警察和白俄侨民闯进了远东银行驻地。他们搜查房间，翻遍了保险柜，长达6—7个小时。与此同时，上海法租界的几个苏联机构也遭到袭击和搜查……我们一踏上上海的土地，一个警官，看来是个英国人，就在一位白俄侨民翻译的陪同下拦住我。正如后来了解的那样，他就是臭名昭著的皮克，确切地说是什皮克*。他的头发淡黄，恶病体质，面孔苍白，一双小小的贼眼滴溜溜乱转。这么一位年轻人一段时间里竟然在M.M. 鲍罗廷的机关里做技术工作。皮克虽然曾被怀疑是奸细和英国特务，但是他却得以逃脱惩罚，藏匿上海。现在皮克已经向英国警察的间谍报告了我的姓名和我的职务等情。

虽然皮克在鲍罗廷手下干过一段时间，但是根据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的看法，他竟然把前军事顾问、后来的苏联驻北京代理武官维克托·彼得罗维奇·罗加乔夫和与他同姓的中国学家、鲍罗廷的会计师视为同一个人。罗杰·法利戈和雷米·考费尔在他们的合著《中国秘密机构》中也介绍了这位双重间谍——皮克“大尉”的活动情况。

科热夫尼科夫欺诈性的内心世界很快在中国“基地”上暴露无遗了。1928年，他与莫里斯·列维茨基和戈罗金共同找到一个中国富豪，这个中国富豪打算开一个赌场。科热夫尼科夫冒充上海市警察局刑侦处长（他受的戏剧教育派上了用场），列维茨基则冒充美国总领事馆的职员。科热夫尼科夫从这位中国企业家手中得到了1.5万美元的订金，分给与他狼狈为奸的同伙每人一笔小钱，还骗他们，他得到的钱比预料的少得多，随后就去奉天。一年后，他回到上海就被捕了，并被判处监禁几个月。不过，他的灾难并没有到此为止。他一出监牢就恢复了同外国一些情报机关的联系，以某个情报机关间谍和为

* 在俄语中，“皮克”这个姓与“什皮克”（密探、特务）形似音近，故有此说。——译者注

中国军队效劳的俄侨招募者的身份，同中国外交部挂上了钩。他和老搭档列维茨基又一起干了一桩冒险的勾当。他们冒充德军军官，科热夫尼科夫称自己为 K. 克吕格上尉，列维茨基则称自己是列维茨少校。他们开始为中国国民政府购买走私武器进行谈判，价值约达 200 万美元。卷入这桩冒险勾当的还有另外几个人。其中一位是英国投机商 R.K. 拉斐尔，另一位是应该为这笔买卖提供资金的中国富商，科热夫尼科夫从他手里骗走了 7 万美元。然而，这桩冒险交易很快就暴露了，他再次被捕。他在法庭上否认自己的罪行，把一切都推到早就被怀疑做走私生意、把武器卖给中国共产党人的拉斐尔头上。科热夫尼科夫及其同谋者被判处监禁。但是，他还是没有就此止步。科热夫尼科夫-皮克的下一桩壮举是勒索和讹诈。现在他勾搭上了一个叫阿道夫·博蒙特的家伙，此人冒充为一个出生于罗马尼亚的比利时人，其真实姓名是伊兹赖列维奇。事情牵涉到一个身为公寓老板的美国女人肯尼迪及她的女情人阿尼娅·扎列夫斯卡娅。少女起诉女公寓老板，索要 1.8 万美元；这笔钱一收到，她就应该和博蒙特分掉。科热夫尼科夫编出某种理由，向扎列夫斯卡娅和博蒙特索要尚未得到的这笔钱的一部分。博蒙特拒绝给钱，科热夫尼科夫便声称他收集了搞臭其名誉的材料，并提交美国领事法庭检察官，但该检察官以博蒙特不是美国公民为由而拒绝受理。

据说，美国领事法庭的一个成员是同性恋者，败坏其名声的材料落到了科热夫尼科夫之手。科热夫尼科夫的讹诈导致这个美国法官自杀身亡。

皮克的下一行动展示了他那无法遏止的想像力。他假借潜伏苏联谍报员的名义，在《每日新闻》报上发表一篇文章，描述蒋介石的一位军事顾问德国上校的死亡秘情。据皮克称，英国情报机关建议德国上校为其效劳，但被他拒绝了。遭到拒绝的英国情报机关使用一条布满天花病毒的毛巾按在上校的脸。这位德国上校被送到上海一家隔离医院，死在那里。实际上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谁也不知道，但是，有一个德国军官，即中国蒋介石军队的顾问确实死在一家天花隔离医院了。

1926—1927年，R. 施塔尔曼⁹³受共产国际执委会派遣，到中国做秘密工作。

1927年，P.M. 希塔罗夫⁹⁴受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派遣，也在中国参与对中国共青团的审查工作。希塔罗夫在寄给中央的关于中国共青团工作的报告中附上了一段话，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中国共青团是靠苏联的钱建立的，苏联驻中国的代表们在1927年亲身经历了种种财务困难。他质问中央：

为什么你们连一笔薪水都不给我寄来？喝西北风过日子太难啦！我们只好乞讨为生，东借西借。钱的问题简直乱七八糟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因为直至昨天和前天，我们四个多月来才第一次收到了我们应该得到的钱的一小部分。你们自己可以想像到，这样缺钱对共青团的工作会有什么影响。我们度日如年，凡是有可能挪借的地方都挪借过了。各省这段时期一直都几乎分文未得，一些委员会干脆散伙了，大概是饥饿造成的。请代我为此向国际联络局及其局长致谢。

1927—1928年，国际联络局驻上海的代表由弗里德里希·费叶尔格尔德担任。⁹⁵

1928—1929年，国际联络局派到上海工作的是阿布拉莫维奇及其妻子埃莉维拉（她以前曾化名贝尔廷担任国际联络局驻上海的秘书）。

Я.М. 鲁德尼克（安里、诺乌连斯，据说他用过12个化名）受国际联络局的派遣，从1928年到1931年被捕之前在上海工作。在他被捕后，上海当局经过长时间国际查询，查明他就是那些年共产国际驻上海组织的领导人，当时他领导的组织编有9名欧洲人。他的职责是：向中国共产党转交经费，为共产国际使者和中共领导人的重要会晤寻找安全地点，建立同莫斯科的信使联系和无线电联系，传递“莫斯科与中国之间的秘密材料”。这个小组还负责本组织的安全保卫工

作。鲁德尼克掌握约 15 间住房、办公室和秘密接头室。他在上海租了一个编号为 1062 号的邮箱，利用它收取一切需要的邮件。鲁德尼克手下有个格雷哈德·艾斯勒，其主要任务是向中国共产党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他仿佛是中共与莫斯科之间的情报交流渠道。艾斯勒应该向中央“提交涉及中国一切社会问题，包括工人运动问题的报告”。据上海市警察局的笔录，艾斯勒住在公共租界的翁格寿花园街 23 号亚历山大·冯·杜宁先生（警察局怀疑此人是苏联谍报员）的住宅里。R. 佐尔格在日本被捕后，在审讯过程中证实，“诺乌连斯冒充瑞士人，不过我不知道他真正的民族属性。我估计他是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人”。

1926 年的上海市区内除苏联总领事馆外，还驻有下列苏联组织机构：

苏联商务代表处分处，领导人是维格兰特。

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办事处，领导人是莱温。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 1921 年踏上国际舞台，当时苏俄还没有政府级的商务代表处，因而由该机构代表苏俄一方。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总办事处设在伦敦，上海办事处是它的分处。中央联社下辖泽列诺夫领导的苏联国营茶叶、咖啡、菊苣托拉斯管理局代表处。

全俄石油辛迪加办事处，领导人是前面已经提到的 3.H. 多谢尔。

上海远东银行是依据英国法律设在伦敦的苏联莫斯科人民银行的分行。行长为库尔斯，他是经验丰富的银行工作者，后来成为苏联国家银行领导人之一。苏联商船局、中东铁路、纺织品贸易公司也在上海派驻了代表。

该市还设有塔斯社分社，其代表是未曾受过中国学专业教育的巴尔斯基，为了工作他招收一些苏联中国学大学生。

1927 年，上海成立了“泛美和平”工会，由下列著名美国共产党员领导：埃尔·布劳德、盖哈特·艾斯勒、尤金·戴尼斯（即波尔·沃尔什）。该工会每年所需工资和情报活动经费 50 多万美元由驻哈巴罗夫斯克的远东边疆局提供。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情报机关诞生地，该情报机关尽可能同苏联情报机关进行了合作。

中国 1925—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出现了白色恐怖。成千上万的中国共产党人、进步民主人士被逮捕，身陷囹圄，许多人惨遭杀戮。据中国资料，到 1927 年 11 月前，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从 6 万人减少至约 1 万人。在地下工作条件下，决定更加严格保密，加强情报工作和反间谍活动。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 1927 年 5 月（一说是 11 月⁹⁶）决定成立直属中央机关的特务机构。于是，直属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特务工作处作为中央特科开始工作，由此前主持中国共产党军事委员会工作的周恩来领导这个处。后来该处改为特别委员会，其宗旨为保障地下党组织的安全，收集中国辖区和外国租界内国民党警察和保密机关及西方各国特工机关的情报。中央特科的任务是：与社会各阶层中国共产党的同情者建立联系，同奸细和叛徒作斗争，监视秘密接头地点，建立全国各级党组织之间的联系。1928 年在莫斯科郊外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赞同建立特科，周恩来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起了积极作用。

1928 年 5 月初，周恩来以古董商的身份作掩护，经大连、长春、吉林和哈尔滨前往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的工作。他在 1928 年 5 月 16 日到莫斯科后，就投入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6 月 7 日，他会见了一些苏联军事活动家，同他们讨论建立中国红军的问题，以及中国红军的组织结构和政治教育工作组织，看来当时还讨论了建立特别情报处的问题。1928 年 6 月 9 日，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等人受到联共（布）中央总书记斯大林的接见。斯大林在同他们谈话时指出，中国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最重要的成果是建立中国红军。

据 C. Д. 齐赫文斯基院士回忆，中共六大通过决议，依照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模式，“建立由向忠发、周恩来和顾顺章组成的反间谍委员会”。这三个人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曾担任 M. 鲍罗廷的私人警卫。

1928 年 7 月 3 日，周恩来在中共六大作了《关于军事工作的报

告》。他富有自我批评精神地指出：我们的主要错误在于，我们不懂得我们党在军队中的基本任务，不懂得这项工作的宗旨。当时处于所谓统一战线时期，我们不懂得，在这个统一战线中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夺取革命的领导权，要实现这一任务，就不能不夺取军权，不能不建立无产阶级的武装力量。

选举党的领导机关后，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周恩来于1928年7月20日被批准担任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兼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伍豪（周恩来的化名之一）同时还被任命为特科领导人。还在六大召开之前，周恩来就是中央组织部的成员，1928年1月10日被任命为该部领导人。

中央特科由四个科组成。第一科（即总部）实施总领导，协调其他各科的工作，由伍豪直接指挥。第二科的任务是收集情报及在国民党内开展侦察活动，由陈赓领导该科工作。（陈赓为1924年黄埔军校的首届毕业生，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1925年的东征和1926—1927年的北伐。据有些资料，他曾在苏联受过专门训练。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后，他在南征时身负重伤，左腿骨折。痊愈后接受党的任务——领导特科第二科的工作）第二科人员由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三人负责选拔。除这三个人外，在第二科工作的还有：陈寿昌、陈养山、刘鼎、柯麟、贺诚。这个科派人打入国民党机构内部，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时各省也建立了中共特别委员会。例如，1927年鄂南中共特委、1928年赣北中共特委的书记先后由中共湖南省军事委员会委员吴德峰担任；1927—1928年湘东中共特委和1928—1930年苏区中共特委的书记则是滕代远。

1927年底，上海法租界的侦探中出现了一个叫王庸的年轻人，一些高级机关给了他很好的评语。他出没于上海各秘密机关和法租界警察部门，大家都尊称他为“王先生”。一天，有共产党员参加会议的一家剧院被国民党特务和法租界警察包围。王庸也参与了这次搜捕。他努力得到了让他把守一个出口的任务，借机向自己的同志发出了信号。同志们趁忙乱跑到街上，藏在人群里。此后由于担心暴露，

王庸不再在侦探中出现，而转入十分隐蔽的地下活动。敌人不久查明，原来这是陈赓以王庸之名进行潜伏。

第三科对保卫地下组织及其干部的特务队的行动以及镇压暗探、奸细和叛徒实行领导，其负责人是顾顺章。他来自江苏省*，起先当钳工，后来在卷烟厂当工长。他作为杰出的魔术师，常常在著名的上海大世界游艺场演出节目，弹无虚发地表演射击，还精通武术套路。1927年，顾顺章参加了上海三次起义，指挥武装工人队伍，受到工人人们的敬重，在街垒战斗中相当善战。1927年4月12日反革命政变后，顾顺章来到武汉，同奸细和叛徒展开斗争。1927年8月，他又返回上海。他指挥“红队”战士作战，同志们称他为“中国的卡莫”**、“神奇的勇士”。伍豪和陈赓直接监督顾顺章的行动。1931年4月25日，由于原纺织工人王竹樵的告密，他在汉口被国民党警察逮捕。他在第一次审讯中就开始招供。由于他掌握上海及其他城市里中共中央机关的秘密接头地点和住址，以及同苏区的联系和无线电通讯手段，成了国民党暗探局珍贵的猎物。他供出了中央的秘密接头地点、被捕但尚未被认出来的中共领导人的姓名，其中就有恽代英。正是由于顾顺章的叛变，恽代英于1931年4月29日被枪杀。

根据国民党侦探机关（“调查科”）档案馆公布的资料，只是靠了在国民党侦探机关负责岗位上工作的一个共产党员扣压了发自武汉的顾顺章的情报，并及时将此情报告中共中央，在上海的中共领导人才没有被捕。

特科第四科负责传递情报（包括进行无线电通讯）。该科领导人是吴铁铮（即吴德峰）。吴德峰1896年生于湖北省。1914—1918年就读于武汉市内的湖北师范学校，积极参加了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1924年由董必武和陈潭秋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

* 据张云所著《潘汉年传奇》（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一书资料，顾顺章“是上海宝山县白杨人”。——译者注

** 卡莫（捷尔-彼得罗相）（1882—1922），俄国革命活动家。俄共党员。在组织地下印刷、交通、筹集资金和武器等方面具有特殊才能。1917—1920年在俄国南部和高加索地区组织游击和地下活动。——译者注

9月，在中共武汉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党的区委委员兼军事委员会书记。1925年加入国民党，并在湖北省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省执行委员会委员。在不同时期先后领导工人部和贸易人员部。1926年冬由邓演达推荐，担任武汉市社会安全部门负责人。统一战线破裂时期，为了使中共各级组织及其领导人免遭破坏和迫害，保障工人积极分子和进步社会活动家的安全，他做了许多工作。

吴铁铮建立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多种形式的通讯联络。只有在第四科工作人员帮助下，中共党员才能找到秘密接头地点，与党组织建立联系。

特科是在武汉中央军事委员会直属特别部的基础上建立的，该部的领导人是伍豪、王一飞和聂荣臻。武汉发生政变后，特别部工作人员转移到上海。特科通过吸收上海武装义勇队的优秀代表，开始扩充队伍，这些优秀代表在1925年5月上海总罢工期间都是工人纠察队员。1927年上海无产阶级三次武装起义期间，他们都是上海革命工人赤卫队的骨干力量。据共产国际工作人员A.Γ.克雷莫夫（中国人）*的资料，这些赤卫队员都具有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他们组成了“红队”，人们称为“打狗队”。“红队”的任务是同奸细、叛徒、密探作斗争，保卫地下党组织和党的干部。

1928年3月中旬至4月中旬，周恩来按照中共领导的决定到了香港，大力营救党和工会的著名领袖邓中夏出狱。

1929年8月24日，中央军事委员会正在开会，警察根据叛徒的告密闯进了上海市西区新闻路的一幢秘密住宅。所有与会者全被逮捕，其中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农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军事部长彭湃，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共中央军事部长杨殷，军事部秘书白鑫，江苏省委军事部负责人颜昌颐 and 邢士贞。出于纯粹偶然的原因，伍豪没有出席那天的会议。这次搜捕行动由范争波领导，他是国民党上海市委委员，与陈立夫关系密切，他还是上海安

* 中国姓名为郭绍堂。——译者注

全处监察员。中共武装营救被捕人员的尝试遭到失败。国民党分子进行装腔作势的法院审理之后几天，就杀害了这些被捕的中共领导人。

8月31日，周恩来就彭湃和其他同志被杀害事件写了一篇中共呼吁书。

陈赓在国民党反间谍机关中有自己的人，他就是杨登瀛。杨生于广东，曾留学日本，与一些共产党员相识，坚持进步思想。国共合作时期，杨登瀛在国民党特种部队由陈赓指挥的分队工作。国共合作破裂后，杨登瀛留下来做原来的工作，颇受国民党反间谍机关首领陈立夫、张道藩、徐恩曾的信任。1928年10月，陈立夫任命杨登瀛为驻上海特派员。国民党特工机关的所有情报都须经过他的手。他负责处理一切最重要的问题，同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保持密切联系，而且还与公共租界巡捕房政治处的西探长英国人兰普顿保持良好关系，得到他的完全信任。陈赓经杨登瀛之手把自己的几个人安插进上海国民党秘密警察机关。这样他实际上奠定了在上海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建立党的反间谍系统的基础。他借助于杨登瀛，获悉白鑫已经叛变，供出了秘密接头地点。同时查明，白鑫是范争波的同乡，与范保持联系，帮助范实施了逮捕中央军事委员会成员的行动。白鑫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在共产党员叶挺指挥的第24师担任教导营党代表。他还参加了彭湃领导的海陆丰苏维埃运动。1929年，白鑫被派到上海中央军委工作。他掌握许多秘密材料，知道中央军委成员的秘密接头暗号和地址。中央特科获悉他叛变后，向所有可能成为他叛变牺牲品的同志发出了警告。特科决定对他判处死刑。1929年11月11日执行了这一判决。A.Γ.克雷莫夫在其回忆录中对此事作了详细描写。同时被处决的还有范争波。

共产党人建立了同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各省委进行联络的秘密无线电台。1928年中共决定建立两座秘密无线电台（一在上海，一在香港，与各地方党组织联络），培养自己的无线电报务员。两座无线电台自1930年1月起开始工作。

为了同共产党人进行更加有效的斗争，美国特工机关让自己的间

谍鲁斯当上了公共租界巡捕房政治处处长。然而，中共中央特科同鲁斯的秘书葛巴华建立了联系，通过他获得有用的情报，每月付给他500元服务费。此外，特科在法租界暗探中安插了两位自己的谍报员，他们为共产党人提供的帮助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1927年下半年，白鑫被除掉后，直属第三科的40人左右的“红队”便成为叛徒、奸细以及国民党反间谍机关畏惧的力量了。这支队伍的装备不错：有手枪、催泪瓦斯手榴弹，还有冲锋枪甚至机关枪。“红队”还有轿车、摩托车和许多带有假牌号的自行车。由于上海市街道狭窄，人口稠密，所以自行车是这个城市里最方便最便于机动的交通工具。危险时刻干脆把自行车扔掉。“红队”同特科第一科、第二科密切配合行动。例如，召开会议时，第一科人员负责寻找合适地点，第二科人员负责保障会议地点的安全，监视特务的行动，第三科战士则负责保卫工作：他们装扮成街头小商贩或送报人，出没在房子四周，密切注视周围的情况。在残酷的恐怖条件下召开工作会议、中央全会、代表会议，是非常复杂而困难的事，但要查清隐藏在中共队伍里的奸细和叛徒，则要复杂得多。例如，1928年4月，特科就未能防止敌人逮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罗亦农⁹⁷。当时杨登瀛还没有被任命为上海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负责人。但是，特科还是通过打进公共租界警察局的谍报员知悉，出卖罗亦农的奸细是何家兴及其妻子何芝华。1926年他们曾就读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何家兴由法国来到莫斯科，何芝华则来自德国。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后，何家兴成了罗亦农的私人秘书，知道中央负责人员的许多秘密接头暗号和地址。他叛变后与西方秘密机关的间谍进行秘密联络，同公共租界警察局长助理谈判。由于出卖中央领导人的笔记及他们的地址，他获得了2万美元及自己和妻子的出国护照。他供出的第一个人便是罗亦农。1928年4月15日上午10时，罗亦农走出何家兴的住宅前往公共租界戈登街（这条街上有组织的秘密接头地点）时被警察逮捕。特科做了各种营救罗亦农的尝试，但都未能成功，因为未经审讯和调查，罗亦农就于1928年4月21日在上海西郊被提前枪杀。

特科现在面临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消灭叛徒何家兴夫妇。经过例行的检查并获得这对夫妇叛变的新证据之后，“红队”在陈赓的指挥下于清晨冲入他们居住的旅馆房间，击毙了何家兴。其藏在床底下的妻子受了重伤，一只眼被打瞎。为了掩护这次行动，旅馆附近有一群半大孩子在“玩耍”，燃放小炮仗和烟花，压住了阵阵射击声。

1927年12月，中共决定派一些忠诚而勇敢的共产党员打进国民党和外国租界的特工机关。伍豪、陈赓派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底打入国民党反间谍最高机关。依靠钱壮飞同徐恩曾的私人关系，这一行动得以顺利实施。徐恩曾是陈立夫的表兄弟（姨表），是陈最信赖的人，负责情报与反间谍事务。徐恩曾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曾在美国研究无线电技术。1928年初，他在陈立夫（过去曾任浙江省电报管理局局长）领导的建设委员会无线电通讯局工作。当时陈立夫已经是国民党的领袖之一，牢牢控制着特工机关的一切事务。

1928年夏季，徐恩曾创办了无线电报务员训练班，受训者中就有钱壮飞。

陈立夫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调查科科长。该科于1928年2月成立，负责收集情报，调查国民党内部的派别斗争。自1929年冬季起，由于苏维埃运动加强和共产党势力壮大，蒋介石命令陈立夫及其调查科首先研究同“赤色危险”作斗争的问题。从那时起该科就成为收集情报、实施破坏活动、物色和派遣奸细打入中共队伍并对他们的行动实施领导的中央机关。它还对被捕的共产党员实施侦察。

中共领导在钱壮飞站稳脚跟之后，决定再派遣另一位可靠而勇敢的中共党员李克农打入国民党反间谍机关。他同钱壮飞相识有一个故事。1928年李克农躲过了敌人的追捕，和伍豪一起来到上海。1929年11月，担任上海沪中区宣传鼓动处主任的李克农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摄影棚里与钱壮飞偶然相识。钱壮飞建议把李克农安插到无线电技术与无线电通讯局担任无线电广播新闻节目编辑。为此必须进行考试。李克农经过认真准备，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考试。1929年12月，他被录用担任上述职务。

1929年12月底，徐恩曾晋升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总务科科长兼调查科科长。有一次他告诉钱壮飞，为了加强反共斗争，拟对特工系统进行扩充，该计划规定要训练奸细并将他们秘密派到共产党队伍中，还规定对叛徒进行再培训和使用。他想在这些问题上利用钱壮飞，钱壮飞表示同意。

徐恩曾遵照陈立夫的命令，着手在长江谷地及南京政府的整个势力范围内建立特别惩罚机关的完整系统。为了领导针对中共、一切反对党和集团的情报工作和破坏活动，南京建立了行动司令部和一座秘密无线电台。徐恩曾任命钱壮飞担任他在这个秘密部门最高机关的私人机要秘书。钱壮飞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完成秘密情报任务而建立合法的通讯社网。于是南京出现了一个民智通讯社，社长就是胡底。中共的谍报员顺利弄到了国民党情报机关的密码，交给了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

传递有用情报的程序是这样的：钱壮飞从南京将情报发给上海的李克农，李与陈赓保持不间断的联络，陈赓则把一切情况报告伍豪和中央。

共产党人这样的行动迫使国民党当局更加周密地组织和加强自己的情报机关。1931年12月底，蒋介石决定建立以戴笠为首的新情报机构，即所谓的“十人团”——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联络组。蒋介石于1934年正式任命戴笠为调查科主任，他还领导国民党军事情报机关和军事反间谍机关。

《大阪朝日新闻》编辑部日本记者尾崎秀实⁹⁸从1928年11月起落户于上海。此人精通汉语和英语，过了两年，他成为里哈德·佐尔格的朋友。

1929年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通信部门的无线电报务员马克斯·克劳森前来加入即将成立的佐尔格小组。起初克劳森来到哈尔滨，在“摩登”旅馆里会晤了苏联驻哈尔滨的谍报负责人。随后他到了上海，立即同康斯坦丁·米申接上关系，就在米申的修理铺里，克劳森组装了一部大功率便携式无线电台。以后佐尔格借助于克劳森的无线电发报机，经常不断地往“威斯巴登”电台（哈巴罗夫斯克郊

区一座大功率无线电台的代号)发送情报。

没过多久,克劳森从米申在上海的住宅搬到一所公寓里,偶然遇到孀妇安娜·瓦莱纽斯,并娶她为妻。佐尔格来到上海后,克劳森便成为无线电通讯的负责人,而他的妻子则成了负责收取东京发到香港的微型胶片的通信员。K.米申后来的命运如何不得而知。

1929年夏,周恩来利用上海一家医院建立了适于党的领导人会晤的可靠的秘密地点。他还在上海秘密举办了几期军事和政治干部训练班,结业的学员于当年9月就被分派到各个苏区传授经验。

1931年5月,20岁的潘汉年被调到中共中央特科担任领导工作,一直工作到1933年,此前他担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潘汉年担任负责收集情报的二科代科长,完全转入地下活动。他最常用的代号之一是“小开”。和他一起工作的活动家有李一氓、夏衍、杨度、姚蓬子、梅龚彬。他有好几次差点被捕,但他都能化险为夷。

例如有一次,他在回到自己的家门口时,发现有人在跟踪他,这时折回已经来不及了,便大步跨入门内,高叫妻子的名字:“许玉文!许玉文!我的肚子饿极了,快弄碗蛋炒饭给我吃。”一面却疾步登上3楼的阳台,拿出事先为应变准备好的大洋伞,跳到邻居的阳台上,跑了。

又有一次,他在马路上行走时,突然发现有几个形迹可疑的人盯他的梢。他立即从容地走进一家饭店,似乎是在寻找座位。一会儿,有两个盯梢的人,也跟进了这家饭店。他灵机一动,沉着地走进饭店里面的厨房,脱下笔挺的西装,换上厨师的工作服,戴上口罩,还顺手提上一个送饭的盒子,从容地走出饭店的大门,扬长而去。

对中国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的镇压,从30年代初起更加变本加厉了。

1931年6月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法租界刚刚走出楼房,打算叫出租车时被捕。不过追捕他的却是法国巡捕,因为当时不允许国民党在租界区进行类似活动。中共中央一获悉向忠发被捕就作出决定,特科应当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营救他。当时决定贿赂法国巡捕,不让他们把向忠发引渡给中国地方当局。然而,这一行动

未获成功，没过多久他就被枪杀了。同向忠发一起被捕的还有中央机关和江苏省委的几位工作人员。1931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人员罗启元、袁宝安及负责散发党的文件、报刊和管理印刷的大约20名共产党员被逮捕；8月又有中央特科卫队领导人王世德被捕。1931年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中共党员林祖涵、吴玉章和谢觉哉被捕。由于对法国巡捕房进行了成功的贿赂，他们未被引渡给国民党而得救，悄悄地前往苏区。一次接一次的挫折及共产党员受到严密监视，对地下工作和上海党的领导机关的处境造成了极其困难的条件。这些挫折和逮捕事件令中共领导和莫斯科十分不安。于是就产生了如何适应中国当时的新形势，调整特科工作的问题。

5. 驻广州的顾问和谍报机关

共产国际从1920年起就与国民党建立了直接的联系。1920—1921年，共产国际的使者Г.Н. 维经斯基、Г. 马林、K.H. 索科洛夫-斯塔霍夫会见了孙中山和其他国民党领袖人物。根据现存的工作报告判断，同国民党代表人物多次会见的总印象令人满意，双方对保持经常联系和交换情报表现了兴趣。为了达到这些目的，1920年8月，K.A. 斯托亚诺维奇以远东通讯社和俄罗斯通讯社（1921年正式开办）记者的名义前往广州。这两家俄国的通讯社把华南的情况介绍给苏俄人士，向孙中山和华南报刊提供俄国消息。

青年共产国际及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C.A. 达林于1922年4月22日在广州会见了斯托亚诺维奇。顺便说，他几乎是在那些年间访问中国的许多人中惟一在回忆录中谈到斯托亚诺维奇情况的人。他这样描写自己同斯托亚诺维奇的会见情况：

起初我到了东山（广州的一个区，“二等”欧洲人住在该区——作者注）。远东通讯社记者K.A. 斯托亚诺维奇就住在这里……斯托亚诺维奇作为一个未被承认的国家的代表，当然和自己一家人一起住在东山。斯托亚诺维奇高高的

个子，蓄着大胡子，和蔼可亲，永远准备帮助他人，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在远东通讯社惟一的同事是来自当时法属印度支那的一位棕黄色头发的越南人。他会说法语，懂汉语，了解中国南部的政治生活。我从斯托亚诺维奇那里听到了令我震惊的有关南方形势的最早消息。无论是孙中山本人，还是他的政府，都被描绘得十分阴暗。照斯托亚诺维奇说来，孙中山政府实行敌视工人阶级的政策。他把孙中山的战友都说成支持美国的军阀。斯托亚诺维奇完全同情陈炯明（将军，广东省省长，投靠英国；1925年其军队被国民党军队打垮——作者注），此人似乎支持工人运动，亲近广州的共产党组织……后来斯托亚诺维奇改变了观点，工作上与我联系……他的立场显然是某些人观点的反映。究竟是哪些人的观点，我还不知道。

1922年年中，斯托亚诺维奇离开广州去上海，当上了苏联领事馆的秘书。

在俄罗斯通讯社的协助下，广州创办了一所俄语学校。不言而喻，俄罗斯通讯社可以作为苏联情报机关的掩护，实际上已经这样做。

索科洛夫-斯塔霍夫在1921年4月21日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中十分坦率地谈到了共产国际同广州政府及孙中山的政党保持联系的基本目的：“我们可以把广州政府主要用作进行东方民族革命的武器，这种革命的结果将把中国推到与协约国为敌的阵营。”这篇呈送莫斯科的报告确认，国民党“坚持的纲领同我国社会革命党人的纲领有某些相似之处”，但该报告同时又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政党国民党的策略原则是模糊和矛盾的”。

1922年秋至1923年初，莫斯科显然作出最终决定：在实行对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政策时，应当依靠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马林在其1922年9月和10月给共产国际的几份工作报告中，表达了以下想法：国民党不但必须进行新的政党建设，而且必须进行新的军事建

设。看来，马林属于懂得在中国条件下国民党必须新的基础上进行军事建设的第一批人。1922年12月，马林再一次会见孙中山，后者对马林在谈话中向他转达的共产国际的两条建议表示赞同：第一，建立一个能够联合各阶层人民，首先是联合工人和农民的政党；第二，创建培养革命干部的军事学校。不过，孙中山当时没有答应马林提出的正式承认苏维埃俄国并与之联合的建议。看来之所以如此，不但因为他担心会使帝国主义加强对中国事务的干涉，而且因为他对帝国主义和军阀抱有幻想。孙中山可能获得帝国主义国家援助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由于没有得到向美国和加拿大请求派出的军事教官（为数不多的美国和加拿大军官表达了赴广州的愿望，但是他们的政府禁止他们为孙中山效劳），孙中山向德国和苏维埃俄国提出了同样的请求。他得到了几位德国志愿飞行员，但在武器援助方面遭到了拒绝。孙中山现在把获得他的政府所必需的顾问和武器援助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苏维埃俄国身上了。

孙中山秘密派遣廖仲恺赴日本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与陪同越飞的武官详细讨论俄罗斯联邦向国民党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一次又一次的谈判是1922年9—11月在东京举行的。廖仲恺与苏俄武官讨论了同俄国加强军事联系的问题。

1923年初，在莫斯科对中国的政策中，最后确定了支持国民党的路线。1923年1月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赞成外交人民委员部提出的大力支持国民党的建议，命令外交人民委员部和俄共（布）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孙中山1923年1月同越飞会晤时称，他计划在最近改革军队和国民党，准备实施在苏维埃俄国帮助下策划好的对北京反动军阀集团的讨伐（北伐）。其中一个方案是从华南革命根据地实施北伐，要求苏俄自满洲方向采取军事行动。但是，他既缺乏足够的资金（他希望从苏联得到200万墨西哥元⁹⁹），又没有善于组建能够执行复杂任务的军队的专家。孙中山迫切希望得到苏联的资金和“顾问”援助。

从Л. 加拉罕1923年3月7日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斯大林的一封信看，莫斯科对孙中山提出的总体计划和越飞的各项建议都发

表示了否定性意见。加拉罕受苏联领导委托于 1923 年 3 月 21 日给越飞发去了指示，并做了如下说明：

现寄去就您在第 8 号来函中所提问题的指示副本。有关援助孙中山的计划与当初孙中山提出时及您附上自己的意见后转交我们时一样。您从这一指示中可以看到，这些计划未被采纳；但是，其中部分是可以接受的，本指示准确地表达了目前我们准备提供的援助的性质和规模。

1923 年 4 月 22 日，加拉罕给在中国的 Я. 达夫强寄了包含如下内容的一封信：

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同南方保持经常不断的联系，以便熟知当地力量对比的各种变化。既然我们越来越重视孙中山，既然我们要向他提供意义深远的援助，那么对于我们来说，特别重要的是要同孙中山保持经常的接触，不但要从孙中山本人的讲话和通过其谍报员所获得的情报了解他在其统治区内的军事情况，而且还要通过我们的谍报员和代表直接了解这些情况。

1923 年 5 月 1 日，苏联政府致电孙中山，表示苏联愿意向中国提供必要的援助。最重要的援助形式是向中国派遣志愿者——军事顾问、政治顾问及其他顾问。仅在 1924—1927 年间，苏联领导就向中国派遣了 135 名顾问，其中 40 名被派到冯玉祥的国民军中。

1923 年 8 月 2 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根据斯大林的建议通过决议：任命 M.M. 鲍罗廷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该决议的第二条指出：

责成鲍罗廷同志在与孙中山一起工作时，以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为行动准则，绝对不能醉心于向中国灌输共产

主义。

看来此处考虑了孙中山与越飞 1923 年 1 月 26 日公报第 1 条的内容。从《真理报》和《消息报》1923 年首次发表该公报起，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该条在苏联文献中基本上没有提起。其中指出：

孙中山博士认为，目前在中国尚不可能实行共产主义制度甚至苏维埃制度，因为中国不存在顺利确立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所必需的那些条件。俄罗斯联邦全权代表完全赞同一种观点……

1923 年 9 月 2 日，以中国南方政府军大本营参谋长蒋介石为团长的军事代表团从中国抵达莫斯科，代表团成员有沈定一将军、新闻记者王登云及张太雷。代表团在苏联逗留了 3 个月左右，接见他们的苏联领导人有 М.И. 加里宁*、Г.В. 契切林**、俄共（布）中央书记 Я.Э. 鲁祖塔克、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Э.М. 斯克良斯基、红军总司令 С.С. 加米涅夫、教育人民委员 А.В. 卢那察尔斯基、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Л.Д. 托洛茨基。

1923 年 9 月 9 日，在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接见中国军事代表团时，蒋介石陈述了代表团来莫斯科访问的主要目的：

一、代表团希望革命军事委员会尽可能多地向中国南方派遣人员，以便按红军模式训练中国军队。

二、代表团希望革命军事委员会给予孙中山的代表们了解红军的机会。

三、代表团请求共同讨论中国的军事行动计划。

* 加里宁（1875—1946）当时担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38—1946 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译者注

** 契切林（1872—1936）在 1918—1930 年间担任外交人民委员。——译者注

对于前两件事，从斯克良斯基的答复来看，苏方做成这两件事毫无难处，实际上已经将一定数量的苏联顾问派到了中国南方。但是，鉴于苏联不具备大量熟悉中国和通晓中文的干部，所以不可能向中国南方派遣大量军事领导人。因此，斯克良斯基建议在苏联开办训练中国人的专门的军事学校。在军事院校就学的中国学员人数问题，将取决于“革命军事委员会为达到上述目的能得到多少资金”。中国代表团第二次会见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时，被告知：革命军事委员会“认为可以将中国同志派往俄罗斯，分配到各军事院校”。其中去总参军事学院 3—7 人，去各军事学校 30—50 人。

加拉罕 1923 年 9 月 23 日致函孙中山，向他介绍 M.M. 鲍罗廷：

鲍罗廷同志是参加俄国革命运动多年的我党资格最老的党员之一。请您不但把鲍罗廷同志视为政府代表，而且视为我的私人代表，您可以像和我一样和他友好交谈。

1923 年 8 月初，39 岁的鲍罗廷和加拉罕一起前往中国。9 月 2 日他们抵达北京。起初鲍罗廷先到东北同张作霖谈话，而后南下北京和上海。鲍罗廷在上海苏联领事馆内见到了斯托亚诺维奇。鲍罗廷得知他曾在广州长期住过，而且看来从自己被正式任命为孙中山的顾问后同维经斯基和达林的谈话中想起了这个名字，同时又看重他了解中国的情况，便决定让斯托亚诺维奇加入他的顾问团。这一点记在斯托亚诺维奇的《琐事录》中：

鲍罗廷、格尔曼和波利亚克顾问团到上海。我暂时调任鲍罗廷同志顾问团的新闻处负责人。重返广州。就接待鲍罗廷同志事宜同孙中山进行政治谈判。恢复老关系。介绍鲍罗廷同志与各工人组织领导人认识。

1923 年 9 月 29 日，鲍罗廷乘小船离上海赴广东，于 10 月 6 日抵达广州。苏联政治与军事顾问团应该参与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将其

改造成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联合政党及反帝统一战线机关。不言而喻，选拔这些顾问通过以下几个渠道：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情报总局、共产国际各机构。A.И. 切列帕诺夫在其《札记》中确认了这一点，当时 A.И. 黑克尔带他们——四位军事学院的学员到工农红军司令部，让 Я.К. 别尔津“相亲”，于是他们的命运就决定了，远赴中国。顾问就是各种情报及从现场探听到的事件真相的提供者。有一份秘密的专门文件责成顾问们在当地履行一定的情报职能。这份文件的名称为《驻中国军事顾问与情报部的关系细则》，是在北京苏联大使馆被侵占时抄走的。这份文件严格规定了驻中国军事顾问的活动。由于文件很重要，现在几乎全文引用如下：

一、每位教官的职责是：

（一）竭尽所能，了解所在军队的军事组织与实力及敌军情况；

（二）按照情报部谍报负责人的专门计划，经常而系统地收集这些军队的准确和最新的情报；

（三）将所获情报交给负责向情报部呈报的人员；

（四）对负责向情报部呈报的人员随时给予各种帮助。

二、按照细则规定，他们通常不做秘密谍报员的工作，也不参与这样的工作，但他们有责任指明可以被情报部“间谍机关”用作秘密谍报员的人员，并在严守保密规则的情况下，对这些人员的代表继续给予某些帮助。

三、教官应获得、并通过上级情报部谍报负责人转发一切正式的条令、细则、法律、预算方案、军事政治与军事经济图书、杂志、地图、火炮技术鉴定等，只要这些材料发表，或者对现有的这类文件补充了新的内容。同时应该指明修改内容及新旧出版物之间的不同点。

四、教官应利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了解军事技术设备、武器装备等领域内一切新的军事技术发明和改进（变种）；并将这些情报呈报上级领导人，同时提供详细说明材料、照

片、草图，尽可能提供样品。

五、新建的“地方谍报机关”应与当地部队或地区的上级教官接触，与其保持密切联系，相互交换情报。

六、教官以下列方式开展情报工作：

(一) 教官应写详细的日记，记录自己所做的一切、会见的所有人员、进行的所有谈话和留下的印象；

(二) 教官对于自己部队和敌军的情况，以及对于各种军事集团的总体形势、相互关系及其同外国人的关系，应写出简要说明材料（提纲）和报告（每月至少1次）。同时还应报告自己对所有问题，包括这些问题对军事实力的加强或削弱有何影响的想法；

(三) 教官只要获得和积累了军事统计性质和地理性质的情报，就应立即写出报告，哪怕写出未作适当加工的材料和原始材料（每3个月至少1次），并附有所在军队占领的地区（省份）及相邻省份的详细说明材料，同时要特别关注交通线（铁路结构、道路情况说明和概述）；

(四) 教官应定期提供有关该地区农民革命运动（土匪和“红枪会”活动等）及各资产阶级组织（军队秘密势力）等情况的简要报告（每月至少1次）；

(五) 教官应提供有关其所在军队的和敌军的特务组织（领导机关、领导人、网络、工作）情况及反间谍工作的专门报告；

(六) 教官应将自己同各种人——中国人和外国人的一切正式谈话以工作报告形式记录下来。

七、教官通过自己的顾问团首长（地方部队或地区的上级军官）发送所有这类报告和通报，后者将这些情报转给当地的谍报负责人进行综合整理。如果没有时间这样做，则将情报发往驻北京的武官（驻中国情报机关的中心官邸）。

八、购买条令、地图、样品等物品的经费由情报部负担。不过教官应当先取得谍报负责人的同意。教官只有在其

样品能够免费获得的情况下，才可不经事先批准邮寄。

1926年9月6日

于北京

长期研究布柳赫尔生平的俄罗斯历史学家兼中国学家 A.И. 卡尔图诺娃证明了这份文件的真实性，她在我们的档案库里找到了该细则的草案，并准备公诸于众。

1923年夏，第一个苏联军事专家团被派往中国南方，他们是工农红军总参谋部军事学院的五位学员：Я.Г. 格尔曼（1896—1938）¹⁰⁰、B.Я. 波利亚克、A.И. 切列帕诺夫、H.A. 捷列沙托夫、П.И. 斯莫连采夫（斯莫连采夫于1925—1928年在工农红军司令部情报部工作）。

1924年4月16日，鲍罗廷和加拉罕致电莫斯科：

一、必须向广州派遣一个由50名积极的军事工作人员组成的顾问团。

二、委任一位富有作战经验并且能够受到孙中山敬重的同志领导该团。

1924年10月初，B.K. 布柳赫尔（加伦）作为顾问团长来到广州（代替牺牲的 П.А. 巴甫洛夫）。与其同时来到广州的其他军事专家和政治工作人员有：T.A. 别夏斯诺夫（1893—1947，炮兵顾问）、B.П. 罗加乔夫（1892年生，毕业于工农红军军事学院，1925—1926年为广州中国南方军事顾问团副团长，1926—1927年为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助理，以后在工农红军机关工作）、Г.И. 吉列夫（广州顾问团军事顾问，任教于黄埔军校，作为炮兵顾问参加了广东战役）、M.Я. 格米拉（1900年生，基辅军校毕业生，列宁格勒大学语言文学系学员）、И.Я. 泽涅克（1898—1937）¹⁰¹、Ф.Г. 马采利克（1895—1938）¹⁰²、И.И. 西尔伯特¹⁰³、Я. 波洛（1896—？）、A.И.

切列帕诺夫 (1896—?)、П.И. 斯米尔诺夫 (斯韦特洛夫斯基, 海军顾问)、H.A. 舍瓦尔金 (普里贝列夫, 步兵顾问, 1892—?)、E.A. 雅科夫列夫 (工程兵顾问, 1880—1951)、列米 (Д. 乌格尔, 1895—1937)、M. 丘贝列娃 (萨赫诺夫斯卡娅-弗廖罗娃, 1897—1937)、M.Г. 斯涅戈夫 (斯韦托夫, 1893—?)、M.Φ. 库马宁 (济贡, 1897—?)、军事情报员 B.H. 帕纽科夫 (1895—1938)¹⁰⁴。顾问团副团长是 M.Г. 叶夫列莫夫 (1897—1942)¹⁰⁵。在鲍罗廷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过一段时间的有: 塔尔哈诺夫 (埃贝格, 1901—1938)¹⁰⁶, 他曾担任共青团总书记几年, 携妻子米尔卡·祖比叶托娃来到中国; E.C. 约尔克 (1900—1942)¹⁰⁷, 携妻子中国学家塔玛拉·弗拉基米罗夫娜离开列宁格勒东方学学院来到中国; M. 沃林 (真实姓名为 C.H. 别列尼基, 1896 年生, 是鲍罗廷机关的工作人员, 塔斯社驻广州记者, 1927—1929 年为中国科学研究所所长)。这些人曾一度出版过俄语杂志《广州》, 刊载总结驻中国顾问工作经验的文章。1927 年前该杂志共出版 10 期, 每期用手摇油印机印制几十册。

起初军长* П.А. 巴甫洛夫 (1892—1924)¹⁰⁸ 被任命为总军事顾问。1924 年 7 月 18 日, 他从广州到广东东南的石龙研究前线局势, 在东江由小舟换乘轮船时不幸牺牲。

按照孙中山的命令, 在广州为巴甫洛夫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孙中山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们陪同参加了葬礼, 并为巴甫洛夫致悼词。葬礼非常隆重。孙中山试图借此让那些拒绝援助他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明白, 他不怕帝国主义, 他的政府正同苏联建立一种特殊的信赖关系。孙中山致电苏联政府:

我为失去巴甫洛夫将军深感悲痛, 他是在中国争取自由的斗争中第一位为中国牺牲的俄国人……

孙中山政府请求苏联另派一位杰出的军事活动家接替过早牺牲的

* 巴甫洛夫来中国前, 在 1923 年 3 月被任命为苏军第 13 军军长。——译者注

巴甫洛夫。1924年8月2日，莫斯科决定派B.K.布柳赫尔（化名加伦）赴广州执行重要使命，担任中国南方苏联军事顾问团团团长。鲍罗廷十分关注莫斯科打算给他派什么人，当他获悉已经决定派布柳赫尔赴广州后，于1924年8月20日致函苏联驻北京全权代表加拉罕，对这一人选是否正确表示怀疑：

尽管布柳赫尔经验丰富，精力充沛，才能卓著，但他能否胜任，是我颇为忧虑的问题。我们应该牢记，广州的军事工作非同小可。胜任的人能做成很多事。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实践证明，布柳赫尔是胜任的，他在中国享有崇高的威信。

1924年8月，斯托亚诺维奇突然声称，鉴于健康状况，他应该离开驻广州的鲍罗廷顾问团去上海。虽然斯托亚诺维奇的健康状况确实不太好，他经常受胃疼的折磨，但是他离开广州很可能另有原因。据写斯托亚诺维奇传记的作者A.H.阿夫多宁看法，当时斯托亚诺维奇已经知道布柳赫尔要来担任总军事顾问的职务，而他国内战争期间在乌拉尔担任东方面军第2集团军司令员时，由于我们不知道的原因，曾撤了布柳赫尔的职。于是，布柳赫尔不得不与卡希林¹⁰⁹一起联合人数众多的武装游击队，向白匪军的后方实施富有传奇色彩的袭击，现在他却带着一身战功来到中国执行军事援助的任务了。与布柳赫尔相会不可能给斯托亚诺维奇带来任何好处，况且周围的人都不知道斯托亚诺维奇-雅科夫列夫的去，而布柳赫尔知道，并且可能揭开秘密。因此，在8月份，布柳赫尔抵达广州前几天，斯托亚诺维奇就转赴上海了。

1924年9月27日，布柳赫尔来到北京，几天后，前往广州，10月末才到达目的地。与布柳赫尔同行的有他的妻子加林娜·科利丘金娜，她在哈尔滨长大并在那里接受了中等教育，和卡扎宁是同学。

布柳赫尔同孙中山持续了几个小时的第一次谈话，是11月初在苏联军事教练舰“沃罗夫斯基号”上举行的。临近谈话结束时，孙中

山请求布柳赫尔：“请留下吧，请用自己的经验帮助我们的事业。我相信您，并且对您充满信心。”在第一阶段工作中，布柳赫尔主要致力于加强广州的防御和中国南方政府军队的建设。照武官 A. 黑克尔说来，无论是对待苏联军事工作人员，还是对待中国军事工作人员，布柳赫尔“一开始就成功采取了正确的行为准则”。

布柳赫尔到广州后，认真判断了业已形成的局势，随后在 1924 年 12 月 7 日致加拉罕的电报中作了结论：“仅仅依靠工农运动和进步商人，要保持我们对广州的影响，希望渺茫。在长时期内决定广州命运的基本力量是军事力量。”他认为，必须“紧急完成蒋介石师的组建，创建广州军队的坚强核心，为此，最近几个月内需要我们提供重大援助”。他在这里指的是“大量集中的军事援助”。在已经提到的这份电报中，布柳赫尔提出了组建蒋介石师和广州军队坚强核心所需要的武器弹药和其他军事技术装备及资金的清单。电报中甚至还指明了他要求提供的武器的存放地点。

加拉罕对 1924 年 12 月 20 日收到的电报作出了积极反应，他给契切林写信说：

寄去布柳赫尔的电报。我完全同意他的请求，并请军事部门支持他的请求。我希望，莫斯科任何人都不会怀疑，我们在这里不是白白提供援助，它的效果现在已经很显著。我们应该继续大力援助。

为数 1 万枝步枪的第一批武器于 1924 年 10 月由“沃罗夫斯基”号轮船运到广州。这批武器原是为黄埔军校和组建广州政府军队第一个突击师提供的。后来苏联又继续不断地提供武器。据军事顾问 A. Я. 卡利亚金回忆，仅在 1926 年 10 月，莫斯科就提供了 24 架飞机、157 门野炮、48 门山炮、128 门迫击炮、295 挺重机枪、73993 枝步枪、11 万枚手榴弹、1.24 亿发步枪子弹、5 万发炮弹、500 普

特*火药。根据卡利亚金的资料，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符合当时的最高标准，具备优异的技术性能，在许多方面超过了军阀部队的同类武器。比方说，中国各军阀部队在那些年根本没有飞机，刚刚开始学会使用重机枪。同时一艘艘轮船满载汽油、煤油、重油、煤炭、木材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巴统运至广州。苏联政府还向广州政府贷款 1000 万元用以开办中央银行。

1924 年 10 月布柳赫尔抵达广州，只和鲍罗廷共事了两个星期，之后鲍罗廷就北上了。当他 1925 年 5 月下半月回到广州时，他与布柳赫尔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更加紧张了。正如 Г. 斯卡洛夫所叙述的那样，鲍罗廷回到广州后，不但把政治顾问团的一切工作，而且把军事顾问团的一切工作都置于自己直接领导之下。两个总顾问之间的摩擦发展成为不可调和的矛盾，布柳赫尔被迫前往北京，后又归国治病。这些情况得到了顾问 A. 赫梅廖夫的证实。他在其 1925 年 10 月广州之行的报告中说：“加伦时期，特别是在他负责领导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时期，所有领导权都集中在他一个人的手里。鲍罗廷回来后，曾尝试在他与布柳赫之间进行分工。但是这样的尝试没有取得积极的效果”。赫梅廖夫认为，广州已经建立了“鲍罗廷同志的个人独裁”。

我同他（鲍罗廷——作者注）谈到这个话题（把广州的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分开——作者注）时，他明确说，在广州这样的条件下，他不认为有可能将权力分成直属北京中心的军事权力及政治权力。他甚至提出这样的问题：倘若他被迫离开广州，将有可能任命另一个人，此人可以兼任政治领导人和军事领导人。他认为把军事工作分离出去完全不可能……鲍罗廷同志已经将军事部牢牢控制在手中……军事工作人员已经无专人负责……在目前条件下，他们甚至丧失了直接与北京进行电报通讯的权利。所有电报只能以鲍罗廷的名

* 普特为俄国重量单位，1 普特等于 16.3 公斤。——译者注

义发出。甚至连给北京寄什么样的邮件这样的问题，鲍罗廷也把决定权留给自己……这种情况显然不正常。如果不是在政治问题上，那么无论如何在各种队列和纯军事问题上，军事工作人员应该保留其独立性。

到1924年6月前，在广州工作的苏联顾问有25人，但是当时那里的看法是，这个数目小了点。例如顾问季山嘉（H.B. 古比雪夫）在给苏联武官叶戈罗夫的报告中说：

我们已经占据了国民革命军各部的好职位。但是，由于顾问人员不足和几乎完全没有翻译人员，暂时不可能进一步深入而获得完全的监督权。

到1926年4月前，苏联顾问人数已达48名，其中27名为专家，21名为技术人员。正如加拉罕1925年5月29日在致斯大林的信中所写的那样，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教官“分派到他们能够施加影响和开展工作的一切地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1925—1927年大革命时期，在中国工作的苏联军事、政治顾问和教官共有150人左右。前军事顾问A. 布拉戈达托夫引用的数据是93名顾问和8名军事翻译、中国学家、各种事件的参与者，但他认为这个名单极不全面。

据A. 布拉戈达托夫的材料，那些年间在中国工作的相当大部分顾问（50%左右）是工农红军军事学院第四届和第五届毕业生。顾问的平均工资为每月200美元左右。

B.E. 波利亚克（波拉克，1890—1947）曾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的主任顾问。在波利亚克于1924年6月去总军事顾问机关后，黄埔军校顾问组由A.И. 切列帕诺夫领导。他和H.И. 捷列沙托夫一起领导战术、射击、队列训练工作。1924年10月，此项工作由来到黄埔军校的H.A. 舍瓦尔金负责，1926—1927年，则由B.M. 阿基莫夫负责。1924—1926年，Ф. 萨赫诺夫斯基¹¹⁰曾任驻广州军事顾问和黄埔军校教员，其妻米拉·萨赫诺夫斯卡娅¹¹¹和他一起工作。

И.Г. 帕洛 (1891—?) 从 1924 年 10 月起在黄埔军校教战术学课。他毕业于高级步兵训练班，以师顾问身份参加过广东各次战役，随后参加了北伐。根据联共 (布) 中央政治局 1927 年 3 月 24 日的决定，他被授予红旗勋章，后来他在工农红军服役，最后遭到了非法镇压。帮助学员掌握军队通信工具的起先是 Н.А. 科丘别耶夫，从 1925 年起是军事顾问 М.И. 德拉特文 (1893 年生，俄国国内战争参加者)。广州顾问团炮兵主任顾问 Т.А. 别夏斯诺夫讲授炮兵课程。С.Н. 瑙莫夫 (卡拉切夫，1890 年生) 于 1925 年 11 月担任黄埔军校政治工作总顾问。Е.А. 雅科夫列夫负责组织实施黄埔军校的工兵教学。1926 年北伐开始前，М.Ф. 库马宁任黄埔军校主任顾问。在他之后，顾问团由参谋长主任顾问 М.Г. 叶夫列莫夫领导。1926 年，И.Я. 拉兹贡 (奥利金) ——Н.В. 古比雪夫的政治助理及 В.П. 罗加乔夫、И.К. 马马耶夫 (1894—?) 也参与了教学大纲的制定。保加利亚人赫里斯托·帕科夫自 1925 年年中起在情报部系统工作，他教黄埔军校的年轻中国学员学习飞行，并修建了机场。在此之前，赫里斯托·帕科夫毕业于苏联一所航空学校。

在我们的顾问帮助下，黄埔军校在北伐战争开始前培养了 6000 名左右步兵和炮兵指挥员、工兵、通信兵和政治工作人员。

广州顾问团的海军军事顾问由 А.Н. 格赖 (1898—?) 担任。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负责海路运输武器的事务。

1925—1926 年，В.А. 斯捷潘诺夫 (1886—1936)¹¹² 担任广州顾问团的军事顾问。

在一度驻汉口的布柳赫尔司令部工作的有布赖洛夫斯基、И.Г. 瓦西里耶夫、翻译 Э.М. 阿布拉姆松 (1898—1941，化名马祖林、马松)、布柳赫尔的副官兼秘书 М.Я. 格米拉 (1900 年生，军事工程专业)。同布柳赫尔一起工作的还有：费奥多尔·迈蔡利克 (1895—? 波兰人)、德罗兹多夫 (化名科恩)、М.И. 卡扎宁 (1899—1972)¹¹³、武官处军事地形测绘员 С. 普罗塔索夫 (1897—?)、А.И. 切列帕诺夫、Ф.И. 奥利舍夫斯基 (1890—1938，化名沃伊尼奇)、广州顾问团司令部军事顾问 М.Г. 斯涅戈夫 (斯韦托夫)、广州顾问

团参谋长 Г.Б. 斯卡洛夫¹¹⁴、译电员 И. 佐托夫 (1900—1927, 1927年8月在汉口宴会上被毒害)、张家口顾问团参谋长兼国民革命军通信主任顾问 А. 科尔涅耶夫 (1890—? 化名安杰尔斯、库克)、广州顾问团司令部作战情报处长斯特鲁姆比斯 (1895—1938, 拉脱维亚人)¹¹⁵和妻子薇拉、А.В. 布拉戈达托夫¹¹⁶和妻子达罗夫斯卡娅·季娜·雅科夫列芙娜。

北伐战争期间各军的顾问分别是：第1军 (军长何应钦) 顾问 А.И. 切列帕诺夫；第2军 (军长鲁涤平*) 顾问 И.Я. 泽宁；第3军 (军长朱培德) 顾问 Ф.Г. 迈蔡利克；第4军 (军长李济深) 顾问 В.Н. 帕纽科夫和 В.Е. 戈列夫¹¹⁷；第5军 (军长李福林) 顾问 А.Б. 波尔特年科；第6军 (军长程潜) 顾问 Н.И. 孔奇茨和 А.Н. 切尔尼科夫¹¹⁸。

在国民党军队第17师师长吴铁城部队工作的军事顾问有恰洛夫、鲁达科夫、尼库林、莫伊谢耶夫。А.Б. 巴库林 (布罗夫) 和比季耶夫曾担任驻汉口副领事，1926—1927年驻汉口总领事则由拉脱维亚人 О.Ю. 普利切¹¹⁹担任。

1925年4月—7月，В.К. 普特纳 (1893—1937)¹²⁰担任驻中国北方的苏联军事顾问团团团长。

苏联顾问团来到国民党军队后面临的任务是组建现代情报与反间谍系统，以顺利对付犯罪、刑事犯和特务，同时获取有关敌人的真实情报。以前由社会安全局做这些事，但按我们专家的看法，该局显然不能应付各种案件。广东不存在什么有组织的情报工作。军队的将军们有组织良好的情报工作，但总司令部却没有。将军不是依靠领取报酬的间谍，而是依靠朋友和熟人搞情报工作，提供有关一切重要事件的情报。况且这是将军个人的谍报机关，除他本人，任何人都不了解。所以某个将军一旦被消灭，其情报机关便完蛋了，再也无法使

* 据有关资料，鲁涤平在1923年曾任谭延闿湘军第2军军长 (1928年又出任国民党军第2军军长)。北伐时期，军队进行了整编，由湘军改编的第2军由谭延闿任军长，鲁涤平任副军长。——译者注

用。

一份秘密的《1925年11月广东情报工作报告》中说：

只有将分散在各处的国民党组织和单个党员联合成一个机关，通过他们获取需要的情报，才可填补这一空白。但是，考虑到中国人的心理状况，以某一机构进行工作的形式组织此种行动，看来未必会成功，也许只得以友好通报的形式函告某位有声望的国民党党员才行。

改善广东情报工作的另一种方式是建立为期3个月的反间谍工作与情报工作学校。这种学校的任务是：培养有理论修养的反间谍与情报工作小组领导人及普通谍报员和特派员。学校设立两个系——反间谍系和情报系。两个系招收的学员选自经过严格审查的大学生、初级和中级指挥员、工会会员、农民组织成员、罢工者。全部课程需时极多，达624个课时（不含队列训练）。课程中包括几门政治课：政治常识、政党与政治任务、党派介绍；军事基础知识：武器、射击、破坏行动；国家管理基础知识：各种机关的职能和任务；秘密工作基本原理、保密规定；情报工作与反间谍工作原理；情报勤务基本理论；密写。

情报系的课程有：

一、军事与军队情报（114课时）；二、谍报侦察（110课时）；三、情报（60课时）；四、组织（6课时）；五、反间谍（50课时）；六、敌情（40课时）；七、机动（22课时）。

反间谍系的课程有：

一、反间谍机关保卫勤务（4课时）；二、外部监视（115课时）；三、情报（60课时）；四、报知（91课时）；五、盗匪活动（20课时）；六、辅助勤务（20课时）；七、政府勤务（30课时）；八、广东敌人行动史（20课时）；九、侦察（20课时）；十、机动（22课时）。

教学的形式为讲授、课堂讨论和作业。

要求每位学员还应学一门外语，最好是俄语，其次是英语和法

语。外语课和政治工作课均在基本教学大纲课时表外进行。

新学员由考试委员会录取，该委员会对他们的政治观点、中文教育程度、欧洲语言知识、记忆力和机敏性进行评价。

第一届短期速成训练班授课时间为 32 小时，24 位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结业；为了让学员易于掌握所学材料，预先翻译了讲课提纲并分发给学员。结业的学员有些被送回原部队，有些则被派往各地区和中央机关。当时认为，这 24 个人和中央机关的一些工作人员一起，将是未来中国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基础。中央机关（委员会）接收了 7 个人，该委员会主席谭平山¹²¹统一并领导全部工作。第一助手傅烈负责反间谍处、秘密处和经济处的工作。第二助手杨殷¹²²负责谍报机关、盗匪处和经济处的工作。第三军政治部主任助理陈某是共产党员，负责特别处、组织处和训练处的工作。此外，还有一个情报与书报检查处，其负责人也是训练班结业的学员。

这样就提出了建立一个类似苏联国家政治保安局的组织的任务，该组织能够执行保卫国家的任务，同反革命活动、间谍活动、盗匪活动、重大渎职罪行、走私活动作斗争。

当时的计划是：通过为期三个月的训练班，于 1926 年 11 月 1 日前训练出 360 人。第一批 95 人，1925 年 12 月 15 日至 1926 年 3 月 15 日；第二批 120 人，1926 年 4 月 1 日至 7 月 1 日；第三批 145 人，1926 年 7 月 15 日至 10 月 15 日。

举办这种训练班的全部组织工作均由苏联提供资金，每月开支为 5000 美元（最初几个月）至 20000 美元。

当时还拟借助于这种学校扩大“境外工作”的规模。学校应该训练驻外谍报机关需要的人才。一份上呈中央的工作报告称：“从罢工者中选择常驻香港和澳门的谍报机关干部，这些干部将接受指导，向我们报告香港和澳门的全部情况。”

按照“绝密”的“华南诸省及毗邻地区情报工作计划”提出了以下任务：收集有关华南各省和各地区的“苏联感兴趣的情报”和“我们在广东开展工作所需各种材料”。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建议向中国南方，首先是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河北、江西、福建各省，派

遣 15 名谍报站长（每省、首都地区和边境地区各 1 名），向其他地区（香港、澳门、河内—海防）派去 3 人。当时认为，1926 年 3 月 15 日结业的第一期学员“能够满足这种需要”。计划称，“应当立即着手建立谍报机关，要尽力而为，依靠我们在初期将拥有的条件：一是尚不高明的谍报机关；二是一些两面人”。同时，这样的谍报机关看来应该设在华南各个新建的领事馆。《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分会关于开设驻中国新领事馆的建议》讲明了最近 6 个月内开设这些领事馆（共 14 个）的愿望。这份文件直截了当地说，这些“主要以实行情报侦察为目的的领事馆，可限制在最小的 3 人编制以内：一位领事、一位秘书、一位翻译”。

但是，在创建学校过程中，遇到了严重困难：缺乏专家和翻译。譬如，有一个情报员曾在 1925 年 11 月 30 日就此事报告中央：

我不再重复我的证据，但是我要报告，如果不从莫斯科火速派来我请求派来的两名工作人员，不从北京立即派来答应派来的人，那我将不得不认为，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工作是次要的工作，我将要求做较重要的（看来是）军事工作。做军事工作，也许我会有更多的用武之地。

没有教官，便不能开办学校；没有学校，便不能得到中国工作人员；没有工作人员，便做不成事情。我不认为自己有理由去负责一个不可能做好工作的组织。

这位情报员提醒，在他就要离开时，曾得到许诺（“甚至以名誉担保”）：国家政治保安局系统将立即派布赖洛夫斯基和卡丘申¹²³来，情报部系统将派某位工作人员前来。他写道：

我还在北京时就敢于表明我对履行这一许诺的怀疑。现在我不得不相信，如果没有等到答应派来的人员就离去，那么这样的做法不对。不过，如果认为一个人也不给可以搞好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工作，那么这种想法至少是奇怪的。

这位情报员指出，其手下负责教练工作的全体人员只有两个半：尼基京（学校授课，编制细则，组织工作，管理谍报机关，收集英语报刊情报）、米哈伊洛夫（负责一切事务，招募人员并与外国——非中国的——谍报机关联络，教务处工作，讲义处工作，整理财务报表）和弗雷德·鲍罗廷¹²⁴（只能利用他的业余时间，因为他有自己的日常工作：当全体人员的英语秘书，对英语材料按情报要求进行整理）。

一位谍报员给中央写信说：

即使我一个人能做点什么事情，哪怕作为普通的特派员来教练谍报员，没有翻译人员的帮助，我也会束手无策。这里没有翻译，而现有人员负担繁重，无法分出来。答应派给我的李某又没有来。我请你们想想看，没有翻译能不能开展工作。至于使用英语，那是胡说八道。党员里能说英语的非常少。我不准备为了谈判，甚至为了翻译讲义、（更不用说翻译谍报材料）而去雇用投机分子。

看来正是因为如此，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于1925年10月26日作出决议：

必须在莫斯科建立一所百人翻译学校。

1925年，苏联为中国北方军队派遣了两个军事顾问团——张家口顾问团（基本的）和同该顾问团协同工作的开封顾问团。

不过当时认为，在中国的苏联顾问明显不够用。薛福林（А.Я. 拉平）1926年3月18日在给上级的信中说：

我们的财务困难使我们无法养活在中国工作的大量军事顾问。在这样的条件下，对派到中国的工作人员应特别提高

要求：和平时期他们应该是教育者、组织者，甚至是“书呆子”；而在战争时期，他们应该是作战顾问。过去我们选派的人员没有达到上述要求，这一点与其他原因一起，使我们在华工作的重要性受到了影响。

1927年8月1日凌晨，贺龙、叶挺和朱德的部队在南昌举行了起义。8月1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代表的联合会议组建了起义领导机关，通过了几个纲领性文件。起义者宣告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其多数成员是共产党员。由于一系列的原因，主要是群众运动陷入低潮，南昌起义没有导致新革命中心的建立。8月5日，总数约1.5万人的起义军撤离南昌。起义实际上遭到了失败。

1927年9月14日，工农红军司令部第四部在莫斯科召开了“南昌起义评价”会议。该会议的速记提到了参加会议的以下人员：B.E. 戈列夫、M.M. 奇赫伊泽¹²⁵、A.H. 切尔尼科夫¹²⁶、И.И. 瓦西列维奇¹²⁷、E.B. 捷斯连科¹²⁸、И.Я. 泽涅克、Г.Б. 斯卡洛夫、К.Я. 沃洛金¹²⁹、谢尔盖耶夫、A.H. 格赖、И.К. 马马耶夫、M.Г. 叶夫列莫夫、B.П. 罗加乔夫。戈列夫作主要报告并致闭幕词。

1925—1927年，И.М. 穆辛¹³⁰担任塔斯社驻中国记者（一段时期驻广州）。他在1925年就向M.B. 伏龙芝提供了有关广东局势的简明而极为客观的情报。正是他于1925年5月底报道了国民党同军阀在1925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斗争，也是他首次报道了上海“1925年五卅运动”的爆发。又是他预告了国民党于1926年春开始举行北伐的可能性。

估计1926年3月2日Г.Н. 维经斯基收到的一封信是И.М. 穆辛写的，信中建议创建中俄通讯社，其中心设在北京，分社设在全国各大港埠。颇有意义的1926年4月24日的报道《中国共产党在广州的任务提纲》亦出自穆辛之手。根据这些材料，И.М. 穆辛这些年大概与情报机关有联系。

6. 张家口顾问团和开封顾问团

当鲍罗廷、西纳尼（Г.Б. 斯卡洛夫）、季山嘉（Н.В. 古比雪夫）和其他苏联顾问在中国南方国民党的中心开展工作时，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一些苏联军事首长也被派到了中国北方。莫斯科对冯玉祥元帅寄予厚望，认为他是可与蒋介石相抗衡的惟一的中国军事首长。张家口顾问团在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第1军（司令部设在张家口）开展工作。1925年4月，该团有29位军事顾问兼教官、2位政治工作人员、1位医生和4位翻译。过了四个月，即9月份，顾问增加到35人。而到1926年1—2月份，顾问达36人。1926年3月，顾问数减至27人。另外，在该顾问团工作的还有从苏联来的技术专家。

张家口顾问团在1923年的第一位领导人是维托夫特·卡济米罗维奇·普特纳，他毕业于高级进修班，来中国之前任工农红军监察员，是革命前入党的共产党员，从中国回国后先后在日本、芬兰、德国、英国担任武官。从1925年5月起顾问团领导人由维塔利·马尔科维奇·普里马科夫（林，Г. 艾伦，1897—1937年）担任，他是乌克兰红军创建人之一。顾问团参谋长为伊万·科尔涅耶夫（安杰尔斯，1890年生），他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国内战争，毕业于工农红军军事学院。1925—1927年在苏联军事顾问司令部和总政治顾问鲍罗廷的机关担任翻译的B.B. 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这样回忆：“他忙于顾问团的工作，四处奔走，从各地带回有关地形、经济、居民状况和人民风俗习惯的详细记录。”顾问中还有1925年4月来中国的H.Ю. 佩特克维奇（久夫伦，1895—1936，炮兵军事顾问，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国内战争）、A.Я. 克利莫夫¹³¹、П.П. 卡拉特金（拉贡，毕业于沙皇军队总参谋部军事学院）、B.A. 日林。1925—1926年，B.M. 阿基莫夫（彼佳·西林，白佳）¹³²曾任张家口顾问团军事顾问，他在步兵军官复训班授课，1926—1927年为广州顾问团顾问，曾在黄埔军校工作，曾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步兵第2师顾问，参加了攻打武昌的战斗。有3个人，即A. 维赫列夫（1902年

生，1926年牺牲于甘肃境内的蒙古草原)、巴尔克(1926年初死于血液传染，葬于北京)和C.C.切金(谢尔盖耶夫)¹³³作为装甲列车军事顾问领导制造了3辆装甲列车。军事顾问K.B.卡利诺夫斯基(科尔德，1897—1932)¹³⁴和这3个人一起工作。在张家口顾问团工作的还有帕维尔·久克(1896—?布罗德)，他担任骑兵顾问，毕业于工农红军军事学院(据B.B.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回忆，帕维尔·久克以勇敢无畏及愤怒时冷酷而狂暴著称。在所有顾问中，他是惟一敢于同亡命北京的白卫分子，甚至同使馆区的英国警察徒手搏斗的人)；伊万诺夫-里诺夫，他是前沙皇军队将军、高尔察克鄂木斯克政府的军事部长。该顾问团还有：A.H.切尔尼科夫(尼基京第二、萨特拉普，1891—?)，毕业于工农红军军事学院，任该团顾问，1926年起任广州顾问团顾问，参加了北伐战争；И.科列伊沃(诺加，1885—1927)，任军事顾问，毕业于塔什干工农红军东方学高级进修班中国班；A.A.阿尔格诺夫(马里诺)。他们都是炮兵，在炮兵学校工作，1925年在该校学习的学员有114人。在张家口工作的还有：费奥多尔·博卡年科(科尔夫)、韦尼阿明·加姆贝格(迈斯基)、B.E.戈列夫(尼基京，1900—1938)、鲍里斯·佩尔林、И.科尔涅耶夫(安杰尔斯，1890—?毕业于工农红军军事学院)、B.И.库兹米切夫(文，1900—?骑兵军事顾问)、A.Я.拉平(1925—1927年任该团军事顾问，1926年代理武官职务，毕业于工农红军军事学院)、И.В.洛巴诺夫(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毕业于工农红军军事学院)、B.И.利沃夫(1898—?毕业于工农红军军事学院)、H.C.莫尔恰诺夫(1896年生，该团军事卫生顾问)、C.H.瑙莫夫(卡拉乔夫，1890—?1925年5月起在张家口顾问团工作)、M.B.桑古尔斯基(乌斯马诺夫，1894—1937)、П.Е.斯卡奇科夫(克列切托夫，1892—1964)。

在顾问团担任翻译的是Φ.T.博卡年科(科尔夫，早先就读于符拉迪沃斯托克东方大学，据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M.И.斯拉德科夫斯基回忆，博卡年科当时是年级精通中文口语的尖子)和佩夫兹纳(克拉夫特)。在苏联顾问帮助下，创建了高级步兵学校、高级军官学校、机枪学校、通信学校和工程兵学校。从伊万诺夫斯基

(A.C. 布勃诺夫)的《1926年2月15日与普里马科夫同志谈话速记记录》可以看到，当时在张家口还建了一所反间谍学校。这有伊万·维纳罗夫的回忆录为证。他写道：

我们（维纳罗夫在此指的还有同他一起从莫斯科来中国的该团领导人格里戈里·萨林，他们二人曾任布柳赫尔的军事情报顾问，以及维纳罗夫的妻子加林娜·列别杰娃——他们的译电员、沙皇将军之女、彼得堡贵族女子中学毕业生——作者注）在冯玉祥“国民军”当了一段时间的军事情报顾问。

1924年，发生了改变军事政治局势并具有重大后果的事变。这里说的是原直系军阀将领冯玉祥发动的政变。冯玉祥于1924年10月倒戈反对直系，将所部更名为国民军，于1924年10月23日占领首都北京（当时中国称这一事件为“京城革命”）。“直隶人”曹锟被迫离开总统宝座，他的政府随之垮台，中国最后一个皇帝溥仪被逐出故宫，正如冯玉祥所写的那样，这样做是为了巩固共和制度。

国民军建制为3个军：第1、第2和第3军。冯玉祥就任国民军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

冯玉祥的行为在其部队占领北京之后是互相矛盾的。一方面，与国民党有联系的政治家被吸收参加临时政府，国民军领导人会议决定邀请孙中山赴北京共商国是。另一方面冯玉祥又同领导政府的亲日政治家段祺瑞及投靠日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联系。正如我国著名中国学家M.Φ.尤里耶夫所说：“这种自相矛盾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解释，尽管冯玉祥踏上了促使其参加国民革命运动的道路，但他实际上依然是一个军阀。”

为了加强自己的军队，冯玉祥决定邀请苏联军事顾问。后来他本人这样记述邀请苏联顾问到国民军工作的事：

鲍罗廷和加拉罕也先后由人介绍相识，常来找我谈话。

每次都由陈友仁先生担任翻译。我们所谈的，主要是关于革命、宗教以及取消不平等条约等等一类问题。我和他们说，中国的目的只是争取自由平等，谁能赞助我们达到这个目的，谁就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接触，越来越亲密，越谈越接近，于是我的思想和许多政治方面的见解也慢慢起了变化。因此我请他们二位介绍，从苏联请来三四十位顾问，步骑炮工等各项专门人材皆备，分在我们训练班中任教。两方均无条件，只为帮助我们完成国民革命。他们来后，几时觉得不适宜，即几时辞去。

随后好几十名学生被派送苏联留学。西安依照黄埔军校的模式建立了一所军事学校，称为西安中山军事学校。该校的领导人是国民革命军驻陕总司令、国民党左派于右任，校长是中共党员史可轩，副校长是从苏联归国、后来在中央苏区牺牲的李林，校政治处处长和党组织书记是邓小平。

苏联政治顾问 A.Я. 克利莫夫¹³⁵于 1924 年 10 月开始在国民军第 2、第 3 军司令部驻地开封工作。

国民军第 2 军（军长为胡景翼将军，1925 年 4 月起为岳维峻）驻扎在河南省，司令部设在开封。苏联顾问团于 1925 年 6 月 21 日抵达开封。1925 年 9 月开封顾问团有顾问 30 名，1925 年 11 月有 22 名，到 1926 年 1 月则是 21 名。

在第 2 和第 3 军工作的开封顾问团不同时期的人数为 21 至 43 人，其中 10 人受过高等军事教育，6 人毕业于高级步兵学校。该团有 1 名医生、2 名工程师（弹药专家）、7 名政治工作人员。

开封顾问团团长为格奥尔吉·鲍里索维奇·斯卡洛夫，副团长兼参谋长为 1926 年调到张家口的 A.Я. 拉平。在开封工作的顾问有已经提到的 A.Я. 克利莫夫，1925 年 6 月起有济明、尼库林、卢别、布林，军事工程顾问 B. 瓦辛，以及两位前沙皇军队将军——驻北京武官的军事顾问 И.В. 通基赫（国内战争时期曾任远东哥萨克首领安年科夫的参谋长，卒于 1947 年）和沙拉温（鲁德涅夫，卒于 1927 年，

1925—1926年在河南军校任教，1926年末起和1927年在广州顾问团工作)。在开封顾问团担任翻译的是И.М. 鄂山荫¹³⁶、B.A. 瓦西里耶夫、С.М. 奥科涅什尼科娃(来自列宁格勒)、Г.Ф. 斯克沃尔佐夫和С.А. 弗鲁别利(来自符拉迪沃斯托克)。在此应当指出，当所有苏联顾问回到苏联，并被呈请授予红旗勋章时，张家口顾问团和开封顾问团却没有一个人受到奖励，因为按照中央的意见，这两个顾问团没有取得像南方顾问团那样辉煌的胜利。

1927—1931年，军事情报员鲍里斯·彼得罗维奇·波斯特尼科夫担任驻喀什总领事¹³⁷。

1927—1929年，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外局谍报站长M.M. 卡扎斯¹³⁸担任驻喀什副领事。

1927—1933年，阿利亚夫金·尼古拉·瓦列里扬诺维奇¹³⁹担任驻喀什总领事馆秘书。

中国学家Г.М. 格里戈里耶夫¹⁴⁰受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外局派遣，在苏联驻齐齐哈尔总领事馆秘书兼副领事身份的掩护下，于1925—1929年在齐齐哈尔工作。

С.А. 斯卡尔别克(斯科尔别克，即别涅迪克)¹⁴¹作为秘密军事情报员于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工作。P.A. 泰罗夫¹⁴²受情报部派遣，这些年也在中国工作(1924年10月来到广州顾问团)。



第四章 在中国工作的暂时收缩

从1926年春至1927年春，由于中国内部斗争尖锐，反苏情绪升高，在帝国主义大国的煽动下，对苏联及其全权代表机关和其他机构的攻击日益频繁。张作霖诬指加拉罕“一到中国就出钱收买大学生闹事，又加紧豢养冯军，从而使国内混乱延续下去”。张作霖认为，这就超出了“大使的正常权利和国际公法准则”。一份就此事呈送给苏联驻奉天总领事的报告称，张作霖现在仍然未承认加拉罕为苏联的全权代表，为了避免问题的复杂化，他坚持要求从中国召回加拉罕。驻莫斯科的中国大使馆采取了类似的外交行动。英国也发生了反对加拉罕的运动。苏联领导人显然不满意这样的事变。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听取了中局势问题报告，提出了政治局中国委员会拟定的决议草案，其中指出：

鉴于受帝国主义挑唆的中国反动派要求召回加拉罕同志，必须在中国（视可能在其他国家，首先是在英国和日本）展开最积极的政治运动，反对这种蛮横无理的要求，阐明苏联代表加拉罕同志推行的解放政策的目的是内容。（第24条）

政治局会议赞同¹⁴³这项决议草案，决定“在中国报刊大张旗鼓地掀起持续的支持加拉罕同志的运动。视可能在英国也开展此项运动。”（第5条）“委托谢列布里亚科夫同志告诉张作霖，苏联政府不得不将他要求召回加拉罕同志的声明视为最严重地妨碍苏联与张作霖

之间正在建立的合作的步聚，视为外国帝国主义怂恿张作霖采取的步骤”（第6条第2款）；“委托拉科夫斯基同志查明，法国对英国掀起将加拉罕同志从北京召回的运动采取何种外交立场，并以适当方式让法国明白，它在这一问题上支持英国，将被我们视为对苏联的最大的敌视行动”（第6条第8款）。

根据斯大林的建议，为了压制张作霖，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26年4月16日做出专门决议：

立即派遣谢列布里亚科夫同志赴奉天，责成他要求张作霖保证，并且向他声明，张作霖本人必须为粗暴对待我们驻北京的全权代表承担责任。

有一项专门指示谈到：

谈判时向张作霖指明，日本各界著名人士同意用另一位具有缓冲作用的将军代替张作霖，但是在建立正常关系的条件下，我们看不到用另一个人代替张作霖的根据。

况且，张作霖的警察机关袭击苏联大使馆时，弄到了苏联情报机关获得的一些秘密文件，这些文件应该能让张作霖“睁开眼睛”看清，日本在他的满洲领地上打算为自己干些什么。

庇护张作霖的田中首相认为，应该让张作霖在满洲保持一种特殊的地位，因为满洲督军是惟一能够让满洲顺利脱离中国，以在那里建成日本无可争议的势力范围的人物。但是，北伐战争导致满洲军队的失败和蒋介石军队的进攻，从而改变了日本人的看法。通过灭掉老帅使满洲军队无能为力的独立行动计划已经在关东军酝酿成熟。日本情报机关收到了（苏联情报机关提供的）补充情报，由于张作霖为美国在满洲获取利益提供特权，他在北京已经预先得到美国提供财政援助和支持的许诺。

在谋划除掉张作霖的那些人当中，有总参谋部的河本大作大佐，

他得到关东军司令村冈将军的准许，在土肥原大佐的参与下，着手实施计划。一名情报军官被派到北京，打听这位满洲统治者所乘专列开往奉天的日期与钟点。日本人决定在日本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交叉处附近的皇姑屯车站炸车。1928年6月4日，张作霖的专列启程驶往奉天。早上6点钟发生爆炸，专列被炸毁，车上的元帅和所有乘客全部遇难。为引开怀疑的视线，日本当局在事发现场枪毙了两位偶然被抓到的国民党军队的军官。但是，日军驻中国北方的司令部仍然受到怀疑（尽管有传言称，其他国家，包括苏联情报机关可能与此案有关）。

大家知道，1926年秋季，绥芬河车站对一列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向西行驶的火车进行海关检查，在一位乘客的皮箱里发现了炸药、定时器和大量美元和日元。被捕的乘客叫布尔拉科夫，其两个弟弟正在奉天，他们应该在张作霖的帅府举办音乐会。调查表明，定时炸弹本应在举办音乐会时安放在帅府中，爆炸时间定于夜间。与布尔拉科夫一起被捕并送交法院的是其同谋者弗拉先科和梅德韦杰夫，后者曾在铁路警察局工作过一段时期。被捕的还有身为乐师的布尔拉科夫兄弟。苏联当局声明，这一切全是侨民的阴谋，他们还把布尔拉科夫称为“白匪”。他被判处5年监禁。苏联政权机关就这样公开抛弃了布尔拉科夫及其同谋，但令人奇怪的是，却继续关心他们的命运。虽然驻奉天的苏联领事回避到狱中探望布尔拉科夫及其同伙，但是他却从哈尔滨谍报站长马克（弗拉斯·拉赫曼诺夫）的经费中每月拨出200美元，发给布尔拉科夫的妻子，还不时把不同数目的钱发给弗拉先科和梅德韦杰夫的妻子。驻奉天的苏联副领事兼国家政治保安局谍报站长帕维尔·东斯科伊向驻哈尔滨的谍报负责人报告，“三人小组”（布尔拉科夫、弗拉先科与梅德韦杰夫）“在向满洲法院上诉过程中失策甚多”，“应该把建议组织三人越狱的每一个人都赶走”，因为一些被捕者在哈尔滨越狱之后，奉天监狱的警卫变得森严多了。“同被捕者的联系异常困难而危险。一切都要经过严密的检查。我停止了各种形式的联络，所有情况都通过梅德韦杰夫的妻子口头转达”。张作霖元帅被杀害的后果是田中内阁垮台。

鉴于苏联大使馆受到袭击后形成的北京形势，加拉罕奉命同莫斯科保持联系，以通过张家口不断向莫斯科报告情况，要求“恢复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并将在满洲的全部外交工作“完全彻底地”从哈尔滨转到奉天。

1926年3月20—21日，蒋介石出乎俄国顾问的意料，把共产党员从国民革命军第1军和黄埔军校中逐出，逮捕了一些人，派兵包围了苏联顾问总部和寓所，在苏联代表团长A.C.布勃诺夫（伊万诺夫斯基）的寓所门口布置了岗哨。随后他的军队包围了香港罢工委员会，逮捕了罢工领导人，主要是共产党员。蒋介石解散了军事委员会，宣告自己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要求H.B.古比雪夫、B.П.罗加乔夫和И.Я.拉兹贡离开中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1926年“三·二〇事件”^{*}。

不久，蒋介石同外国报刊代表谈话时称：至于断绝与苏俄之外交关系，我们仅是与苏俄政府断绝……中国人民与俄国人民之关系丝毫未变。只须看看苏俄驻华各处领事馆，它们实为第三共产国际之分部，同时亦是中共阴谋之温床。为了自身安全，亦为了中国革命与远东和平，国民党采取了此一果断行动。

让我们努力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一事件呢？这里有几个过去在苏联历史文献中讳莫如深的原因。在国民党队伍中，对共产党人的独裁作风和苏联教官、顾问作用的不满越来越强烈。中国人认为，他们越来越不把孙中山的老战友和亲密朋友们的愿望当回事了。实施共产国际将国民党共产主义化的方针，变成了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人几乎毫不掩饰的以下企求：控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整个机关。俄罗斯历史学家A.B.潘佐夫公正地认为，这就理所当然地导致蒋介石的反共政变。例如，1926年3月24日，B.索洛维耶夫（赖特）于“三·二〇事件”发生后，立即在“纪念列宁号”轮船上致信加拉罕，坦率地报告，苏联“军事工作人员做得太过头了，忘记了他们只是顾问，而不是指挥员”。“我深信，在此之前，我指的

^{*} 又称“中山舰事件”。——译者注

是最近数月，或者更确切地说，最近一个月，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把蒋介石推开，把国民政府推开。”1926年3月27日，A.布勃诺夫致函鲍罗廷承认，“三·二〇事件”因我们“在军事工作中犯严重错误而变得复杂化、尖锐化，并提前发生”，这一事件“还暴露了领导人的一些共同错误”。他承认，“首先应当废除顾问们过分突出尤其是进行直接指挥的习惯做法。与此同时，应当减弱政委对将领的监督，而且在宣传鼓动工作中应该更加谨慎行事”。这一点在И.М.穆辛1926年4月26日所拟中国共产党在广州的任务提纲中得到证实。该提纲确信，“蒋介石3月20日的出击行动，系广州最近形成的总形势引起的，但是毫无疑问，由于俄国同志即俄国军事顾问和政治顾问，以及在军队工作的中共党员在军事工作中犯了错误，这种行动来得更快、更猛烈了。”为了解释这样的情况，穆辛写道：

军队集中领导的形成，过快实行政委制度，政委制度的过激条例及生硬采用这一条例，对中国将军们过多监督，共产党员过分突出，共产党员占据过多重要岗位，加之对待中国将军们，特别是对待蒋介石本人常常毫不客气，采用不讲分寸的“同志式”的态度，所有这一切都加速和加剧了3月20日的事变。

A.C.布勃诺夫领导的处理紧急事件委员会解除了驻中国南方顾问团团团长Н.В.古比雪夫（季山嘉）、副团长В.П.罗加乔夫及政治副团长И.Я.拉兹贡（奥利金）的职务。

В.П.罗加乔夫在其关于1926年“三·二〇事件”的报告中写道：

这一次，我们的错误（过分拖延罢工，共产党员过分突

出，对孙文主义学会*的活动关注不够，集中领导军队的速度过快，漠视“照看”将军们，首先是“照看”蒋介石的必要性，等等）为所有这些矛盾的暴露提供了可能。

拉兹贡和罗加乔夫在其关于“三·二〇事件”的报告中指出，蒋介石采取这些行动的另一个原因是“近日蒋介石收到的”许多匿名信里包含一次又一次的谋杀恐吓。罗加乔夫报告：

3月18日，海军党代表**李之龙（共产党员）接到一个以蒋介石名义用电话下达的命令：将中山舰调黄埔港候用。李之龙指挥开出中山舰，向蒋介石索要书面命令。蒋介石却说他未曾发出任何命令。此时蒋介石收到了经同一个李之龙签字的信（似乎也是伪造的），信中李之龙要求蒋介石于三天内（据拉兹贡所写是三个月内）通过政府实现广东企业的国有化，并威胁他，如不执行，就将其逮捕并遣送俄国。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理应担心有人正在策划阴谋，企图绑架他，用中山舰将他运至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

显而易见，苏联顾问同蒋介石之间发生了摩擦。他曾抱怨说：“我对他们真诚相待。但他们以欺骗报答我。无法与他们共事……他们好怀疑又爱嫉妒，而且在公然欺骗我。”¹⁴⁴

颇令人感兴趣的是，苏联顾问和情报员当时对蒋介石的个性做出的评价各种各样，有时互相矛盾，截然相反。

一种评价这样说：

蒋介石是国民革命军总监、中央军事学校校长、国民党

* 1925年12月正式成立的国民党右派反共团体。其前身为中山主义学会（同年6月成立）。主要头目有戴季陶、王柏龄等。——译者注

** 应为海军代理局长。——译者注

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浙江省人。曾留学日本军事学校。除汉语外，还通晓日语。访问过苏联。他是一个深藏不露、疑心很重、自尊心极强的人，根本不相信任何人。他神经过敏，贪势揽权。蒋是开始同我们认真共事的首批将军之一。是所有将军中最精干的一个。是优秀的组织者。他善于在周围物色绝对服从自己的人。只要深信新措施的必要性，他能比较痛快地采取这些措施。只要表面上不觊觎其权力和领导地位，可以和他很好地共事。他政治上是左派，而且正向左走。他容易受左派思想的影响，并会醉心于某些左派思想。其政治品行取决于周围的人。他执行自己的决定隐秘而坚决。对他人的意见并不特别在乎，有时候同所有人对着干。

军事教官斯捷潘夫给蒋介石做的另一种评语是：蒋介石他善于做出决断并付诸行动，满脑子是沽名钓誉的计划。斯捷潘诺夫认为，蒋介石不但非常熟悉中国的各种政治问题，而且十分了解全世界的政治问题。他能立即觉察出哪条道路能更可靠地引导他掌权，他珍惜群众的支持，但是从来不完全依赖群众。¹⁴⁵

让我们再引用另一位俄国顾问做出的评语（切列帕诺夫认为，这份评语可能是他或者捷列沙托夫写的）：

蒋介石为黄埔第1军军长，访问过俄罗斯。在军事工作人员中他和我们最亲近。深谙政治，极端自尊。研究拿破仑，能阅读介绍拿破仑的日文书，曾留学日本。浙江省人，过去曾有人怀疑他迷恋家乡。

许崇智担任总司令时，他军事上并不比其他将领突出。现在他实际上已首屈一指，超越军长的狭小眼界而到了能够理解集团军任务的高度。夺取惠州之后，他致电政府，在其电报的第一部分指出了他在广东军事建设中的功绩，还指出他懂得军事建设的任务。随后他写道，他怕自己变成一位平

庸的军阀，要求解除自己的军职。当向他讲明他不可能成为一个军阀，因为他没有军队，他指挥的这个军不是他的军队，而是党的军队时，他就接受了这一思想，常在讲话中引用这一原则。

他快决速断，但经常定下未经深思熟虑的决心，于是只好改变决心。他顽固执拗，总是我行我素；在其政治生涯中，理应走至合乎逻辑的终点。他在军队中享有威信，在调集部队执行勤务过程中，善于在非执勤时间与指挥人员建立友好的关系。

具有惊人的政治敏感性、善于透过阴谋诡计和蛊惑宣传看清事物实质的杰出军人 B.K. 布柳赫尔，在其 1926 年 6 月 5 日的报告中给蒋介石的评价颇耐人寻味：

虽然蒋介石派出最好的炮舰到三角洲接我至广州，我和他的私人关系起初还是有些紧张。他反反复复地提我们是否相信他的问题，多次并长时间解释促使他采取三月二十日行动的原因。他的叙述给人的印象是：汪精卫和季山嘉（虽然他没有直接谈及季山嘉）企图将他化为乌有，阻碍他的部队发展壮大，把他的部队置于比其他部队更差的境地。这种轻视他及其部队的政策可能会加强国民革命运动的敌人，因此，为了拯救国民革命运动，他理应做这件事。

得到了牢固的军事独裁大权之后，他竭力占据孙中山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换言之，他竭力以党的独裁来巩固自己的独裁，却又害怕此刻同孙文主义学会发生冲突，因而陷入了这个泥潭。至于共产党人和左派，他同样也怕他们，他明白，甚至左派也不会原谅攻击党和驱逐汪精卫的行动。他非常清楚，共产党和左派很强大，与他们决裂危险至极。由此可见其政治上的不彻底性。

3月24日，H.B. 古比雪夫、И.Я. 拉兹贡和B.П. 罗加乔夫与A.C. 布勃诺夫为首的代表团一起离开广州。胡汉民建议蒋介石逮捕刚刚来到中国的鲍罗廷，但蒋介石没有这么干。3月21日，加拉罕在北京召见A.И. 切列帕诺夫。他从桌子的抽屉里取出以下内容的电报：“季山嘉致薛福林。切列帕诺夫（1927年3月24日政治局会议决定授予他红旗勋章——作者注）须在北京等候伊万诺夫斯基自广州归来。”

在蒋介石“政变”后的最初几天，莫斯科明显有点不知所措。许多人无法理解事情怎么会是这样：就在不久以前，即1926年2月国民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没多久，国民党还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正式请求接纳它加入共产国际，现在却突然决定搞“反革命政变”。应当指出，十分清楚的是，一方面苏联各部门代表发来的情报互相矛盾，另一方面又缺乏真实的情报¹⁴⁶。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驻上海秘书拉费斯¹⁴⁷1926年11月24日在一次中国问题个别会议上报告：

我们抵达中国时（1926年6月中旬——作者注），从同志们那里得知广州三·二〇事件及蒋介石举行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军事示威的情况，这一切使我们觉得十分新鲜。我们在莫斯科没有想像到广州发生了三·二〇事件。我们想像不到这一事件发展到了何等程度，其后果又有多么深远。但是，三·二〇事件已经深入广东内部政治生活之中。伊万诺夫斯基同志曾在那里，索洛维耶夫同志曾在那里。但是，三·二〇事件的实际后果只是在他们离去之后才能看到。在反共军事示威发生时还不清楚，这里正在暴露阶级力量的某种冲突，所有这一切对三·二〇事件之后各种政治力量的组合将具有很大意义。

然而，尽管中国发生了上述事件，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26年4月29日召开的中国统一战线问题秘密工作会议上，要中共

积极干预国民党内部事务，将“右派分子”开除出该党的方针依旧不变，尽管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对此持否定态度。作为对这一方针的校正，当时只是决定在国民党内放慢共产主义进攻的速度，以便重新组织力量。斯大林认为只需要“在重新安排人员方面对国民党左派做一些内部组织上的让步”。但是当时任何一位苏联领导人都没有把蒋介石的三月行动视为右派行动。为了不让有关蒋介石“政变”的消息传到新闻界，苏联领导人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苏联舆论界和所有关心中国形势的人们对1926年3月20日发生的事件一无所知，这样的状况一直延续到1927年春季，即联共（布）内部的反对派发表讲话谈到中国形势问题之时。

1926年8月，张作霖声明要接管以前属于中东铁路的所有船舶，要求取消中东铁路教务处，把所有学校交给中国东三省特别区总司令所辖的国民教育局。

为了回答这一要求，苏联外交人民委员Г.В.契切林于1926年8月31日照会中华民国驻莫斯科外交代办处。

苏联政府期待立即撤销对中东铁路管理局提出的上述要求，要求将这些问题移交两国政府正常工作的外交机构处理。

但是，1926年9月2日，哈尔滨地方当局无视这一照会，夺取了所有河运船舶和中东铁路财产。伴随着这一举动，苏联员工被驱逐出中东铁路轮船公司的多个机构。

1927年，北满继续发生了一系列小型挑衅事件。例如，早在1月11日，苏联公民工会理事会理事长叶西科夫未经起诉即被逮捕；1月12日，铁路运输工人工会委员会遭搜查；1月31日，担任中国警察的一位白俄分子当街拦阻哈尔滨总领事乘坐的总领事馆汽车，要求取下车上的苏联小国旗；3月11日，哈尔滨商务代表处遭搜查；3月16日，地方当局命令毫无理由地查封了苏联运输股份公司哈尔滨办事处；3月31日，搜查了铁路运输工人工会委员会主席斯捷潘年科、

教官科索拉波夫和中东铁路哈尔滨电报局局长维尔德格鲁贝的寓所。5月25日，穆棱站军代表于再江毒打车站值班员萨夫琴科，原因是这个值班员要求一位中国士兵不要在行进中上火车。车厢连接员萨夫拉索夫也遭到了此人的毒打。6月10日，苏联领事馆司机加里宁因保护汽车上的小红旗遭受白俄流氓的侮辱，在中国警察眼皮下遭到毒打。7月19日，营长哈扬舟毒打远东银行职员科诺瓦洛夫及其妻子和儿子，原因竟是小男孩追赶几只鸽子。9月2日，基谢列夫、赫梅廖夫、萨莫伊连科在绥芬河车站无故遭警察毒打，尔后又被逮捕，惨遭绞刑。9月8日，洛巴诺夫在同一个车站又挨毒打，9月25日，波德戈尔斯基遭到同样的厄运，还被带上镣铐，投入地下室。9月3日，苏联公民乌沙科夫在齐齐哈尔车站也遭毒打。

这些年我们外交信使的工作也非常艰难，他们常常陷入难以应付的困境。他们常被当作苏联特务而遭逮捕（下面将要谈到“纪念列宁”号轮船事件），有时候他们成为土匪袭击的重点。

例如，1926年11月9—10日发生了袭击驶往广州的苏联“托木斯克”号轮船事件。著名中国学家П.Е. 斯卡奇科夫作为外交信使与拉脱维亚人布雷迪斯一起乘该船从上海前往广州，他这样记述这一事件：

轮船行驶至珠江口，突然停下，舵轮操纵系统出了什么故障。我们站着。已是夜间。枪声骤起。我和布雷迪斯抓起文件箱和手枪，跳出卧舱，跑过走廊，到了机舱……我们伪装了一下，脱下衬衫，把毛巾缠在头上。我躲在煤舱旁，布雷迪斯藏在锅炉旁。头顶上一片骇人的喧闹声。还用说吗，海盗们看见了盼望已久的“钱箱”。我们等着他们闯到这里来。没听到开船的口令。传来了人跌倒的响声。原来是船长避开海盗，钻进了煤舱。煤太少了，他摔得很痛。船长讲述了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倒霉事。海盗们采用接舷战法攻击轮船。乘客惨遭抢劫，无线电报务员的头被打伤，无法联络了。我试图进入卧舱，收拾留在舱里的文件、护照和钞票。

走廊里一声枪响，我藏到浴室门后，随即放弃刚才的想法，在门的掩护下回到原处。我们坐着，等着，焦急不安，就这样过了六个小时。四周寂静下来。中国军舰的探照灯射在我们的“托木斯克”号上。海盗已经逃之夭夭……

1927年2月28日，张作霖的军队在南京附近扣押了苏联轮船“纪念列宁”号，该船2月27日凌晨驶离上海，前往汉口为苏联商船队运茶叶。这是非常著名的轮船。早在1917年革命前，它就用别的船名在黑海商船队中进行航运活动。在白卫军从克里木撤退时，这艘轮船本可以和其他舰船一起逃往国外。但是，船长格罗斯贝格和全体船员在夜间秘密将该轮船开出，驶入苏维埃政权控制的港口。这艘轮船加入了黑海苏联商船队，1924年取名为“纪念列宁”号。船长未换，仍然是格罗斯贝格。以后该船被调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开始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与中国各个港口之间实施定期航运。1925年孙中山的广州国民政府实行新的港口关税时，外国人都拒绝支付这样的关税。为了迫使中国政府取消这些关税，外国公司拒绝向广州出售石油和煤油。严重的燃料危机威胁着广州。“纪念列宁”号轮船率先突破封锁，运来石油和煤油，把整个广州市从燃料严重匮乏的困境中解救出来。

当时的目击者法因娜·鲍罗廷娜这样描述这一事件：

中午前后，当我们在江中心驶过南京时，我听见了某种信号，接着我们的轮船停住了，开始放锚链。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决定不上甲板，在自己舱里等候消息。

透过舷窗我看见一艘中国军舰正向我们靠近。情况已经很清楚：“纪念列宁”号要接受搜查。

很快就有一人跑进我的船舱，说要搜查我们。我一打听才知道，一位姓胡的海军将军、几位海军军官和许多水兵已经上了“纪念列宁”号轮船。

据法因娜·鲍罗廷娜回忆，这位胡“将军”在张作霖那里得到

“海军”官衔之前，曾在上海和南京担任志愿船队代理人。他了解所有俄国轮船及其驻泊地和船长。一个检查鲍罗廷娜行李的军官带着被查者的照片，用英语问她是不是鲍罗廷的妻子。女士及其卧舱被查了三次：中国人查两次，白卫分子查第三次。

1927年3月9日在南京市外交委员团，苏联驻上海总领事林德当着杨委员及其秘书 T.Γ. 休亚和苏联商船队商务经理 И.М. 奥沙宁的面，录下了“纪念列宁”号轮船船长 Г.М. 格罗斯贝格的供词。从这份供词中可以更详细地看到发生在“纪念列宁”号轮船上的事件。

格罗斯贝格的供词说：

今年2月28日中午，轮船驶近南京时，我收到了停泊场一艘挂有中国旗帜的军舰发出的命令：停止前进。我执行了这一命令。中国军事当局官员来到船上，说要进行搜索。他们的第一个问题是船上有没有武器，他们得到了否定的回答。接着他们开始搜索轮船。上船的20来个军人从船头开始搜索，逐步搜遍了全船各个部位。此前他们已在舰桥和舷梯上事先布置了军队岗哨。检查者要求出示乘客名单和货单。货物没有，乘客也只有四个人。

乘客及其行李都在自己的舱内受到了严密的检查。当时三位外交信使强烈抗议拆开外交邮件，但在中国军舰舰长的特别命令压力下，外交邮件还是当着船长的面被拆开了。第四位乘客格罗斯贝格（女）也在船长不在场情况下受到了同样仔细的检查。搜查者当着我的面在三位外交信使处找到了盖着外交人民委员部公章的三个外交邮件。搜查者要求拆开外交邮件，外交信使们拒绝了。检查者自己拆开了邮件。外交信使出示了自己的护照和邮务证，并警告，开拆外交邮件所造成的后果由开拆者承担。中国军人当着我的面开启的公文包里装的是俄文版图书、杂志及《真理报》和《消息报》；没有任何外国（包括中国的）读物，搜查者一无所获。他们继续搜查，进了煤舱，直到3月2日夜里，当100吨左右的

备用煤全部倒腾过后，搜查才告结束。搜查煤舱之初发现了一个小手提旅行包（这是2月28日的事），根据启包时在场的二副戈拉因所言，皮包里装有旧的银叉子、银匙、女梳妆用品（烫发用）、几本中文和俄文书。这个旅行包是在中国军舰上打开的。我不知道这个皮包的主人是谁，不过搜查煤舱时在场的第三机械师吉布舍尔推断，这个旅行包可能是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到上海途中被盗并被藏在煤舱里的，因为有一个去上海的德国女乘客带有这样的旅行包。就在2月28日晚，胡将军在其他中国军人和一个身着中国军官制服的白俄分子的陪同下上了船，要求指明船上火炮和一切武器的藏匿处，并威胁说，一旦发现隐藏这些武器，将产生无法想像的后果。应胡将军的要求，又在几个白俄分子参与下，再一次检查了外交邮件。当着那几个白俄分子的面，船长拟写了搜查记录，注明外交邮件中没有任何损坏名誉的东西。但是，胡将军未讲明原由而拒绝在记录文件上签字。就在2月28日那天，对轮船所有工作室进行了仔细搜查，最终也是一无所获。搜查姓格罗斯贝格的那位女乘客时，发现她有中英文名片，她马上解释，她姓鲍罗廷娜，旅行中用姑娘时期的姓氏。3月1日，船上的搜查继续进行。在山东军队中的白俄分子参与下，第三次检查外交邮件，这一次发现了五六页中文手稿。这几页手稿从何而来，我无法说清楚，但是，我证明：第一次和第二次搜查时，尽管对所有物品直至某些书页进行了仔细检查，并没有发现这几页手稿。三次检查外交邮件，我的二副戈拉因都在场。3月1日对所有舱室重新搜查了一番，搜查像前面那次一样，仍然毫无发现。此次搜查时向船长提了一个问题：船上有几位共产党员？同时，白俄分子对船上的一位共产党员，即轮船党支部书记吉布舍尔又补加一次检查，其结果同样是毫无收获。党支部档案室的所有记录都被抄走。船长和大副瓦热宁、两位外交信使携带的射击武器都被胡将军没收，还开了收据。3月2日，鉴于检查煤炭

进展太慢，延误了轮船启航，我向军事长官提出了书面抗议，要求立即释放我船，因为数次搜查都一无所获。答复至今未见。3月2日早晨9时许，三位外交信使、鲍罗廷娜连同其部分行李被带下轮船。当天中午三位信使返回，傍晚鲍罗廷娜也由张宗昌的一个老婆陪同回船。3月3日早晨，那三位外交信使和鲍罗廷娜被押送离船，去了何处，我们不知道。

就这样，乘船的苏联外交信使伊万·克里尔（42岁）、格赖布斯（36岁）和卡尔·夏雷，以及总政治顾问夫人、36岁的法因娜·鲍罗廷娜与全体船员（47人）一起被逮捕。3月5日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发出照会：

从大使馆得到的报告知悉，隶属张宗昌正规军队的白俄分子于2月28日扣押了前往汉口运茶叶的苏联“纪念列宁”号商船。这些白俄分子为了运输部队和武器而劫夺轮船，拘留船员和乘客，包括外交信使，他们的命运至今没有说明。

1927年3月11日，中国外交部答复该照会，内容如下：

本部荣幸地确认，3月5日来函业已收悉……

本部认为有责任答复并奉告外交代办先生，现已收到山东省特派外交委员电复，三位外交信使和鲍罗廷夫人已从南京送到济南府，受到上佳款待，安住谢先生家中。

显而易见，中国当局尚未决定如何处置被捕人员。

然而，还在这封信发出之前，中国当局就已责成有关部门查明法因娜·鲍罗廷娜的住处。1927年3月9日19时20分，一份密码电报发往北京，内容如下：

公民鲍罗廷娜和三名俄国人自本月6日起住在一座欧式房子里，有人看守，不过她受到了贵宾待遇。未来如何要待

战争结束后才能决定。由于外交信使只能用于政府与各大使馆联络，所以当地政府不愿承认鲍罗廷娜及其同伴的信使身份，而认为这是证据确凿的非法行为，因为所运东西是武器和宣传品。

签字人为西贝尔特。

中国当局在逮捕法因娜·鲍罗廷娜之后，企图对她丈夫施加压力。张宗昌致鲍罗廷的一封信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总政治顾问鲍罗廷在汉口的一天早晨，有人向他报告，有一位官员自称张宗昌元帅的使者，在会客室等候接见。鲍罗廷接见了这位不速之客，客人交给他一封信并补充说，他还应当转达元帅的口信。

信中说：

尊敬的最高顾问：尊夫人路过南京之时，适逢当地紧急调动军队。敝人恐其遭不测，故请其登岸。鉴于岸上之南京市无法保障尊夫人安全，敝人请其驾临济南府。

请勿为尊夫人之安危担忧，吾等必以贵宾之礼相待。

张宗昌的口信带着威胁，其内容是：

南北军事对抗持续下去，可能导致复杂国际形势，包括对中国和苏俄造成威胁。届时也可能危及尊夫人安全。如鲍罗廷先生能利用自己的影响，促成南北媾和，则将为全面和平建立大功，中国与苏俄利益将因此而占上风，尊夫人之安全亦能得到保障。

鲍罗廷答道：“元帅把我置于非常难堪的境地。如果我此时赞成南北和平，那么我就会招致公正的责备：我这是想救自己的妻子。相反，如果我反对任何和平建议，那么我的行动可能被解释为我因妻子

被捕而发泄个人怨恨。如果元帅认为，拘捕了我妻子，他就能强迫我在南北双方战与和的问题上持某种立场，那么很遗憾，我会令他失望。至于鲍罗廷娜的安全，她的命运掌握在中国人民的手中，我相信，中国人民会保护她。”

看来，当局知道交易已经失败，考虑到北京发生了4月事变，便于1927年5月前半月将法因娜·鲍罗廷娜转至北京，投入了侦查监狱。开始了对她的审讯。她要求会见苏联领事馆代表。鲍罗廷娜的努力获得了成功，她获准会见北京苏联领事馆的秘书尤什克维奇。她得知，“纪念列宁”号轮船已被白匪凿沉，全体船员和船长都在济南府坐牢。1927年4月苏联大使馆遭袭击时被抵走的同志们和她关在同一座监狱，但任何人都不许去看他们。自苏联临时代办A.C. 切尔内赫¹⁴⁸离开北京之后，“纪念列宁”号轮船被捕者的处境变得特别困难。报纸上开始出现越来越具有威胁性的报导，认为即使不是所有被捕者，那么至少部分被捕的“俄国共产党员”将会被处死。1927年4月28日20名中国共产党党员被杀害后，这种危险完全可能成为现实。尽管先后由军事法庭和民事法庭长时间审理后，业已查明苏联工作人员的直接罪证实际上并不存在，但是北京当局那时仍然拒绝释放被监禁者。正如法因娜·鲍罗廷娜和外交信使们的正式辩护律师A.Я. 坎托罗维奇在法庭上强调的那样，“正在审理的案子，是中国针对苏联公民乃至所有无条约关系的外国人的第一桩重大政治诉讼案”。因此，该案“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外交信使和鲍罗廷娜在北京受到了审判。我们已经讲过，鲍罗廷娜的辩护律师是30岁的A.Я. 坎托罗维奇（捷连季耶夫，阿亚克斯，1896—1944年，生于彼得堡一个法学家庭，积极参加了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1919—1921年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彼得格勒分部工作人员，1921—1922年为共产国际执委会莫斯科情报处工作人员。1922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社会科学系，在外交人民委员部任职。1924年作为佩尔加缅特教授的委员会成员来到中国。1928年4月坎托罗维奇返回莫斯科外交人民委员部，1932年转到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工作），著名的美国律师、《华北星报》编辑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作为

法律顾问曾助他一臂之力，但中国当局不让他作为辩护律师出庭。只是到了1927年7月12日，在苏联领导采取坚决的外交行动，法院对他们作了无罪判决之后，法因娜·鲍罗廷娜和外交信使才获释。M.И.卡扎宁在其《布柳赫尔司令部》一书中详细记述了鲍罗廷娜生平中的这一插曲：

反革命的盘算极其简单：以惩罚鲍罗廷娜相威胁，影响她丈夫的立场。然而，由于无论鲍罗廷本人还是他的妻子都没有表达进行任何交易的愿望，张作霖及其最亲近的助手、当时的山东督军张宗昌为鲍罗廷娜安排好了李大钊式的命运（已依据可能判终身监禁或死刑的第101条向她提起公诉——作者注）。她被转交给法院，但是具有民主倾向的法官清晨进行了合议，作出了无罪判决（显然问题不在于法官的“民主性”，而在于给了他一大笔钱的贿赂。尽管我们在这方面尚未发现直接的文件，但已有口头证据和间接文件。譬如那些年北京盛传，法官受贿20万美元。法因娜·鲍罗廷娜本人在其《在中国暴君的刑讯室里》一书中证实了这些传言：“后来报纸上传播这样的消息：霍冲似乎已经被我们大使馆收买，为释放我们他得到了20万美元。”）。法官知道为此要丢脑袋而逃之夭夭。鲍罗廷娜也立即离开法院。

据鲍罗廷娜本人回忆，军阀们将愤怒全都发泄到法官的亲属——他老婆、两个孩子和弟弟身上。他们被拘留，移交给张宗昌发落，被投入大牢。询问这一切的电话昼夜不停，世界所有报纸都为此刊载了冗长的报导。北京在继续搜寻鲍罗廷娜。北京警备司令悬赏3万美元捕获鲍罗廷娜，奉天当局则将她的人头定价为2万美元。当时认为法因娜·鲍罗廷娜藏在苏联大使馆内。北京使馆区的各个入口被为数众多的特务和白俄分子封锁了整整两个月。通向苏联大使馆的那条街上横着挖了一些很深的坑，旁边挂着“慢行”牌，目的是让警察巡逻队能够监视当时北京还不算多的所有汽车。美国新闻记者希恩对所发生

的事件是这样描述的：

整个北京被搜了个底朝天，毫不掩饰地监视车队，接二连三地袭击可疑的房屋。天津对离港的轮船实行监管。但无论怎样也找不到鲍罗廷娜。她的照片刊登在许多家报纸上，挂在北京、天津、奉天及满洲其他城市的警察局里。中国当局要求特别关注天津。之所以选中天津，是因为认为这里最容易逃脱。这些天该市警察当局一直死盯着“所有胖胖的、皮肤偏黑的女士”。

为了迷惑中国人（鲍罗廷娜一直在中国），苏联特工部门在外国报纸上发表假消息，说鲍罗廷娜正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卡扎宁回忆道：

不过有一天，即鲍罗廷娜被宣告无罪之后 10 天，日本一家通讯社自符拉迪沃斯托克以急电报导，鲍罗廷娜已经乘日本轮船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并详细报导了她在北京被监禁和受审判时的体会。又过了 10 天，各报发表了在西伯利亚特别快车上对鲍罗廷娜的采访谈话，尔后又发表了她到达莫斯科后发表的声明。毫无疑问，全世界的报纸都刊登了这些报道。这样，鲍罗廷娜就从张作霖的魔掌中逃脱，现在安然无恙地呆在莫斯科了。张作霖及其爪牙承认自己失败，停止了监视。

其实，这段时间法因娜·鲍罗廷娜一直躲藏在老北京城里一个狭小胡同的小房子里。

根据现有资料，这座房子的主人是两位东方学家：鲍里斯·伊万诺维奇·潘克拉托夫（1892—1979）和彼得·安东诺维奇·格里涅维奇（1888—1941），二人均曾就读于符拉迪沃斯托克东方学院，只是前者 1916 年毕业，后者则于当年进入该学院。

（备查：鲍里斯·伊万诺维奇·潘克拉托夫，曾用中文名字潘可夫，外号吴全，他还有蒙古名字和西藏语名字洛布桑·丘尔季姆。从1917年起鲍里斯·伊万诺维奇就在东方学院教蒙语和满语，当时派他赴北京进修一年以提高中文知识。回来后除教课外，还曾代理大学生事务书记，显然那时他已同大学生格里涅维奇结交了。1918年潘克拉托夫奉派去中国，在汉口工作到1921年，教俄语和英语，还研究方言。他在汉口出了一件事，被迫离开了这个城市。

1921年他住在前俄国租界区。他同俄国侨民协会首脑，即昔日同中国地方当局关系不错的前俄国领事别利琴科，过从甚密。周围有很多侨民。有一次，有人对别利琴科搬弄是非，说潘克拉托夫对苏维埃政权抱有好感。于是别利琴科以潘克拉托夫怀有亲苏维埃信念为由起诉他。别利琴科和中国当局代表一起审讯潘克拉托夫。根据法院判决，被告人应该离开俄国租界，他除了前往北京，别无去处。他在那里被安排到俄罗斯通讯社工作，同时在中国外交部附属俄语学院兼职。保存下来的文件证明，1921年9月就已经建议他在该学院参加资格考试了。由于缺少精通专业的优秀东方学家，1923年他被苏联大使馆领事部任用为英文和中文译员，一直工作到1929年。看来他是在20年代初就定居在我们所说的那座房子里了。潘克拉托夫同国立北京中俄大学和北京律师协会保持良好的关系，积极参加北京各大学和学院的学术活动，在这些大学和学院讲课，作报告，从事研究。他来到北京后很快就结交了进步知识分子的代表、“五四”运动的领导人李大钊教授和胡适。同李大钊教授的友谊一直保持到1927年中国当局逮捕他为止。潘克拉托夫冒着危险竭力帮助李大钊，把他藏起来，仅仅因为幸运和偶然性，他才避免了同样试图营救李大钊的其他苏联人所遭受的那种命运。1921—1922年，他在北京大学结识了胡适。他们的住处相距不远，这也促进了他们的交往。胡适把潘克拉托夫带进了中国学术界。

彼得·安东诺维奇·格里涅维奇，1888年1月16日生于乌克兰一个牧师家庭。1920年毕业于东方学院，1924年毕业于国立远东大学社会科学系。自1925年起担任国立远东大学东方系教师，一直工作

到 1928 年。这些年间，格里涅维奇经常到中国出差。表面上看，他颇为沉默寡言，甚至愁眉不展，令人觉得十分古怪，实际上却是一个非常善良和富有同情心的人。）

光顾他们房子的客人各种各样，中国人、外国人、传教士、大学生都有。因此，有一天晚上，一辆挂着意大利旗的轿车轮子轧轧作响地驶进一条狭窄的小胡同，便毫无特别之处了。这辆小轿车开到一座大门前，门里横着一堵按古城传统画上彩画、驱逐恶鬼的影壁。影壁后面现出一座景致绝佳的花园，此园是原先建在这里的一座寺院的遗址。从汽车里下来两个外国人，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一位戴着宽大雪白的帽子、穿着朴素的修女。为了不引起局外人的注意，三个陌生人极为麻利地走过大门，穿越花园，进入一所孤单僻静而又极其简朴的住宅。执行专门任务、搜寻特别危险的罪犯已经好几天的北京警察局，没太注意这辆小轿车及车上的乘客。

过了几个星期，还是那位修女，还是戴着那顶浆硬了的帽子，由外国人陪同走出这座小房子，极力不引起局外人的注意。

根据苏联官方的说法，“纪念列宁”号轮船的船员及乘客遇上了大赦，在缴纳罚金后，于 1927 年 12 月 13 日获释。然而，实际上是莫斯科为此动用了大量资金。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8 年 1 月 5 日经斯大林签署的专门决议，准许“在已拨出的 12 万美元以外，向外交人民委员部再拨款 28 万美元，用以支付‘纪念列宁’号轮船全体船员的赎金”。这样，全体船员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船员和船长不止一次宣布绝食，以抗议对他们的一次次污蔑），在济南府监狱被监禁至 1928 年 1 月上半月，时间长达 11 个月左右。没有对他们进行任何起诉，只是作为人质关押着，直到支付大笔赎金之后，他们才获释。如此看来可以得出结论，“已拨出的 12 万美元”本是用来赎法因娜·鲍罗廷娜的。著名的俄罗斯中国学家 Ю.М. 加鲁尚茨证实了我的猜测：为救鲍罗廷娜支付了相当大的一笔赎金。她本人后来也向他说过此事。在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隆重庆典上，我同奥列格·瓦西科夫不期而遇，他也向我证实，他父亲瓦西里·瓦西科夫正好也参加过营救法因娜·鲍罗廷娜的行动（赎

金的确切数额他记不清了)。为了叙述这件事我请求允许引证他的话，奥列格·瓦西科夫回答，确实很有必要恢复公正，指明那次行动的参加者的姓名了。在鲍罗廷娜所著《在中国暴君的刑讯室里》，仅在1927年5月27日北京的《预审申请》文件的译文中注有B.瓦西科夫的姓氏，此外再也没有提到过。他的儿子说，父亲当时就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是他父亲把法因娜·鲍罗廷娜藏起来，随后冒着很大的危险，沿着骆驼行走的小路穿越新疆，将她送回苏联境内（顺便说说，根据儿子的回忆，瓦西里·瓦西科夫为1929年从驻北京大使馆撤走苏联财产做了准备，亲手包装好旧俄国大使馆遗留的那些黄金制品——金质餐具等，并将这些东西全部带回苏联）。

1927年4月6日，中国士兵和警察袭击了苏联驻北京全权代表处，搜查了全权代表处武官处和职员住所，以及远东银行驻地、中东铁路代办处等，15名苏联工作人员和60名中国公民（包括李大钊及其两个女儿）被逮捕。B.B.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对这一事件是这样描述的：

4月6日上午10点半，500名士兵、警察和密探包围并占领了全权代表处的一部分，内部的一条小胡同将这部分同主要建筑隔开。所有进出口全被封锁。建有10座工作人员住房的大院子、军事区域，以及远东银行和商务代表处所在的中东铁路管理局地段，全都被士兵围得水泄不通。搜查、抢劫开始了，继而演变成一场货真价实的大破坏。匪徒们捣毁了俱乐部，搬走了藏书，夺取了银行会计账簿，搜查了商务代表的办公房，摧毁了塔斯社分社。武官的办公室和私人寓所，以及其他私人住宅都遭到搜查和洗劫……砸破门锁的巨响和载重汽车的吼叫彻夜不断。

……和中国同志一起被捕的还有15名苏联公民，其中有翻译加姆贝格（迈斯基）、武官的助手通基赫和伊利亚申科、北京大学的俄语教师斯卡京、门卫格里戈里耶夫、副领事莫罗佐夫等。

他们当中的一些人遭到毒打。当时所有当地与外国的大众传媒工具都系统刊载了据说是从全权代表处没收的文件，这些文件充分暴露了苏联特工机关在中国的活动，同时还登载了苏联军事顾问的名单，并指出了他们的化名。比如，说通基赫“管理秘密文件，依据报纸上的军事消息为武官整理综合通报，因此他被视为苏联全权代表处的秘密军事间谍而受到指控”。

外交人民委员部和苏联驻北京全权代表处抗议中国当局违背国际法的起码原则。例如，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就中国士兵和警察袭击苏联全权代表处武官办公室，逮捕并折磨全权代表处工作人员的事件，于1927年4月9日照会中国政府驻苏联代办，指出：

北京政府发表的令人难以置信和十分离奇的声明宣称，在搜查中似乎发现了可作为准备起义证据的武器和文件，这一声明可以说明，为什么会在如此特殊的情况下袭击大使馆武官处和工作人员寓所。这是因为这种情况排除了实行基本监督的可能性，在此情况下登记被查抄物品及其他事项，没有丝毫保证，一切可以被外国敌对势力利用的物品，都可能被说成在这些房屋里“找到的”，而这些势力是4月6日袭击的教唆者和赞同者。

照会中接着说：

如果北京内阁掌握的情况证明，苏联大使馆直接辖区内
有北京内阁所称从事反对其利益活动的中国公民，那么它有充分的可能也有责任将此情首先告知苏联大使馆。

鉴于上述一切情况，苏联政府坚决主张“满足下列起码的要求”：

(一) 中国军队和警察应刻不容缓地撤离武官及大使馆

和商务代表处工作人员的住所。

(二) 所有被捕的苏联大使馆和苏联各经济机构的工作人员应该立即获释。

(三) 被抄走的武官处所有文件应毫不延迟地归还。

(四) 被警察局和安国军（为反抗革命力量而建立的华北军阀联军。——作者注）司令部劫掠的金钱、财物、家俱、图书及其他财产应立即归还原主。

照会接着说：

在这些要求得到满足之前，苏联政府不得不从北京召回外交代办Г. 切尔内赫及大使馆全体人员，只留下履行领事职能的工作人员，以表示抗议。

莫斯科就这样作出了决议，召回全权代表处全体人员，只留下领事馆和奉命保护全权代表处财产的人员。

对于外国报纸刊载据说是在苏联驻北京大使馆遭袭击时被劫走的“文件”，各报刊的代表纷纷提出质询，副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不得不发表声明：

近来，由于搜查了苏联驻北京全权代表处，安国军司令部开始公布据说是在全权代表处武官处及工作人员寓所抄获的“文件”目录。此外，安国军司令部还把据说是在搜查乘坐“纪念列宁”号轮船、并在南京被张宗昌的警察逮捕的苏联外交信使时发现的文件，列入这类“文件”之内。

外国报纸刊载其记者用电报自北京转发的这些“文件”，装出相信其“真实性”的样子，再歪曲解释一通，便作出了那样一些政府需要和适用的结论，这些政府即使不是袭击苏联大使馆的发起者，也是这一行动的鼓励者。

由于遭受袭击，我们就据说是抄获的全部文件发表意见

的任何可能都被剥夺了。我官方代表中不但没有任何一个人被邀请到搜查现场，而且警察局干脆反对这样做。譬如，代办切尔内赫同志试图到军事区时，警察就不准他通过，同样也不准许我全权代表处的其他官方代表通过。……

我外交信使在南京遭逮捕和搜查的情况也非常特别。我官方代表和外交信使本人都不在场的前两次搜查一无所获。直到第三天，在白俄分子帮助下进行第三次搜查时，由于没有我官方代表和外交信使本人在场，才似乎发现了什么文件。

安国军司令部暂时只公布“文件”的目录，没有公布其详细内容。仅有的一份文件，其照片刊登在北京的《华北正报》上，具备一切伪造的特征。这份“文件”的制作者显然不知道苏联实行新的拼写法已有10年，仍然按旧拼写法写这份“文件”（尽管如果考虑到在苏联驻中国机关工作的几位俄国工作人员是从沙皇外交部门转过来的，那么可以认为他们尚未学会使用新拼写法，仍然像过去那样书写。——作者注），而且出现了一大堆严重错误。

有意思的是，有这次袭击和刊登一系列在苏联代表处发现的文件之后，英国当局却意外地发现了几份绝密英国外交文件的复制品。外交部的报告称，这些文件中有“两份特别重要的通报”属于英国大使M. 兰姆普森花几个月准备的那些文件（这也说明苏联在华情报机关工作的效率）。兰姆普森本人还断言，意大利和日本的外交代表处泄露情报的情况更为严重。

“从意大利代表处获得的文件主要包括往来于北京、罗马的重要电报的密码译文。而从日本代表处获得的文件则如此详细，以致文件上甚至注有正式接待来宾的准确时间安排和公使馆官方代表同来访者谈话的记录”。这一点证明苏联秘密机关在中国的工作搞得不错，对此，国外也承认。

此后英国代表处进行了清洗，结果办公室主任和在英国公使馆工

作的一位中国工作人员被揭露，他们为俄国人的利益进行特务活动。

历史学家 K. 恩德鲁认为，对驻北京外国公使馆开展谍报活动的主要是军事情报机关，而不是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作者举出在搜查苏联代表处时得到的一份文件，它似乎披露了苏联情报机关的工作方法。在招募外国代表处低级中国工作人员（通讯员、门卫、园丁等）细则中说：“最合适的受招募谍报员，是具备思想信念基础、在招募秘密谍报员方面受过充分训练的（共产）党员。”受招募的谍报员应该收集那些撕碎并丢进了垃圾筐的文件、“损毁的打字页、用各种印刷机印制后的第一批校样，等等”。对于在印刷机上用过的漏字板应该予以特别的关注。

对于能够获取类似材料的谍报员，应该给予金钱奖励，但是，这种金钱奖励数额不应很大，其原因有二：第一，谍报员手中握有大笔金钱会引起该代表处其他工作人员的怀疑，而其雇主会通过他们了解到实情；第二，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谍报员认为其情报具有重要价值，他会在适当时机同我们讨价还价。因此，你们应该经常向他指出，我们期待他提供更为重要的情报。如果我们向他付出的奖金多一些，那是因为我们希望他将来的工作更富有成效。可见，这些谍报员的奖金应当比他们从雇主那里得到的报酬稍微多一些”。

该细则接着指出：“由于秘密谍报员的优异工作而应该获得奖励的还有招募他们的那些谍报员，因为他们才是这一工作的推动力。”应该要求秘密谍报员表现出勤勉和一丝不苟的精神，不掩饰对雇主的忠诚和眷恋，同时去做能够避免雇主产生怀疑的一切事情。他们的联络员应该“时刻保持警惕，切记有假情报存在”；要认清，谍报员可能被代表处的工作人员揭穿，并被用来传递虚假情报。

设在上海的一些苏联机构——远东银行分行、中东铁路代办处、俄罗斯亚洲银行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当地的苏联领事馆被包围。据 B. 维什尼亚科娃回忆，“4月6日，苏联领事馆被白俄武装分子和英

国军队包围，他们企图搜查所有进出人员，连上海中国当局的外事委员也不能例外，由于他拒绝接受侮辱性的搜查，他未被准许去见总领事林德。”围困持续了两周。这段时间领事馆里有斯托亚诺维奇，他是领事馆的积极保卫者之一。所有信件和电报全都被拦截，上海领事馆的造访者全被毫无礼貌地拍了照片。

英国当局于1927年6月逮捕了斯托亚诺维奇和新闻记者戈利亚诺夫斯基，借口是他们“反对南京政府和反对现存秩序”。为英国特工机关服务的上海著名的暗探克德罗利万斯基炮制了抵毁斯托亚诺维奇的材料，以便对他追究法律责任。斯托亚诺维奇这样评价他：“克德罗利万斯基是上海罪恶世界一霸，又是对苏联机构和一些苏联工作人员拼命进行挑衅又屡屡受挫的家伙。”但是，据П. 巴拉克申的材料，B.M. 克德罗利万斯基是上海市政府警察局最能干的俄国侦探之一。服役几年后，他离开警察局，开办了私人侦探所。由于Э. 多谢尔和E. 福尔图纳托夫博士一案，克德罗利万斯基的名字开始广为人知。多谢尔是苏联公民，因从事谍报和破坏活动嫌疑被捕。搜查他的住所时，当时在上海市警察局供职的克德罗利万斯基发现了共产国际委托多谢尔发动上海工人罢工和掀起工潮的证书。多谢尔被捕后不久，福尔图纳托夫向克德罗利万斯基表示愿意出1万美元，换取他在法庭上作证：共产国际的文件系上海市警察局伪造，有人按命令塞进了多谢尔的文件。除钱外，还向克德罗利万斯基提供了去北京的火车票及带给加拉罕大使的信函，大使会尽快把他送到苏联。

克德罗利万斯基把福尔图纳托夫的建议报告了自己的主子。尔后他同福尔图纳托夫会面。福尔图纳托夫在向克德罗利万斯基交钱时，被上海警察局逮捕。

蒋介石也对斯托亚诺维奇不满，派特务监视他。国民党分子不喜欢斯托亚诺维奇与新闻记者戈利亚诺夫斯基一起在上海组建苏中新闻工作者情报委员会，不喜欢他是广泛收集情报又和在中国工作的大部分顾问很熟悉，不喜欢他一个卓越的消息灵通人士。他在中国的监狱里蹲了三个月（对他的控诉是，他的文件里有收到鲍罗廷钱款的收据，因此得出结论：他就是鲍罗廷的间谍）。只是依靠苏联驻上海领

事坚决的干预，才应斯托亚诺维奇妻子和戈利亚诺夫斯基妻子的请求，实行了认真的司法调查，江苏省最高法院开庭审理，对他们的案子作出了无罪判决，其内容如下：

江苏省最高法院判决书

被告人：斯托亚诺维奇，41岁，俄罗斯人，住上海；

戈利亚诺夫斯基，36岁。

被告人选定的辩护人：朱书正。

鉴于上述被告人被怀疑制造内部混乱，江苏省最高侦查机关请求对他们的案件进行预审。

我院现已完成预审，兹作出以下判决：终止上述案件审理。

民国十六年九月十九日

此后斯托亚诺维奇被迫携全家离开中国。

1927年4月7日，远东银行天津分行、蒙古中央合作社、中东铁路商务代办处、苏联商船队都遭到了搜查。1927年4月2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秘密会议，在听取了伏罗希洛夫和加拉罕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之后，通过决议：“将无法在当前工作地点继续合法开展工作的所有军事政治工作人员转调其他地区；召回不能提供重要情报的工作人员。”该决议建议，“鉴于武官（P.B. 隆格瓦——作者注）离开了中国，对军事工作人员的总领导暂由乌拉尔斯基（即布柳赫尔——作者注）同志负责”；责成 M.M. 拉舍维奇¹⁴⁹“销毁中东铁路的秘密和专门的往来公文”。（当然，中东铁路的工作人员中也有苏联情报员。例如，1926—1932年，中东铁路管理局的秘书即由苏联军事情报机关的工作人员 B.H. 克利亚尔费尔德担任。¹⁵⁰——作者注）这一决议的特别条第四款建议询问北满委员会，“是否已经采取措施，销毁中东铁路俄国党组织的文件”。该决议还建议“多夫加列夫斯基¹⁵¹严密侦察日本政府针对苏联、满洲和南中国的行动纲领”，并将

结果报告莫斯科。

这样，最近几个月酿成的中国革命的深刻危机，便在1927年4月十分尖锐地显露出来了。工农的阶级要求提高，共产党人的政治活动趋于积极，共产党人同国民党左派的合作扩大，鲍罗廷与蒋介石之间的分歧尖锐化，最后是帝国主义列强直接逼压，这一切导致了国民党右派，首先是其将军们，在共同的反共旗帜下发动几乎遍及各地的反革命行动。

1927年10月23日，鲍罗廷在莫斯科老布尔什维克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我们及时与蒋介石绝交了。1927年1月3日决裂已不可避免……早在1月3日我们就同蒋介石断绝了关系。”然而，这是鲍罗廷的方针。他们之间的冲突已具有尖锐性。蒋介石于2月份要求将鲍罗廷召回苏联。1927年2月22日和23日他同维经斯基谈话，2月26日又同布柳赫尔谈话，解释了自己提出这一要求的理由。1927年1月底，维经斯基向莫斯科报告了蒋介石的叛变阴谋。

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中国代表和中共代表指望动摇或者哪怕削弱蒋介石的地位，采取了根本改造武汉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和政府的方针，同时试图在南京和上海这些蒋介石军队已经逼近的中心城市实施反对蒋介石及其军队的一系列行动。中国共产党利用报刊和口头宣传，掀起了反对国民党右派的运动，矛头直指蒋介石。在鲍罗廷的压力下，1927年3月中旬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决议，严重限制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及其军事委员会的个人权力。两名共产党员参加了武汉政府。蒋介石在夺取上海的决战前随机应变，声明他服从国民党的纪律。

国民党中央执委会（1927年）三月会议之后，武汉政府首脑“经鲍罗廷同意”立即签署了逮捕蒋介石的密令。该密令交给了共产党员林伯渠——蒋介石主力军之一的党代表，当时该军军长与武汉左派关系密切¹⁵²。这一切发生在1927年4月12日上海“蒋介石政变”之前。1927年4月2日，苏联驻北京全权代表处工作人员M. 尤什克维奇同鲍罗廷在武汉进行谈话时向后者提出了一些问题，从鲍罗廷的回答来看，他未能正确估计当时的局势，过高估计了左派力量：

蒋介石一无所有。有的只是一个蒋介石光杆总司令，而他大概只有能够依靠的第1师。不错，还有一批宁波富商支持他。就是这些。我们拿下了南京。蒋介石留在船上，没有进南京。他目前在上海，在那里不敢出面。总司令如今处于“漂泊浪人”的境地，东奔西窜，不知所措。而在武汉，大多数军队跟我们干。工人和农民也跟着我们。我们拥有一切。

在同蒋介石的冲突中，鲍罗廷依靠的是湖南将军唐生智（1889—1970），此人在北伐期间是国民革命军第8军军长。

布柳赫尔对时事持有另一种较接近实际的评价。1927年4月3日，布柳赫尔在与同一个尤什克维奇的谈话时认为，夺取上海之后并不是同蒋介石决裂的有利时机。按照布柳赫尔的估计，被认为武汉国民政府支柱的唐生智的大部分军队支持蒋介石，他本人也不是很靠得住，在军界威望不高。武汉试图依靠唐生智的事实，恰好送给蒋介石一张反对武汉政府的王牌。布柳赫尔认为：“蒋介石正向右转。……他依靠军队，依靠资产阶级的重要势力，可能还依靠外国帝国主义。一系列的省，特别是那些帝国主义势力早就很强的沿海省份广东省和广西省会支持他。”他认为实际上不是我们与蒋介石断绝关系，而是蒋介石利用武汉政府动摇不定的政策，同我们断绝关系，此时决裂不是时候，也没有组织上的准备。他建议占领北京前应该继续对蒋介石相机行事，或者根本不与他决裂。后来的事变证明布柳赫尔的估计较为实际和准确，而鲍罗廷的看法则证明他不了解中国南方的局势，不了解军队力量的分布。

毫无疑问，鲍罗廷实行的政策，特别是蒋介石获得准备逮捕他本人的消息，促使蒋介石采取较为极端的斗争方法。这一点已为上海事变所证明。

中国共产党决定在上海准备新的起义。重建和补充了工人纠察队，人数达5000人，建立了市与各区的起义指挥部。为了对起义实

施领导，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党的上海委员会书记罗亦农为首的三人小组。共产党人联合国民党人和当地资产阶级共同行动。3月21日，当国民革命军各部队已进至城市接近地时，80万工人开始举行总罢工，并立即转为武装起义。3月22日傍晚，上海已处于起义者掌握之中。白崇禧将军指挥的国民革命军部队奉蒋介石命令，盼望工人被消灭，暂停进攻上海，上海释放后又开进已经解放的城市。第二天，蒋介石的另一个集团占领了南京。这本是革命的最伟大胜利，但却成为革命失败的开端。蒋介石指挥的军队立即实行戒严，企图剥夺上海起义者的胜利果实。3月26日，即白崇禧部队进城后第四天来到上海的蒋介石，不但很快同被逐出武汉后栖身上海的国民党右派——富商张静江、前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民族主义理论家陈果夫及戴季陶建立了联系，而且同中国工商界人士建立了联系。在准备政变过程中，蒋介石在上海刑事犯圈内的老关系起了一定的作用。

只有一些匪帮头子，例如青帮头子黄金荣或与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联系紧密的杜月笙，才能为实施行动提供必要的队伍。据有些材料称，在所述事件10年之前，当蒋介石还只是上海一家交易所的不知名的经纪人时，他本人已经加入了“青帮”，现在他重新与黄金荣及其帮凶们勾搭上了。3月底4月初，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蒋介石招募了几百名武器精良的亡命徒，并把他们组成共进会，其临时巢穴就设在法租界的黄金荣家里。看来蒋介石甚至对此事也不十分在意要完全保密，至少对上海国际警察机关不完全保密，该机关在（4月7日）一份报告中就提到了“共进会所采取的准备措施，这些措施的目的在于突然袭击市总工会驻地，并解除驻地人员的武装。这样的袭击行动应当由‘青帮’的会员们实施，并由穿便服的士兵支援他们”。

上海的金融银行家们给了蒋介石一定的资助。例如，第四次工会代表大会提到的数字是1500万元。1927年4月10日出版的《北京政客》写道，“银行家们以自己的基金支援反共运动，但它未说出数字”。其他材料说出了4月初的两次付款数额，一次为700万元，另

一次为 300 万元。蒋介石利用这些资助为上海的黑帮队伍（即秘密的帮会组织——青帮和红帮）提供武器和资金。在他们帮助下，工人纠察队于 1927 年 4 月 12 日被蒋介石解除了武装。在设于闸北的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发现并没收了 20 挺机枪、3000 枝步枪、200 把毛瑟手枪、100 万发子弹、2000 枝长矛。

就在这一紧要关头，帝国主义企图实施公开武装干涉。在中国领海聚集了英国、美国、日本、法国及其他国家的 170 多艘舰艇，一批批外国陆军登上中国领土。这时，蒋介石开始加紧同国民党右派及帝国主义列强的领事勾结。4 月 11 日夜间，驻上海的帝国主义各国军队逮捕了 1000 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人，并将他们交给了蒋介石的司令部。4 月 12 日凌晨 4 时，蒋介石分子用上海资本家的钱豢养和武装起来的雇佣强盗们，戴着带有“工”字的袖标作为识别标志，身着蓝色制服，在军队和警察的支持下突然袭击闸北、浦东、南市和沪西的 20 多个要点，向工人纠察队挑起武装冲突。他们在几个小时之内就解除了所有纠察队的武装，抓捕了几位工人领导人，其中包括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市里举行的群众抗议集会被用机枪驱散并遭武力镇压，工人纠察队被解除武装，约 300 名纠察队员被打死打伤。伤亡人数急速增加，工人组织都被解散，共产党员被迫紧急转入严密的地下状态。鲍罗廷和其他苏联顾问都藏到俄国商人 B.E. 乌兰诺夫在法租界的房子里。

反动军阀在广东、广西、福建、浙江和安徽各省省会同时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他们在向大众演示谁是这些地区的真正主人。这些事件在我们的文献中通常被称为“反革命政变”。

1927 年 4 月 18 日，蒋介石在南京宣告成立其有别于武汉国民政府的“南京国民政府”，这意味着国民党政权正式分裂。

所有这些事件着实令莫斯科的领导人焦急不安。1927 年 5 月 12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特别会议，听取伏罗希洛夫和加拉罕所作的中国问题报告。会议通过了决议，其中一些专项的内容是：

……

（四）责成由科肖尔、亚戈达、李维诺夫和别尔津同志

组成的委员会，重新审查外交人民委员部、共产国际执委会、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有关档案保护办法、密码文件和其他寄往国外的保密材料的寄送与保护办法的所有细则，以及达成最大限度保密的细则。该委员会的工作期限为两周。召集人为科肖尔同志。

(五) 责成李维诺夫和加拉罕同志于两周内就被捕的苏联驻北京工作人员诉讼案向政治局提交决议草案。

……

(七) 必须派专人赴中国确保销毁一切有损名誉的文件，杜绝其他文件被抄的可能。责成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为此目的派出一名负责工作人员，并同外交人民委员部和中央书记处协商该负责人员人选。

(八) 责成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外交人民委员部在派遣上述工作人员赴中国时，将依据政治局该决议制定的专门细则发给在中国工作的所有同志。

……

(十一) 由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发出密码电报，要求在工作中和销毁损害名誉的文件时采取紧急保密措施。

20世纪20年代曾在波斯、土耳其和阿富汗工作的苏联情报员A.阿加别科夫在其回忆录中证实，这样的指示很快就发出了。

1927年年中，在中国警察搜查苏联驻上海和广州领事馆后，我们收到了为全权代表处、商务代表处、情报部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拟定的通电，通电命令检查这些机构的档案文件，销毁那些可能损害苏联国外政权机构声誉的文件。全权代表处和商务代表处立即着手清理档案。挑出了一堆堆该烧的文件。这些文件在全权代表处的院子里烧了整整一个星期。火焰冲天，以致市政府以为苏联全权代表处发生了火灾，打算派消防队去救火。

我们收到了更加严厉的命令。莫斯科命令销毁所有档案文件，今后只保存最近一个月内的往来信件，保留的方法和条件是：要使大使馆一旦遭受袭击时，能够立即销毁一切损害名誉的材料。从如此匆忙的举动可以看到，莫斯科的惊慌失措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中国警察侵犯苏联驻中国外交机构后，其他国家也有发生类似侵犯事件的危险性，外交人民委员部面临着关闭一些苏联大使馆的威胁。据苏联外交家Г. 别谢多夫斯基所回忆，李维诺夫坚决要求政治局立即禁止共产国际在各大使馆的谍报机关继续开展工作，他达到了这一目的。Г. 别谢多夫斯基写道：

一些政治局委员向他指出，各大使馆在工作中同各国共产党联系完全不可避免，因为这种联系是进行世界革命的基本方针所决定的。李维诺夫答道，交给他的任务不是领导世界革命，而是领导外交人民委员部，他想拯救外交人民委员部驻外机关免遭彻底毁灭。如果把他调到共产国际工作，他当然会关心世界革命的利益，而目前他在外交人民委员部，他应该关心苏联各大使馆。

1927年6月2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莫斯科召开会议，会上再一次提出中国形势问题（报告人是温施利希特和加拉罕）。通过了以下决议：

领事及签发密码电报的人员负责绝对禁止拍发用真名签署并由官方人员和机关收取的特殊电报。真实签名及负责人员的地址、姓名应该用化名代替。

1927年7月21日，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一次听取了形势问题报告，决定“要求加伦同志（即布柳赫尔——作者

注)烧掉自己的档案文件”，同时“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国外组织广泛的运动，抗议中国枪杀共产党人”。

苏联驻北京大使馆遭受袭击和一些文件被抄走后，各方面开始对这些文件进行整理和公开。驻北京的美、英、法国武官立即对这些文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们最先对这些文件进行挑选、翻译并寄回本国。早在1927年4月19日，北京就公布了第一批文件。从此，中国和西方报刊开始翻译和公布这些文件。至6月底，公布的文件已多达30份左右。这些文件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有关苏联情报机关、苏联对国民党及其军队的军事援助和驻广州苏联顾问工作情况的材料。

著名的列宁格勒中国学家、历史学博士Г.В.叶菲莫夫在集体专题学术著作《远东国际关系》中，这样评价1927年4月6日事件：

遭到袭击时大量各类文件被掠走，其中包括这样一些文件，它们的真实性已经不能单凭搜查时没有任何苏联官方代表在场这一事实来判断了（不错，但是也有些苏联档案馆可能存有这些文件。——作者注）。第一批公布的“文件”带有明显的伪造痕迹（其中一些文件甚至是用旧拼写法写成的）。

中国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历史学家习五一尝试第二次证明：这些文件是伪造的。她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论文《苏联“阴谋”文证〈致驻华武官训令〉辨伪》公诸于世。她对一些文件（京师警察厅档案的照片复制件）进行了仔细研究，又同目击者和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张作霖的原外交官张国忱多次谈话。张国忱1927年曾领导选译苏联大使馆查抄文件的编译会，他承认第一批公布的文件中有伪造件。于是习五一得出结论：该文件（《莫斯科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关于中国问题之决议案致驻华武官训令》）是伪造的。习五一的根据何在？首先作者特别注意到“训令”与“决议案”文本存在着严重的带有政治性的意思差别，即在涉及中国革命的性质、特征

和前途这些原则性问题上，存在直接矛盾。作者将“训令”内容同共产国际的文件详作比较，有充分根据地引导读者得出“十分怀疑该‘文件’真实性”的结论。习五一虽然公正地指出，“八十多岁高龄的老人回顾五十年前的往事，某些细节可能有所出入”，但她特别提到了老人回忆中关键的一点——“将伪件执笔人与直接炮制者的名字第一次公诸于世”，此人就是白俄记者 H. 米塔列夫斯基，正是他，当年曾利用文件“翻译”的地位，出版了一本书，名为《苏联全球阴谋：在苏联驻北京大使馆抄出的未公布文件揭秘》。习五一写道：

尽管有的西方学者对米塔列夫斯基知情的可靠程度，进行过客观评述……但人们并没有料到，他就是伪件的执笔人。

顺便说，马丁·维尔伯和朱利·霍在其专题著作中同样怀疑 20 世纪 20 年代公布的一系列文件是伪件，而拒绝选入他们的书中。

在这样的情况下，俄国顾问们留在中国不无危险。他们开始返回祖国。1927 年 7 月 8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莫斯科召开紧急会议，听取了形势报告。会议通过的决议称：

我们建议班基尔（即鲍罗廷——作者注）离开（中国——作者注），以免被驱逐。班基尔应该以最适当的手续和理由安排启程。

1927 年 7 月 18 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当天以密码文件形式发往武汉的一份电报，其内容是：

致加伦、班基尔、柳克斯（即布柳赫尔、鲍罗廷、普利恰——作者注）。按照党的纪律命令班基尔立即回莫斯科。未经上级准许，班基尔不能给自己任命副手。从现在起乌拉尔斯基（即布柳赫尔——作者注）按照由此发出的预先指示支配钱款。

上级

1927年7月16日，鲍罗廷在30名工作人员和新闻记者的陪同下从汉口起程回苏联。夜里两点钟，韩健将军即组织了对他寓所的袭击，打算处理他。他们起初乘火车，后来坐汽车经过陕西、甘肃二省，穿越戈壁沙漠，到了乌兰巴托。经过张家口的普通大道已被封锁，那里驻有张作霖的军队。顾问拉平在郑州与鲍罗廷汇合。直到1927年9月29日，鲍罗廷才回到上乌丁斯克。维什尼亚科娃和阿基莫夫则更早离开汉口回国。

1927年8月，经过乔装打扮的布柳赫尔及其妻子（时任A.Л.拉祖莫夫和罗明纳兹的联络员）秘密离开了汉口。根据A.Л.拉祖莫夫的回忆，布柳赫尔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离开中国的：

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留在汉口时，几乎所有俄国顾问都已离开该市。很多人来找布柳赫尔，自愿为他效劳。中国人知道加伦将军身体欠佳，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天更差，建议他到四季如春而享有盛名的昆明去，或者到任何别的地方去。对于这样的建议，布柳赫尔回答，中国气候对他的健康有害，他必须到基斯洛沃茨克**去。蒋介石表示愿意向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提供一艘军舰，送他到上海。但是，布柳赫尔拒绝了这一建议。情况很明显，布柳赫尔受到蒋介石亲信们如此严密的“关照”，已经无法离开汉口了。当时已经决定，布柳赫尔要秘密离开。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及其妻子被乔装打扮了一番。之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这个城市的人太熟悉他了，他曾经乘汽车或驾摩托车自由自在地跑遍了汉口。一位苏联将军在当地的一份报纸上刊载了一则公告，说加伦将军及其司令部定于某月某日乘某艘轮船离开。到了指定的时间，一辆辆汽车开过来，把行李装上轮船，造成了布柳赫尔真要动身的热闹景象。出发时刻到了，

* 布柳赫尔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 俄罗斯联邦高加索地区的疗养胜地。——译者注

布柳赫尔却不见踪影。那位苏联将军声称加伦病了。船长则说他不能等下去，轮船于是离岸而去。

其实，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是第二天乘日本轮船前往上海的。而据 И. 巴拉克申的说法，情况似乎是这样：

加伦（布柳赫尔）在回莫斯科途中去上海同蒋介石见了一面。蒋介石同布柳赫尔的关系不同于他与任何共产国际和红军顾问的关系。他认为布柳赫尔是杰出的军人，品质优秀的人，完全不同于其他苏联代表。……在上海同蒋介石分别时，布柳赫尔情绪不好。蒋介石对他说：“我们还有共事的机会，不必苦恼嘛。”布柳赫尔答道：我希望这不是我们最后一次会面。¹⁵³

情报员 И. 维纳罗夫回忆道：

早在布柳赫尔的顾问团离开中国之前，我们小组就神不知鬼不觉地“融化掉”并销声匿迹了，变成了由紧急开办一些小型贸易企业并开始“赚钱”的几个商人组成的小组。不言而喻，我们通过我们的译电员加林娜（当时享有驻北京的“官方身份”），同中央、同别尔津领导的情报部保持联系。同加林娜会面，同莫斯科交换秘密信件，都是按照情报艺术的一切规则实施的。

当时在上海法租界开办了一家上海进出口公司，在北京也开办了一家这样的公司，后一个公司的老板一个是波兰人，一个是德国人，还有两位前高尔察克军队的白卫军分子。

对苏联驻中国机构的袭击持续不断。

1927年11月7日，在地方当局的大肆纵容下，白俄分子对上海苏联总领事馆实施了疯狂袭击。一群刚刚参加了为“被杀害的罗曼诺

夫一家”祈祷仪式的暴徒怒气冲冲地闯进门，企图捣毁楼房，杀害楼内所有的妇女儿童。根据我国外交官 B.H. 韦列夏金转述的著名俄国中国学家奥沙宁的回忆，这一事件是这样发生的：

被自己的首领们（其中有牧师）鼓动起来的一大群白俄侨民包围了总领事馆楼房。不知是何种原因没有来得及关闭大门。总领事馆墙下的苏州河里停着一艘平底货船，船上搭了一座绞架，暴徒们点着了“共产党员”草人。当时已断电，上层一个窗子的窗帘被煤油灯烧着了。这给杀气腾腾的人群壮了胆，有几个人冲向正门，打算闯进总领事馆大楼。按照奥沙宁的说法，是一个幸运的偶然情况救了总领事馆工作人员。正门对面架着一挺报废的“马克辛”机枪，这是此前不久躲过追捕的共产党起义者留在楼里的。白俄侨民一见到这挺机枪，就惊慌失措地后退，开始拥挤起来，有几个人被踩伤。乘袭击者张皇失措，总领事馆工作人员及时关上了大门，并用铁板加固，再用粗大的钢棍顶住，同时楼上也把火熄灭了。

在此日保卫总领事馆行动中，路德维希·马季亚尔表现最为出色。他带着手枪，是可靠守卫最前沿，即直接把守大门的三个工作人员之一。大门一度被撞开，暴徒们蜂拥而入。马季亚尔和他的同志们与敌人对峙，毫不犹豫地继续射击。这就造成了转机，匪徒抬着伤员开始逃跑，有一人被击毙躺在犯罪现场。只是在一切都已完结之后，租界的英国巡捕才出现。据中国学家 O. 涅波姆宁的资料，利用“马克辛”机枪的主意正是路德维希·马季亚尔出的。

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发专电向驻上海总领事 B.И. 科兹洛夫斯基及其同事表示感谢，在这些同事中赫然占据第一位的姓名便是路德维希·马季亚尔。

1927年12月11—13日，爆发了广州起义（广州公社宣告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最后一次尝试恢复南方革命根据地。按照预先

的决定，起义应于12月13日举行。然而，当时在上海的汪精卫得到了即将爆发起义的消息，于12月9日将此情电告张发奎，并派其妻子陈璧君将指令带到广州。1927年12月9日截获的汪精卫电报内容如下：

苏联领事馆是共产党员的大本营。我们期望您进行搜查，驱逐苏联领事。所有共产党员都应逮捕。这是目前最重要的任务。

汪精卫在1927年12月10日的电报中重复了这些要求。起义开始的时间改为1927年12月11日3时30分。这次起义最后被淹没在血泊中。显而易见，侦察员Г.И. 谢苗诺夫对组织起义起了显著的作用。可资说明的一个事实是，1928年初，中国革命失败后，Г.И. 谢苗诺夫回到莫斯科，在共产国际主席团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广州起义的报告，这次会议专门研究仅仅坚持了3天的“广州公社”失败的原因。出席会议并在这样的听众面前作报告的事实再一次证明，他在中国那次事件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尽管中国革命在那一阶段总体上遭受了挫折，但从全面看，谢苗诺夫作为军事顾问所做的工作还是得到了高度评价。1928年谢苗诺夫不但被调到情报部中央机关工作，而且还升了级，这不是偶然的。1929年5月之前，他担任情报部第二局（谍报局）副局长，这一职位是情报员谢苗诺夫的仕途顶峰。

汪精卫的指令发出后，广州苏联总领事馆受到袭击，五名工作人员于1927年12月14日被野蛮枪杀。他们是：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外局工作人员、外交官兼情报员、总领事馆秘书B.A. 乌科洛夫¹⁵⁴，副领事A.И. 哈西斯¹⁵⁵、总领事馆译电员Ф.И. 波波夫¹⁵⁶，还有П.П. 马卡罗夫¹⁵⁷、K.И. 伊万诺夫¹⁵⁸。

1927年驻广州总领事B.A. 波赫瓦林斯基¹⁵⁹（化名韦谢洛夫）是这样回忆这一悲剧事件的：

8时左右（1927年12月13日——作者注），我们已经

到了食堂，一个值班的中国人从院子里跑进来告诉大家，我们已被士兵包围。

我让同志们不要动，自己迅速跑上楼，那里可从阳台看清我们领事馆面对着的两条街。天色已经很暗，但是挤满领事馆前两条街的大群武装士兵，我还是能看得一清二楚。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看来要发生我们预料不到的危险，但会是什么？……我飞快跑到楼下，告诉同志们，反抗是无益的，并对一个工作人员——波波夫同志喊了一声，要他烧掉此前已准备好的秘密国家文件，又让其他人到楼上我的办公室去，自己则同上面提到的姓姜的中国人（他有大门的钥匙）一起来到院子大门边。

栅栏大门旁的一群武装士兵杀气腾腾的，懂英语的姜给我翻译，说他们要求打开大门。我试图通过姜与出现在门旁的军官说话。对我的回答是一阵阵野蛮的吼叫、对准我的毛瑟枪和命令打开大门。我估计文件应该已经烧掉，便让姜开门。¹⁶⁰

总领事馆的全体人员，包括家属和孩子全被逮捕，受到中国军阀最粗暴的侮辱。5位工作人员很快惨遭枪杀。整个广州开始散发哈西斯、乌科洛夫、波波夫、伊万诺夫和马卡罗夫遗体的明信片大小的照片，上面还有题字：“1927年12月14日被枪毙的5名俄国人”。

汉口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形。汉口苏联总领事馆里总共留下10—12名工作人员，其中包括B.T. 苏霍鲁科夫（1917年入党，参加过国内战争，工农红军军事学院毕业后，于1925年被派到中国工作至1927年）。对苏联总领事馆的袭击在预料之中。以下是这一事件的目击者B.T. 苏霍鲁科夫的回忆：

1927年12月26日夜间，我收到了紧急而可靠的消息，说汉口军事当局已接到蒋介石从上海下达的命令：当夜捣毁汉口苏联总领事馆，逮捕工作人员，对他们实施广州实施过

的那种镇压。由于及时获悉蒋介石的阴险计划，我们得以在最后时刻彻底销毁了所有尚未烧掉的文件和材料。

总领事馆遭到了袭击，宣布将所有俄国人驱逐至南京，由蒋介石处置。全馆人员于当日被赶进一艘快艇，沿长江东下。过了一昼夜，抵达南京，随后去上海，从上海经日本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

1927年12月23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就广州总领事馆遭袭击发表声明，称目前尚缺乏“关于广州最新事态的确切报告，但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广州的许多苏联公民遭受各种凌辱后惨死。各种消息来源中均有关于苏联副领事哈西斯同志惨死的报道，因此未必能够怀疑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的真实性。”

由于中国逮捕苏联工作人员，向中央提供情报者的范围急剧缩小。越飞1928年1月6日致函B.И.索洛维耶夫（赖特），直截了当地写道：

一次次的事件显示，我们消息闭塞。目前消息来源几乎丧失殆尽。最重要的任务是让情报工作走上正轨。

中国革命事件及苏联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着实令一些外国政府焦急不安。1927年末至1928年初，为了准备签订苏日渔业公约，日苏文化交流协会主席后藤访问了莫斯科，专门要求苏方解释在“中国的共产主义宣传”及苏联在其中所起的作用。1927年12月29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斯大林签署的决议，责成契切林就此问题解释苏联的立场。契切林应该声明：

我们不理解一些日本人表现出来的恐惧和不安。共产主义宣传是民族运动不可避免的伴随物，既然容许中国民族运动，那就一定会有共产主义宣传。从共产主义宣传的角度而言，我们对中国事务的态度是保持绝对中立。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允许任何人与共产主义宣传有这样那样的关系。我们的

任何一位职员，一旦被揭露或者被怀疑进行共产主义宣传活动，那么他不可能留在机构哪怕一秒钟。

契切林不止一次地说，1927年苏联的（首先是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是错误的。例如，1929年6月20日，他在致斯大林的信中强调，“来自中国的虚假情报使我们在1927年犯了大错误（在1923—1926年间实行极佳政策之后），而由于这些错误，所谓‘中国革命的苏联阶段’已有两年意味着这一革命完全处于低潮了”。他写道：“和尚念经式的方法，即被背得烂熟的假革命公式，以及罗明纳兹、米夫、安德烈、谢苗诺夫（《真理》出版社社长）、沙茨金和其他共青团员，都没有改变这种事实。”1929年秋，契切林致函雷科夫，再一次说“共产国际目前的路线是导致其灭亡的路线”，“在中国我们正在饱尝1927年那条致命路线的苦头”。

1928年3月1日，田中义一代表日本政府向苏联驻日大使A.A.特罗扬诺夫斯基递交一份照会，声称日本政府代表英、美、法、意等12个国家，建议苏联加入他们1919年4月在巴黎签订的禁止向中国输入武器的协定。

1928年3月1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莫斯科就此事召开由斯大林主持的会议。这次会议的记录第3项关于“日本人的建议”中说：

必须通过照会答复日本政府。责成外交人民委员部根据政治局会议交换的意见，拟定照会草案，分发给政治局委员。照会中应包含以下声明：我们现在没有，也不打算向中国输出武器。

看来，对于了解实情的人而言，这样的声明是何等的厚颜无耻，以至于最终未敢将这一观点写入A.A.特罗扬诺夫斯基致田中义一的复照中（很可能口头传达了，但没有记录在文件中）。

临近1928年时，莫斯科中央领导机关遇到了财政困难，也不可

能像过去那样向驻中国谍报机关汇款。一些驻外谍报站长便向其他相关部门借钱。1928年5月17日的一份文件雄辩地证明了这种情况：

绝密。共产国际执委会皮亚特尼茨基同志亲鉴。

我们驻上海的代表阿列克谢耶夫同志曾借给阿尔布雷希特同志4000美元。因此阿列克谢耶夫同志现在无钱可花，他请求贵部门发急电告知阿尔布雷希特同志向他还钱。此外，遵照您的嘱咐，在哈尔滨已从我们的资金中向贵系统拨出2000美元，这笔款至今尚未归还我们。

请您尽速向上海发出相应命令，并请在这里偿还我们2000美元。

工农红军司令部第四部部长别尔津

1928年6月4日，一列火车在南满铁路一座高架桥下被炸（一种说法认为是日本人策划的），车上的张作霖被炸死。张作霖遇害后，其子张学良继续在中国实行敌视苏联的政策。

1928年12月22日，中国警察部队占领属于中东铁路并由苏中双方共同管理的哈尔滨电话局。受张学良节制的东北各省当局拒绝就解决这一冲突与苏联代表谈判。1929年1月初，苏联公民办的发行上万份的报纸《议论》被查封（该报主编兼出版者为H.П.涅奇金，此前他化名尼古拉·杰维利为《生活新闻》当编辑。报纸被查封后，涅奇金被驱逐出哈尔滨）。尔后，一个在中国警察机关效劳的白俄分子莫洛卡诺夫公然在哈尔滨总领事馆开枪射击。

5月27日，米崇凌将军带领大队中国警察（其中有几个俄国人）违反一切国际法准则，袭击哈尔滨总领事馆，包围了大楼。总领事馆当局得到了一位中国警察职员的通知，给总领事馆各入口装上了严实的铁门。警察在发出破门的严重威胁后，才进入了大楼，据说总领事馆的职员们正在匆忙焚烧秘密文件。

《大满洲帝国》一书这样描述这一事件：

5月27日中午1点钟，几队警察突然包围了哈尔滨苏联总领事馆大楼。在警察要求开门，双方与各自首长联络之时，以领事梅利尼科夫为首的官员，正在为数众多的办公室和档案室里急忙焚烧笔记、记录、命令，也就是能够反映在满洲进行红色破坏工作的一切。许多东西都烧掉了，但是警察弄到手的材料已足以使人们认识北满铁路“商业”活动的性质与规模。搜查使当局掌握了如此严重损害苏联领事馆名誉的材料，证据又如此确凿，以至布尔什维克外交机关甚至不敢提出抗议。

如该书所称，“搜查取得的证据表明，许多苏联重要的达官显宦（如拉什克维奇、黑克尔、格兰特等人）搞的是军事性质的特殊工作”。

搜查过后，警察拘捕了总领事梅利尼科夫、副领事兹纳缅斯基、驻奉天总领事库兹涅佐夫、远东商务代表处主任钦巴列维奇、苏联商船队监察员塔拉诺夫、中东铁路商务处职员斯坦克维奇。最后被逮捕的三个人是国际红十字会理事会执行委员会的负责人，该组织领导满洲的工会、共青团、少先队、妇女及其他一切组织的工作。总共拘捕了80人左右，抄走了领事馆的来往信件。警察在对哈尔滨总领事馆进行袭击的同时，也袭击了驻瑗珲*、齐齐哈尔和满洲里的苏联领事馆。哈尔滨总领事馆的职员被讯问后获释。而同苏联各领事馆和中东铁路管理局没有任何关系的39人却被押送至奉天受审。

7月21日，南京政府就这次袭击事件发表“公告”，断言在哈尔滨总领事馆缴获了关于“阴谋反对中国统一”、“组建针对南京和奉天活动家的暗杀团”、“建立破坏中东铁路秘密军队”的文件。除上述文件外，在苏联总领事馆还发现了日本总领事馆的一些官方信封和两枚美国驻哈尔滨领事馆的公章。莫斯科急忙向人们保证自己完全与此无关，声称这一切是为中国警察效劳的俄侨耍的阴谋，指责俄侨在搜查

* 又作“爱珲”、“爱辉”，在今黑河市。——译者注

时偷偷塞进了这些信封和公章，企图败坏总领事馆的名誉。

日本政府闭口不谈信封之事，但进一步加强了对其领事馆职员的监督。美国国务院同日本在处理此事过程中的考虑一样，并未特别重视中国当局的声明。他们任何一方都不愿想到他们的领事馆人员中并非一切如意，而有奸细存在。

1929年6月13日的《纽约时报》援引了一份在苏联总领事馆抄到的发给远东边疆区党委的电报，内容如下：

中国出现的骚动应该能够帮助我们改善在远东的地位。许多小组不同意中国统一的思想，如果他们积极行动，我们就能夺回我们过去在中国占有的地位……制造风潮为时尚早……

中国报刊掀起了新一轮集中的反苏反共运动。

作为报复措施，苏联采取了行政手段，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逮捕了几十名非法的中国银行业者，在全国逮捕了数百名“刑事罪犯”，其中几个人已经判罪，另外一些人正受到侦查。冯玉祥的子女当时在苏联，不准他们离开俄国。

中方通过其领事韩书曾于1928年春建议调整苏联与北京政府的关系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8年4月19日召开会议，通过了斯大林签署的决议，同意中方提出的建议。为此提出了五个条件：

（一）……互致信函申明互不干涉内政（可能履行不支持敌对集团的义务）；

（二）北京政府对袭击俄国驻北京代表处表示歉意或遗憾；

（三）释放在北京被捕的人员（15名）；

（四）我们恢复大使馆，派遣我们的外交代表赴北京；

（五）在我国境内按行政手段和司法程序逮捕的中国人将获释出狱，返回中国。释放和出境根据北京政府或中国各

领事提供的名单，经被捕者同意后实施。

三、如果完全解决双方关系问题的谈判拖延下去，可以首先根据第二项之（三）和（五）款，互相释放被捕人员。

四、在谈判过程中，尝试扩大释放我国公民的问题，争取释放不同时间在哈尔滨和满洲其他各城市被捕的人员。

五、在我们的条件中一定要包括一条要求：北京政府解散武装白俄队伍，并将他们驱逐出满洲。

六、不反对冯玉祥的子女离开苏联。

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工作的一个专门委员会，于1928年3月22日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了针对中国人的建议，即“释放已经逮捕和判罪的57名非法中国银行老板，条件是他们必须立即离开苏联”（如果中国领事要求释放他们的话）。该委员会接着建议，“采取紧急措施，释放关在监狱中的数百名被捕的中国刑事犯”，“将同意回国的部分被捕人员遣送回中国”。委员会建议，“为了瓦解从事外汇投机的中国非法银行组织”，可以逮捕“该组织的头目，但不超过5—10人”。同时建议今后要避免大量逮捕和大量驱逐中国人的做法。不过，这最后一项建议看来未被注意。从中华民国驻苏联代办夏维松1929年7月17日致加拉罕的照会中可看清这一点。该照会称：

据外交部得自驻苏联大使馆和各领事馆的报告，苏联国家政治保安局毫无理由地逮捕并监禁我国侨民和商人不少于千名。

1929年6月初，驻奉天总领事库兹涅佐夫与两位领事馆职员在回莫斯科的路上于海拉尔车站被捕。但被捕者很快就获释，因为检查行李时未发现任何暴露性的材料。不过在满洲里的警察忙着检查库兹涅佐夫的行李时，苏联领事馆另一位职员携带大量行李，已乘汽车越过了满洲与苏联边界，在这些行李中大概有中国当局这么起劲寻找的东西。

1929年7月17日，苏联又一次发出照会：

中国政府的照会没有表示停止对苏联公民和苏联机构的非法迫害，反而认为这些迫害是合法的行为，虚伪地试图为这样的行为辩护，假称苏联对中国公民进行了大规模的迫害，其实它很清楚苏联只是对中国公民中的一小撮特务、鸦片商、窝主、走私犯和其他刑事犯进行惩罚。

1929年7月初，蒋介石与张学良在北京会晤，作出了武装夺取中东铁路的决定。蒋介石为促使张学良采取这一步骤，千方百计地将少帅置于完全受制于南京的地位，同时提高自己的威望，让南京攫取中东铁路运营的大部分利润。张学良也认为夺取中东铁路将巩固他在东北的地位，使他能够自行支配中东铁路的利润，保障他对南京的独立性。

1929年7月10日，中国当局违背1924年苏中协定，占领了中东铁路全线的电报局，查封了苏联商务代办处及驻中国东北各省的其他苏联经济机构。按照中东铁路理事长吕荣寰的命令，中东路的苏联职员全被解职，200多名苏联铁路员工被逮捕，投入监狱，其中85人是海拉尔站、60人是博克图站的员工；大约60名苏联公民，包括中东铁路局长叶尔马舍夫被驱逐出中国。被逮捕的苏联铁路员工总数增加到2000多人。张学良军队和白俄队伍集结于苏联边境沿线。从6月中旬起，中国军队和白俄部队不断袭击苏联领土。一支白俄武装曾闯入后贝加尔地区，前出至涅尔琴斯克以北15英里处。另一支队伍渡过乌苏里江，袭击了伊曼地区的一个苏联哨所，几名苏联边防军人被打死。

对居住在哈尔滨及中东铁路沿线各城市的苏联公民的迫害仍未停止，其中有2000多人被关进集中营，过着非人的生活。7月15日，蒋介石公开声明要控制中东铁路，7月22日，南京政府发表声明，公然号召同苏联开战。

苏联政府在其1929年7月17日的照会中声明，鉴于“通过协商

解决中国当局挑起的中东铁路争议和冲突所需要的一切手段已经穷尽”，苏联政府被迫采取以下措施：

- 一、从中国召回所有苏联外交、领事和商务代表。
- 二、从中国召回苏联政府任命的中东铁路所有人员。
- 三、停止中苏之间一切铁路联系。
- 四、建议中华民国驻苏联外交和领事代表立即离开苏联。

那么究竟什么原因促使中国当局同苏联发生冲突呢？

第一，蒋介石和张学良错误地认为苏联未准备好使用武力保卫自己的利益。第二，蒋张二人都渴望借助夺取中东铁路来巩固自己的国内国际地位，并改善财政状况。同苏联冲突的顺利结局，使南京政府有理由作出更大努力，争取取消对中国不平等的国际协定，使自己得到国际上的承认。对蒋介石而言，夺取中东铁路的举动使其能够制止张学良与冯玉祥结盟，削弱满洲统治者的实力，将其置于南京政府的控制之下。对张学良而言，取得冲突胜利可使他更加不受蒋介石的约束，提高他在中国的政治威望。

苏联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实行了局部动员。苏军被调到绥芬河和满洲里附近。

苏联在苏中关系中采用武力解决中东铁路问题，出乎中国领袖们的意料之外。由此可以看到，苏联因蒋介石反共反苏及苏联外交政策在中国遭受挫折而希望惩罚蒋介石，可以看到苏联向中国和全世界显示其军事实力，以此证明苏联政治体制稳固的意图。为了达到以上目的，苏联选择了正确的策略：没有立即卷入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而是表现出忍耐精神，稍作间歇，等待时机，待敌人因内部矛盾（蒋介石与冯玉祥争斗）而削弱了力量之后，给予毁灭性的打击。据这一事件的参加者崔可夫元帅回忆，苏军在满洲里市地区消灭了约2万人的两个加强旅，俘虏1万人左右。中国军队伤亡惨重。按照苏联政府同日本的预先协议，苏军未越过海拉尔和满洲里。密山战役在有零星白俄

游击队活动的兴凯湖以西进行。11月17日，苏军在航空兵支援下攻击配置在密山附近的奉军骑兵第1师和驻太平镇地区的步兵第42团。进攻持续了两天，到11月18日晚终前，穆棱河以东整个区域的满洲军队全被肃清。

满洲里-扎赉诺尔战役和密山战役结束后，奉天政府和南京政府开始求和。

1929年12月22日签订了《伯力会议议定书》，根据该议定书，满洲的军事行动宣告结束，苏联被捕人员获释，中东铁路恢复了1924年协定规定的原状。

Л. А. 阿努洛夫是中东铁路战斗的参加者，从1929年起他是情报部派驻中国的谍报负责人¹⁶¹。

莫斯科的领导人显然不满意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一时期的消极行动及长时间杳无音讯。1929年12月29日，《真理报》刊载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这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与加入该组织的各党相互关系实践中极为罕见）。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在该信中对中局势和那些年间一系列迫切问题，其中包括对中国各军阀集团同蒋介石之间再次爆发军事行动，建立反对南京国民党的“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的问题，苏中关系因哈尔滨苏联总领事馆遭国民党当局和白俄分子袭击而变得复杂化的问题，企图夺取中东铁路的问题，中国内部经济情况问题，工农运动状况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信中还指出：

无法预言全国危机向直接革命形势转变的速度。但是，现在就可以而且应该使群众做好准备，通过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和地主集团的政权，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人阶级和农民专政，积极开展和日益扩大各种革命形式的阶级斗争（群众性的政治罢工、革命游行示威、游击行动，等等）……共产党思想政治影响力和工人阶级的组织性，依然落后于群众性的不满情绪和不断积聚的革命动力的增长，落后于自发的运

动。

共产国际执委会接着建议中国共产党为获得反帝运动的领导权，其中包括反对美帝国主义而斗争，建议适应满洲事件发动保卫苏联的运动，并公开号召推翻现存制度：

巩固和扩大游击斗争，特别是在满洲地区及毛泽东和贺龙活动的地区……努力创建苏维埃根据地。

1930年3月初，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周恩来从上海出发（经德国）前往莫斯科。他奉命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中央在党的六大后所做的工作。出发之前，他准备了有关中国红军的数量、装备及分布情况的专门报告。看来，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表明中国共产党在这几年并非无所作为，另一方面是说明中共缺乏武器，苏联在这方面应给予援助。据周恩来提供的资料，中国红军当时总共有62700人，装备38950枝步枪；游击队在中国10个省的162个县活动。



结 束 语

在任何历史阶段、任何制度和任何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情报机关都应该保卫国家利益。那些年我们苏维埃情报机关和任何国家工具一样，不可能不是为意识形态服务的组织。肃反委员会、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包括对外情报机关、军事情报机关、共产国际各部门首先是国际联络局，都是联共（布）的工具。这些组织正是以这种资格“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口号下”开展活动。俄罗斯情报机关在 1917 年前已有自己的发展史和积累的经验。下面就是俄国情报机关的几个重要发展阶段。首先，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于 1654 年建立了枢密衙门，作为特别办公厅代替外交事务衙门开展情报活动。从这时起，密码开始采用于秘密通信的正规实践活动。随后在 1716 年彼得一世的新军事条令中，情报工作第一次有了法律基础，由总军需部门负责实施。之后在 1810 年，俄陆军大臣 M. B. 巴克莱·德·托利向俄国驻欧洲一些国家的大使馆派遣了第一批常驻代表——“军事谍报员”。从此开始依靠正规的职业机构获得国外的秘密军事政治情报。最后，到 1856 年，亚历山大二世批准了俄国情报史上第一部军事谍报工作条例，对外情报职能越来越成为军人的特权。1905 年，俄国在同日本的战争中遭到惨败之后，总参谋部军事学院第一次开设秘密情报课程，训练基干职业情报员的工作始上正轨。至此，大家都已理解“一名好间谍抵得上整支军队”这句格言的含义。

本书提供的材料清楚表明了 20 世纪 20 年代苏联驻中国情报机关的形成过程。年轻的苏维埃情报机关只是在寻找国外工作的途径与方

法。工作中常常遇到那些年存在的大量困难（在财政、组织、干部、技术等方面），这些困难妨碍了在同俄罗斯相邻或不相邻国家领土上建立高效情报网的工作，我们的机关试图克服这些困难（时而顺利，时而不大顺利）。

根据本书提供的具体文件和材料（其中许多是首次取自俄国秘密档案并用于科学研究），可以看到：苏联驻中国情报机关如何形成，莫斯科怎样和通过谁领导在中国的情报网，当时建立了哪些中心，这些中心又如何工作。每一个中心都有自己的目标、任务和谍报网。他们之间为了获取情报不乏竞争，有时候又不得不和其他机关分享同一情报。

假定苏联在中国的情报工作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则 1920—1925 年为第一阶段，1926—1929 年为第二阶段。

20 年代国家政治保安局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外局境外情报机关的主要任务是：同莫斯科认为准备对苏联实施军事进攻的武装白俄侨民进行斗争；判明主要帝国主义国家针对苏联的真实目标和任务，以及这些国家可能对我国领土实施的武装干涉；破译外国密码，揭露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包括日本）的计划。在中国领土，即东方最好的“开发地区”（在西方，驻柏林谍报机关所在地被认为是这样的地区），对外情报机关（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外局）除获取有关中国的情报外，还开始对其邻国——日本、印度、东南亚国家做工作。20 年代初在北京、哈尔滨建立的驻外谍报机关由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外局直接领导。考虑到距离遥远，驻赤塔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外局远东全权代表处直接在中国开展情报工作，并向满洲和中国派遣秘密谍报机关。

如果说 1926 年驻中国“合法”谍报机关有 5 个，秘密谍报机关有十多个，那么 3 年后，在 1929 年，“合法”谍报机关已达 13 个，其中 5 个设在满洲。谍报机关数量猛增的原因是：中国局势更加复杂，政治上混乱不堪，国家四分五裂，实际上有许多地区性政府并发生了国内战争。由于北京政府加强了其政策的反苏倾向，进行了一系列军事挑衅，强占苏联驻中国多个领事馆，临近 20 年代末，苏联总

谍报机关从北京迁到了哈尔滨。

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外局在中国实施的最成功的行动是：

一、1923年，苏联驻奉天各谍报站从日本特工机关获得整个远东地区白卫反间谍机构的档案材料，并立即呈送莫斯科。

二、1924年，借助外国间谍机关之力，查明了哈尔滨的白俄地下组织情况。尔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外局派人取代秘密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领导匪帮的科瓦廖夫中尉。结果成功破获白匪地下组织设在我国境内的一个分部，1925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就科瓦廖夫及该组织其他成员一案开始公开审判。

三、哈尔滨谍报机关获得了证据确凿的材料，证明东京制定了1928年在中国东北建立“满洲独立共和国”的计划。

四、在哈尔滨获得《田中奏折》的复制件，后来又在汉城获得，并在世界各报刊广泛登载（尽管有些专家认为，这个奏折是莫斯科炮制的伪造文件）。日本投降后，1946—1948年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审判日本主要战争罪犯时，该奏折成为控诉人的第169号证据。

军事情报机关应该判明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以及在那些年互相厮杀的中国军阀的军事与技术潜力。

苏维埃俄国军事情报机关对于组建、训练和武装国民党军队和所谓国民军，以及创建培养军事干部的黄埔军校和其他军事学校，作出了最大的贡献。苏联军事顾问在中国积极传授自己的经验和知识，拟制军事战役计划（B.K. 布柳赫尔在中国闻名遐迩）。

驻中国的共产国际机关如同在全世界一样，也首先致力于蓬勃开展世界革命。他们负责在中国、朝鲜和日本创建共产党，出版表达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观点的“进步报纸和杂志”。共产国际国际联络局负责从苏联向中国输送进步的和共产主义的读物，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活动秘密提供经费，保障共产国际同中国共产党的联络，护送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到苏联参加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并将他们送回中国。共产国际为在苏联各专业学校、军事学校和军事学院训练中国人作出了很大贡献。20年代，国际联络局工作人员和中共领导人共同在中国选派赴苏联学习的学生。

苏联驻中国外交使团和各领事馆遭挑衅和侵占、两个邻邦的外交关系实际破裂、中东铁路被夺占之后，日本在 1929 年又开始积极准备侵略满洲，苏联情报机关面临着一些新任务，他们必须在 30 年代采取其他手段和方法，才能完成这些任务。

应该指出的是，在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工作的大部分情报员、谍报站长、共产国际工作人员，不是牺牲于敌人之手，而是牺牲于苏联“大恐怖”时期的苏联审判和惩罚机关的假指控。下面仅列出牺牲者名单中的一些人：阿道夫·越飞，以自杀结束生命，抗议灭绝政敌的行径；苏联第一位驻中国大使、副外交人民委员列夫·加拉罕，因拒绝在装模作样的审判中承认自己未犯的罪行，不经宣判就于 1937 年 12 月在卢比扬卡被枪决；共产国际国际联络局领导人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受到迫害并被枪决；共产国际成员和广州公社三人小组成员之一约瑟夫·佩佩尔于 1936 年在莫斯科被解职并被枪决；布柳赫尔元帅和自己的副官一起于 1938 年在莫斯科“梅特罗波尔”旅馆被杀害；担任过驻北京武官的叶戈罗夫元帅、黑克尔（军级*）、拉平（薛福林）都因图哈切夫斯基案件被枪决；因此案被枪决的还有国内战争英雄、杰出的红军首长之一 B. M. 普里马科夫（军级）；应孙中山个人的邀请，于 1923 年至 1927 年 7 月在中国担任总政治顾问，尔后担任《莫斯科新闻》报主编的 M. 鲍罗廷（格鲁森贝格）同样遭到镇压。乌拉尔的战士、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负责从托博尔斯克押送沙皇一家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特派员、中国共产党组织者之一的 B. B. 雅科夫列夫也成了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的囚徒，并于 1938 年成为迫害的牺牲品。牺牲在迫害“绞肉机”之下的人员名单远不限于已经说出的这些姓名，这个名单可以无穷尽地说下去。最后应该说明，20 年代在中国工作的许多情报员、军事顾问和政治顾问的姓名，在我国国内仍然很少有人知晓或者完全无人知晓，他们当中许多人以化名工作，直到今日也没有恢复他们的真实姓名。因此我们的责任就是缅怀他们和叙述他们的活动。

* 军级是苏联 1935 年颁布的相当于中将的一级军衔。——译者注

注 释*

1 即 Я. X. 达夫强。

2 据 A. 科库林和 H. 彼得罗夫合著：《全俄肃反委员会(1917—1922)》及《自由思想》杂志 1998 年第 6 期第 109 页资料，达夫强是亚美尼亚商人的儿子，曾就读于彼得格勒，1905 年还是大学生时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3 年后因参加政治活动被捕，尔后侨居比利时。在那里接受了工程教育。1915 年返回俄国，途中被抓进用来关押被拘俄国公民的德国监狱。革命后作为俄国红十字会代表团成员去过巴黎。这一工作开阔了他的政治视野，丰富了他的世界文化知识。他养成了高雅的举止，出色掌握了对他今后工作很有用处的 3 种欧洲语言。1919 年回到俄国，请求中央安排工作时考虑他具备国外经验的情况。从 1920 年初起，达夫强开始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不久就担任了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与波兰局局长。此时捷尔任斯基正在物色全俄肃反委员会对外局局长的可靠人选。伊涅萨·阿尔曼德很了解达夫强在国外工作的情况，建议捷尔任斯基考察他的候选人资格。于是捷尔任斯基请求中央将达夫强从外交人民委员部调至全俄肃反委员会机关担任即将设立的对外局代理局长职务。不久（1920 年 11 月 12 日），中央组织局的记录确认：“满足捷尔任斯基同志的请求，调达夫强同志归其任用。”

1921 年 2 月前，达夫强兼任外交人民委员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

* 原书注释是全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共有 942 条。译者翻译了其中绝大部分人物简介（其中凡在中国工作过的人一律译出），而舍弃了大量书目索引。——译者注

与波兰局局长和全俄肃反委员会对外局代局长。

3 特里利谢尔·梅尔·阿布拉莫维奇* (1883—1940, 化名莫斯科温), 阿斯特拉罕人, 1901 年仅 18 岁就成为职业革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其主要工作是查明混在布尔什维克流亡者中的警察密探。1906 年曾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芬兰军事组织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人。被捕和受审后, 被押赴西伯利亚服无期徒刑。后来成为东西伯利亚与后贝加尔苏维埃兵役委员会委员, 远东共和国阿穆尔州政府特使, 在那里建立了苏维埃远东第一个用于同中央联络的专设密码机构, 并开始组建侦察谍报机关。R·法利戈和 R·科费尔认为, 特里利谢尔曾和他的弟弟一起在共产国际的情报机关工作。但是他们可能搞错了(尽管特里利谢尔确有一个弟弟)。其实这是同一个人在两个组织工作。例如, 我们在共产国际组织局 1922 年 12 月 19 日关于建立秘密委员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常设秘密委员会)的决议中, 可以看到 M. 特里利谢尔的姓名与 И. 皮亚特尼茨基、Г. 埃别尔莱因和 Э. 普鲁赫尼亚克的姓名一起出现。

1921 年 2 月, 特里利谢尔作为后贝加尔共产党员的代表参加了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当时曾建议他去中央机关研究远东党组织的领导问题。半年后, 即 1921 年 8 月, 捷尔任斯基调他到全俄肃反委员会对外局工作。曾在西欧和东欧各国开展情报工作。后来遭到镇压, 死后恢复了名誉。

4 Г. И. 博基, 1878 年生于乌克兰一个教师 and 老布尔什维克家庭。参加过 1905 年和 1917 年革命, 曾 12 次在沙皇监狱服满刑期, 两次流放到西伯利亚。1937 年遭到镇压。

5 安德烈·瓦西里耶维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1883—1941), 1911 年毕业于总参谋部军事学院, 军衔为上校。1917 年 11 月至 1918 年 9 月领导国外谍报工作。1918 年 9 月因公前往布良斯克地区,

* 第一章已注释说明俄罗斯及苏联其他民族人姓名的用法: 在需要突出姓氏时, 全称按姓、名、父名顺序排列, 这里特里利谢尔是姓, 尔后依次为名和父名, 和正文不一致。后面的注释大多如此排列。——译者注

乘机越过战线投靠白卫军。1941年死于法国。

6 施瓦茨·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1882—1936），1911年毕业于总参谋部军事学院，上校。1918年1月至10月领导谍报工作，尔后供职于工农红军司令部，曾在工农红军军事学院任教，担任过该院东方系主任。

7 H. M. 波塔波夫（1871—1946），总参谋部总局军务总监。1917年7月起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军事组织合作，领导总参谋部总局到该局在1918年5月撤销。尔后曾担任军事部门各种领导职务，从事军事科学和教学工作。曾参加肃反委员会的“托拉斯”行动。中将。

8 阿拉洛夫·谢苗·伊万诺维奇（1880—1969），商人之子，先后毕业于商业学校和商学院。1902年以享受优待的身份* 志愿参加佩尔诺夫近卫军团，在这里参加了社会民主运动。后相继参加了俄日战争和1905—1907年革命，被缺席判处枪决。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军衔为上尉。1917年二月革命后先后任第3集团军军人委员会副主席、主席，投靠孟什维克，坚持护国主义立场。十月革命后任副团长。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18—1920年先后任莫斯科军区作战部长和陆海军人民委员部作战部长，西南方面军第12、第14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8年11月至1919年6月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司令部登记局长（情报部长）。

9 奥谢姆·弗拉基米尔·赫里斯季安诺维奇（1879—1937），毕业于武备中学。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9年起被流放多年。1989年恢复名誉。

10 伦茨曼·扬·达维多维奇（1881—1939），1899年入党，1917—1919年在拉托维亚工作。1921年后担任共产国际拉托维亚支部工作人员。1937年11月24日被逮捕，1939年3月被枪决。1956年恢复名誉。

* 19世纪到20世纪初，俄国对受过高等或中等教育、志愿参军的人在服役上提供优待条件。——译者注

11 别尔津的真实姓名为彼得里斯·丘济斯。1889年生于拉脱维亚一个农民家庭。从15岁起积极参加地下革命组织的工作。1906年在与警察冲突时受伤被捕。军事法庭判他服苦役8年。但是由于他尚未成年，这一刑罚以两年监禁代替。1911年又因武装袭击银行被捕，流放到伊尔库茨克，3年后返回。随后被征召参加沙皇军队，开小差逃跑后来到彼得格勒，在那里当钳工。1917年2月积极参加革命。夏季，当布尔什维克及托洛茨基拥护者们为反抗孟什维克而准备武器时，彼得里斯·丘济斯在拉脱维亚革命小报《无产阶级斗争报》当编辑。1917年10月，他已经在布尔什维克党彼得格勒委员会工作。他成了扬·卡尔洛维奇·别尔津，人们非正式称他为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他指挥一支特别分队，其职责之一是保卫列宁和其他党的领袖。他在这一工作中表现出众。在进行反间谍工作时，他伪装成被收买的准备与现制度的敌人合作的钻营家而一试身手，由于角色扮演逼真，打入了罗伯特·布鲁斯·罗克哈特*领导的英国情报网。后来他成为拉脱维亚副内务人民委员，开始同红军接触。他在肃反委员会监督下，组建了第一批军事侦察队伍，首先对军官进行监督。其任务是揭露白卫军派遣的“反革命分子”。1921年4月被调到红军情报部，几乎立刻被任命为从事对外情报工作的第3局领导人。从1924年3月至1935年，一直担任情报部长。1936—1937年担任西班牙共和军总军事顾问。1937年11月27日被捕，1938年7月29日被枪决。后得到平反昭雪。（参见B. 皮亚特尼茨基：《反斯大林的阴谋》，莫斯科1998年版，第424页）

12 A. M. 尼科诺夫（1893—1937），苏联军事情报领导人之一。生于奥洛涅茨省列利科沃村。神学院毕业并读完师范学院一年级后，被征召服兵役。1916年毕业于彼得戈夫准尉学校。参加了第一

* 罗伯特·布鲁斯·罗克哈特（Robert Bruce Lockhart, 1887—1970），英国驻外新闻记者，1912年起驻俄国。1918年任驻苏维埃俄国公使，因组织间谍活动和策划反苏维埃阴谋被俄肃反委员会揭露而被驱逐出境。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继续在英国外交部从事情报工作。——译者注

次世界大战，在步兵第44师服役，军衔为陆军少尉。1918年加入俄共（布），参加过国内战争。先后任战役集群副参谋长、步兵第2师第6旅参谋长，在北方拉脱维亚战线作战，参加了远征华沙战役。1921年起在情报部第3局工作，1922—1924年任第3局副局长，1924年起任工农红军总参谋部第四部（情报部）第3局（情报统计局）局长，从1925年起兼任第四部部长助理。尼科诺夫是Я. К. 别尔津的亲密战友。1927年毕业于高级指挥人员进修班。1935—1937年任情报部副部长。在别尔津被捕后，任情报部代部长。1937年10月3日被捕，26日被枪决。

13 В. В. 萨温科夫（1879—1925），社会革命党积极分子，该党“战斗组织”领导人之一，临时政府军事部副部长，彼得格勒总督。十月革命后一系列反苏维埃阴谋的组织者。1924年被逮捕，死于狱中。

14 В. М. 切尔诺夫（1873—1952），社会革命党创建人之一，该党理论家。1917年5—8月任临时政府农业部长。十月革命后曾是俄国境内若干反革命政府的成员。1920年流亡国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参加过抵抗运动。

15 “民族中心”是前立宪民主党人、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企业主的联盟，1918年在莫斯科建立。1919年4月，该中心与莫斯科其他组织——“复兴联盟”、“社会活动家委员会”合并成“策略中心”。按照全俄肃反委员会的说法，“策略中心准备进行支援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军队的反革命暴动。它与国外反革命分子保持联系。8月16—20日对‘民族中心’案进行了审理。”参见1920年8月17日、19日、22日《消息报》。

16 根据俄共（布）中央1919年7月18日决定，共产国际常设局决定从其编成中调人组成共产国际小常设局。其成员有：Я. 别尔津、А. 鲁德尼扬斯基、Г. 克林格尔、Н. 布哈林（担任俄共（布）的代表）。1920年4月24日，小常设局经过改选，由下列人员组成：Н. 布哈林、К. 拉狄克、Я. 别尔津、Г. 克林格尔、А. 鲁德尼扬斯基。小常设局开始发挥共产国际领导机关的作用。

17 Д. С. 贝科（贝卡）（1885—1946），1905年革命时期曾是

著名的“林中兄弟”运动*领导人之一。1910—1917年侨居美国。当时他还兼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18 塔尔希斯·约谢尔·奥里翁诺夫（皮亚特尼茨基·约瑟夫·阿罗诺维奇），1882年生于科韦利省的小城市维利科米尔（今立陶宛乌克兰梅尔格市）。有3个哥哥和3个姐妹。他靠自学达到了能读俄语、犹太语和立陶宛语报纸、传单而不是识字课本的水平，这些报纸和传单多数具有革命内容。其家人只说犹太语。13岁时，父母亲将他送到一个专做女装的裁缝处当学徒。于是他成了手艺人，开始独立生活。1897年底，约谢尔到科夫诺（考纳斯）一个哥哥家里住下来。哥哥是个木工。约谢尔参加了自学小组和木工秘密工会的活动。由此直接走上了从事地下革命活动的道路。耐人寻味的是，皮亚特尼茨基在共产国际的未来战友——普兰普斯·艾杜基亚维丘斯、阿伦·索尔茨和维克季·卡普苏卡斯（米茨克维奇），以及年轻的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都在同一时期在科夫诺开始活动。

约谢尔后来从科夫诺迁到维尔诺**，在当地同志的帮助下找到了工作，参加了女装裁缝秘密工会，不久当上了该工会不脱产的秘书兼出纳员。就在维尔诺，皮亚特尼茨基于1900年接受战斗洗礼，参加了夺取警察局和营救3位被捕同志的战斗。两星期后，他奉命护送被营救同志中的两位妇女越过边境。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秘密越境，以后他竟有10年专门从事这一活动。

除犹太语和立陶宛语外，约谢尔讲俄语和德语都很差，波兰语只会一点。据他同时代的人回忆，他很随和，机智，能干，勇敢。尽管他天生热情如火，却善于将勇敢精神同精确的算计结合起来。他在维尔诺结识了代号为费夫奇克的钳工，此人受当时刚与《火星报》联合的“劳动解放社”派遣，由巴黎来到这里。约谢尔从来人口中获悉“劳动解放社”的计划和准备出版《火星报》的情况。接着他结识了

* 拉托维亚游击队组织，1905年12月至1906年12月间在拉托维亚社会民主党人领导下活动，依靠农民。1905—1907年革命失败后解散。——译者注

** 即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译者注

马尔托夫（采杰尔包姆）的弟弟谢尔盖·采杰尔包姆（叶若夫）。约谢尔全力以赴，将《火星报》运进俄罗斯，把需要的人员送到国外。他经常护送载有秘密读物的运输工具，把自己人送过边境。1902年，19岁的约谢尔在火车厢里第一次被逮捕。他被押送至基辅卢基扬诺夫监狱。他在狱中结识了许多大名鼎鼎的社会民主党人，其中有：H. 鲍曼、M. 李维诺夫（瓦拉赫）、《火星报》排字工人约瑟夫·布卢门菲尔德，布卢门菲尔德很认真地对约谢尔进行政治教育。

1902年8月18日，在监狱里蹲了五个月零四天的约谢尔和一批志同道合者成功越狱。

基辅国家档案馆保存有警察局和基辅省宪兵局的几份材料。下面是1902年9月5日的一份材料：

“B字第262号 秘密
提交讯问的被告人材料
塔尔希斯·约谢尔：

……

(18) 受教育地点：未在任何学校受过教育，完全不会俄语，犹太语程度低。

……

(22) 讯问根据：谍报联系和监视材料表明，塔尔希斯认识许多重要的活动家，在党内的代号为“维列涅茨”。

恰恰从这个时候起，约谢尔有了一个代号，这个代号成了他终生的姓氏。社会民主党人巴赫母女为保密起见，为他想出了一个绰号“弗赖塔克”（德语“星期五”音译）*，因为他经常指定她们每逢星期五会面。

临近1903年时，皮亚特尼茨基来到柏林，立即参加了往俄国运

* 约谢尔的终生姓氏皮亚特尼茨基（пятницкий）系俄语 пятница（“星期五”，译音为“皮亚特尼察”）加后缀和词尾 цкий（茨基）而成。——译者注

送图书和人员的组织工作。1903年底，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诺斯科夫来到柏林。皮亚特尼茨基和他一起前往当时《火星报》编辑部所在地伦敦。他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他们谈到了建立柏林《火星报》运输站的事。皮亚特尼茨基负责组建党的国外中心与俄罗斯联络的机构。从此，他开始专门研究保密和地下工作“技术”，并熟练掌握了这一行，以致1917年后党中央责成他组建共产国际联络机构。他需要改革和完善国际联络局的工作。实际上皮亚特尼茨基成了共产国际新保密技术机关的创建者。1921年底至1922年初，他亲自走遍了所有主要的国外联络站，并把考察结果写成报告呈送领导。

19 П. А. 翁佩 (1890—1925)，生于卢加一个医生家庭。受过高等教育，曾在尼古拉耶夫铁路担任法律顾问助理。

20 阿布拉莫夫·亚历山大·拉扎列维奇 (米罗夫-阿布拉莫夫，1895—1937)，苏联军事情报领导人之一，著名共产国际活动家。生于莫斯科一个商人家庭。在德国接受教育。1916年成为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参加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1921年起在柏林从事外交和共产国际工作。1935年11月起担任共产国际国际联络局联络处副处长。1936年9月5日起在工农红军总参谋部第四部 (情报部) 工作，任部长助理和西班牙方向领导人。1937年5月21日被捕，11月25日被枪决。

21 沿中东铁路的电报线路 (伊尔库茨克—北京) 及俄国与国外联络的部分其他线路 (东亚有上海—长崎—符拉迪沃斯托克) 早在1906年就已租让给“丹麦北方电报公司”，该公司收取可自由兑换的服务费。按照丹麦公司当时的价格，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根据自己的预算，每年只能拍发15页电报 (每页30行，每行8个单词)。除此以外，该局每年只得24个小时利用“直通电报线”与其驻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分支机构进行交谈。

22 B. B. 罗明纳兹 (化名韦尔纳，1897—1935)，1925—1930年为党中央候补委员，1925—1926年任青年共产国际书记。1926年4—12月任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1927年7月至11月任共产国际驻

中国代表。1928年起做党的工作。1935年自杀。

23 西方重要的情报问题理论家克里斯托弗·安德鲁写道：“布尔什维克当政的头10年，苏维埃情报机关由于两个最严重的缺点而苦不堪言。第一，布尔什维克由于害怕使用从沙皇政府继承的较为复杂的密码，启用了一套较不可靠的秘密情报传递系统，在第一阶段，这一系统的基础就是简单地重新排列字母。第二，世界上最强的沙皇密码破译机构被解散，而对布尔什维克而言，不幸的是该机构一些主要的工作人员逃到了国外。”（见O. 戈尔季耶夫斯基、K. 安德鲁：《克格勃：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的情报战》，第81页）

24 鲁德尼克·雅科夫·马特维耶维奇（化名安里、亨利、马林、诺乌连斯、留埃格，1892—1963），波兰籍犹太人。生于基辅郊区一个贫困家庭。商业学校毕业。后就读于彼得堡工学院，在该院被征入伍。军校毕业后获准尉军衔。参加过二月革命。1917年成为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期间担任芬兰团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先后参加了强攻冬宫、镇压士官生叛乱和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叛乱的行动。在芬兰组建了红色近卫军。1918年初成为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委员。随后在最高军事监察部政治部工作。1918年夏领导了向基辅秘密运送武器的行动。1918年底至1919年初在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学习，尔后在乌克兰、克里木（克里米亚）进行地下工作。1919年3月在敖德萨逃脱逮捕，与复员法国士兵一起乘轮船到了法国，因积极参加法国共产主义运动和罢工运动，受到追捕。1920年9月回到俄国，在南方面军担任政治工作人员。接着到共产国际机关工作。1921年2月被派到法国担任苏维埃情报机构谍报站长。1922年被逮捕，判处两年监禁。1925—1931年在共产国际国际联络局工作。其中1925—1927年在奥地利，1928—1931年在中国。在中国以留埃格为姓遭到逮捕，关押至1937年。1939年回到苏联。1940年起在苏联从事教学工作。1941—1943年从军，随后在红十字会和国际关系学院工作。

25 Г. Н. 维经斯基*（扎尔欣、格里戈里耶夫、格里戈里、

* 当时又译为魏金斯基（按标准音译应为沃伊京斯基）。——译者注

塔拉索夫，1893—1953)，小职员和木材厂管家之子，生于维捷布斯克省涅韦尔市。1907年毕业于四年制市立中学后，在维捷布斯克印刷厂当了3年排字工，随后又在斯特鲁吉别雷当了3年会计。1913年迁至北美洲，住在美国和加拿大，既上大学又当工人。1918年回到俄国，加入俄共（布），开始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工人代表苏维埃工作，在远东参加了国内战争。1919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被白卫分子判处终身流放萨哈林岛，1920年在那里参与建立苏维埃政权。同年被调到共产国际机关，随即被共产国际派到远东工作。

26 罗易（马纳本达·纳特·罗易，1892—1954），1927—1928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中国代表。1928年被开除出印度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执委会。

27 Л. Н. 黑勒（1875—？），1922—1930年任红色工会国际东方部部长（有间歇）。1930年起从事教学工作。后遭非法镇压。

28 Н. А. 福金（莫洛多伊、济米列夫，1899—？），1926—1927年任青年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1928年起任苏联列宁共青团驻青年共产国际代表。1927—1930年任青年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1930—1933年任红色工会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后遭非法镇压。

29 艾斯勒·盖尔哈德（罗伯特·罗伯茨，1897—1968），1927—1928年任德国共产党中央候补委员。1929—1931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中国代表。1931—193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机关工作人员。1933—1935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美国代表。1935—1939年任德国共产党国外中心工作人员。1941—1949侨居美国。1967年起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尔后担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职务。

30 哈迪·乔治（格奥尔格·乔治，1884—1966），1922—1926年任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1924—1926年任英国驻共产国际代表。1927—1930年任红色工会国际驻中国代表，工会太平洋书记处书记。1930年起任红色工会国际英美支部指导员。

31 约瑟夫·波加尼（约翰·佩佩尔、约翰斯，1886—1938），1919年任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国防、外交和教育人民委员。1920年

起住在苏联。1924—1926 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情报局局长。1927 年起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秘书处成员。1927—1928 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中国代表。1929 年被解除在共产国际的工作。1930—1937 年在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1938 年遭非法镇压，后恢复名誉。

32 马西·亚历山大（贝伦斯，1905—1947），1926 年起任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1928 年任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秘书处工作人员。1929 年任青年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共产国际远东局成员。1929—1932 年任英国共青团中央书记。1932—1938 年任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37 年起任青年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

33 师哲（卡尔斯基，1905—1998），1925 年首次到苏联，与工程兵学校其他中国学员一起，被从莫斯科送往基辅，进入指挥员联合军事学校，在该校一直学习到 1927 年春。其时由中国人组成了一个 50—60 人的独立的特别班，另有一个来自黄埔军校的小学员班，此班学员都是国民党员。中国学员每月领取 80 卢布助学金。到 1927 年 10 月前，所有中国学员和师哲一起从基辅来到莫斯科，被分配到设在列福尔托沃的四所军校。师哲有一个俄国姓名叫 M. A. 卡尔斯基。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郊区召开时，他担任翻译，为中国代表团服务。1929 年前往西伯利亚工作。1929—1938 年担任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新西伯利亚州全权代表处侦缉员。据尤茂春的资料，正是在这一时期，师哲成为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谍报员。1939 年担任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中央第二国际儿童保育院副院长、中国党校（设莫斯科）助教。1939—1940 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报刊局记者。1940 年起到延安，担任毛泽东与莫斯科进行无线电联络的专职秘书（考虑到他精通俄语）。以后在中共中央安全机关和中共中央编译局工作。1991 年写了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

34 M. 福尔图斯（П. А. 米夫、威廉、约瑟夫、科佩尔、库

佩尔，1901—1938)*，1926年任中山劳动大学（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副校长，1927—1929年任校长。1928—1935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秘书处副秘书长。1930—1931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书记。1936年任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校长。1937年任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研究所所长。1938年遭镇压，后恢复名誉。

35 马马耶夫**·伊万·基里洛维奇（1896—?），毕业于哈尔滨商业学校。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内战。后又毕业于工农红军军事学院东方系。1924年10月至1926年在中国工作，担任黄埔军校教官。作为（广西）第七军军事顾问参加了广东战役和北伐，还参加了强攻武昌战斗。1927—1937年在情报部担任指挥职务。1937年起在伏龙芝军事学院任教。

36 Я. Э. 斯滕（1899—1937），1924—1927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宣传鼓动局局长。1928—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所副所长。

37 《中俄关系史料：俄政变与交涉（1917—1919）》，台北1960年版，第267页。转引自M. 克留科夫：《通向同盟的曲折道路：苏俄与孙中山（1918—1923）》，载《远东问题》1999年第2期第110页。

38 华盛顿会议（1921年11月12日—1922年2月6日）参加国有美国、英国、中国、日本、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葡萄牙。会议确定了有利于美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中国和太平洋地区帝国主义势力的新关系。太平洋地区最大的国家苏维埃俄国未接到参加会议邀请。美国当局也未准许已经到达的远东共和国代表团参加会议。

39 泽瓦托夫斯基—金托夫特·伊格纳季·柳德维戈维奇—马利诺

* 本书许多人物有一个或多个化名，作者在注释时一般列出真实姓名，并将化名附在括号内，在正文中则多半使用当时使用的化名，从而造成正文和注释姓名的一致。在这里的福尔图斯，在正文是米夫。——译者注

** 又译马迈耶夫。——译者注

维奇（波兰人）在俄国以伊格纳季·利沃维奇·尤林之名广为人知，是冬宫第一批卫戍司令之一。在沙皇军队中当过连长。在红军中则历任军事院校总政委、全俄总参谋部政治委员、第12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尔后历任俄共（布）中央远东局书记、远东共和国军事部长和外交部长。尤林的姓氏后来在苏联历史文献中很长时间没人再提起，因为据说他在30年代中期逃往波兰，成为“叛徒和波兰民族主义分子”。

40 格列博夫将军在1936年呈送南京国民党中央机关的报告中是这样介绍K. Θ. 梅茨勒的：“K. 梅茨勒无论从出身还是从宗教信仰来说都不是俄罗斯人。其特点是厚颜无耻，好吹牛，不讲原则。”作为对他的一项指控，报告指出，“1932年日本与中国发生冲突时，在上海通过侨民委员会秘密招募了俄罗斯工人，为日军运送军事物资和修建军用机场。”

41 1901年9月7日，北京政府同包括俄国在内的八国大使签订了所谓《最后议定书》。该议定书强迫中国为起义者对外国造成的物质损失支付45000万两白银巨额赔款，39年内付清。赔款总额连本带利达14700万英镑，约合15亿卢布。

42 Ф. Л. 格列博夫是一位将军，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官衔为骑兵司务长，由于屡立战功，获得过所有乔治勋章和十字勋章。1923年9月14日，他乘“鄂霍次克”号轮船由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抵达上海。到上海后，将“鄂霍次克”号轮船和另一艘俄轮卖给了一家中国公司。格列博夫不是一个等闲之辈，有许多人对他不满意。忠实的谢苗诺夫分子不会原谅他转向梅尔库洛夫兄弟的政府一边，当时他代替哥萨克首领谢苗诺夫在格罗杰科沃指挥谢的残余部队。参加白卫军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进军朝鲜的那些人指责格列博夫在难民营内制造集中营的气氛。按照他的命令，被他怀疑对布尔什维主义有好感的人被赶回了符拉迪沃斯托克。他的队伍到上海后，就住在军舰底舱，受胃病、夜盲症的折磨，给养匮乏，医疗救助不足，因此都抱怨他对大家的生活条件完全无动于衷，而他作为他们的官长，却在上海挥金如土。有人说格列博夫一次在舞厅里因为扯破了一个舞女

的连衣裙，竟付给她 500 美元。大家指责格列博夫毫不受监督地任意挥霍他出卖部队去上海所乘军舰得到的钱。1925 年，按照哥萨克首领谢苗诺夫的命令成立了调查格列博夫活动委员会。该委员会“收集了大量材料，但是局势不允许将此事做完”。俄侨中的亲日分子指责格列博夫在日中冲突期间帮助国民党军队招募俄国专家、炮手、机枪手等。同俄国领事界亲近的人，则指责格列博夫对待沙俄驻中国最后一位总领事 B. Ф. 格罗谢的那种令人无法容忍的态度和粗暴的陷害。П. 巴拉克申认为格列博夫将军是一个领取报酬的国民党秘密间谍。格列博夫将军没有宽恕他的为数众多的责难者。1936 年他向南京国民党中央呈送了一份详细报告，不过他只是把 K. Э. 梅茨勒及其团体作为自己控告的目标。

43 涅恰耶夫队伍作战胜负不定，它不止一次被击溃。这支队伍声名狼藉，因为其士兵经常抢劫（另一个原因是，在白卫军中服役并不是什么美差。中国军阀常常连着几个月不给他们发饷。士兵感到绝望，常发生自杀现象。而招募者弄来一批又一批新的雇佣兵，甚至连半大孩子都被骗进他们的队伍）。但是，中国人却害怕涅恰耶夫。例如，曾经投靠吴佩孚集团的安徽督军孙传芳 1925 年底进攻上海，曾重创涅恰耶夫部队，中国人企图用以下方法保障自己的安全。B. M. 普里马科夫的资料指出，“传说孙传芳的士兵将俘虏的 300 名白俄分子双手砍掉。这样做的原因是害怕俘虏袭击押送队，夺走武器，重新组织能够上山打游击的队伍。孙传芳得知此情后，命令把俘虏的脑袋也砍掉，因为杀死俘虏的野蛮性比砍掉他们的双手低”。有一件事是众所周知的，那就是 1926 年春冯玉祥的军队撤离天津时，外国租界行政当局组建了专门的宪兵队，以阻止涅恰耶夫的队伍进城。1927 年春，这支队伍终于在河南被国民革命军打垮。

44 里金·阿里斯塔尔赫·阿里斯塔尔霍维奇（雷利斯基·阿里斯塔尔赫，1887—1938），俄罗斯人，农民之子，由一个教育家收为义子。1906 年在彼得堡读完德国中学，后在彼得堡大学读完一年级，1910 年毕业于苏黎世大学，1913 年又读完军医学院二年级。1916 年再毕业于亚历山大军校速成班。就专业而言他研究的是生物学。

1905—1910年他是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革命党战斗组织成员。这段时间他住在瑞士。

1917年前，他在萨洛尼卡战线俄军驻法国特别远征军编成中作战，军衔为少尉。曾受伤。在士兵中进行革命工作，被告发后被派到法国。他拒绝上前线，因病获准缓期两个月。后辗转至法国布列斯特，1917年9月乘侨轮回到俄国。1918年加入俄共（布）。同年底在基辅担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H. C. 季赫梅涅夫（后担任苏联驻丹麦全权代表）的秘书，作为X. Γ. 拉科夫斯基的代表团成员参加同П. C. 斯科罗帕茨基盖特曼政府的谈判。后被德国警察逮捕，关进卢基扬诺夫监狱。1919年担任基辅地区军事领导人、基辅卫戍区和战斗地段司令。1920年任劳动第2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0—1921年在西南方面军司令部执行特别任务。1921年3月，根据乌克兰和克里木（克里米亚）驻军副司令员阿夫先季耶夫斯基的建议，调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参加过维堡疏散委员会的工作和热那亚会议。

20年代及30年代前半期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外局工作。1922—1923年任驻北京谍报站长（以武官职务和全权代表处领事部主任为掩护，化名雷利斯基）。尔后任驻丹麦谍报站长（1924年8月至1925年3月为全权代表处武官）。1925年3—5月任驻日本全权代表处二等秘书。1925年8月，俄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因其闹意气宣布给予处分。1925年12月至1927年任对外局驻法国谍报站站长（全权代表处二等秘书）。1927年10月至1928年11月任驻罗马谍报站长（全权代表处二等秘书）。因受诬告于1928年底被从意大利召回。由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委员会成员Г. И. 博基进行审理后，宣告里金无过错。

里金被从意大利召回后，谍报站由其妻З. А. 列塔韦特领导。里金在莫斯科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外局机关工作。1929年4月，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其三人小组中包括里金1919年在基辅时的首长H. И. 波德沃伊斯基）在一次会议上，当着里金和对外局副局长С. Г. 韦列热夫的面撤销了1925年对他的处分。1935年，里

金与阿尔图佐夫一起调工农红军情报部工作。1935年授衔旅政委级*。1937年9月27日被逮捕。1938年9月1日被枪决。

45 霍多罗夫·阿布拉姆·叶夫谢耶维奇（1886—1949），敖德萨人，在敖德萨读完法律系。1905年参加了大学生运动。十月革命时霍多罗夫正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当记者。随后在北京领导俄罗斯通讯社分社。1923年任东方贸易局副局长。1924年起从事科学教育工作。后遭到非法镇压。已恢复名誉。

46 Я. X. 达夫强的生命在1938年过早结束。1957年恢复名誉。

47 米赫利松-阿尔维斯·卡尔·安德烈耶维奇（1885—1938），拉托维亚人。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05—1920年在拉托维亚、流亡中和远东地区从事党的工作。1923—1934年在情报部供职。1937年12月2日被逮捕。1938年4月26日被枪决。

48 福尔图纳托夫·叶夫根尼·阿列克谢耶维奇（1883—1938），医学教授之子，受过良好教育，懂多国语言，包括东方国家语言。1917年前当医生。1903年至1919年为布尔什维克。曾在1903年、1905年和1907年多次被捕入狱。第一次俄国革命期间先后任喀山、萨马拉和雅尔塔党委委员。1906—1907年曾在基辅参与组织南方军事技术局。1906年作为代表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军事与战斗组织坦墨尔福斯会议**。曾在太平洋沿岸生活，因此被认为是了解远东的人。1920年起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对外局工作。有一次试图获取秘密材料，就在拿到文件之时被中国警察抓住。随即被逮捕，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花一万美元将他赎出。从中国回国后，在对外局机关领导远东处。30年代后半期创建并领导全俄肃反委员会列宁格勒博物馆。1937年被逮捕，1938年被枪决。

其子叶夫根尼·福尔图纳托夫（1904—1939）毕业于商业学校，

* 当时所定低于少将高于上校的政治工作人员军衔，相当于其他国家的准将。——译者注

** 坦墨尔福斯（即坦佩雷）是芬兰城市。——译者注

精通中文和英语，也在其领导下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工作。叶夫根尼从1926年起就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供职，1928年加入联共（布）。1929年起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外局工作人员。1939年3月13日因被指控进行特务活动被逮捕。1939年9月25日被枪决。

49 由于俄共（布）和苏维埃国家外交活动中的中国因素日益增强，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5年3月19日通过决议，决定建立一个委员会（称为“中国委员会”），其成员有：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苏联陆海军人民委员 M. B. 伏龙芝，外交人民委员 Г. B. 契切林，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 B. M. 莫洛托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局局长 Ф. Ф. 拉斯科利尼科夫（可由拉斯科利尼科夫的副手 Г. H. 维经斯基替代）。按照政治局决议的提法，建立该委员会是“为了对援助国民党和支持它的团体的现行措施进行总的监督”。随着时间的推移，委员会补充了一些新成员。1925年10月31日伏龙芝逝世后，新任主席温施利希特曾主持该委员会会议。从1926年9月20日起由伏罗希洛夫担任委员会主席，尔后从10月20日起又由温施利希特代理。在该委员会工作过的还有 A. 布勃诺夫、Я. 别尔津、Г. 索科利尼科夫、Г. 亚戈达、B. 梅利尼科夫、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局局长皮亚特尼茨基。

50 沃罗宁·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普季钦，1885—1937），职业为医生。1905—1910年为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派成员，但随后成为布尔什维克。在土耳其斯坦参加了国内战争。1921年6月23日至1922年10月30日任土耳其斯坦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曾被授予两枚红旗勋章。

51 由于莫斯科希望“实地”考察中国实际发生的情况，评价事件发展趋势和前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6年1月决定派一个被赋予广泛全权的检查委员会前往中国，任命联共（布）中央书记、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A. C. 布勃诺夫为委员会主席，成员为 H. A. 库比亚克、И. И. 列普谢和 Л. M. 加拉罕。委员会在中国工作两个多月（从1926年2月初到4月底）。

52 黑克尔·阿纳托利·伊里奇（1888—1937），生于梯弗里斯（第比利斯）高加索军队的一个军医家庭。先后就读于梯弗里斯中学和彼得堡弗拉基米尔军校。1916年进总参谋部军事学院训练班学习，毕业后被派到罗马尼亚方面军所辖第33军司令部任职。以具有革命情绪而闻名的黑克尔上尉成为该军军人委员会委员，1917年9月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20年，黑克尔成为共和国内卫军参谋长，指挥肃反委员会军队镇压反革命行动。1921年2月因“作战勇敢和才能出众”被授予红旗勋章。同年1月至1922年8月先后出任工农红军军事学院副院长、院长。1922年6月至1924年任苏联驻中国全权代表处第一任武官。1925—1929年任中东铁路理事会成员和苏联驻中国情报机构领导人之一。1929—1933年任驻土耳其武官。1934年任工农红军某总局局长。1934—1935年任国防人民委员部情报部第4局局长。1935—1936年任情报部第6局局长。1936—1937年任国防人民委员部第11局（对外关系局）局长。1935年被授予军级军衔*。荣膺3枚红旗勋章。1937年5月31日被逮捕，7月1日被枪决**。1956年恢复名誉。

53 A. И. 叶戈罗夫 1883年生于布祖卢克。在喀山军校接受军事教育，1905年毕业。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先后任连长、营长。1917年后被选为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国内战争结束后，叶戈罗夫在红军中先后担任一系列重要职务：军区司令员、工农红军、参谋长、总参谋长。1935年成为苏联元帅。1937年起任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后遭到非法迫害，1939年2月22日逝世。已恢复名誉。

54 拉平（拉宾·阿尔贝特·亚诺维奇、薛福林***，1899—1937），

* 相当于后来的中将。——译者注

** 据《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其被枪决时间为1938年7月1日，因此其生卒年应为1888—1938年。——译者注

*** 薛福林是当时译名（按现规定译音应为塞富林）。——译者注

生于里加一个拉脱维亚工人家庭。1907年全家迁往莫斯科。曾在“勇士”工厂做工，1915年参加布尔什维克组织。在莫斯科先后毕业于中学和商业学校。1917年参加革命，曾任莫斯科党委委员。1917年12月进入红军总参谋部。1918年6月赴喀山前线镇压捷克白卫分子叛乱，在那里被任命为第5集团军司令部情报处政治委员，随后又被任命为集团军司令部政治委员和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在第5集团军司令M. H. 图哈切夫斯基领导下，提高了军事技能。1919年6月23日在车里亚宾斯克附近，脊椎受重伤，在野战医院躺了几个月。医务委员会认为他已经不适合服兵役。但是图哈切夫斯基应拉平请求，让他回司令部担任作战处长。不过拉平身体刚恢复到能够扔掉拐杖行走，就要求上前线。第5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派他去担任B. K. 布柳赫尔组建的步兵第30师师长。他积极参加同波兰白卫分子的斗争。正是在他的指挥下，鄂木斯克步兵第72师第80旅在追击敌人过程中，从行进间强渡西布格河，击溃了斯莫洛维茨集团，逼近了华沙。与波兰人的战争刚刚结束，拉平就被派往远东肃清边疆的日寇和白匪残余。从1921年到1922年，他担任过以下各种职务：远东共和国铁道警卫部队司令、远东共和国代总司令、阿穆尔河沿岸军区司令员、后贝加尔军区司令员。1925—1926年，担任驻中国北方的张家口军事顾问团成员。1926年4月临时代理驻中国武官。尔后担任冯玉祥指挥的西北军副总军事顾问、河南顾问团参谋长。回到苏联后，历任总参谋部军训部部长、军长、布柳赫尔指挥的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副司令。曾获4枚红旗勋章。1937年5月11日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不久被枪决。

55 博罗沃伊·帕维·尤里耶维奇（1902—？），苏联军事情报人员，曾就读于哈尔滨。1920年加入俄共（布），任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情报部工作人员。1922年前在远东做党的工作。1924年毕业于工农红军军事学院东方系。伟大卫国战争初期牺牲。

56 隆格瓦·罗曼·沃伊采霍维奇（1891—1938），生于华沙一个商人家庭。上中学时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开除。通过自学完成了该校学业。1910年加入青年社会主义者联盟。1910—1918年为波兰社会党

左派成员。1912年3月至1913年9月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捕。1915年军校毕业，任布特尔第66团上尉。1917年8月参与镇压科尔尼洛夫叛乱。1918年加入俄共（布）。参加了抗击克拉斯诺夫和邓尼金的多次战斗。1920年被授予红旗勋章。同年11月至1921年11月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司令部情报部长。1921年11月任乌克兰与克里木（克里米亚）武装力量情报部长。1922—1925年在乌克兰军区司令部任情报部部长、政委。1925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秘书。1926年任派往中国的布勃诺夫委员会秘书。1926—1927年任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武官。正是在他武官任上，北京警察袭击了他的机构。从中国回苏联后在总参谋部工作，曾任工农红军通信部部长。1937年5月21日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1938年2月8日被枪决。

57 特里福诺夫·瓦连京·安德烈耶维奇（1888—1938年），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俄共（布）第四及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1925年11月被派往中国担任武官 A. И. 叶戈罗夫的助手。1926年春，根据 A. C. 布勃诺夫委员会同年3月作出的决议，特里福诺夫因同苏联驻中国大使加拉罕有分歧而被召回莫斯科。特里福诺夫写好了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一封信，其中解释了他与在中国推行错误政策的加拉罕之间存在的分歧。1926年被任命为驻芬兰商务代表。1928年春从芬兰回国，被任命为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主席团委员。1937年，被指控为“托洛茨基破坏危害组织”的参加者而遭逮捕，后被枪决。已恢复名誉。

58 维纳罗夫·伊万·措洛维奇（1896—1969），生于保加利亚普列文市一个大地主家庭。1916年起为社会民主工党（紧密派）* 党员。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积极参加1918年九月起义（弗拉达亚起义）。后在保加利亚共产党军事机关工作，为共产党购买和劫夺武器。1921年被逮捕，尔后越狱。侨居苏联后，从苏联经海路向保加利亚运送武器。1924年起任工农红军总参谋部第四部（情报部）工作人

* 该党左派，保加利亚共产党前身。——译者注

员。1925年在巴尔干半岛进行秘密工作。1926年起任军事顾问。1927—1929年任派驻中国的秘密谍报站长的助手。

59 萨尔嫩·赫里斯托福尔·伊万诺维奇（“格里什卡”、奥西普·赫里斯托福·福格尔、赫里斯托福·劳伯格、维克托·胡戈斯，1885—1939），拉托维亚人，生于里加一个工人家庭。1900年毕业于两年制中学。190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加了1905—1907年革命，担任战斗队员。参与组织了波罗的海沿岸许多大规模的战斗队行动，其中包括从里加监狱解救已被判死刑的拉齐斯、斯列萨尔，从里加侦缉队解救战斗队员卢特尔、卡尔嫩等。曾被捕3次，但每次都得以逃脱。1908年起住在伦敦，管理秘密住宅。1912年到美国。1920年到远东，参加阿穆尔第2集团军，尔后从事地下工作。1920—1921年以赫里斯托福尔·福格尔之名住上海。1921年到彼得格勒，在情报部工作。1921—1923年再次到远东。1923年转到德国，为组建德国共产党秘密战斗组织工作，组建了图林根州“红色百人队”及秘密仓库和武器基地网。1924年带一批武器前往保加利亚。在保加利亚南部化名奥西普，作为扬切沃游击支队的一员与政府军打游击，时间长达约四个月。1923—1924年在中国担任秘密侦察员。1926—1929年以美国公民赫里斯托福·劳伯格的姓名在中国担任谍报站长。参加了中东铁路事变，领导在中国军队后方进行的破坏活动。1930年毕业于情报首长进修班。1936年2月起任情报部“A”特种处（积极侦察处）副处长。1937年6月至1938年3月化名维克托·胡戈斯在西班牙工作。1938年4月21日被逮捕。1939年5月8日被枪决。

60 本内特·赖萨·所罗门诺夫娜（1899—1937），生于彼得罗扎沃茨克。美国女共产党员。1927年到苏联并加入联共（布）。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教外语。1929—1935年归情报部任用。1935年7月15日因“克里姆林宫案件”被捕。1937年10月9日被枪决。

61 И. И. 斯皮利瓦涅克（1883—？），1927—1928年苏联驻北京代理领事。

62 С. Г. 韦列扎耶夫（1885—1972），俄罗斯人。生于沃罗涅日州顿河左岸区克西洪卡村。牧师之子。曾在圣彼得堡矿业学院学习

两年。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职业为教师。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军衔为准尉。1917—1918年曾是社会民主党人（国际主义派）。1918年起成为布尔什维克。1917年8月任鄂木斯克军区司令助理。1917年10月12日在彼得格勒被逮捕。曾任西伯利亚兵役委员会委员。1918年10月至1919年4月当日本武装干涉者的俘虏。1919年10月起在游击队作战。起先任活动于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地区的骑兵连副连长，尔后任该连连长。1920年3月任哈巴罗夫斯克区兵役委员会委员，4月任哈巴罗夫斯克方面军（东方面军）参谋长。1921年2月任阿穆尔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政委。同月任分管西伯利亚的副总司令司令部作战部政委，6月任该司令部情报部副部长，10月任该部部长。

1923年至1929年8月任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外局副局长。1924年任调查与归还前弗兰格尔分舰队驻比塞大（法国）军舰的委员会成员。从中国回国后至1929年11月，任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边防与军队局局长。1930年起在联共（布）中央机关工作。1931—1933年在工业学院学习。1934—1937年任基辅“军火库”工厂厂长及从事其他经济工作。曾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5—1937）。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在有色金属人民委员部系统工作。1938年起任钨及稀有金属工业总局工程师。1957年起为特别退休金享受者。

63 田中义一（1863—1929），日本将军。1918年9月至1921年6月及1923年9月至1924年1月两次出任日本陆相。1927—1929年任日本首相兼外相和拓相。是对远东进行武装干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64 明斯克尔·雅科夫·格里戈里耶维奇（明斯基，1891—1934），犹太人，生于基辅一个裁缝家庭。读过技工学校四年级。1903年进入基辅艺术学校，1906年因参加罢课被开除。1911—1918年为社会革命党党员。1912年10月26日被逮捕。1913年11月按《刑法》第102条被判处流放伊尔库茨克省某小镇。1914年在流放中加入了社会革命党基辅工人小组。不久即从流放地逃到敖德萨，尔后又去了波尔

塔瓦，但是后来又回到伊尔库茨克，一直到二月革命爆发前都在那里当办事员。

二月革命后，明斯克被选为伊尔库茨克工兵代表苏维埃成员。1917年4月回到基辅，在社会革命党出版协会工作。8—9月再次到伊尔库茨克，在那里参与镇压士官暴动，被任命为负责建立城市联合会的委员。后因与苏维埃政权合作被开除出社会革命党（他曾代表该党当选为工兵代表苏维埃成员）。在西伯利亚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西伯利亚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主管该委员会情报处。同年8月西伯利亚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迁到上乌金斯克*后，被选为该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西伯利亚苏维埃政权失败后，明斯克转入地下，被选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地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8年12月加入俄共（布）。1919年1月29日被高尔察克反革命当局逮捕，1920年1月31日前一直被监禁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监狱。

被释放后，被任命为俄共（布）滨海边疆区全权代表，尔后被任命为驻中东铁路征用地带的俄共（布）中央远东局全权代表，领导哈尔滨各工会的工作，曾是中东铁路职工总罢工的组织者之一。

卡佩利**分子到达后，他被选为革命委员会成员，并于1920年8月被任命为驻阿穆尔舰队军事委员会北满全权代表。1920年10月被任命为工农红军司令部情报部驻北满全权代表（谍报站长）。1921年2月到赤塔，随后又到伊尔库茨克，在那里当了一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工作副全权代表。1922年2月到莫斯科任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外处工作人员。1922—1924年在波斯以领事职务为掩护工作。1925年12月至1926年底在上海以副领事身份为掩护活动。1926年12月至1929年在驻土耳其全权代表处武官身份掩护下工作。1929年被召回苏联，供职于中央对外情报机关。1933年任国家保安政治总

* 1934年改称乌兰乌德。——译者注

** B. 卡佩利（1883—1920），沙俄中将。1919年曾指挥高尔察克的东方面军。——译者注

局对外局远东处处长。歿于莫斯科。

65 米亚钦·康斯坦丁·阿列克谢耶维奇 (B. B. 雅科夫列夫, K. A. 斯托亚诺维奇, 1886—1938), 生于奥伦堡省一个农民家庭。从13岁起与继父一起生活在乌法, 1903年第一次和革命者相识。1904年加入俄国民主工党, 不久积极参加了乌法党委会地下组织“人民武装战斗队”的活动, 逐渐成长为一个战斗队员, 负责保卫群众集会和会议, 参加袭击战斗以夺取制造炸弹的机床、印刷厂用的铅字、仓库里存放的武器和炸药, 实施能够为游击队提供所需设备的没收行动, 很快成了乌拉尔战斗队的领导人和组织者。1908年, 他用雅科夫列夫的护照 (从此他成了 B. B. 雅科夫列夫) 前往日内瓦参加战斗队员会议。雅科夫列夫在革命活动中参加了20次“游击行动”和没收行动。这样的数字 (可能有意多说), 是后来他在索洛韦茨基集中营因盼望得到宽大而给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写的几封信中提到的。从1910年起, 雅科夫列夫在博洛尼亚学校 (“社会科学学校”) 学习, 与卢那察尔斯基一起进入了该校委员会。二月革命后, 于1917年春回到俄国。在彼得格勒短时间逗留后, 回到乌拉尔故乡, 当选为锡姆代表苏维埃主席 (锡姆是车里雅宾斯克州的一座工人小城), 秋季又前往彼得格勒参加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那里积极投入了准备和实施十月革命的活动。从1906年起就很了解雅科夫列夫的斯维尔德洛夫* 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从谢斯特罗列茨基工厂搞到武器。雅科夫列夫很快完成了任务, 把武器运到了彼得格勒。1918年春, 雅科夫列夫将满载粮食的40节车厢组成的一列火车弄到了彼得格勒, 尔后又为同杜托夫** 斗争搞到了武器和资金。同年4月, 斯维尔德洛夫将他叫回莫斯科, 让他完成一个绝密行动——把罗曼诺夫一家*** 从

* 苏俄重要领导人, 十月革命后担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19年34岁时去世。——译者注

** 杜托夫 (1879—1921), 沙俄中将。1917年11月曾在乌拉尔南面的奥伦堡领导反苏维埃叛乱。在1918—1919年高尔察克“执政”期间任奥伦堡独立集团军司令。后逃到中国, 被击毙。——译者注

*** 即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译者注

托博尔斯克押送叶卡捷琳堡。后来，也是在1918年，他担任东乌拉尔方面军司令员。但是他突然自愿转到乌法执政府*即全俄临时政府一边。回苏联后受到迫害，于1938年被枪决，后来恢复了名誉。

66 雅南将军系驻“最高执政者”高尔察克处的法国代表。

67 扎鲁宾·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1894—1972），生于莫斯科一个工人家庭。读完两年制专业学校后，在贸易公司工作，一边当工人、办事员，一边学习。1914—1917年在俄军当列兵，二月革命时曾受伤。1918—1920年在红军服役。1921年被接纳到全俄肃反委员会机关工作。曾任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驻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经济处处长。首次以情报员身份到国外出差，是1924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工作时由反间谍机关派遣到中国。1925年起在对外局工作，随后在该系统国外机构活动，曾在两个国家领导秘密谍报工作，在3个国家担任谍报站长。以后相继在芬兰、丹麦、法国、德国、美国当过谍报负责人。工作期间曾被授予两枚列宁勋章、两枚红旗勋章、一枚红星勋章和多枚奖章。

68 梅利尼科夫·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谢苗诺夫、米勒，1895—1938），生于色楞金斯克市，哥萨克。毕业于市立实科中学**。后就读于彼得堡工学院，1916年在该院加入俄共（布）。1917年毕业于米哈伊洛夫斯基炮兵学校，授少尉衔。1917年10月任伊尔库茨克卫戍司令、伊尔库茨克革命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尔后任特罗伊茨科-萨夫斯克苏维埃主席。1918年夏至12月被日本人俘虏。后流亡中国，在那里再次被逮捕，并移交白卫分子。1920年初以前被关押。1922年任分管西伯利亚副总司令司令部情报部副部长，尔后被调到莫斯科任工农红军总参谋部情报部谍报局第二处（东方处）处长。1923—1924年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驻哈尔滨全权代表机关工作人

* 1918年9月23日在乌法建立的反革命政府机构，同年11月17日被另一个反动将军高尔察克推翻。——译者注

** 实科中学是俄国在1864年建立的有别于传统中学的教育机构。它开设更多的数学、物理、生物、化学课程，同时以德语、法语代替古典语言。19世纪末俄国创立的大量商业学校，也是一种实科中学。本书中的许多人物曾就读于这类学校。——译者注

员。1924—1926年任工农红军总参谋部情报部处长，同时在1924—1928年兼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处处长。1928—1931年任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其间在1928—1929年任中东铁路理事会成员。1931年任苏联驻日本临时代办。1932—1934年任工农红军第四部副部长。1935—1937年任共产国际秘书处通信主任。1937年5月4日被逮捕，1938年7月28日被枪决。后恢复名誉。

69 奇恰耶夫·伊万·安德烈耶维奇（1896—1984），俄罗斯人。生于阿克莫林斯克省科克切塔夫县乌斯克利亚镇一个农民家庭。毕业于教会学校。1911年起在莫斯科居住，当过投递员、装卸工、书籍推销员。1916年应征参军，在西南方面军作战。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团士兵代表苏维埃委员，并被选为营委员会主席。

1919年任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鲁扎耶夫卡市革命委员会和肃反委员会主席。1920年任阿拉特里站肃反委员会主席。1921—1923年任莫斯科铁路政治保安局主席，负责保障铁路运输的恢复。

1923年12月，由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反间谍局派遣，以苏联全权代表处领事部主任身份为掩护到蒙古工作。1924年调国家保安总局对外处工作。当年调任对外情报机关驻图瓦共和国*谍报站长，掩护身份为苏联驻克孜勒领事。1925—1927年任外交人民委员部专家。1927年9月起任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外局驻朝鲜谍报站长，掩护身份为苏联驻汉城（首尔）总领事。1930年回到苏联，在外交人民委员部机关工作，随后任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外局处长。1932年起以总领事身份为掩护出任驻维堡**谍报站长。1934年任驻爱沙尼亚谍报站长。1934—1938年在中央情报机关工作。1938年8月至1939年4月任驻里加谍报站长。后历任驻斯德哥尔摩、伦敦、布拉格谍报站长。1947年回莫斯科后，在苏联外交部先后任处长、副局长。同时

* 即我国所称的唐努乌梁海，清代为乌梁海三部之一，归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统辖。1864年后逐渐被沙俄割、夺。现分别处于俄罗斯和蒙古境内。俄占部分在1924年成立“乌梁海共和国”，1926年改称“唐努图瓦人民共和国”，首都为克孜勒。1944年正式并入苏联版图，改称“图瓦自治共和国”。对此，中国历届政府均未予承认。——译者注

** 1920年建立的卡累利阿芬兰自治共和国的首都。——译者注

兼任工人夜校教员。1952年患心肌梗塞后因健康原因退休，开始进行文学创作。是《难忘的岁月》、《流逝日月片段》、《十月曙光照耀鲁扎耶夫卡》三部曲及许多文章、随笔的作者。

70 克鲁强斯基·托德雷斯·扬克列维奇（卡林·费奥多尔·雅科夫列维奇，在保加利亚化名 A. 科列茨基，1896—1937），犹太人，生于比萨拉比亚省苏斯列纳镇。1919年入党，同年参加工农红军，并于同年到肃反委员会机关工作。1922—1924年先后在罗马尼亚、奥地利、保加利亚担任秘密情报员。1924—1927年在哈尔滨担任谍报站长。1928—1933年在德国和法国任谍报站长。1934年起在工农红军司令部情报部工作。1935年1月20日被任命为情报部第2局局长。被授予军政委级军衔*。1937年5月16日被逮捕，同年8月21日被枪决。

71 赛博特·阿尔维德·亚诺维奇（格兰特，1894—1934），苏联军事侦察员，拉托维亚人。生于里加，实科中学毕业后，就读于彼得格勒大学物理数学系。1916年起转入地下。二月革命后当选为里加苏维埃代表，拉托维亚步兵**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德国占领期间被逮捕，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后获释。1918年秋回到里加，出任拉托维亚苏维埃政府统计人民委员。1919年5月至1920年10月任第15集团军政治部主任。1920年9月起任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司令部登记局副局长，1921年4月起任该局代局长。1922年11月至1924年3月任工农红军司令部情报部部长兼政委。

72 阿博尔京·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维奇（阿瓦林，1899—1978），曾参加拉托维亚地下斗争和国内战争。1925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东方系。起先以中央从日本接收北萨哈林委员会主席身份到远东（1925年）。从中国回苏联后，1929—1930年间先任教员，后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任副所长，1931—1935年任该所研究员。

* 1935年苏军政治干部军衔。相当于后来的中将。——译者注

** 建于1915年，1916年扩编为步兵师，积极参加了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译者注

1935年未经答辩任经济学博士。1956—1976年任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

73 波兹涅耶夫·德米特里·马特维耶维奇（1865—1937），生于奥廖尔一个牧师家庭。家庭人口众多（16个子女，但仅3个儿子和4个女儿存活），有牢固的宗法基础。但是，到19世纪下半叶，这样的基础开始动摇：哥哥阿列克谢（1851—1920）在宗教学校毕业后拒绝踏上波兹涅耶夫一家几代人走过的老路——升入宗教大学，而上了彼得堡大学，成为当时最著名的蒙古学专家之一，是蒙古学家K. Ф. 戈尔斯通斯基最有天才、最勤奋的学生，后来阿列克谢成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东方学院第一任院长。

阿列克谢13岁时，弟弟季马弄出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搞得一家人都坐立不安。季马手中装满碳酞矿泉水的瓶子突然爆炸，碎片飞进他的左眼，于是他终生瞎了一只眼。成年后他在日本进修，为自己定做了一个蓝灰色的瓷眼，看起来像一只真眼睛。

德米特里1889年毕业于基辅宗教大学历史专业，1893年进入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攻读汉蒙满专业，立即以其非凡才能而出类拔萃。他的三学年论文都获得了金质奖章。1894年他成为大学编外副教授，讲授中国历史。大学毕业后，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学术出差，在伦敦、巴黎、柏林的图书馆完善自己的学识（1893—1894）。尔后在1898—1904年出差中国。义和团起义期间，波兹涅耶夫与妻子和一岁的女儿留在北京被包围的使馆区。他参加了防卫行动，挖战壕，放哨。他在北京写了日记，后经整理在奥廖尔出版，内附起义期间在北京印刷过的圣旨的译文。波兹涅耶夫曾在财政大臣C. Ю. 维特手下做事，维特颇看重他的实干精神和工作能力，将他培养为建立俄中经贸关系的主要依靠力量。1903年3月15日，波兹涅耶夫代表俄国与中国签订了首批条约之一《俄国海运物品新增税率协定》。维特派这位年轻有为的工作人员参与管理中东铁路事务：任命他为1895年底建立的俄华银行分行经理、中东铁路局北京分局局长。（看来他同俄华银行董事会成员、五等文官达维多夫过从甚密，此人是驻北京的俄国情报员，该银行的职员弗里德贝格是达维多夫的帮手，也在那里工

作。)同时波兹涅耶夫还被任命为“中东铁路公司”理事会北京分会经理。为了表彰他富有成效的活动，中国光绪皇帝赏他一枚三级双龙勋章。在财政部供职的四年中（当时维特尚未离职），波兹涅耶夫多次游历中国、满洲和蒙古，研究自然条件、经济、民俗。1903年前他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贸易实际问题的文章（满州的港口、关税）。1904年回到俄国。

1906年，波兹涅耶夫到了日本，在电讯社分社供职，同时研究日语。他曾任彼得堡大学教员（1896—1898年）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东方学院教员（1904—1905年）。由于其兄精神过度疲劳和希望回姐妹们寡居的奥廖尔，东方学院出现了谁当新院长的问题，于是德米特里在1903年被提名为候选人。当有人向远东总督外事办公厅主任Г. А. 普拉托夫询问德米特里的情况时，普拉托夫回答，“德米特里·波兹涅耶夫（北京那个）比哥哥强”，“委任他未必会有什么障碍”。他劲头十足地着手改革学院的教学进程。但是，新院长的严格要求和一丝不苟的精神并未让教授们欣喜若狂。出现了摩擦和冲突。俄国的1905年事件即将来临。部分教授在聚会时对学生随声附和，在教学会议上却要求立即制止混乱，这种伪善激怒了德米特里·波兹涅耶夫。院长本人原则上不赞成大学生参加政治斗争，认为：“除了掌握科学，大学生没有权利把年轻的精力用到任何其他事情上。”1912年，德米特里·波兹涅耶夫建立了自己的出版机构“俄国新闻记者委员会”，一直出版至1917年前，每一期刊物都有他写的文章。1910—1917年，波兹涅耶夫担任东方实验学院院长。在此期间，他写成了三卷本巨著《日本北部及其与亚洲大陆和俄国关系史料》。1917年后，他担任彼得格勒大学编内教授，讲授日本、中国经济和历史。1923年开始在莫斯科工作，在工农红军军事学院任教。

74 吴佩孚（1878—1939），将军。盘踞长江流域和华北部分地区的亲英国直系军阀头子。吴佩孚军队在1926年6—10月被国民革命军打败，此后吴佩孚退出历史舞台。

75 关税会议于1925年8月在北京开场。早在华盛顿会议上就已确定由各大国讨论关税自主问题，但是这一问题久拖未决。这次关

税会议起初（1925年11月19日）“原则上”通过了中国关于承认其1929年起享有关税自主权的建议。但是，会议没有为实现这种自主做任何事，因为会议拒绝通过立即对现行低额关税税率实行附加税的决议（见《China Year Book 1926》，Shanghai 1926，第1111—1136页）。北京政府代表团要求对现行关税立即实行附加税（多数商品的附加税为其价格的5%，奢侈品更高）。日本代表要求中国同每一个国家分别签订贸易条约，指望为自己取得优越的条件。他们主张，在建立关税自主制度前，附加税不得超过2.5%，因为按照他们的声明，较高的税额会影响日本工业的贸易。他们最终提出了要求，其他与会国大都同意，但英国反对，认为附加税应保障偿付没有担保的债款（据中国的资料，在4.07亿中国银元的债款中，日本的债款为2.55亿，即占62.6%）。

76 段祺瑞（1864—1936），亲日皖系军阀头子。1916—1920年及1924—1926年两度在北京执政。1918年与日本签订了关于中国出兵干涉苏维埃俄国的协定。曾镇压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1926年3月18日，根据他的命令开枪镇压了反帝游行。

77 张作霖（1875—1928），奉系军阀头子。1920—1922年及1924—1928年两次控制北京政府。1926年12月至1927年6月任北洋军阀联合武装力量——安国军总司令。1927年6月任安国军“大元帅”。1928年被谋杀。

78 冯玉祥（1882—1948），1924年前依附直系军阀，1924年10月领导了北京政变，出任国民军总司令兼国民军第1军军长。1926年到苏联考察，并加入国民党。以后历任军队和国民党要职。1948年因不幸事故遇难。

79 孙传芳（1885—1935），1923—1924年任福建军务督理。1924年底脱离直系军阀，投靠美国。1924—1926年任浙江军务督理。1925—1927年任江苏军务督理。1926—1927年被国民革命军打败。1929年引退。后被谋杀。

80 蒋介石在北伐期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1927年4月实行反革命政变。1949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被打败。蒋介石逃到台

湾岛领导一个政权。

81 蔡瑟尔·威廉 (1893—1958)，德国人，生于埃森附近的罗特豪森，“斯巴达克”联盟成员，尔后成为德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毕业于莫斯科军事专修班。1925年11月至1926年春作为军事情报系统人员在巴勒斯坦进行秘密工作。是德国共产党军事机关领导人之一，领导党的秘密军事训练班，编辑“十月”杂志。1932—1935年担任共产国际组织局指导员和国际列宁学校军事教员。1936年化名戈麦斯将军去西班牙。他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全部的创建者和第一任部长。1954年因“进行反党和派别活动”被乌布利希开除出党和撤销领导职务。1958年去世。

82 沃斯克列先斯卡娅·卓娅·伊万诺夫娜 (1907—1992)，1907年4月28日生于图拉州阿列克辛市一个铁路职工——阿列克辛车站副站长家庭。她有两个弟弟。父亲于1920年10月患肺结核去世，随后全家迁移到斯摩棱斯克，卓娅在那里生活到1928年。1921年她14岁时，开始在斯摩棱斯克省全俄肃反委员会部队第42营当图书管理员，成为特种任务部队司令部工作人员。1923年，被调到设在斯摩棱斯克附近斯塔罗日谢村的犯罪少年教养院当指导员。1928年，作为联共（布）预备党员被派到斯摩棱斯克市扎德涅伯罗区党委当组织处调配科科长。1928年由斯摩棱斯克调到莫斯科在党校学习的丈夫身边。根据党组织的介绍，被安排到克鲁普斯卡娅教育学院工作。尔后又调到驻白俄罗斯车站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交通处当打字员。1929年4月成为正式党员。同年8月应邀到卢基扬卡*担任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女情报员。经相应实习后被派到哈尔滨石油购销联营组织工作。1932年2月从哈尔滨回国后，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列宁格勒对外处当过一段时间科长，分管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托维亚事务。不久被派到柏林当情报员。1933年奉派到奥地利。1935—1939年化名伊琳娜在芬兰工作，公开身份为苏联“外国旅行者”驻赫尔辛基代表处负责人，以“亚尔采夫太太”闻名遐迩。1936年，B. A. 雷布金以大

* 后来的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总部所在地，在莫斯科。——译者注

使馆参赞身份到芬兰担任谍报站长。沃斯克列先斯卡娅在赫尔辛基担任副站长（站长是以亚尔采夫身份到芬兰的雷布金，化名金）。她与苏联秘密谍报人员保持联络，为中央搜集必要的情报。曾与 П. А. 苏多普拉托夫（安德烈）会面。1941—1944 年在瑞典工作。50 年代初退休，开始文学创作。1974 年出版了三卷本选集。1993 年出版了有关情报工作的书（参见 3. И. 沃斯克列先斯卡娅：《现在我可以说实话了——一个女情报员的回忆》，莫斯科 1993 年版；《俄罗斯对外情报史料》，第 3 卷，第 310—324 页）。

83 库兹涅佐夫系僧侣出身，原是大学毕业的工艺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流落到日本，学会了日语和中文。1918 年加入共产党。由于熟悉远东情况，被派到外交人民委员部东方局工作。

84 斯图切夫斯基·帕维尔·弗拉基米罗维奇（1890—1944），生于波尔塔瓦一个犹太人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在日内瓦就读于技术学校。按所持观点，他属于无政府工团主义*派别，但他认识很多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回到俄国，1918 年 2 月成为俄共（布）党员。1918 年起在哈尔科夫从事党务工作和军事工作。1920 年在波兰前线作战。1921 年担任共产国际南方局秘书，并兼任乌克兰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1922 年到莫斯科，在红色工会国际罗曼语系秘书处工作。1924 年 11 月至 1927 年 5 月在德黑兰从事外交工作。1926 年担任共产国际对外局全权代表。1927 年被调到工农红军情报部，10 月被派到巴黎当谍报站长。1931 年被逮捕并判处 3 年监禁。1934 年回到苏联，在共产国际国际联络局工作。

85 乔治·索科利斯基 1893 年生于纽约一个从俄国迁去的犹太侨民家庭。其父是犹太教牧师。乔治曾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但不久就被开除。于是来到俄国，1917 年夏到达彼得格勒。他亲眼看到发生了

*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一些欧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流行的工人运动无政府主义思潮。认为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是工会（即工团），生产资料应该转归工会。鼓吹采取“直接行动”（罢工、怠工、游行示威等），幻想以各地工会在经济上联合起来代替国家机器，反对由工人阶级政党领导的政治斗争。——译者注

十月革命。后来离开俄国前往中国，1918年春到达天津。随后转赴上海，在一家外国通讯社供职。1919年初索科利斯基在某地认识了孙中山，并经常随侍左右。孙中山懂英语，但没有好到能够自己用英语给外国人写东西的程度。为此孙中山把索科利斯基调到身边，同时委以编辑其创办的英文《Shanghai Gazette》（《上海公报》）职权。美国驻上海领事埃德温·坎宁安和美国武官沃尔特·德莱泽把索科利斯基变成了自己的情报提供者，他定期向美国领事馆报告孙中山同外国人接触的情况。

86 奈曼·弗拉基米尔·阿布拉莫维奇（尼科利斯基、瓦西里、瓦西里耶夫、贝格·维克托·亚历山德罗维奇，1898—1938），* 1921年加入俄共（布）。在赤塔商业学校读完三年级后，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私人商行做事。1919年应征参加高尔察克军队，后在警卫连发动起义，并带领该连投奔游击队。1919—1921年在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部队服役。1921年到共产国际行政部门工作。1921年12月以前在上海，尔后到1925年前在满洲工作。1926年夏由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到赤塔。1926—1928年任赤塔反间谍处全权代表。1929—1930年任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符拉迪沃斯托克边区处全权代表。30年代初再次到中国（璦琿）。尔后任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远东边区代表处对外处处长。1933—1935年驻上海。后被调回莫斯科，再派到国外出差。1938年被逮捕和枪决。

87 谢苗诺夫·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安德烈，1891—1937）俄罗斯人，生于尤里耶夫（塔尔图）市，出身于贵族家庭，消费税征收官——五等文官之子。受过良好中等教育，懂法语和德语。早在16岁时就因参加革命组织而被捕入狱，10个月后被释放，驱逐到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以外。1908年因参与组织营救里加中央监狱被判死刑的革命者行动再次被捕，被关进这所中央监狱，坐了12个月左右的牢，然后被流放阿尔汉格尔斯克省两年。1912年回到尤里耶夫，又遭逮捕，但几个星期后即获释。此后谢苗诺夫决定侨居法国。在那

* 卒年与正文一不致，原文如此。——译者注

里住到 1915 年，只偶尔回俄国。在巴黎，他结识了 C. 莫吉列夫斯基——未来的全俄肃反委员会对外局局长。他在法国与社会革命党人接近，同无政府主义者断绝关系。根据他填写的履历表，1912—1921 年是社会革命党党员，其中 1919 年至 1920 年 12 月是该党少数派成员。1917—1918 年他曾是社会革命党战斗小组领导人，该小组的目的是消灭列宁，并准备随时暗杀列宁。谢苗诺夫由社会革命党恐怖分子“转变”为苏维埃政权的拥护者的过程，是在实施暗杀列宁行动后不久，即 1918 年底至 1919 年初开始的。经过短时间的侦查，始终没有出卖同谋者的范妮·卡普兰于 9 月 3 日被枪决。据档案文件提供的资料，1918 年 9 月，工农红军反间谍机关逮捕了藏匿的谢苗诺夫，理由是他隶属一个军事组织。后来的情况表明，收监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偶然的，因为当时还没有谢苗诺夫的明显罪证。谢苗诺夫本人则完全不这样看。因此，在前往警卫室途中，被捕者大胆尝试逃跑，打伤了两个红军战士。流血搏斗以他的失败告结。他在监狱里被关了 9 个月，直到 1919 年春。3 年后，在 1922 年对社会革命党人的诉讼过程中，谢苗诺夫断言，正是 1918 年底在狱中，他经过激烈思想斗争后，对苏维埃政权的看法发生了转变。历史学家 C. B. 茹拉夫廖夫依据档案文件认为，这种“过高估价”过程，并非在没有军事反间谍机关和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帮助”和“介入”的情况下发生，这些工作人员试图迫使谢苗诺夫合作，以换取活命和自由。刚刚获释的谢苗诺夫早在 1919 年 4 月就已开始和工农红军司令部情报部秘密合作。但是，苏联国防部总参谋部情报总局 1957 年根据情报机关档案和 C. B. 茹拉夫廖夫的材料所编参考资料确认，他们的工作人员谢苗诺夫 1919—1921 年基本上“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系统工作”。从 1922 年起，谢苗诺夫成为工农红军司令部情报部的编内工作人员和联共（布）党员（入党介绍人是叶努基泽、谢列布里亚科夫、克列斯京斯基）。我们从档案文件中可以看到，谢苗诺夫不是执行领导任务的普通人员，而是被赋予很多独立活动机会的宝贵的工作人员，是非同寻常的演员和秘密工作者，明显爱好冒险的人。1923 年秋，工农红军情报部司令部给了他一项经济间谍领域的秘密使命——从德国获取并

带出钨生产工艺情报。1923年的德国革命事件使围绕钨的谍报活动受到了严重威胁。直到临近1924年夏季，谢苗诺夫才终于获得必要数量的钨情报。1924年7月31日回到了苏联。

1927年，苏联军事情报机关又完全需要谢苗诺夫作为战斗队员和军事组织者的经验。谢苗诺夫说，“1927年在布哈林的积极支持下，我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顾问。”于是，这次他被派到了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决裂后，共产国际决心试图按照苏联模式在中国实行民族革命。这一点最明显地反映在1927年12月的广州起义（“广州公社”）中。谢苗诺夫也直接参加了这次起义的准备和实施。1937年10月8日，由乌尔里希担任主席的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就“布哈林中心案”判处谢苗诺夫枪决。判决被立即执行。从现有档案材料可以看到，1927年4月至1928年1月谢苗诺夫在中国，后来来到满洲工作。（参见2000年3月31日《独立报》）

88 阿片·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赫梅廖夫、文采尔，1893—？），拉托维亚人，生于普斯科夫省阿克先诺沃村一个农民家庭。1916年作为校外生完成中学四年学业。后又读完师范学校一年级和准尉学校。1918年7月参加工农红军，任机枪队排长。1919年加入俄共（布）。同年先后任第15师司令部作战科副科长、科长。1920年在登记局任行动处长。1921年先后任高加索方面军登记局局长、第11集团军情报部长。1922年任驻波斯武官。1923年任第5集团军司令部情报处长，1924—1925年任工农红军司令部情报部第2局副局长。1926年9月，以赫梅廖夫为姓到中国，领导中国共产党秘密军事组织活动，组织武装工人纠察队。在他的直接指导下，上海工人举行了3次起义，其中第3次起义夺取了上海。1928年被授予红旗勋章。从中国回国后，任工农红军司令部第四部（情报部）第2局副局长。1931年进伏龙芝军事学院基本系学习，1932年毕业。1932—1934年任情报部副局长。1934—1937年任白俄罗斯军区司令部情报部长。193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后遭到镇压。

89 Г. М. 海费茨（马尔科维奇、格里梅里尔，1899—1984），

犹太人。生于里加附近的德文斯克。俄国社会民主和“崩得”*活动家、1900年即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党员的 M. Я. 海费茨之子，美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A. 古达利斯基的外甥。

1915年即积极参加犹太革命运动，成为“崩得”成员。同年被当局驱逐出里加。此后居住在莫斯科省博戈罗茨克市。1915年当过家庭教师。1916年任犹太工人俱乐部秘书，1917年起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和“崩得”联合组织秘书。同年毕业于博戈罗茨克实科中学。

1918年在莫斯科教育人民委员部民族宫校外处任秘书。1919年任阿列克谢耶夫民族宫主任兼莫斯科苏维埃教育处长的助手。

参加过国内战争。1919年加入俄共（布）。同年6月受“崩得”中央派遣参加工农红军。7月起担任西方面军第16集团军政治部干事。曾在斯卢茨克地区第8师编成内与白匪作战，9月则与第17师部队一起在鲍里索夫卡方向参加战斗。

1920年3月起任莫斯科军区卫生部政委助理。同年相继进莫斯科商业学校和莫斯科大学特别系学习。1921年1月任高加索矿泉区基斯洛沃茨克疗养院政委。曾参加肃清基斯洛沃茨克地区土匪组织的战斗。手臂负了伤。

1921年3月起任政治干部。曾任 H. K. 克鲁普斯卡娅**的秘书，随后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机关工作。1922年起任共产国际国际联络局工作人员。同年4月转到掩护组织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担任外交信使局秘书，随后又任经济处法律主任助理。1924—1927年在外交官身份掩护下从事境外情报活动。离开中国后去柏林工作。

* “崩得”（犹太语“同盟”之意）是“立陶宛、波兰、俄国等国犹太工人总同盟”的简称，系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1897年创建于维尔诺（维尔纽斯）。1898—1903年及1916年后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独立组织（1912年曾被开除）。支持经济主义、孟什维主义、取消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坚持社会沙文主义。1917年支持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其领导人投靠反革命。1920年后不再与苏维埃政权作对。1921年自动解散，部分战员加入俄共（布）。——译者注

** 列宁夫人。——译者注

1929年2月起任《火星》出版社书记兼社长，后任《发明家》杂志责任编辑。

1931年6月起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特别后备人员，到法国和美国工作。回国后，从1935年10月起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第七局对外处副处长。

1938年7月，在未讲明原因的情况下被解除在国家安全总局第5局的工作，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劳改营管理总局任用，被分配到沃尔库塔工作。由于患严重肾脏病，他拒绝了分配。结果在同年9月由于健康原因离开了安全机关，被任命为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副主席兼处长。1939年重新成为后备肃反人员。

1941年10月回到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第1局工作，并于11月被派到旧金山任谍报站长，掩护身份为副总领事。积极参加了对苏联核武器设计的情报保障。1944年7月完成了在旧金山的任务，把工作移交继任者Г. 卡斯帕罗夫。1944年11月被召回莫斯科。曾被授予中校军衔。

1947年4月21日，因精简编制离开了国家全部。1947年经批准担任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副任书记和主席团委员。1951年11月因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被逮捕，1952年8月被判处剥夺自由25年。1953年12月28日因缺乏犯罪要素被释放，并恢复名誉和党籍。1984年在莫斯科去世。曾获一枚红星勋章和一枚“战功”奖章。

90 米尔戈夫·拉约什（马季亚尔·路德维希，1891—1940），生于匈牙利公务人员家庭。1914年前当记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军事记者。1918年底任记者协会总书记。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继续当记者。1920年1月被逮捕。1922年通过交换在押人员方式来到俄罗斯。1922—1926年在塔斯社差不多工作了5年，尔后被调到外交人民委员部。1929年到共产国际东方秘书处担任领导工作。马季亚尔像他周围的许多人一样，被送进了1937年的绞肉机。耐人寻味的是，对马季亚尔的指控之一，竟是他与斯卡洛夫在1934年11月7日进行了致命的谈话（对斯卡洛夫的指控也一样）——当时这个匈牙利共产党员在红场游行结束后，想起不久前法国外交部长路易·

巴尔图和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在马赛遭暗杀的情景，认为应当注意，站在列宁陵墓主席台上的苏联领袖们是潜在的不法之徒的良好靶子。他说苏联的领导权过分集中，与斯大林密不可分，因此对领袖的政治谋杀可能造成可怕的后果。正是这种对苏联领袖们的安全充满忧虑的意见交换，对参与谈话者产生了致命的结果。

91 H. M. 纳索诺夫（恰尔利、尤诺沙，1902—？），1924—1926年在中国任军事顾问。1926年7月起任工农红军司令部第四部（情报部）第四局局长助理。尔后任步兵第43师参谋长。1927年11月起任工农红军司令部第四部工作人员。

92 亚历山德罗维奇（奥莉加·米特克维奇，1889—1943），1927—1928年任红色工会国际驻中国代表。1928—1930年在北高加索做党的工作。1930—1931年任党中央主任指导员。1931—1936年先后任航空工厂党组书记、厂长。后遭非法镇压。

93 伊尔内尔（阿尔图尔、里哈尔德·施塔尔曼，1891—1975），德国人。1924—1927年在莫斯科军事学校学习。1927—1928年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遣到中国做秘密工作。返回莫斯科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组织局任反战工作指导员，随后历任德国共产党瑞典国外局成员，旅苏德国军人工作指导员。1931—1936年任巴尔干共产党人联盟机关工作人员、《巴尔干联盟》杂志责任编辑。

94 P. M. 希塔罗夫（贝格，1900—1939），1925—1927年任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组织局局长。1927年任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中国代表。1927—1928年任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欧秘书处主任。1928—1931年任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28—1935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31年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清理西西伯利亚边疆区党委机关全权代表。1931—1935年在萨哈林岛任市党委书记。1935年起任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后遭非法镇压。已恢复名誉。

95 弗里德里希·费叶尔格尔德（弗里茨·施奈德，1897—1937），1927—1928年任共产国际国际联络局驻中国代表。后遭非法镇压。

96 俄罗斯中国学家 A. M. 格里戈里耶夫断言，在 1931 年 4 月前，中共中央政治局下设“特务工作处”作为中央特科，由向忠发、周恩来和顾顺章领导。后来“特务工作处”似乎改为“特别委员会”。在 1933 年转移莫斯科之前，其领导人为康生。

97 罗亦农（布哈罗夫、罗觉，1901—1928），1901 年生于湖南。1919 年在上海参加“五四”运动。1920 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化名布哈罗夫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5 年回到中国。1926—1927 年参与领导上海无产者武装起义。1927—1928 年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组织局局长，同时担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后被国民党杀害。

98 尾崎秀实（“奥托”、“因韦斯特”，笔名白川次郎等，1901—1941），生于日本记者家庭，本人是记者、作家、诗人。1922—1925 年就读于东京大学。法学博士。1926 年在《东京朝日新闻》报社工作。1927 年供职于《大阪朝日新闻》中国分社。从 1931 年至 1941 年，用日语写了 11 部书，用日语和英语写了大量文章。1934 年起再次和已经在日本的佐尔格合作。当时他在《东京朝日新闻》和东亚问题研究会工作，并且是日本秘密机关工作人员。1938 年被近卫首相任命为内阁中国问题顾问。同时担任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日本在华特务据点）研究局的咨议专家。1939 年 8 月起负责编纂南满铁路“生产”月报。1941 年被逮捕。1944 年 11 月 7 日被杀害。

99 这一时期的中国银圆（一圆）重量与 18 世纪至 20 世纪初大量流入中国的墨西哥比索（外汇）相同。中国在 19 世纪末已经开始制造银圆，但在国外仍按习惯将其称为墨西哥元。

100 格尔曼·约翰（亚甘）·甘索维奇（1896—1938），生于纳尔瓦，爱沙尼亚人。在彼得堡读完中学和会计训练班。曾任准尉，步兵第 429 团军官。参加过国内战争。1919 年加入俄共（布）。1919—1920 年在爱沙尼亚步兵师做参谋工作，与邓尼金、马赫诺和弗兰格尔军队打过仗。1920 年起在工农红军军事学院学习，1923 年毕业于该院基本系和东方系。同年到中国担任广州顾问团军事顾问（“五人

小组”之一)。在中国参与创建黄埔军校，并参加了广东的几次作战。1926年起在情报部工作。1927—1928年任情报部情报统计局工作人员。1933—1936年归情报部任用，曾任该部第一局（西方局）的处长。193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36—1938年在西班牙任军事顾问。1937年被授予列宁勋章。1938年6月8日被逮捕，9月3日被枪决。

101 泽涅克·约瑟夫·雅科夫列维奇（泽姆布罗夫斯基，1898—1937），苏联军事情报人员。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1918年加入俄共（布），参加了工农红军。1925年毕业于工农红军军事学院。1925—1927年任广州顾问团军事顾问。1927—1929年任工农红军司令部第二部工作人员。1930—1932年任驻德国副武官。1937年7月25日被逮捕，11月21日被枪决。

102 马采利克·费奥多尔·格奥尔吉耶维奇（马采利克，1895—1938），苏联军事情报人员。乌克兰人。军校毕业。1918年参加工农红军。1924年起在情报部工作。后毕业于工农红军军事学院。1924年10月到中国任广州顾问团军事顾问。在黄埔军校任教官。参加了广东几次作战和北伐，任第3军（滇军）顾问。1927—1930年任工农红军司令部第2部局长助理、处长。1930—1935年在情报部工作。1935—1937年任第1局处长。随后任情报部对外关系局代局长。旅级军衔。1937年11月23日被逮捕。1938年6月14日被枪决。

103 西尔伯特·约瑟夫·伊萨耶维奇（1898—1939），犹太人。生于波兰罗兹。1917—1918年为无政府工团主义者。1918年加入俄共（布）。参加过国内战争。1924年毕业于工农红军军事学院基本系和东方系，由工农红军司令部第四部（情报部）任用。1924年10月至1926年在中国工作。在黄埔军校任教官，并担任广州顾问团军事顾问，参加了广东多次战斗和北伐。1926—1927年任情报部第4局局长助理。1931年被授予红旗勋章。1931—1932年先后任情报部第3局副局长、空军科学实验研究所所长。1938年9月19日被逮捕，1939年4月15日被枪决。

104 帕纽科夫·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科米，1895—1938），苏联军事情报人员。科米族，显然正因如此化名科米。生于

科米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乌斯季库利斯基区涅别季村。在乌斯季瑟索利斯克上完中学后，就读于华沙技术学校。后应征参军，毕业于彼得戈夫第三准尉学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团副官。1918年加入俄共（布）。同年参加工农红军。参加过西伯利亚剿匪。曾任步兵营长、炮兵营长。1922—1924年历任土耳其斯坦方面军、列宁格勒军区特种任务部队参谋长。后毕业于塔什干东方学训练班。1924年10月到中国。起初在黄埔军校当翻译，随后当教官。作为军事顾问参加了广东多次作战。北伐即将开始时，被布柳赫尔（加伦）任命为第26军军长白崇禧将军的军事顾问。1927—1932年在工农红军预备队任师长，并在军事化的警卫队任职。1932年起在情报部工作。从中国回国后，1932—1936年曾任蒙古人民军总参谋部军事顾问。1936—1937年任工农红军情报部第九局局长。1937年8月13日被逮捕，1938年3月15日被枪决。1956年恢复名誉。

105 M. Г. 叶夫列莫夫（阿布诺尔特，1897—1942），生于图拉省，曾在莫斯科一家工厂当木器雕刻工，同时在一所夜校学习。1915年应征参军，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毕业于高加索准尉学校。积极参加了1917年革命，在红军中担任过由连长到旅长的各级指挥职务。1919年加入俄共（布）。1920年参加了解放巴库战斗。先后被授予三枚红旗勋章和荣誉武器。从中国回国后历任高级职务*。1930年毕业于政治学院（一长制首长系）。1933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在前线牺牲，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106 塔尔哈诺夫·奥斯卡尔·谢尔盖耶维奇（拉祖莫夫·谢尔盖·彼得罗维奇、O. 陶贝、O. 塔宁、O. 埃贝格、卡里奥、杨柱来，1901—1938），犹太人。1918年加入俄共（布）。共青团创建者之一。曾担任敖德萨地下组织领导人。1918年秋为躲避逮捕到克里木（克

* 叶夫列莫夫·米哈伊尔·格里戈里耶维奇是从中国回国后担任过各种高级职务的为数很少的高级指挥员之一。从1937年起历任伏尔加河沿岸军区、后贝加尔军区、北高加索军区等五个军区的司令员。卫国战争开始后历任集团军司令员、方面军副司令员。1942年4月在维亚济马率部突围时阵亡。——译者注

里米亚)，任共青团克里木州地下委员会书记和州党委委员。国内战争后任少年先锋队中央局第一主席。1923—1924年任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书记。1925—1927年在中国担任政治顾问，尔后到蒙古工作。1927年因支持托洛茨基主义被开除出党。1928年恢复党籍。1930年到历史与苏联建设和法制研究所东方班学习。1932年起在工农红军服役。1937年6月12日被逮捕，时任驻蒙古全权代表处顾问。1938年2月3日被枪决。

107 约尔克·叶夫根尼·西吉兹蒙德维奇（约甘、约甘松、姚凯，1900—1942?），犹太人。1919年加入俄共（布），1926年参加工农红军。1926—1927年在驻中国的鲍罗廷机关工作。1932年起在工农红军任职。团政委级军衔*。1934年起由工农红军情报部任用。1937年被情报部党组织视为人民的敌人开除出俄共（布）。

108 П. А. 巴甫洛夫（在中国用戈沃罗夫姓氏，1892—1924），生于沙皇军队中将家庭。曾就读于武备中学，后进入彼得堡工学院深造。1914年应征参军，被送进准尉学校。尔后被提升为近卫军沃伦斯基团军官。1919年加入俄共（布）。因在国内战争中及消灭坦波夫省安东诺夫匪帮和布哈拉的反革命匪徒战斗中战功卓著，被授予两枚红旗勋章（1917年前已得过四次奖赏）。

109 Н. Д. 卡希林（1888—1938），苏联军事首长，1918年加入俄共（布）。曾与哥萨克首领杜托夫的白卫军作战，任支队长。是乌拉尔远征军领导人之一。

110 Ф. 萨赫诺夫斯基（尼洛夫，1898—?），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毕业于工农红军军事学院。1924—1926年，在中国任军事顾问。1926年7月起任工农红军司令部第四部第四局局长助理。1927年11月起任工农红军司令部第四部工作人员。

111 萨赫诺夫斯卡娅—弗廖罗娃·玛利亚·菲利波夫娜（丘巴列娃，1897—1937），苏联女军事情报员。生于维尔诺。犹太人。1918年加入俄共（布）。参加过国内战争，在布勃诺夫的宣传列车工作。

* 1935年所定苏军政治干部军衔，相当于军事干部的上校。——译者注

尔后到骑兵第1集团军，是苏联惟一毕业于工农红军军事学院基本系的女性。后被派到中国担任军事顾问。在广州顾问团工作，担任顾问团参谋长，并在黄埔军校当教官。回苏联后，在情报部工作，领导训练游击队员和破坏人员的一个局。曾被授予红旗勋章。1928年因支持托洛茨基主义被开除出俄共（布）。1928年12月29日第一次被捕。1929年1月5日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特别会议决定将其流放西伯利亚三年。但这一决定在1929年12月23日被撤销。1937年4月15日第二次被逮捕。同年7月31日被最高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同日被枪决。

112 B. A. 斯捷潘诺夫（1886—1936），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国内战争。1925—1926年在中国担任军事顾问。1926—1928年任工农红军司令部第一部第4局副局长。1929年7月起任工农红军司令部第五部第2局局长。1930年起历任师长、师政委、乌克兰军区副司令员。1926—1928年在工农红军军事学院学习。

113 M. H. 卡扎宁（1899—1972），1925—1927年在中国工作。在布柳赫尔的副手 A. 布拉戈达托夫手下当军事翻译。

114 Г. Б. 斯卡洛夫（西纳尼，1896—1940），1896年5月7日生于莫斯科。是破产地主和农艺师6个孩子中的长兄。母亲是教师。家庭在他9岁时解体。起先他和母亲一起先后住在彼得堡、罗加乔夫、明斯克，后来又和父亲一起住在奥伦堡和萨马拉，并于1912年在萨马拉读完了实科中学。1914年春读完普通中学。在这些年中，他像自己在自传中写的那样，“同情革命，并且认为自己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但是对无政府主义的了解又极其含混。”他进了彼得堡交通工程学院，但一年半后，即1915年春季，就以享受优待的身份志愿参军。他后来回忆说：“我没有什么爱国主义热情，但是我认为前线的人在受苦受难、流血牺牲，我呆在后方是‘可耻的’。”秋季，被提升为准尉，负责后备炮兵连的总务，半年后被任命为喀山炮兵区监察员属下动员组组长，其职责是把新的炮兵编成送到前线。他在喀山读了很多书，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文献，不过《资本论》到最后“也没有攻下”。“对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差别也不甚了了，只把它们简化

为对战争的态度问题。本人是护国派。”

1917年1月，他所在的炮兵旅前往法国支援协约国盟军。但是军列在彼得格勒被阻。20岁的中尉被卷进了二月革命的旋涡，又被推到了革命浪潮的最高峰。他被士兵选为该旅军人委员会委员、旅长、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委员，成为常设局委员，以及该组织士兵委员会主席的同志。斯卡洛夫和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阿夫克先季耶夫、切尔诺夫，孟什维克马尔托夫、达恩、奇赫伊泽、格沃兹杰夫，中间分子托洛茨基及布尔什维克斯大林、莫洛托夫、季诺维也夫、什利亚普尼科夫一起进入了苏维埃领导机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他作为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代表，被选为第一届（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全俄中央委员，并进入全俄中央军事部。后来他写道：“虽然二月革命后彼得格勒的孟什维克组织给了我一张印有党龄‘自1916年起’的党证，实际上我只是在二月革命后才成为比较自觉的社会民主党人。”他履历中的这些斑点，后来在1933—1937年党的清洗运动中遭到了清算。

接着，斯卡洛夫与过去进行了决裂，不再去捍卫二月革命的理想，于1919年春参加了红军，同年11月在塔什干加入了俄共（布）。他在中亚参加过国内战争的许多激烈战事。许多重要的使命让他去完成，他还参加了花拉子模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他在不同时期领导过阿姆河局、谢米列奇耶军事委员会（该委员会管辖州执委），指挥过被派去解除韦尔内（即阿拉木图）叛军武装的支队（Д. 富曼诺夫所写长篇小说《叛乱》描写过这些事件），当过国际主义宣传委员会驻新疆的全权代表。布哈拉酋长（埃米尔）被打倒后，他被任命为H. B. 古比雪夫的助手、俄罗斯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全权代表、俄共（布）和共产国际驻布哈拉代表。1920年底，斯卡洛夫作为费尔干纳集团军级集群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协调过平定巴斯马赤叛乱的军事斗争。在参与镇压咯琅施塔得叛乱后，他被授予红旗勋章。随后再次到东部领导土耳其斯坦肃反委员会（其前任有Г. 博基、Я. 彼得斯等）。1922年底，根据他的请求，被调出土耳其斯坦，又根据俄共（布）中央的决定，被任命为莫斯科东方学学院院长。共和国革命

军事委员会主席伏龙芝在土耳其斯坦就了解斯卡洛夫，根据他的建议，斯卡洛夫被派到了中国。他在中国化名西纳尼，领导开封军事顾问团，并担任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指导员，在鲍罗廷去汉口后，成为广东政府顾问。回苏联后，到工农红军军事学院东方系学习。1929年被派到蒙古领导苏联政府代表团。1930年8月，根据联共（布）中央组织局的决定，“由工农红军司令部第四部任用”的斯卡洛夫“转由共产国际任用”，但仍然由工农红军司令部（第四部）给予特别关注。1930—1931年任共产国际指导员。1935年3月29日在高尔基大街自己的住宅里被逮捕（就在3月26日，他还在共产国际党委会上拒绝对自己的攻击和指控，声称他曾由情报系统派到国外，说明他是得到信任的）。搜查中没收了编号为2826号的红旗勋章、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的信件、报纸、望远镜和莫斯科军事测绘局出版的地图。他成了“克里姆林宫案件”的被告。此案指控在克里姆林宫似乎有一系列职员、卫戍处工作人员及军人等企图谋害斯大林。Л. Б. 加米涅夫被指为这一“密谋”的首领。对斯卡洛夫的指控最为笼统：与马季亚尔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地下反革命组织的其他活动家有联系。斯卡洛夫“承认自己”在进行反苏谈话和企图对斯大林采取恐怖行动方面“有过错”，被判处10年监禁，没收财产和剥夺政治权利三年。1940年，斯卡洛夫死于劳改营。

115 日古尔·扬·马季索维奇（斯特鲁姆比斯，1895—1938），1912年入党，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军衔为中尉。1918年参加红军。曾任步兵第40师师长。1923年毕业于工农红军军事学院。1924年起在工农红军司令部第四部（情报部）工作。1925年任第四部第3局局长助理，1926年起任副局长。在中国化名斯特鲁姆比斯领导广州顾问团情报处。1930年5月任工农红军军事化学部副部长。后任伏龙芝军事学院和总参谋部军事学院主任教员。曾被授予红旗勋章。1937年12月14日被逮捕，1938年8月22日被枪决。

116 A. B. 布拉戈达托夫（罗兰，1893—？），生于卢布尔雅那梁赞步兵第69团一个大尉家庭。其父为功勋作战军官，曾参加俄土战争，1904年志愿参加俄日战争并战死。布拉戈达托夫先后毕业于

雅罗斯拉夫尔武备中学、炮兵学校。国内战争中参加过古利亚伊波列附近打击马赫诺的最激烈交战。1922年9月进入工农红军军事学院学习。

117 戈列夫·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维索科戈列茨、尼基金，1900—1938），白俄罗斯人，军事情报员。1915—1920年为无政府共产党人。1920年加入共产党。1918—1923年先后任游击队员、政治工作人员、工农红军部队特别处干部。1924年毕业于工农红军军事学院基本系和东方系。1927年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3月24日决定被授予红旗勋章。从中国回国后任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军事领导人。后去西班牙作战。1930年化名B. 维索科戈列茨出版了《中国军队》一书。1930—1933年在美国任谍报站长。1936—1937年任苏联驻西班牙武官。1938年1月25日被逮捕，同年6月20日被枪决。

118 A. H. 切尔尼科夫（Campan, 1889—?），1925—1927年在中国先后任张家口、广州顾问团军事顾问。回国后任工农红军指挥干部。

119 O. Ю. 普利切（柳克斯），拉托维亚人。1926—1927年任苏联驻汉口总领事。

120 B. K. 普特纳（1893—1937），国内战争中先后任团政委、团长、师长。后遭非法镇压。已恢复名誉。

121 谭平山（1886—1956），广东人。同盟会会员。1917年进北京大学学习。参加了学生运动。1920年参与组织广州共产主义小组。1923年任改造国民党委员会成员，作为共产党员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年1月），根据孙中山的建议进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先后担任组织部长和农民部长，后担任武汉政府成员。

122 杨殷（1892—1929），广东人，1911年加入同盟会，曾与秘密团体有联系。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赴苏联学习。1923年回国。是中国南方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曾参与领导省港大罢工。参加了1928年在莫斯科

郊外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共中央军事部长。1929年8月24日，由于叛徒、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告密，在上海被捕。同年8月30日被杀害。

123 布赖洛夫斯基（艾季金）于1924年7月到达广州，10月前担任武官助理。卡丘申的身份没有查明，但是有人估计他可能是科托夫·列昂尼德·亚历山德罗维奇（1899—1981），戈梅利情报机关工作人员，1925年毕业于军事学院，他又叫艾廷根·璘姆·伊萨科维奇，生于什克洛夫城。1917年加入左派革命党，1918年参加红军。

124 鲍罗廷·弗雷德（费奥多尔），米哈伊尔·鲍罗廷和法因娜·鲍罗廷娜的长子，在美国出生和成长，英语讲得比俄语还好。在家里按美国方式叫他弗雷德。1925年他17岁，以公开身份在上海的美国学校上学。

125 M. M. 奇赫伊泽，1925—1927年在中国任军事顾问。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在工农红军司令部第二部担任重要工作人员。

126 A. H. 切尔尼科夫（萨特拉普，1891—？），毕业于工农红军军事学院。1926—1927年在中国任军事顾问。后在工农红军任指挥职务。

127 И. И. 瓦西列维奇（1895—1937），1926—1927年任中国南方军事顾问团成员。

128 E. B. 捷斯连科（捷列先科，1898—1972），1925—1927年在中国任军事顾问。后在军事工业部门担任领导工作。

129 K. Я. 沃洛金，1927年11月至1940年10月先后担任多个军区的炮兵主任。

130 约赫尔（И. М. 穆辛、马克西莫夫，1894—1928），1920—1922年先后在外交人民委员部担任Г. И. 契切林的秘书、远东人民共和国驻中国使馆工作人员。1922—1925年任共产国际政治顾问和秘书。1925—1927年任塔斯社驻中国记者。1928年自杀。

131 A. Я. 克利莫夫（1898—1970），1918年加入俄共（布），在远东参加了革命运动和国内战争。后毕业于工农红军军事学院东方

系。曾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24年）。1924—1925年在中国河南顾问团任军事政治顾问。1925—1926年在张家口顾问团工作。后任苏联驻张家口领事。1927年回莫斯科。以后担任外交和教学工作。

132 阿基莫夫·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彼佳·西林、白佳，1901—1957），苏联军事情报员。1919—1922年为红军战士、土耳其斯坦军区政治工作人员。1925年毕业于塔什干工农红军东方学高级训练班中国班。1932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东方系。1927年被授予红旗勋章。1932—1936年在情报部情报局和东方局工作。1937—1938年在中国兰州从事中国抗日军队的供应工作。1938—1939年离开工农红军。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先后任师长、军长。

133 C. C. 切金（谢尔盖耶夫，1894—？），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国内战争，1925年到中国。1926—1927年任张家口顾问团工程顾问，与K. B. 卡利诺夫斯基一起为冯玉祥的国民军第1军制造了5辆装甲列车，这几辆列车对在北京地区抗击奉军起了很大作用。从中国回国后曾任古比雪夫军事工程学院副院长。

134 K. B. 卡利诺夫斯基（科尔德，1897—1932），1897年生于斯摩棱斯克一个俄国军官家庭。依靠莫斯科的亲戚，在莫斯科第二中学上学。毕业后以享受优待的身份志愿参加作战部队，到了炮兵第4师。革命爆发后，和整个炮兵营一起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1919年夏，被送进莫斯科高级汽车装甲坦克学校学习，1919年11月17日毕业后被任命为8号装甲列车车长，前往南方面军与波兰白军作战。由于在国内战争中战功卓著，被授予两枚红旗勋章。后进工农红军军事学院深造。学习期间，进行了科学研究，写了几篇论述装甲坦克兵在不同类型战斗中使用的引人注目的文章。他还担任了《红军技术与供应》杂志编委会委员。卡利诺夫斯基以谦逊著称，从不炫耀自己的战斗和革命功勋。1932年在空难中牺牲。*

* 据权威材料，卡利诺夫斯基于1931年7月12日死于空难，同机遇难的有红军副参谋长特里安达菲洛夫等。因此，其卒年应是1931年。

135 A. Я. 克利莫夫 (1898—1970), 在远东参加了革命运动和国内战争, 1918 年加入俄共 (布)。毕业于工农红军军事学院东方系。滨海地区和西伯利亚党的老一代工作者。曾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1924 年)。后在中国任军事政治顾问。1925—1926 年在河南顾问团工作。1926—1927 年任开封军事顾问团团长的政治助理、苏联驻张家口领事。1927 年回到莫斯科, 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以后从事教学研究工作。

136 鄂山荫·伊利亚·米哈伊洛维奇 (1900—1982), 生于雅罗斯拉夫尔一个俄罗斯贵族和法学家家庭。最初就读于华沙中学, 1918 年毕业时获金质奖章。他除通晓希腊语、拉托维亚语外, 还通晓德语、法语和波兰语。后志愿参加工农红军, 但由于视力差, 被认为不适宜队列勤务, 因此被分配到最高军事检查机关当办事员, 随后又被派到工农红军通信部当文件管理员, 一直到 1922 年。其间经首长介绍, 被准许在军事学院旁听中文课程。后来进入东方学学院外交系。1924 年在该院毕业后, 这位年轻的中国学工作者到北京担任商务代表处翻译。一年后, 根据全权代表的命令, 进入冯玉祥国民军第 2 军军事顾问机关。1926 年 2—3 月冯将军的军队遭败绩后, 年轻的翻译辗转至汉口和上海, 在那里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部翻译近一年。1927 年开始在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任翻译。

137 波斯特尼科夫·鲍里斯·彼得罗维奇 (1895—1941), 苏联军事情报员和外交家。1917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 年参加工农红军, 参加过国内战争。1913 年毕业于工农红军军事学院。后在外交“外衣”掩护下担任军事情报员: 1923—1927 年任驻阿富汗马扎里沙里夫领事; 1927—1931 年任驻喀什总领事。1932—1938 年由工农红军第四部 (情报部) 任用。其间 1933 年任外交人民委员部驻塔吉克斯坦代表。1936 年被授予团政委级军衔。1938 年从工农红军退役。后任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1941 年 4 月被逮捕, 同年 11 月 21 日在萨拉托夫被枪决。

138 M. M. 卡扎斯 (1896—?), 卡拉伊姆人 (克里木半岛), 生于职员家庭。1914 年中学毕业。1919 年加入俄共 (布)。1920—

1921年任奥伦堡省肃反委员会特派员。1921—1922年任肃反委员会特别处处长助理。1922—1924年先后在拉扎列夫东方语言学院*、工农红军军事学院东方系学习。到中国前，在1924—1927年以全权代表处二等秘书职务为掩护，任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外局驻德黑兰谍报站站长。1929年起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中央机关工作。1939年从内务人民委员部退役。

139 阿利亚夫金·尼古拉·瓦列里扬诺维奇（1901—?），生于莫尔尚斯克。先后毕业于莫尔尚斯克中学和党校（1922年）。1918年志愿参加工农红军，参加过国内战争。1918—1927年在浮空部队**行政机关工作。1933年毕业于侦察进修班，并被派到工农红军司令部第四部工作。尔后历任苏联驻旧金山（1934—1936年）和洛杉矶（1937年）总领事馆副总领事。1937年退出现役。据中央档案馆材料，阿利亚夫金未遭镇压。

140 阿布拉姆松（Г. М. 格里戈里耶夫，1901—1997），犹太人。生于敖德萨。1906年随家迁到哈尔滨。毕业于哈尔滨中学。1919年迁移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在联共（布）党委会工会出版社工作。1920年4月日本人占领符拉迪沃斯托克，他在收到收件人为格里戈里耶夫的文件后转入地下，此后即以格里戈里耶夫为姓。1920年7月加入俄共（布），11月起在工农红军服役。1922—1924年在工农红军军事学院东方系学习（专业为中国问题），随后担任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1925—1927年和1931—1933年两次作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派遣人员到中国，先后以秘书、副领事、领事身份为掩护驻齐齐哈尔和天津。1934—1938年在苏联驻美国全权代表处工作。

* 莫斯科东方学学院的前身。1815年在莫斯科用亚美尼亚贵族拉扎列夫（拉扎良）家族遗产建成。讲授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亚美尼亚语、阿塞拜疆语、格鲁吉亚语。1919年改称亚美尼亚学院，1921年改称莫斯科东方学学院。——译者注

** 浮空指乘坐轻于空气的器械（气球等）飞行，最早见于18世纪。苏维埃俄国在1917年12月组建了第一批浮空部队，随后参加了作战。卫国战争中主要用于侦察和炮兵校射。——译者注

1945年后，格里戈里耶夫被任命为军事外语学院中文教研室副主任。1949年12月至1965年底在《苏联百科全书》出版社词典编辑部任汉语词典主任编辑。1966年至退休在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工作。

141 C. A. 斯卡尔别克（斯科尔别克、别涅迪克，1897—1974），波兰人，生于波兰文奇察。曾是德国“崩得”成员（1916—1918年）。后成为德国共产党员。电工。1920年到苏维埃俄国，被吸收进俄共（布），党龄从1918年起算。1930年“因在远东事件中努力工作”被授予镌刻姓名的银表。

142 泰罗夫·鲁边·阿尔乔姆耶维奇（特尔—格里戈里扬、特尔、特鲁尼，1894—1938），亚美尼亚人，1894年生于纳戈尔内卡拉巴赫的伊斯帕甘朱克镇一个农民家庭。1914年毕业于巴库商业学校。1915年成为布尔什维克。1916年再入基辅商业学校学习，并与该校一起后撤到萨拉托夫，在那里因参加社会民主集会逮捕，坐了两个月牢。十月革命后在莫斯科苏维埃财政部门工作。1918年参加工农红军。参加过国内战争，先后任卡尔梅克第1师、第9集团军政委，第10集团军政委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骑兵第1集团军政委。曾在北高加索方面军政治部工作。后毕业于工农红军高级指挥人员军事速成班。1924—1925年在工农红军军事学院东方班学习。1924年10月至1927年以特鲁尼为姓到中国。1925—1927年任华南军事顾问团司令部政委、顾问团政治副团长。1929年7月至1932年2月任工农红军司令部第四部部长助理、第二局局长。1935—1937年任苏联和联共（布）中央驻蒙古全权代表。1937年“因在外交领域工作出色”被授予列宁勋章。同年6月被逮捕，1938年8月22日被处以极刑。

143 共产国际档案馆保存的最后文本与美国托洛茨基档案室保存的校对文本有出入。

144 《蒋介石日记》，第215页。转引自П. 巴拉克申：《在中国的结局》，第27页。

145 引自斯捷潘诺夫的报告（从1927年4月6日在苏联驻北京大使馆抄走的文件中找到）。

146 可以援引维经斯基1925年4月22日写给苏联驻中国全权

代表加拉罕的一封信，作为此种情况的证据。信中写道：“近日在同斯大林长谈时已经看清楚，在他的意识中，共产党人已经溶化在国民党内，他们没有独立的组织，受国民党的‘虐待’。斯大林同志对共产党人这种依附地位表示遗憾，看来他认为，在中国出现这种情况，历史地看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向他解释，共产党有自己的组织，而且是比国民党更加团结的组织；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享有批评的权利，国民党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的同志做的。他对此感到十分惊讶。为了辩解自己对国民党内共产党人地位的看法，斯大林引证了报纸上的消息和我们发自中国的情报。确实可以认为，对于没有到过中国和不了解中国实情的那些人来说，鲍罗廷的通报正会造成那样的认识。”（参见 A. B. 潘佐夫：《苏中关系秘史》，第 126 页）

147 M. Г. 拉费斯（马克斯，1883—1941），1920 年起在共产国际鼓动与宣传局工作。1926 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驻上海秘书。以后任塔斯社国外消息处处长。1941 年遭非法镇压，后恢复名誉。

148 A. C. 切尔内赫（1892—1940），生于色楞金斯克城。1926—1927 年任苏联驻中国临时外交代办。1927—1928 年任苏联中央统计局局务委员会委员。1928—1931 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干部。1931—1933 年任全苏农业科学院副院长。1933—1935 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下属全苏无线电委员会委员。1935—1939 年任苏联驻伊朗全权代表。

149 M. M. 拉舍维奇（1883—1928），生于敖德萨，并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代。17 岁时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该党分裂后投向布尔什维克。曾任党的叶卡捷琳堡、彼得格勒委员会委员。由于参加革命活动，曾几次坐牢，并被沙皇政府流放到沃洛格达省和纳雷姆边疆区。1917 年作为起义者在彼得格勒参加了夺取电报局、国家银行、金库和邮电局的行动。1918—1919 年和 1923 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在红军队伍中参加了打击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尤登尼奇的战斗。波兰战争结束后，被派到西伯利亚担任西伯利亚军区司令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25 年被任命为第一副陆海军人民委员、

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因战功两次被授予红旗勋章。

150 B. И. 克利亚尔费尔德 (1895—1939), 生于赫尔松省。1915年毕业于实科中学。1917年毕业于彼得格勒准尉学校。1919年加入俄共(布)并参加工农红军。1920—1924年在登记局工作。1924—1926年任步兵第14师司令部作战科副科长。1935—1938年由工农红军情报部任用。1939年3月19日被枪决。

151 B. C. 多夫加列夫斯基 (1885—1934), 工程师, 190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1年任俄罗斯联邦邮电人民委员。1924—1925年在瑞典、1925—1927年在日本、1927年起在法国任全权代表。

152 《林伯渠传》, 北京1986年版, 第127页。

153 参见 И. 巴拉克申: 《在中国的结局》, 第43—44页。后来, 中苏外交关系恢复, 蒋介石曾数次请求苏联政府派布柳赫尔去给他当军事顾问。但是, 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1939年, 立法院代表宋福(译音)到莫斯科, 按照蒋介石的要求, 亲自向斯大林提起布柳赫尔。直到这时, 斯大林才答复, 布柳赫尔因“受日本女间谍诱惑”已被处死。

154 B. A. 乌科洛夫, 1910年因参加革命活动被终身流放西伯利亚, 后从那里逃到澳大利亚, 结识了谢尔盖耶夫(阿尔乔姆)。1917年后回到祖国。国内战争中在北方面军担任集团军司令部领导成员, 土耳其斯坦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反间谍处处长。后转到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

155 A. И. 哈西斯 (1894—1927), 1916年加入俄共(布), 在工农红军任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1924年毕业于工农红军军事学院东方系。1924年10月起在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局工作。1925年

* 据正式文献是副主席。1925年1—10月的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是伏龙芝, 伏10月逝世后由伏罗希洛夫于11月接任。另外, 拉舍维奇在1918年、1919年和1923年三次当选为中央委员, 1925年当选候补委员。1927年因参加托派被开除出党, 但随即承认错误, 恢复了党籍。1926—1928年任中东铁路理事会副主席。1928年歿于哈尔滨。——译者注

被任命为驻上海总领事馆秘书，随后到汉口任总领事馆秘书。1926年12月被任命为广东总领事馆副领事。

156 Ф. И. 波波夫 (1896—1927)，生于乌法省斯捷尔利塔马克县一个农民家庭。1919年应征参加红军。1920年加入俄共（布）。复员后开始在外交人民委员部担任译电员。1922年被派到苏联驻蒙古全权代表处，一直工作到1926年。随后调到苏联驻广州总领事馆担任译电员。

157 П. П. 马卡罗夫 (1897—1927)，顿河哥萨克。毕业于实科中学。1918年10月至1920年1月当海员。1923年在俄罗斯联邦驻满洲全权代表处任翻译，随后被调到驻齐齐哈尔领事馆。1927年8月6日被调到苏联驻广州总领事馆任翻译。

158 К. И. 伊万诺夫 (1894—1927)，生于弗拉基米尔省，毕业于农业学校。1919年加入俄共（布），应征参加了红军技术部队。后在外交人民委员部担任外交信使。1925年7月1日被派到苏联驻北京全权代表处，工作到1927年。同年7月1日起在驻广州总领事馆任办事员。

159 Б. А. 波赫瓦林斯基 (韦谢洛夫)，1927年在苏联驻广州总领事馆工作。1928年起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局局长。写过回忆广州公社失败的文章（《广州的悲剧：苏联驻广州总领事馆被毁记（目击者的叙述）》，载《广州公社》一书）。

160 参见 Б. А. 波赫瓦林斯基：《广州的悲剧：苏联驻广州总领事馆被毁记（目击者的叙述）》，载《广州公社（纪念广州起义40周年）》，莫斯科1967年版，第165—167页。

161 莫斯科维奇 (列昂尼德·阿布拉莫维奇·阿努洛夫，1897—1974)，生于基什尼奥夫县甘切什特镇。军事情报员。1916—1917年为沙皇军队列兵。曾参加比萨拉比亚布尔什维克地下活动。1918年参加工农红军。1919年加入俄共（布）。同年毕业于敖德萨炮兵指挥员训练班。1919—1922年在外国长期出差。1922—1923年任国家保安总局反间谍局全权代表助理。1923—1924年毕业于第四部情报训练班。1925—1926年在情报部中央机关工作。1926—1927年在外国出差。1927—1929年任情报部第二局处长。后毕业于情报进修班。

20 世纪 20 年代 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

〔俄〕维克托·乌索夫 著

赖铭传 重译

焦广田 冯 炜 初译

解放军出版社



SULIANQINGBAOJIGUANZAIZHONGGUO

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

〔俄〕 维克托·乌索夫

重译：赖铭传

初译：焦广田 冯炜

20世纪20年代



20世纪20年代

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



SULIANQINGBAOJIGUANZAIZHONGGUO

责任编辑：郭莹 封面设计：张禹宾

ISBN 978-7-5065-5493-0



9 787506 554930 >

ISBN 978-7-5065-5493-0 定价：25.00元



Я. К. 别尔津——1924年为军事情报机关领导人



Я. X. 达夫强——国家政治保安局对外局第一批领导人之一，1924年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驻中国总谍报负责人



武官——A. E. 叶戈罗夫



武官——A. И. 黑克尔



军事顾问——A. Я. 拉平



总军事顾问——П. А. 巴甫



A. A. 越飞——1922-1923年
驻中国全权代表



M. M. 鲍罗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中
国代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总政治顾问



翻译——Г.科利丘金娜（В.К.布柳赫尔之妻）



国民革命军总军事顾问В.К.布柳赫尔（加伦）和顾问И.沃罗比约夫（沙尔费耶夫）——1925年第一次东征时留影



驻中国全代表Л.М.加拉罕



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Г.Н.维经斯基



顾问——И.К.马马耶夫



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П.米夫



军事情报员——М.Ф.萨赫诺夫斯卡娅·弗廖罗娃(丘巴列娃)



总军事顾问——В.М.普里马科夫

译者的话

《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是俄罗斯历史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历史学博士乌索夫·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撰写的历史著作。作者1943年生于莫斯科。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亚非国家学院）。曾先后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进修。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俄中友好协会理事。其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包括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传统）和俄中关系。迄今已写过130余部（篇）著作。目前正在继续写20世纪不同年代苏联在中国进行谍报活动的情况。

本书援引大量档案材料和相关题材的众多著作，比较严谨、客观地叙述了苏联对外情报机关的形成和历史沿革，着重介绍了与远东地区，特别是与中国密切相关的情报系统，展现了20年代在中国进行的谍报工作。

书中披露了许多在我国还鲜为人知的人物和事件，其中包括：中山大学（全称为中山中国劳动者大学）对中国干部的训练，苏俄和共产国际情报机关在北京、哈尔滨、上海、广州的谍报组织和具体活动，记述了中东铁路的争端，苏俄向南方革命政府、黄埔军校及冯玉祥国民军派遣专家的情况和这些专家回苏联后的命运等等。需要指出的是，本书通过篇幅达数万字的注释，对书中提到的数以百计的人物生平和归宿作了交代。这些史料对于研究20年代中俄、中苏关系以及苏联、俄罗斯当时的谍报工作，具有较大参考价值。不过，同时应当指出，作者的有些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请读者加以鉴别。

本书正文由焦广田、冯炜初译；赖铭传进行了重译，并择要翻译了 160 余条注释，对书中为数众多的历史事件、机构、人名、引文进行了认真查证，力求准确。不过由于资料所限，仍有个别中国历史文献、文章或较不重要的中国人名无法按原文、原字译出，敬请读者谅解。

2007 年 5 月，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20 世纪 20 年代 / (俄罗斯)
乌索夫著；赖铭传译.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
ISBN 978 - 7 - 5065 - 5493 - 0

I . 苏… II . ①乌…②赖… III . 苏联—情报机构—
活动—史料—中国 IV . D751.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10218 号

版权页注明：

Викто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Усов

Советская разведка в Китае. 20-е годы XX века

Москва: 《ОЛМА-ПРЕСС》, 2002г.

根据莫斯科《ОЛМА-ПРЕСС》出版社 2002 年版本译出

版权所有：《ОЛМА-ПРЕСС》出版社。本书中文专有出版权由
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为解放军出版社取得。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100035)

北京国防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A5 印张：9.625

字数：283 千字 印数：5000 册

定价：25.00 元